

失控的 群體思維

The Power of Others

Peer Pressure, Groupthink,
and How the People Around Us Shape Everything We Do

譯——林士棻 著——麥可·龐德
Michael Bond

英國心理學會
2015年度選書

獨家「情緒傳染量表」
1分鐘知道你多容易受人影響!

從同儕壓力到同溫層效應
人的一舉一動
都逃不出「群性」

社會衝突、動盪背後，全來自看不見的「群體情緒傳染」

何明修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孫蒨如 政治大學心理學教授 | 超級Y YouTuber

黃益中 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 黃涵榆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 萬毓澤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專業推薦 (依姓氏筆畫排序)



The Power of Others

Peer Pressure, Groupthink,
and How the People Around Us Shape Everything We Do

麥可·龐德——著 林士棻——譯

Michael Bond

獻給潔西卡

序言

我們也許以為事情都在掌握之中，但大多時候正好相反。我們的想法和行為受到當下情勢，尤其是周圍的人所支配，影響之深，遠超乎你我想像。

日常生活中，我們各方面都被別人牽著鼻子走。他們左右著我們的穿著、喜歡的音樂、吃的東西（還有食量）、投票的習慣以及金錢投資。這些人也牽動著我們的情緒起伏、心情好壞，甚至道德觀念。

這些由群體產生的動力是我們本身察覺不到的，相關的科學研究正在改變我們對人性的理解。我們並非如自己以為的，是獨立自主的主導者；相反的，我們是徹底的群體動物。這項見解令人感到憂心，因為它對我們看待自己及評斷別人的方式提出了質疑。該說法認為，以個性與人格作為預測未來行為的依據並不可靠。此外，我們也被迫正視某些涉及人性的難題，例如：犯罪是一種心理狀態嗎？作惡是否會引發更多惡行？英雄是與生俱來的嗎？

要承認人性如此複雜難解並不容易。還記得《滾石雜誌》（*Rolling Stone*）在二〇一三年七月那期以波士頓炸彈案嫌犯的照片作為封面，凶手查納耶夫（Dzhokhar Tsarnaev）有著一雙雌鹿般的無辜大眼，蓬頭亂髮、一副青澀男孩的模樣，怎麼看都不像會犯案的人。這也暗示著，大眾往往認為尚未定罪的殺人犯，外表怎麼看都不該像是搖滾歌手或是母親身邊乖兒子的模樣。

當然，他們也不是不能扮演這些角色，但令人不安的事實是：壞人從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來。而背後的因素應該是他們的社會性與難以抑制的群性（groupishness）。

人類是喜歡區分群體的，這一點毋庸置疑。我們用最牽強的藉口將人分門別類，例如髮長、口才等等，也難怪人類的諸多行為得從群體的層次解釋才能理解。一九五四年，美籍土耳其裔心理學家穆扎費．謝里夫（Muzafer Sherif）在他的「羅伯斯山洞」（Robbers Cave）實驗中，首次以科學方法證明了這一點。他將一群十幾歲的男孩帶到奧克拉荷馬州參加夏令營，將他們分成兩組，使其相互競爭。實驗期間，兩組人發展出近似部落戰爭的敵對意識，但這些男孩的背景及年齡幾乎一模一樣。謝里夫只是在雙方之間劃定楚河漢界，便製造出兩邊彼此歧視、水火不容的關係。

之後幾十年，社會心理學家多次證明人類可以毫不費力地建構出一套關於「我們」與「他人」的論述，緊接著衍生出偏

見。例如人們會本能性地依據各種條件區分你我，比如眼睛或上衣的顏色、喜歡哪位特定的藝術家、多估或少估了圖案網點的數量，及擲銅板落地的是人頭還是字等等。

即使是隨意選定的標準，依然能產生根深蒂固的群體認同。目前任教於英國艾克斯特大學的馬克．列文（Mark Levine）博士做過一項實驗，他先要求曼徹斯特聯隊的足球迷仔細思考曼聯球隊的優點，接著發現這些球迷在路上看見陌生人受傷時，若對方穿著曼聯球衣，他們相助的機率會是對方穿著利物浦隊球衣或一般上衣的三倍。接下來他又重複同樣實驗，這次他要受試者先把自己當成一般的足球迷。結果顯示，無論受傷的陌生人穿什麼，只要是球衣，他們都樂意伸出援手。群體認同能夠徹底改變一個人，但效果來得快，去得也快，而這同時也是出自本能的反應。史學家大衛．康納汀（David Cannadine）在《未分裂的過去》（*The Undivided Past*）中提到¹：「這種衝動……將世上的民族撕裂成逞勇好鬥的不同群體，它的存在就和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

人類的群性有其演化上的道理。我們老祖宗身處的環境，只有能夠互助合作、迅速辨別敵我的個體，才能在物競天擇的機制中取得有利的生存條件。群體生活有各種好處，如勞務分工、共同抵禦掠食者及敵人等，可幫助人類提高生存繁衍的機會。這種傾向部落結群的天性深植在我們的生理機制中，透過體內激素及神經傳導物質的調節而發生作用。像睪固酮及催產素，前者會促進競爭行為；後者則增強對群體的熱愛認同（但也有說法指出並非所有人類皆然）。這有助於解釋人為何生來

就渴望社交連結，也能解釋孤單寂寞所產生的譴責效應。別人的存在可能引致我們走上歧途，但沒有他們，我們可能會被推入更黑暗的深淵。

許多人一想到周遭的人對自己竟會產生如此劇烈而深遠的影響，都覺得很可怕，有時甚至感到無能為力。他們擔心無法掌握自己的生活，害怕失去主宰，擔心在群眾中會失去理智，或是群體的力量會使他們墮落，就像過去這麼多異教人士因此淪為暴民那樣。這種恐懼很大程度上源自迷思（事實上暴民既不魯莽也不是瘋子），但也並非全然如此。毫無疑問地，我們的群體傾向足以將我們拖往黑暗的道德深淵。

群性使我們難以容納異己，甚至撕裂社會。它無數次地使人捨棄和平談判而選擇侵略進攻。它可能引發銀行倒閉，足以說服普通人犯下驚世駭俗的暴行；它能让心懷不滿的孤僻人士變成大規模殺人犯，使我們的觀點變得偏激，扭曲我們對各種問題的思考。它還會使我們太容易順應別人對自己的看法，當別人對我們抱持負面印象時，這就成了嚴重的問題（或許這就能完美解釋為何在某些文化中，女孩在數學及理科方面的表現比男孩差，而非裔美國學生的表現往往差強人意，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正在接受智力測驗）^[1]。

然而，群體傾向也可以將我們的行為提升至自己難以企及的層次。二十世紀許多反對極權暴政的抗爭行為大多是共同行動。大部分的英雄人物並非天生豪傑，而是為了回應同胞的迫切需求才挺身而出，他們根本想不到會留名青史。軍隊可以藉由患難情誼與團結來彌補敵眾我寡的劣勢；在許多運動成就的

背後，團結是成功的關鍵要素。少了它，就無法在極端環境中締造冒險與生存的壯舉。有別於常見的典型形象，群眾往往展現出高度合作與利他精神，社會心理學家約翰．德魯利（John Drury）稱之為「第四緊急救援服務」（the fourth emergency service）[\[2\]](#)。

強烈而有感的社會聯繫，甚至能幫助孤立無援的人渡過難關：許多被挾持的受害者及獨行探險家，就是靠著躲入遠離眼前侷限與幽禁的抽象世界裡，尋求精神上的庇護才得以保持理智。此外，我們還能假借社會需求（social need）的名義來達成正面目的。英國政府為了追討尚未繳交的所得稅而實施「推力」（nudge）策略，作法包括寄信提醒遲繳者，告訴他們大多數民眾都準時繳納，此舉有效讓補繳率提升了約百分之二十。由此可見，我們在各種想得到的層面上都很在意別人的一舉一動。

本書試圖透過一系列的真人實事，從古怪的舉止到一般人的日常行為，完整解析說明此現象。我們會看到戰爭英雄、極地探險家、倫敦暴徒、埃及阿拉伯之春的抗議人士、美國革命的草莽英雄、登山客、環球帆船航海家、紐約消防員、太空人、自殺式恐怖分子、戰時歐洲猶太人的救命英雄、孤僻殺手、職業自行車手、綁架案的受害者，以及美國「超高度安全管理監獄」的囚犯。我們將聽到社會心理學家現身說法，了解他們的實驗團隊以及田野調查如何重新定義一般人對於行為動機的認知。我們的腳步將從加薩的難民營一路走到埃及開羅街頭，從古巴的關塔那摩灣來到美國佛蒙特州林木蓊鬱的山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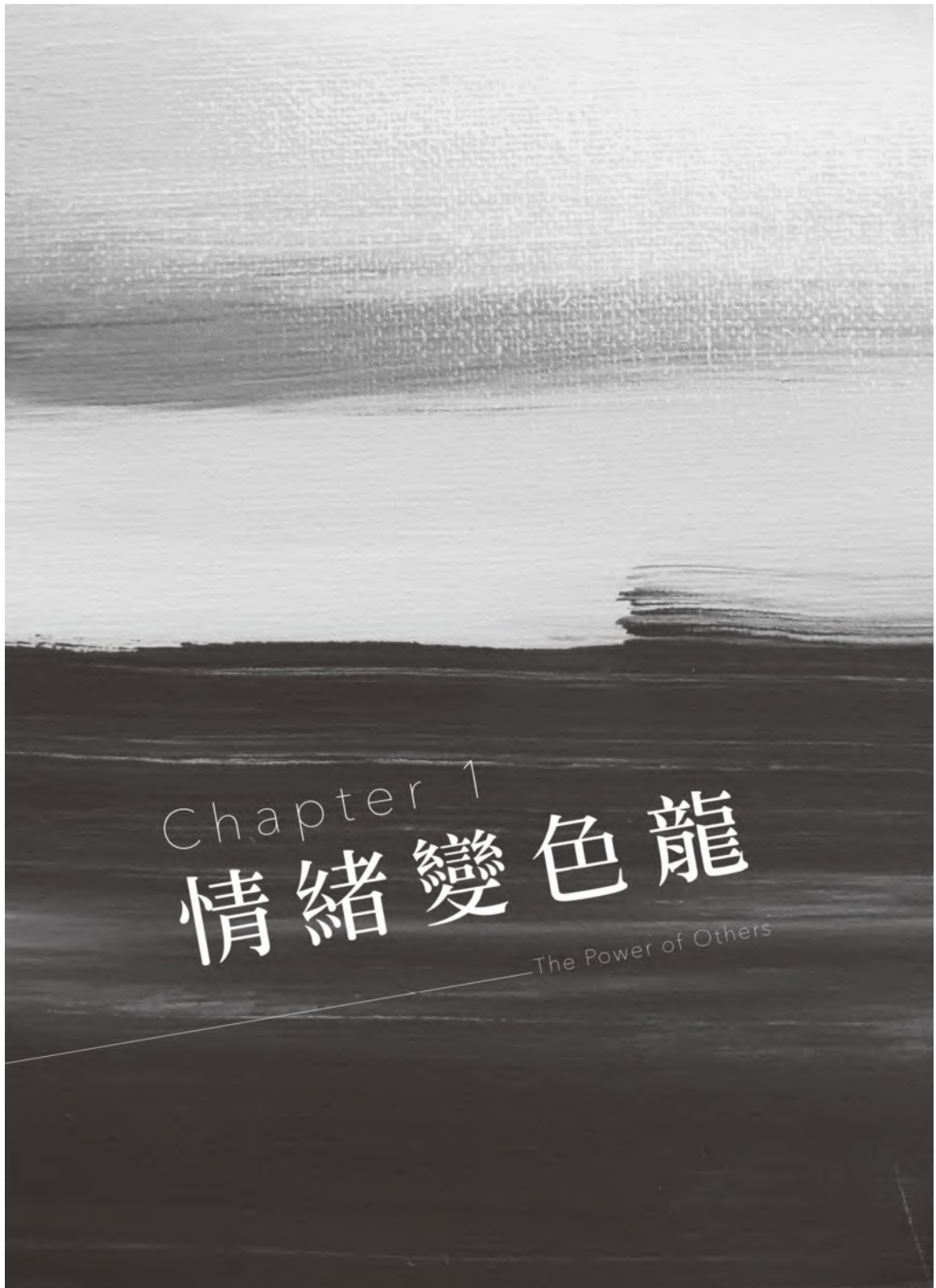
最重要的是，我們將學習如何管理社會的驅動力與人性弱點，並利用它們來達成目的。我們將學會何時該順應群眾或是當個獨行俠、如何從聚集大批民眾的緊急事件中全身而退、如何透過自我覺察來幫助我們勇於對抗歧視、如何成功號召眾人集思廣益、如何面對孤獨與疏離，以及如何避免團體迷思隱藏的風險。

我們會發現，與其讓員工相互競爭，不如想辦法讓他們開心地打成一片，更能有效提高生產力。我們也發現，和別人共事很容易產生不合（但英雄壯舉也是一種群體活動）；刻意聳人聽聞的報導手法雖然刺激了報紙銷量，但也扭曲了我們對世界和彼此的看法。我們會了解為何全明星隊的表現總是差強人意；為何幾乎沒有任何自殺炸彈客是單槍匹馬行動；為何同儕壓力能讓聰明人在面對簡單而直截了當的問題時，卻給出荒謬的答案？

本書旨在為人類難以捉摸、多變有趣的群體行為提出解釋，說明它們如何影響我們的所作所為。社會心理學能讓我們深入了解自己，沒有它，我們不可能冀望能真正瞭解彼此、心意相通。

[1] 原註：此現象稱為「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詳細解釋可見克勞德·史提爾（Claude M. Steele）所著的韋瓦第效應（*Whistling Vivaldi*）。

[2] 譯註：三大主要緊急救援服務系統為：警察、消防、緊急醫療服務。



有一定年紀的英國人，對於在一九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傳出黛安娜王妃在巴黎車禍中喪生消息的當下，應該還記憶猶新。那一刻對我們來說猶如晴天霹靂。突如其來的噩耗雖然令人震驚，但更不尋常的是後續引發的社會反應。許許多多英國人悲痛欲絕，彷彿他們就認識王妃本人一樣。上萬民眾聚集在倫敦聖詹姆士宮外徹夜排隊，想在悼念簿上簽名。當送葬車隊緩緩往西敏寺前進時，沿途聚集了上百萬民眾夾道哀悼；而在她肯辛頓花園的故居門前，民眾致哀的鮮花堆積如山，底部甚至開始腐爛。

當時我就住在肯辛頓附近，還記得她出事的那一天是週日，我走過公園，看著傷心欲絕的民眾，通通站在大門口注視著那些鮮花，並且獻上花束。對此本來只覺得驚愕的我，這時竟也開始悲從中來，心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看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悲慟相擁；電視上，有些新聞播報員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作家卡門·卡莉爾（Carmen Callil）把這種情形喻為「納粹時代的紐倫堡黨代表大會」¹：在這波全民哀悼運動中，除了悲愴，還是只有悲愴。

如今回想起來，我似乎懂了那是怎麼一回事。心理學家很清楚這種現象叫做「情緒傳染」（emotional contagion），一種不自覺產生相同情緒與感受的心理作用，可以傳染整個群體。正如許多案例，黛安娜王妃的國殤無疑是媒體大肆報導所引起的，一開始只是零星民眾哀傷的反應，透過煽情的言論及肆無忌憚的報導，讓全國上下都感染了這份情緒。這就是文化學者詹姆斯·湯瑪士（James Thomas）所謂的「霸占公共場景的優勢意見」²。然而，情緒傳染是人類社會行為無可避免的結果。一如變色龍會隨著環境改變身體顏色，我們也會主動模仿別人。在我們深入探討之前，先來看看另一個例子，了解情緒能如何迅速地感染整個社群並引發何等劇烈的影響，這次的主題是恐懼。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三，紐約市一位商人走進布朗克斯區弗里曼街上的美國銀行（Bank of United States）分行，這是一間私人銀行。他要求出納員清空他在銀行持有的股票，但銀行經理試圖勸退他，堅稱這是非常穩當的投資。商人離開之後，在同業朋友間散播謠言，說該銀行遇上了麻煩，不到幾小時，那間分行聚集了好幾百人想提錢；到了晚間八點關門時，群眾已經暴增至兩萬人。三千名存戶領走的金額高達二百萬美元，其中還有人排了兩小時的隊伍，只為了提領他僅有的兩塊錢。

這間美國銀行從此關門大吉，不實謠言導致其他分行也出現擠兌潮，銀行董事們擔心大批瘋狂的群眾隔天再度上門，把銀行的現金領到半毛不剩。星期四一早，他們結束銀行營運，將剩餘的資產通通交給紐約州的銀行業督察布洛德瑞克（Joseph Broderick）保管。這是正確的決定。到了上午九時三十分，八千名情緒激動的顧客冒雨站在弗里曼街的辦公室外，布朗克斯、布魯克林和曼哈頓的五十八間分行還有數千人聚集。該銀行位於第五大道五三五號的總部，騎警甚至不得不騎到牆上，才能驅趕大批民眾³。

當時，美國銀行是美國史上庫存金額最高卻倒閉的銀行。它的破產重挫了民眾對國家經濟的信心，此時距離華爾街發生史稱「黑色星期二」的股市大崩盤才過了十三個月，經濟學家米爾頓·弗利曼（Milton Friedman）等人認為，這件事加速了銀行業的危機，使原本正常的週期性衰退現象演變成後來的經濟大蕭條⁴。該年年底，另外三百家銀行也結束營業。

美國銀行的擠兌事件，係民眾擔心它付不出錢而衍生渲染性的恐懼，導致風波愈演愈烈。這和所有銀行的擠兌一樣，代表大家對銀行體系的運作以及「信用」的價值集體失去信心。這種恐懼，無論所謠傳的「沒有任何一家銀行的庫存全是現金」是否屬實，都會成為自我

應驗的預言。大眾的集體恐懼很難視若無睹，從經濟大蕭條以來，這種模式已經重演多次。最近的例子發生在二〇〇七年九月，英國北岩銀行的營運岌岌可危，當時有上千名憂心忡忡的民眾從報紙和網路部落格得知有人開始提錢，也紛紛大排長龍急著提領存款，即使英格蘭銀行已經同意出手相助，依然消除不了民眾的恐懼。



圖一、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冒雨聚集在美國銀行外的民眾。

這種盲目跟風看似可笑，但其實並不蠢。眼看大批群眾對銀行體制開始失去信心，迅速撤資是相當合情合理的舉動。即使這樣的行為缺少充分依據，但銀行的名聲一旦敗壞，倒閉的風險是相當高的。另一方面，如果大家追求的是人們渴望或自以為想要的目標，也同樣容易加入跟風行列。二〇一二年一月，蘋果公司以「安全考量」為由，被迫延後最新iPhone手機在中國上市的日期，因為稍早在北京的旗艦店外，有上百名激動的果粉引發暴動。害怕搶不到商品所引發的行動力，往往不遜於擔心陷入財務困境的恐懼。

我們是日常生活的主宰，坐在駕駛座上，自己下決策，體驗自己製造的種種情感，憑藉我們所相信（以及不相信）的事而做出選擇。大多時候這都是一種假象。四十多年來，人類行為決策的研究顯示，我們相當容易受社會風向左右，要擺脫甚至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我們很難離群索居，過著隱士般的生活（繼續看下去就會知道，就算隱居也無法置身事外）。

要探討箇中原因，首先讓我們從最具代表性的社交儀式——吃飯開始。有句越南諺語 [\[1\]](#) 說：「和死亡一樣，我們能在餐食中感受到人類根本的友愛。」這個觀念最近獲得荷蘭行為學者羅爾·赫曼斯（Roel Hermans）證實而有了科學依據。赫曼斯的研究團隊在奈梅亨（Nijmegen）的拉德伯德大學（Radboud University）實驗室設計了一間餐廳，測試人在共餐時的進食行為有多麼容易受別人影響（就是這種實驗計畫讓心理學成為最受大學生歡迎的科目）。他們準備了一張小餐桌，擺上餐盤、餐具、玻璃杯、餐巾，以及兩張面對面的椅子。他們在鄰近的檯燈上架設隱藏式攝影機，以便從隔壁房間觀察實驗者的用餐情形。接著，他們找了七十對年輕女性來吃晚餐，大概都

是滿懷感激來接受招待的大學生，並記錄每個人的食量、將食物放入嘴裡的次數及進食的確切時間。

觀察這些人吃完三千八百八十八口食物之後，他們發現每位女性的食量取決於她的同伴吃了多少，而且每一組受試者進食的動作都展現高度的協調性。換句話說，兩人會不約而同地把叉子舉到嘴邊，而非各自進食，特別是在開始用餐的時候⁵。研究人員這才了解，他們觀察到的是社會模仿（social mimicry）的典型案例，這是一種常見的現象，人會在不知不覺中模仿起另一個人的習慣動作。此現象稱為「變色龍效應」（chameleon effect），可以改善溝通，讓人際關係更和睦。赫曼斯認為，這或許可以解釋許多常見的社交飲食行為，比如為何我們在別人面前往往吃得更多⁶？為什麼一起喝酒的人通常會同時舉杯啜飲⁷，特別是在彼此專注聽對方講話的時候？即使不是與真人互動的場合，依然會出現同樣反應：下次當你邊喝酒邊看電影時，不妨觀察一下，自己是否會跟著螢幕上的演員同時舉杯⁸。

這類行為協作現象完全是下意識的動作，對於有心節制飲食的我們來說，無疑讓情況更加棘手。如同銀行擠兌與舉國哀悼的例子，過度放縱也是會傳染的。「人們對飲食的自制力遠低於他們想像。」赫曼斯說。我問他該怎麼克服，他表示：「減少盲目飲食！」說得倒簡單。要充分注意飲食，細細品嚐各種味道，心無旁騖，不受任何事物干擾，就必須獨自用餐。赫曼斯認為，真正問題在於要學著找出影響我們日常習慣的外在因素，但是他不鼓勵大家刻意克制自己的模仿本能。「我不敢建議治療師做到這種程度，畢竟模仿是人類社交生活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針對飲食行為的研究，引發了許多耐人尋味的問題，不亞於它們所解決的疑惑。參加赫曼斯實驗的女性平均年齡二十一歲，體重「正常」，彼此素昧平生，但在用餐的最初十分鐘內互相模仿的機率是最

後十分鐘的三倍。要是她們年紀再大一些，或者換成男性，抑或在參加實驗之前本來就是舊識，還會產生相同效果嗎？要是每組受試者改成混齡，性別、體重不拘，或是不准他們交談呢？我們無從得知。每一組女性受試者見面時所展現的模仿行為，可能是為了融洽相處而不自覺產生的舉動。若果真如此，假使這是一種普遍的人性特質，或許就能想見一家人吃飯時不易出現模仿行為，因為彼此都相當熟識；但在應酬飯局上，可能性就高出許多。

與赫曼斯教授聊完不久，我約了一位已經一年多沒見的記者朋友吃午餐。我本來預期吃飯時，我們會像跳起求偶之舞的火鶴，展現驚人的同步默契，畢竟表現得熱絡些，對彼此都有好處。但對方卻三兩下就把東西吃完了，害我不知所措。後來整頓飯我吃得心神不寧，擔心他是不是討厭我，也或許是我們對模仿心理瞭解還不深，才有如此輕率的判斷。當然也有可能他真的很餓。

或者，他可能就只是非常自私。研究顯示自私的人通常不擅長配合別人步調。在亞伯丁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berdeen）研究社會認知的喬安·朗姆斯頓（Joanne Lumsden）教授發現，為了獲取自身最佳利益而接近別人的人，模仿對方動作的頻率大約只有追求互利互惠者的一半⁹。她表示，最有可能的解釋就是，配合別人的動作時，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對方身上，而只關心自己的人通常不太會這麼做。

模仿是社交互動的象徵。我們不自覺地模仿別人，不這麼做就無法突破表面的溝通層次，達成更深一層的交際。每個人都在無意中模仿朝夕相處的人，複製他們的臉部表情、姿態、說話方式與小動作，而且速度快得驚人。

一九六六年，一項以匹茲堡大學學生為對象的實驗，發現人們在短短二十一毫秒內就能模仿彼此的動作¹⁰，而在測試閃光反應的實驗中，受試者被要求一看到閃光就按下按鈕，一般人的反應時間大約要比這慢上十倍左右，可見我們的模仿完全是下意識的行為。這是一種出自原始本能、與生俱來的反應，所有靈長類動物皆然，包括人類嬰孩。嬰孩在出生幾個小時內，就開始密切追蹤母親的臉部表情。模仿能夠使社會接觸（social encounter）變得相當流暢。若把兩個人的對話影片以慢速播放，會發現雙方的動作與姿勢會呈現有如芭蕾舞般協調，且動作愈一致，相處就愈融洽。赫曼斯觀察，就連明顯習慣性的動作，例如吃東西，也會出現這種情形。

但模仿不僅限於肢體語言，人類一切行為都可見它的蹤跡。黛安娜王妃驟逝和銀行擠兌事件的啟示，象徵我們內心世界架構的情感和情緒，都是可以「攫取」的。

雪菲爾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的心理學教授彼得·托特戴爾（Peter Totterdell）是研究情緒傳染的先驅。他一開始研究的並非情緒的感染現象，而是調查輪班工作者的晝夜作息，對象包括護士和警察，看看他們在工作期間精神狀態有何變化。有一天，他注意到這些人的情緒同步出現變化，起伏一致，後來在會計師、保全、教師、組裝工人、客服人員和職業板球選手身上也觀察到一樣的模式。

對於不熟悉板球晦澀難懂的規則和極度冗長比賽時間（最久要五天才能分出勝負）的人來說，這項運動實在相當惱人。正因如此，才吸引托德戴爾教授選擇它作為觀察同儕人際關係變化的實驗環境，這一次他觀察的對象是同一隊的球員。他找來兩支在英國郡縣冠軍盃分庭抗禮的職業球隊，發給隊員每人一臺口袋型袖珍電腦，要求他們隨時把自己的心情以及比賽過程中不同時間點的感受記錄下來。結果顯

示，無論局勢是否對他們有利，任何時刻，每位球員都會因為隊友開心而感同身受，雀躍不已¹¹，大家就好像被插上巨大的水煙袋，集體吸入笑氣一樣。

情緒傳染看似是人類所有社會互動的自然特徵。二〇〇八年，社會科學家克里斯塔吉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士．福勒（James Fowler）以美國麻州佛萊明罕地區數千名居民的朋友、親戚、鄰居和同事組成的人際網絡為對象展開研究。自一九四八年以來，流行病學者就開始追蹤當地民眾，進行跨世代心臟疾病的研究。兩人注意到在人際網絡中，快樂的人通常會聚在一起，意味著他們比較容易變成朋友；他們還發現，這些人跟其他快樂的人關係愈緊密，就愈開心¹²。對此，克里斯塔吉斯的解釋是：「朋友愈多的人愈快樂，大部分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但真正的重點在於那些朋友自己快不快樂。¹³」

人們能傳遞憤怒、焦慮等各種情緒和心情，甚至是更持久的心理狀態，例如滿足或悲傷等等，已經不是什麼科學新知。三十多年前，加州大學一項實驗顯示，安排一小群人相對而坐，不准他們交談，過了兩分鐘後，每個人都會感染群體中表達力最豐富的人的情緒，他透過臉部表情、手勢和身體動作，明顯表達出心情¹⁴。其他研究發現，不同的日常環境也有類似效果。例如，若與罹患輕微憂鬱症的人共用生活空間，時間一久，你可能會變得愈來愈抑鬱，因為你也感染了對方的負面情緒¹⁵。同理，銀行出納員和零售人員確實可以透過微笑和親切的問候使客戶心情愉悅。客戶通常會親切回應，這時候，服務人員也會感受到暖心的回饋¹⁶，而形成一種愉快互惠的良善循環。對於銀行經理或店家管理者而言，這樣做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業績。有些零售商很早就把這一點銘記在心，如英國高級速食連鎖品牌「Pret A Manger」就要求員工洋溢熱情、散發「真正」的快樂。近來研究顯

示，這種開心的情緒不僅會一傳十，十傳百，還會擴散到整個社交場域中，感染周遭的朋友和同事。¹⁷

大多時候，我們的情緒源自於那些我們直接遭遇的種種。你可能會因為灑落在臉上的和煦春陽而積極振奮；想到即將發表的簡報而緊張焦慮；或想到去世的朋友而悲傷不已。但你若在某種社交情境中感受到強烈情緒卻找不出源頭，很有可能就是受到周遭人的影響。反之亦然，你可能也在把自己的情緒傳染給別人。

心理學家認為，透過強迫性的表達特定情緒，進而有意識地影響別人，甚至是可能的。多倫多大學研究職場行為的史蒂芬·柯蒂（Stéphane Côté）教授指出，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深層演出」（deep act），指的是回想過去在什麼樣的場合感受到某種真實情緒¹⁸，這種方式類似於方法派演員用來進入角色的技巧。所以，你若想表現出自信積極的一面，就想想從前成功應徵新工作、受到朋友意想不到的稱讚或是在學校得獎等各種感受；想表現出安撫的樣子，就回想過去對某人感同身受、真心關懷的對話場景。

儘管如此，最有渲染力的依然是那些真摯的情感。真誠發自內心的情感表現會影響所有目睹的人。在慶祝二〇一二倫敦奧運圓滿結束的遊行中，我站在特拉法加廣場，和上千名群眾面對著架在納爾遜紀念柱下方的巨大螢幕。我們看著殘障奧運排球選手馬汀妮·萊特（Martine Wright）的訪談，她談到自己在二〇〇五年七月七日倫敦恐攻爆炸案中失去雙腿、全身失血百分之八十，卻仍努力復原的事。意外發生的前一天，倫敦才剛順利爭取到奧運主辦權。訪談過程中，她突然哭了起來。我轉頭望向人群，看見她的悲傷全都照映在現場數百人的臉上，他們緊盯著螢幕，幾乎就在那一瞬間，爆發了情緒傳染，很難教人不為之動容。

模仿賦予社會編舞（social choreography）發揮的空間，同時也讓我們對人類心理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它幫助我們了解他人的想法。當我們模仿某人表情時，我們開始體驗其背後的情感，達爾文在一八七二年出版的《人與動物的情感表達》（*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書中就觀察到這個現象。他指出，操縱臉部肌肉，能深刻影響我們的思覺所感。

十年後，哲學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提出，情緒是一種身體變化的心理感知，這個概念被神經科學家達馬吉歐（Antonio Damasio）等人進一步擴充。他認為情緒的身體知覺，例如脈搏加速、肌肉收縮、瞳孔放大等反應，會發生在大腦產生該情緒之前¹⁹。也就是說，情感係由生理反應決定。一九七〇年加州大學的心理學家保羅．厄克曼（Paul Ekman）和華萊士．弗里森（Wallace Friesen）在研發人類表情的分類技術時²⁰，不經意驗證了這樣的「體現認知」（embodied cognition）。他們為了確認臉部肌肉如何掌控表情，自己親自上場示範，用將近上萬種肌肉運動的組合做出鬼臉，並將過程拍攝下來。事後，厄克曼對此描述如下：

我發現當自己做出某些表情時，會感覺到心中充滿強烈的情緒。但不是每種表情都如此，而是那些我認為是全人類共通的表情。我問弗里森是否也有同樣反應，他說自己也是。當他做出某種表情時，心中也會感受到某些情緒，而且通常都不太愉快²¹。

難怪演員有時會迷失在自己所詮釋的角色裡。美國老牌演員寇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回想他在一九五六年演出電影《梵谷傳》（*Lust For Life*），扮演梵谷時入戲太深的情況。他說：

我覺得自己過於投入，跨越界線，整個人變成了梵谷。我不只五官神似，就連年紀也和他自殺時一樣大。有時我不得不克制自己伸手摸耳朵，好確認它是否還在的衝動。那次經驗實在太可怕了，足以把人逼瘋²²。

就算不是演員或實驗心理學家，也能理解為什麼模仿別人的表情可以得知對方的心理狀態。透過各種姿態、身體運動及發聲模式，很容易就能製造情緒。不妨試著表現悲傷：稍微擺出八字眉，嘴角下垂，然後哼著披頭四的〈Eleanor Rigby〉（或是跟著小三和弦的音調起伏喃喃自語）²³，無精打采地走過房間，這個方法保證可以暫時澆熄明媚晨光的喜悅。

針對這種情感的過度刺激，有一款現代解方，那就是A型肉毒桿菌毒素，又稱「保妥適」（Botox）。只要將這種強效神經毒素注射到某些臉部肌肉上，就能防止皺紋產生，不過因為人類必須透過這些肌肉來表達情感，這種美容療法也有礙我們的情緒感受。二〇一〇年，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的心理研究團隊找了一群利用肉毒桿菌來減少皺紋的女性為實驗對象。在她們施打藥劑之前，研究者請她們來到實驗室，在電腦上閱讀帶有各種情緒的語句，如「妳雀躍地走上階梯，來到愛人的公寓」（用意是讓她們感到開心）、「妳在生日那一天打開電子郵件，卻發現沒有半封新信」（傷心）、「妳和那個腦袋灌漿的老頑固吵架，氣到發暈，怒摔車門」（憤怒），並記錄其反應時間。兩週後，等這些女性眉角內側的皺眉肌因為施打肉毒而暫時僵化之後，他們重複一模一樣的實驗。受試者看到開心句子的反應速度並未受到肉毒桿菌的影響，但對於傷心及憤怒的內容，反應卻變慢了。由於她們無法透過表情適切傳達情緒，她們的大腦需要花更久的時間來反應。無法皺眉，實際上似乎延緩了她們的認知²⁴。

這項發現也獲得功能性磁共振造影（fMRI）研究證實。該項實驗中，在皺眉肌施打肉毒桿菌的德國女性被要求做出憤怒表情時，其杏仁核（大腦中主導情緒產生的部位）顯示活動力下降²⁵。以上實驗結果的重點不在於肉毒桿菌可以用來進行美容治療，而是可見情感表達與模仿在社交互動中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和人交談時，你的表情如果無法跟上談話及時做出反應，就會給對方留下冷淡的印象，甚至產生負面觀感。在威斯康辛大學進行實驗的大衛·哈瓦斯（David Havas）懷疑，由於肉毒桿菌毒素會減弱臉部製造細微表情的能力^[2]，「那些打肉毒的人通常被認為是不太討喜的人。」

即使情緒傳染在大眾悲慟、銀行擠兌、燃油危機、健康恐慌和我們並不樂見的各種行為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它似乎也是一股強大的力量，能夠帶動進化發展。透過情緒傳染，可以增進團隊合作。托特戴爾表示：「如果人們在社交互動時處於同樣的心理狀態，就能更順暢有效地彼此配合。」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簡稱MIT）人類動力學實驗室的電腦科學家潘特蘭（Alex Pentland）等人，以優異的成效展現出這種社交和諧的益處。該團隊採用他們自行研發，名為「現實探勘」（reality mining）的技術，利用手機和特製電子器材，如藍牙定位感應器和加速計，監測人們的行為、身體動作、交談模式和其他行為。套用潘特蘭的說法，「現實探勘」的意思是：

就像資料探勘（data mining），你進入資料庫，檢視並嘗試找出模式、進行預測，並且了解正在發生的狀況，差別就在於這項技術並非應用於文字、網頁及數位內容，我們試圖

歸納出現實生活中的行為模式。（這樣一來）你就能知道很多別人的事情：他們去哪裡、和誰出遊，甚至玩得開不開心等²⁶。

對於企業與組織而言，最值得觀察的目標，就是辦公室同仁的向心力與溝通情形，也就是他們平常交談、交流和分享事物的熱絡程度，以作為預測其工作效率的有力指標。芝加哥某家IT公司，群體向心力排名前三的員工，工作效率比平均高出百分之十。某間位於羅德島的美國銀行話務中心，績效最好的話務人員是那些最常和同事講話的人。潘特蘭說：「許多如何出人頭地、提昇工作效率的關鍵祕訣，都是在茶水間聽到的²⁷。」他發現，表現優異的團隊成員很常交談，就像蟲子一樣嗡嗡作響。重點不在於話題，而是所有人的參與程度²⁸。他根據收集到的資料，為打造團隊的人提出建議：「個人的理解力與才能對於團隊成功的貢獻，遠遠不及他們所想像。要打造一支強大的團隊，最好的方法不是依據個人的聰明才智或成就來選擇成員，而是去了解成員之間的溝通方式，形塑並引導整個團隊，採取一套成功的溝通模式²⁹。」這表示允許員工在家工作的公司，終究會蒙受損失。同理，以績效為導向的報酬方式，雖然是為了刺激員工的動機，但效果可能適得其反，因為這會激起同事競爭，削弱團隊合作的誘因。這不僅是因為透過自然開放的互動，有助員工激盪出各種想法；另外，與認識（並欣賞）的人同桌交流，也會激發更多工作的動力。

二〇一〇年三月至翌年六月期間，潘特蘭的實驗室進行了一項「朋友與家人」的研究，持續追蹤一百三十位成年人的行為，他們就住在麻省理工學院旁一個以年輕家庭為主的社區。該研究收集了受試者手機裡的資料，包括他們的所在地、動作、與其他人的距離、溝通模式等，並利用線上應用程式與大量額外資訊，如臉書活動、財務報表和自我記錄的日常情緒及睡眠模式。當然，這種公然侵犯隱私的行

為必須獲得當事人完全同意才能進行。其中最有意思的發現包括，這些居民更樂於和每天見面的人分享手機應用程式；他們也願意參加鼓勵運動的有獎活動（提供小額獎金），而且要是獎賞由大家共享的話，興致更高。此外，在收入水平較低、缺少多樣化的社會群體中，他們不太與別人交流（一如潘特蘭所描述的，一個人愈有錢，別人對他的好奇心就愈強³⁰）。這項「朋友與家人」實驗觀察到的差異現象，很大一部分是情緒及行為感染的結果：人會模仿別人的行為。「這就是入境隨俗。」潘特蘭說。

人類的模仿行為可以用生存的角度來理解。社交網絡專家鄧肯·華茲（Duncan Watts）的解釋是：「這個世界太複雜，單憑個人無法解決所有問題。我們必須仰賴隱藏在社會環境中的各種資訊才能獲得解套。我們都預設別人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這解釋了我們在群眾面前為何容易上當。心理學家史丹利·米蘭格倫（Stanley Milgram）在一九六九年透過實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他安排幾位合作對象，站在繁忙的紐約街頭，抬頭凝視著大樓六樓的窗戶；他則在旁統計有多少路人跟著照做。結果發現，仰望窗戶的人愈多，人們就愈容易停下腳步，跟著他們的目光望去³¹。如此有說服力的舉動是很難抗拒的。換作是你，你會若無其事地走過去嗎？

伊蓮·哈特菲爾德（Elaine Hatfield）比大多數人還瞭解情緒的感染性。她研究社會互動、人際關係及親密關係長達四十年，並在夏威夷大學當了三十多年的心理學教授。不過，這並不表示她不會受到情緒傳染的影響。九〇年代初期，當她還是心理治療師時，就注意到病患會對她灌輸一種「困惑的情緒反應」，而且不只病患這樣做。有一天，她和先生受邀到兩位當地藝術家中共進晚餐。過程中，她感到濃濃睡意襲來，累到連頭都抬不起來。後來她給主人寫了一張

道歉紙條，對方立刻安排下次再吃一頓飯。到了約定那天，同樣狀況又發生了，餐會開始後半小時，伊蓮開始打瞌睡。後來她和同為心理治療師的先生討論起這件事，兩人一起找出了問題所在：

蘇珊是個活力十足的人，卻也充滿了焦慮。和她講話，總是聽她發洩長期累積的不滿和抱怨。她這個人並不無趣，要是只須面對她，這頓飯或許還吃得下去……或單獨和她先生哈利吃飯，那也不成問題，儘管他十分消沉，一句話也不說。

（我們）整天都得跟憂鬱的人講話，問候對方的生活。麻煩的是，現在一次得面對兩個，被歇斯底里和憂鬱症左右夾攻，伊蓮忙著處理兩種衝突矛盾的情緒，除了用睡覺逃避之外別無他法³²。

伊蓮夫婦選擇以不妥協的方式解決了這項問題：他們從此再也不登門拜訪這對夫妻。

我們有些人特別容易受到周遭情緒的影響，比別人更容易隨著朋友興高采烈而開心，或陪他們一起憂鬱沮喪。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容易產生共感，因此更容易受到情緒傳染。外向的人，不分男女，往往會高度關注所互動的對象。事實上，內向者和憂鬱病患向內投射的目光，某種程度上會讓自己與外界隔絕。對別人情緒的敏感度，很大程度取決於自己和對方的關係。他們對你愈重要，你就愈容易陷入對方的情緒，因為你會更認真看待或投入更多心力去聽他們講話、體察他們的感受。媽媽非常容易受到小孩情緒的影響³³，情侶之間也是。伊蓮的例子證明，即使是專業心理治療師也難逃情緒傳染的擺弄。

情緒傳染或許可以解釋為何結婚多年的夫妻，隨著時間日久會愈來愈相像：他們一直以來經常模仿對方的表情和小動作，結果雙

方的臉部線條和皺紋也開始相似起來。（最近動物情緒的研究顯示，此現象在狗和飼主身上亦成立。）模仿的確是一種表達奉承的方式，一項針對已婚伴侶的研究發現，結婚滿二十五年、長相最有夫妻臉的銀婚伴侶是最美滿和諧的³⁴。

正因為每個人對情緒和行為的吸收程度不一樣，有些人更擅長將情緒往外擴散。毫無疑問，你一定認識這樣的人：他們魅力十足、活力充沛，表情豐富，姿態多變。和這些人相處，很難不被他們感染。像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雷根（Ronald Reagan）、柯林頓（Bill Clinton）等都是這類型的名人。美國小說家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在路上》（*On the Road*）的悲劇英雄狄恩·莫里亞提（Dean Moriarty）也是如此：

狄恩的聰明才智無庸置疑、璀璨而完整，以及少了知識分子乏味無趣的習氣。而他的「惡性」也不那麼偏向慍怒與譏蔑；那是一種狂野激昂的美國式喝采；充滿西部風格，彷彿一陣西風，一首平原上傳來的謳歌，充滿新意，是先知早已預示，大家期盼已久的（而他偷車也只是為了兜風）……狄恩在社會橫衝直撞，飢渴追求他的麵包與愛情；其他什麼都不管³⁵。

我們有可能避開情緒傳染的影響，對別人的情緒濃霧築起防護牆嗎？很遺憾，要是你已經深陷其中，這可能性微乎其微。最好的選擇，或許是讓自己抽離、減少關注，保持冷淡，別讓情緒過度集中³⁶。「只能藉由想像與幻想來逃避眼前的恐懼，」伊蓮的說法相當聳動。又或者，可以試著在聆聽的過程中，監控並管理自己的情緒反應，但缺點是會讓自己顯得很失禮（想想肉毒桿菌的效果）。

另一方面，想藉由有意識的誇大模仿來增強情緒共感或社會凝聚力，是相當危險的作法。還記得我們拷貝別人的動作有多快嗎？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拙劣的模仿容易讓自己看起來矯揉造作，或者被當成怪人。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的法蘭克．伯尼里（Frank Bernieri）教授研究動作同步現象和人際關係融洽兩者之間的關聯，對此進行了廣泛研究。他拍攝受試者在辯論、交談或訪談中的互動情形，利用影片進行分析³⁷。他表示：「模仿別人的姿勢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就像血壓和心跳一樣。我目前還沒看過證據顯示有人能夠刻意控制模仿行為。」他發現在談話過程中，在雙方都沒有注意到的情況下，刻意模仿並不會增加別人對自己的認同與欣賞。由於原因至今尚未明朗，勉強模仿似乎無法傳達真實的情感訊息，最好別在約會或面試時輕易嘗試。

情緒傳染是社會科學家所謂「資訊串流」（information cascade）現象 [3] 的一種變化，我們自發性、不假思索的模仿傾向讓許多人產生同樣的思考與行為模式。資訊串流對於人類行為有相當強烈的影響：試想黛安娜王妃逝世後的舉國哀悼，或者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在車臣的薛爾科夫斯克（Shelkovsk）爆發的集體歇斯底里，當時數十名學生及教師出現莫名原因導致的癲癇、呼吸困難、抽搐等症狀。資訊串流左右著我們每天所作的決定：要聽什麼音樂、穿什麼衣服、買哪支手機、看哪部YouTube影片、支持哪些公益團體、對哪些臉書留言按「讚」等等。

[1] 譯註：此句應為林語堂所言，出自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英文語錄集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中文譯為《生活的藝術》）。

[2] 原註：這點對心理健康亦能帶來某些正面效果。其他研究發現，在額頭皺眉肌注射肉毒桿菌，有助減緩憂鬱症狀。更多細節見Eric Finzi, *The Face of Emotion: How Botox Affects Our Mood and Relationships*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3] 譯註：又譯為「資訊瀑布」，意指群體中做某件事或某個決定者超過一定人數後，其餘人往往會停止運用自己的知識，轉而模仿他人行為，導致群體做出錯誤決策。社會輿論中的「帶風向」即是這種效應的體現。



你有多容易被別人的情緒影響？ 情緒傳染量表

本量表將協助你瞭解自己對周遭的情緒敏感度有多高。請回答以下十五項問題，分數愈高，代表愈容易受到情緒傳染，也愈有可能「捕捉」到別人的情緒。

請利用下列指標計分：

- 4 分—總是如此：每次都會發生，沒有例外。
- 3 分—經常如此：十次有八九次，經常發生。
- 2 分—很少如此：不常發生。
- 1 分—從來沒有：從來不會發生。

--

1. 談話的對象如果講到一半就開始哭，我也會跟著熱淚盈眶。
2. 當我情緒低落時，跟快樂的人在一起，心情就會跟著好轉。
3. 有人對我親切微笑時，我也會微笑以對，覺得很溫暖。
4. 別人談論親人去世時，我會覺得非常悲傷。
5. 看到新聞上的憤怒面孔，我會緊咬下巴，肩膀緊繃。
6. 當我注視著情人的眼睛，心中會充滿浪漫的感覺。
7. 站在憤怒的人身邊，讓我非常惱火。
8. 看見新聞報導中受害者恐懼的神情，我會試著想像他們的感受。
9. 被情人緊抱的時候，我覺得整個人都融化了。
10. 聽到別人吵得不可開交時，我會緊張。
11. 和快樂的人相處時，我心裡也會充滿快樂正向的想法。
12. 情人碰觸我的時候，我感覺到身體有所反應。
13. 和有壓力的人相處時，我發現自己也變得緊繃起來。
14. 看悲傷電影的時候，我會哭。
15. 在牙醫候診室聽見小孩驚恐刺耳的尖叫聲，我會很緊張。

出處：R.W. Doherty, 'The emotional contagion scale: a measur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21 (1997), 131-54. 感謝伊蓮·哈特菲爾德授權本書使用。

更重要的是，它也影響了我們的投票意向。例如，有些國家係由各地依序舉行選舉（如美國總統初選），或是地方上有些選區的投票會比其他地區還早結束，在這種情況下，若知道某特定候選人已經取得優勢，其他人就有可能被說服去支持他；要是少了這類資訊來帶風向，選民可能會轉投其他人³⁸。於是我們輕易地被說服了，美國傳統上最早進行初選的新罕布夏州，九萬五千位選民的民意怎麼可能會錯呢？選前公布的民調亦能產生類似效果。因此。英國和德國明文規定，在投票所關閉之前，禁止公布出口民調結果；新加坡也完全禁止公開出口民調。法國、以色列、義大利及俄羅斯更進一步，限制在選前幾天內（義大利是整整兩週）公布所有民調數據。

資訊從四面八方湧入，匯流成瀑布，但終究是受到情緒驅使。鄧肯·華茲說：

你想跟別人做同樣的事，並非覺得這樣比較妥當——儘管你可能這麼認為——而是想跟其他人一起，這才是重點。我們都想歸屬於群體，並認同團體其他成員。方法之一就是擁有一套共通的文化涉及共同品味：喜歡同樣的歌曲、電影、運動、書，不僅讓我們有話題可聊，也讓我們有種超越自身以外的歸屬感。

和一大群人走上街頭遊行，可能覺得有成就感，但如果大家都是錯的，其實無濟於事。仔細想想這種情況的可能性高到令人不安，畢竟每個純粹受到社會風向擺弄就加入行列的人，往往會捨棄自己獨立思考而來的理解判斷。在缺乏新資訊的情

況下，集體決策的品質勢必會隨著群體擴大而降低。群眾優勢能讓大量的資訊串流看似可靠，但實際上通常只是外行引導外行的盲目跟風。

想想美國投機性的房地產泡沫化現象，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是引發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元凶。從一九九七到二〇〇六年，美國整體房價實際漲幅高達百分之八十五³⁹。同一時期，專門借貸給信用不佳購屋者的次級房貸，市占率從百分之五成長至百分之二十⁴⁰。當時不少人認為買房是一種安全的長期投資，一窩蜂地看好房價會持續上漲，有房就不怕沒飯吃，甚至能更上一層樓。二〇〇五年，當市場景氣還欣欣向榮時，耶魯大學的經濟學者羅伯·席勒（Robert Shiller）和卡爾·凱斯（Karl Case）問舊金山的購屋者，預測他們的房子會升值多少。平均預測結果為每年成長百分之十四，無論在何種金融環境下，這都是相當可觀的回報率。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甚至異想天開，有些人預測高達百分之五十的年成長率。「他們到底是哪來的樂觀和信心？」席勒不得其解。原來「他們不只觀察到房價大幅上漲，還聽到別人對此趨勢的見解。⁴¹」

綜觀人類社會的演進，我們始終無法擺脫這種人云亦云、「傳染式思考」的影響，然而現在我們卻愈來愈容易任其擺布。原因之一，就是社群網絡媒體，如推特（Twitter）、臉書（Facebook）以及YouTube的發達，無論內容準確與否，皆具有無遠弗屆、迅速傳播資訊的能力。另外，我們比過去接觸到更大量的活潑鮮明、煽動人心的意象刺激，扭曲了我們對世界的瞭解與認識（並使得我們很難針對風險做出明智的決策）⁴²。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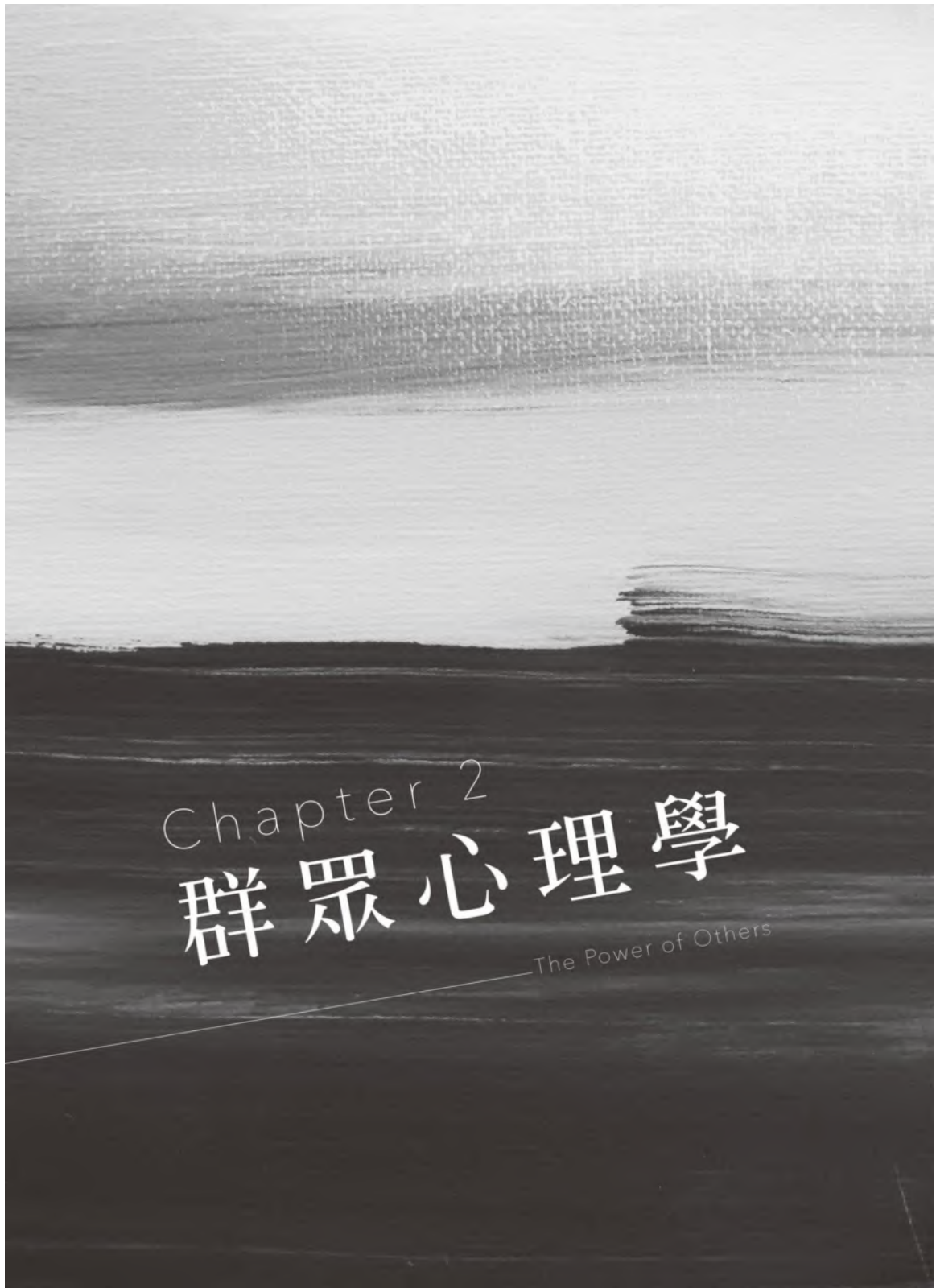
國九一一恐攻事件翌年，許多美國人出門選擇開車，不敢搭飛機，以為這樣更安全^[4]。結果顯示，當年有一千六百人死於交通事故，是那次飛機劫持死亡人數的六倍⁴³。威斯康辛大學心理學者珂琳．恩芮特（Corrine Enright）認為，光是收看九一一事件週年紀念的新聞報導，就足以讓人覺得發生第二次恐怖攻擊的可能性大增⁴⁴。恐懼和憤怒總能凌駕理性，平面媒體經常刊登各種激動、情緒化的臉孔，滋養著我們最古老的本能。正如作家暨概率專家納西姆．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觀察：「我們的理性不足，無法應付媒體的接觸。⁴⁵」

毫無疑問，排山倒海的資訊串流，也可以成為一股正向力量。這股力量引發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運動、加速東歐共產主義垮臺，並促成環保意識抬頭，成為主流。然而，它往往具有毀滅性與破壞性。面對各種眾口鑠金、令人信服的氾濫意見，我們該如何應對？關鍵在於要看清楚那些已經深陷當下情緒無法自拔的人，是否真的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他們憑據的是本身既有的知識，還是獨立思辨的見解？若是如此，他們的意見或許有參考價值。又或者，他們只是放任情緒肆意發揮，尾隨大家的腳步盲目跟風？若是如此，那麼請記住，此時跟著人群走絕非上策。

對許多人來說，龐雜的資訊混流和渲染性的情緒，使他們對於群眾的瘋狂及蔓延的盲目產生深切焦慮。接下來，我們將把焦點轉到這種群眾的恐懼上，探究背後豐富精彩的歷史，看看現代心理學者如何努力剖析並揭露箇中祕密，你會發現，這

是一種政治權宜的迷思。人在群體中會展現出違背常理的行為，往往超乎你所想像。

[4] 原註：二〇〇五年倫敦交通網絡發生恐怖爆炸事件後，也觀察到類似的影響：倫敦城市大學心理學者彼得．艾頓（Peter Ayton）研究團隊發現，攻擊事件發生後的六個月裡，許多人選擇改騎單車而不敢搭地下鐵，導致額外的二百一十四人發生交通傷亡事故。此研究於二〇一二年五月在芝加哥舉行的第二十四屆美國心理學會年會上發表。



喬瑟夫．普萊斯利（Joseph Priestley）是史上最「非典型」的通才。他發現了氧氣並發明汽水，名列當時最知名的科學家之一，還與美國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交好，同時也是與教會唱反調的牧師、神學家、哲學家、老師、英語語法學者、政治評論家，身分相當多元。為他撰寫現代版傳記的作者羅伯．薛菲爾（Robert Schofield）指出，普萊斯利在「各種領域的啟蒙運動中都是明星人物，涉獵之廣，超乎常人。¹」然而，就在一七九一年的七月十四日，一群憤怒的暴民燒毀了他在伯明罕的家，最後迫使他流亡美國，在異鄉度過人生最後十年。和如此悲慘的遭遇相比，縱使有再多豐功偉業也是徒然。

事情怎麼會演變成如此地步呢？儘管普萊斯利的成就與影響斐然，英國建制派發現他在許多事情的立場上都令人反感，例如他拒絕承認耶穌的神性，這在當時是相當不敬的褻瀆態度 [\[1\]](#)；他主張政教分離、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支持殖民者，還讚賞法國革命是一場為了爭取公民自由的越獄行動。隨著民眾開始擔心法國的動盪會越過英吉利海峽延燒到英國，普萊斯利的觀點很快引起民眾反感。有一天，他在伯明罕某家旅館設宴慶祝巴士底監獄被攻陷兩週年，這似乎做得過火了，他的反對者，包括一名律師、一名地方法官和幾名當地神職人員趁機發起一場暴動。

他們聚集的暴民在城裡大肆作亂，長達三天。起初就像典型的社會動亂，暴民朝著離開旅館的人丟擲石頭與爛泥；得知普萊斯利早就離開後，他們便轉而放火燒毀他所主持的教堂，一邊大喊著「政教合一」以及令人納悶不解的「反對天主教」口號（但普萊斯利並非天主教徒）。這幫人接著衝到他在市郊的家，他後來是這麼寫的：「晚飯後，我本來打算下盤雙陸棋（Backgammon）自娛，屋外突然冒出一批年輕人猛敲著門，嚇得我們驚慌失措。²」他們躲到前方幾哩外的朋

友家避難，他和妻子都清楚聽見「所有經過（我們家）的暴徒大聲咆哮，以及他們揮舞工具，打破門戶、砸壞家具的各種聲響。^{3]}

普萊斯利在這場暴動中失去了四十年來的個人日記和書信、未出版的回憶錄、所有宗教手稿、一本記載物理及化學實驗的手冊，他的書房與有著許多科學儀器的實驗室也通通毀於一旦。三天後，倫敦的政府軍隊終於抵達，此時暴動民眾早已褻瀆焚毀了四間持有異議的教堂及二十七名改革支持者的家園。普萊斯利在英格蘭再次感受到失去自由及安全的威脅，就在三年內，舉家遷往美國賓州鄉間，從此再也沒回去過。

這場因普萊斯利而起的暴動，隨著消息廣泛流傳，進一步證實了人們普遍的見解：人只要集體行動，就能輕易被說服去對任何人為所欲為。巴士底監獄風波中，多達上千名巴黎民眾攻破監獄的守備，並將管理者斬首示眾。此後，城市暴民在一般大眾的想像中就成了政治力量的化身，不是為人民的意志而發聲，就是凶惡駭人的野蠻動物，端看你抱持何種觀點。

這顯然嚇壞了不少知識分子。普萊斯利的好友兼政治盟友，英國輝格黨議員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巴士底獄事件後，多年情誼突然一夕生變；他預料文明會「被踐踏在一群卑劣的豬眾蹄下」⁴，轉而投身多數意見旗下。他將巴黎暴動者誇大描述成「可憎透頂的地獄怒火」⁵，並在幾十年後獲得法國史學家丹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的贊同。他認為這些人就像一群「只會哀號的烏合之眾」，又像一匹「本來溫馴卻突然再度失控的大象」⁶。

當時的科學家對於巴士底監獄事件的批評同樣毫不留情。法國犯罪學者塔德（Gabriel Tarde）甚至將十九世紀最文明的群眾喻為「凶暴的蠕蟲，情感氾濫不受控制，仍受大腦驅使，做出凌亂失序的

行動。⁷」同樣研究犯罪的義大利學者西蓋勒（Scipio Sighele）則援引催眠心理學的論點，試圖解釋為何群眾如此容易受到誘導，為了達成共同目的而行動。他認為，念頭和情緒一旦被植入腦中，就會像「微生物」蔓延開來。因此，所有群眾必然都是非理智的，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容易做出壞事⁸。

目前為止，這群新興的群眾行為分析家之中，最具影響力者當屬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他的身分多元，既是醫生，也是社會心理學家，更是一位全方位的異類知識分子。他和丹納一樣，經歷一八七一年巴黎人民對抗法國政府的暴動之後，受到深刻的心靈創傷。他展開研究，試圖以科學的方式理解人們大量成群結黨之後會做出什麼行為。他診斷出一種大腦癱瘓現象，並且和西蓋勒一樣，發現人腦會進入一種特殊的催眠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個體會被無意識的衝動奴役，出現不假思索就聽從別人建議的傾向。

他失去自我，成為一具不再受自我意志掌控的機器人。此外，光憑著他身為群眾組織的一分子，他的文明程度又會降低好幾級。獨處時，他可能修養極佳；但一旦置身人群，他就成了野人……他是沙堆中的一粒沙，當風恣意吹起，便隨之起舞⁹。

直至今日，這仍是政治家、評論家及大眾對於群眾行為普遍的看法。大多數人相信，群眾心中有一片原始本能與不受控制的灰暗地帶，他們活在其中，被奪去自我，導致不自覺做出暴力及非理性的行為。專欄作家威爾·賽爾夫（Will Self）在二〇一一年英國暴動事件後¹⁰發表看法：「群眾最顯著的特徵，是把無數的個體簡化成一個失去功能的角色代表。與這些個體平均的智慧相比，群眾顯得愚蠢多了。」本章目的，就是要說明群眾心理是如何開始引人注目，以及為什麼，根據現代社會心理學家的說法，被深刻誤解。

勒龐雖然不是第一個明確指出群眾瘋狂心理的人，卻是最早推廣這個概念的先驅。他的名著《群眾心理學》（*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2] 出版後二十五年內，在法國再版了二十五次，英語版則是十六次¹¹，最後還翻譯成十七種語言。雖然他的論點和當時的學界格格不入，但確實是相當不凡的成就。比如說，他相信頭骨的大小是判斷智力的可靠指標，因為白種人的頭比其他種族大，故他們的大腦更發達；女性則是人類演化的敗筆，「與其說是成人或文明人，她們更接近小孩與野人。」他不否認的確有相當傑出的女性，「但她們的存在就像無端誕生的怪物般特殊，好比長了兩顆頭的大猩猩。因此，我們完全不用將女人列入考量。^{12]}

勒龐的偏見與研究方法受到同行嚴厲批評，但似乎無損他在民眾心目中身為群眾心理學權威的形象。他對於原始主義（primitivism）與群眾愚性的見解，獲得當時歐洲中產階級的共鳴，遠超乎學術圈的支持。這些中產階級對於城市暴動與民眾示威造成社會動盪不安感到憂心忡忡。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便是以勒龐的分析為出發點，建構他對群眾心理的見解，透過探討勒龐這本「當之無愧」的名著¹³，開始撰寫《群眾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一書。許多公眾人物都認同勒龐對群眾心態的擔憂，就像作家暨政治家希萊爾·貝洛克（Hilaire Belloc）在一九一〇年所說的：「看看那些怒氣沖天，一路咆哮過街的烏合之眾。」^[3]、「讓人覺得，彷彿一頭威武英勇、凶猛懾人的猛獸，但在牠的殘酷堅毅之中，卻藏著一絲邪惡。^{14]}

可以想見，勒龐的理論遲早會被某些具有強烈控制欲的領導者拿來當作實現邪惡野心的手段。二十世紀初，他的《群眾心理學》被極權主義派奉為主臬，列寧、史達林、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熱烈服膺書中提及的催眠作用、匿名、集體心理等概念。據說列寧在自己桌上放了一本，裡頭劃了滿滿重點；墨索里尼在自傳中將它奉為經典，推崇至極。這些人最想從中學到的，無非是領導統御的技巧和建議，也確實發現書中有不少值得深思的啟發。勒龐曾經形容群眾是「奴性深重的羊群，少了主人的指令就形同廢物。^{15]}」他隨後提出，領導者應透過三樣工具來使群眾信服其理念：認同肯定（affirmation）、反覆宣傳（repetition）、傳染擴散（contagion）。換言之，若能把事情陳述清楚並反覆宣傳，消息自然會不脛而走。再加上充滿魅力、令人崇仰的個人特質（他稱之為「聲望」），輕易就能收服人心。

暴民彷彿退化成原始人，對於他們的恐懼不僅深植政治文章，同時也深刻烙印在通俗文學作品中。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一八五九年所寫的《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形容攻占巴士底監獄的革命群眾是一股肆虐的洪水，被捲入渦流之中：「人潮開始動盪，發出一聲怒吼，彷彿所有法國人都齊聲喊出那個可憎的字眼。人潮不斷湧入，匯聚成海，浪潮一波波襲來，愈捲愈高，淹沒了城市。^{16]}」無獨有偶，美國當代作家傑克·倫敦（Jack London）一九〇三年發表描寫倫敦東區人民生活的《深淵居民》（*The People of the Abyss*），形容那些擠在髒亂街上的「可憐群眾」就像「飄散著惡臭的廣闊海上無數道的波浪，在我身邊不斷拍打著，不斷進逼，愈湧愈高，彷彿要把我吞噬般。」^[4]此外，在法國作家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一八八五年所著的《萌芽》（*Germinal*）中，那些為了抗議惡劣工作環境而發起罷工的礦工，也被寫成復仇心切的暴徒，「他們目光如炬，張著大嘴，成了一群被怒火焚身的惡眾。^{17]}」

這類主題延續到當代，在整個二十世紀的美國文學中屢見不鮮。對於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哈波·李（Harper Lee）、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等人而言，濫用私刑的暴徒就和勒龐眼中那些失去理智、魯莽衝動的政治群眾沒兩樣。史坦貝克一九三八年發表《義警》（*The Vigilante*），主人翁好不容易從暴民的前線行列中安然脫身，不禁感嘆：「我感覺……就像在夢遊一樣。」這群暴民從監獄帶走一名男子，把他吊在榆樹下。就在半小時前，這位主人翁還一直在爭取拉繩子的機會；現在他靜下心來，慢慢試著接受自己之前的所作所為，只感到「一陣惡寒的孤獨感襲來。」¹⁸

我們看到，近來社會心理學家努力試圖反駁人一旦聚眾就會集體失能、變成機器人的觀念。他們要推翻的，不只是勒龐那一套廣為接受的群眾行為論點，還有學界同樣的「去個體化理論」（deindividuation theory）。該理論主張，被納入群體的個體會失去自我意識，變得不受控制、拒絕對行為負責。一九六九年，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宣稱，去個體化可以解釋為何人在被允許隱匿身分的情況下，通常會變得更有攻擊性（第三章將進一步探討他備受爭議的「史丹佛監獄實驗」）¹⁹。從那之後，該理論就一直被用來解釋群眾失序、難以管制的現象，但有些心理學家卻不以為然。例如，他們指出，群體成員通常只對外人隱姓埋名，彼此間還是會透露身分。另外，群眾中的個體不是喪失自我認同，而是主動去迎合周遭發生的種種。

將這些論點帶入公共話題的討論有其重要性，因為我們對於群盲的迷思太常被公眾人物用來支持那些可疑的社會或政治行為理論。例如，美國政治評論家安·庫爾特（Ann Coulter）曾試圖阻撓自由派人士的社會與經濟政策，宣稱民主黨（但非共和黨）的成功，要感謝群眾的團體迷思 ^[5] 與盲目魯莽。她在〈惡魔：自由暴徒如何危害

美國〉（*Demonic: How the Liberal Mob Is Endangering America*）²⁰一文中寫道：「同樣的暴民心態，使向來守法的民眾對警察丟擲石塊，也會讓聰明人拒絕相信任何未曾在公共廣播電臺（National Public Radio，簡稱NPR）聽過的消息。」猜猜看她認為誰才是賦予這項荒誕假設靈感的關鍵人物？不是別人，就是古斯塔夫．勒龐²¹。

史蒂芬．萊歇爾（Stephen Reicher）是極少數在電話中聽起來和本人一樣親切隨和的人。或許這一點都不意外，因為社交對他來說根本輕而易舉，也是樂此不疲的興趣。萊歇爾實際上是一小群英國社會學家的領頭羊，過去幾十年來，他們不斷研究並重新定義教科書所介紹的群眾動能，試圖更進一步瞭解其中複雜的社會和心理因素。他們發現一種機制，與勒龐及其追隨者建構的內容截然不同。萊歇爾團隊發現，大多時候群眾展現出合作與向心力，而非盲目瘋狂。他們觀察到的不是去個體化現象，而是認同的轉移，其研究開始影響政府及警方對於公眾集會的認知理解與處理方式。

萊歇爾從一九七五年開始研究群眾心理學，也就是他剛進入布里斯托大學（Bristol University）就讀的第一年，當時發生了兩件大事。首先，他遇見了亨利．泰弗爾（Henri Tajfel）這位研究社會心理學的先驅，同時也是最早從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角度解釋群體行為的學者。泰弗爾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正如萊歇爾所言，這種恐怖「籠罩著戰後所有的社會思維」，促使後來好幾個世代的猶太裔心理學家，都試圖去瞭解這種現象的成因與背景，其中有許多人本書將一一介紹。

第二件大事，是萊歇爾第一次參與的「群眾運動」，數百名學生占領學校大樓，主張開放女性進入校園。他回憶「這是一次激烈無比且極富教育意義的知識體驗」，徹底顛覆他在心理學課堂上所學到群眾理當毫無理性的認知，而這群學生也並非副校長所稱，是一群思慮不周，過度情緒化的暴民。「我親身體驗的實際情況和過去所學的理論背道而馳，加上積極套用理論以試圖詆毀，讓集體行動失去合法性的作法，三者相互矛盾，帶給我相當大的衝擊。」

五年後，萊歇爾還在布里斯托大學攻讀博士，他終於有機會實際驗證自己的推想。一九八〇年四月二日，他打開收音機，聽見聖保羅街頭發生暴動，該區為貧民區，失業問題與種族緊張局勢日益加深，更因為實施攔路臨檢法令，被視為是衝著非裔加勒比人而來，有失公平，因而導致衝突加劇。警方突襲了一間當地頗受歡迎的咖啡館，懷疑它無照出售酒類。這起事件引發一場憤怒的示威抗議，最後演變成警民之間長期的武力衝突，導致二十一輛警車損毀，二十二名警察入院，一百三十人被捕，數棟大樓被洗劫或燒毀。

萊歇爾前往現場，身上帶著一本筆記本。他首先注意到，當地的暴力行為，根本不像去個體化理論及傳統上對群眾行為的認知所預測，是不分青紅皂白的胡亂施暴，反而是極度有選擇性、只針對警察的行動。他記得：

我站在那裡，一看就知道不是當地人。他們對我搜身，知道我不是警察後，態度就變得友善。就像許多暴動，聖保羅暴動的特點和許多案例一樣，事態乍看之下相當危險，彷彿置身生死關頭，但另一方面，又像一場狂歡，每個人在各方面都表現得比平常更融洽友善。

他還注意到一種奇怪的日常氛圍。即使路上不時可見車輛被縱火與磚塊飛舞，當地人下班後照常步行返家，家家戶戶也會外出購物，隨處閒話家常，彷彿丟磚、砸車在當地早已司空見慣。

另外他也注意到，儘管警方高層宣稱這場暴動是由「情緒化的精神病患和企圖煽動叛亂的顛覆分子」所預謀發起，但萊歇爾並未發現任何證據顯示有人策劃或主導整起事件。顯然暴動是民眾自主發起的，參與者認為自己是一群為了反對警察勢力的迫害而起身抗爭的有志之士²²。事後他發表這份研究，對此表示：「無法想像要怎麼用經典的群眾行為理論來解釋這些暴動（特徵）。²³」

三十年來，觀察過數十場示威、抗議遊行、環保行動、足球賽和街頭暴動之後，萊歇爾和其他學者研究出一種新的群眾行為模式，勒龐若地下有知，可能也會跳起來。他們認為，集結成眾的人並非被迫放棄理性思考與自我意識，而是依據當時所附和的人（例如反戰的抗議分子、某個足球俱樂部的球迷、環保人士等）來定義自己，就是這種「社會認同」決定了群眾行為。此外，各種社會認同係由人們當下的處境（例如是否感到被威脅）以及他們具備的共同點形塑而成²⁴。

照這個說法，將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倫敦反人頭稅抗議活動所引發的騷動，全都歸咎於暴徒或煽動群眾暴力的投機分子（儘管這些人也都在場），就沒什麼道理了。當天下午聚集的二十五萬人早就對政府打算推行的均一式社區稅^[6]激憤不已，儘管每個人的背景迥異，也分屬不同利益集團，但許多人本來就是反對政府的。這正是所謂「心理群眾」（psychological crowds）的典型特徵：每個人對某個共同的主題思想都深感認同。當警方試圖用警棍驅散抗議人士時，現場群眾的心理產生了變化。主張和平的示威者本來就不樂見衝突發生，這時突然發現，他們自己也成了警方不分黑白任意施暴的目

標。於是他們開始用非常理性的心態，有志一同地將警民衝突合法化。這場暴動演變成知名的「特拉法加之戰」（Battle of Trafalgar），一直持續到隔天凌晨三點才平息。

萊歇爾表示，這種群眾行為模式同樣能套用在過去三十年所觀察的各起社會騷亂，包括了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俗稱「西敏之戰」（Battle of Westminster）的學運衝突^[7]、九〇年代中期的反M11連接道路抗議運動、二〇〇九年倫敦峰會場外的抗議事件，導致無辜路人湯姆林森（Ian Tomlinson）被警方壓制在地後不幸喪生，以及二〇一一年的英國暴動（後續會介紹）。此論點同時也和史上最徹底的都市騷亂調查結果相符。美國坎納爾委員會（Kerner Commission）針對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間，底特律、芝加哥、洛杉磯和國內其他城市的暴動事件進行調查。報告結論是，釀成暴動的主因是黑人社區普遍經濟邊緣化，並指出典型的暴亂分子教育水平通常高於其社區平均，且社會化的程度更高，不太可能有犯罪前科²⁵。

這項發現的影響力遠超乎學術上的爭議。假設群眾暴力係源自大多數人的社會規範（social norm）^[8]，而非少數犯罪分子的行動，那麼出動警力（例如鎮暴部隊）維持社會秩序的傳統作法很可能只是提油救火，反而使事態惡化。英國和部分歐洲國家（美國較不明顯）²⁶開始認知並理解這一點，警方也傾向採取更謹慎的方式來面對群眾管理。這一切都要感謝另一位學術出身完全顛覆傳統的英國心理學家。

克里夫·斯托得（Clifford Stott）自己也承認，他研究群眾行為的方式「非比尋常」。他稱之為「民族誌」方法，也就是人類文化的田野調查；另外就是「直接參與，實地觀察」，就像直接跳進巨大

湍流的深處一樣。他親自混入足球迷當中——通常是客場比賽的英格蘭球迷，貼身記錄他們的行為、感受他們的情緒、他們喝什麼就跟著喝（通常是啤酒）、一起放聲唱歌。正因為是英格蘭人，歐洲警方往往把每個人都當成流氓，他也努力躲避警棍攻擊，不被帶回派出所過夜。他坦言這種經驗「相當可怕。混入一群英格蘭球迷之中做研究，難免會遇到自己非常討厭的人，那種格格不入的疏離感和孤立感非常深刻。但為了研究，你不能輕易抽身，卻也無法完全投入。」過程中難免會遇到真槍實彈的驚險時刻，他被丟過催淚瓦斯、挨過警棍、被水炮攻擊、被丟東西、被洶湧人潮推落臺階，還被當成流氓嫌犯帶回警局拘留²⁷。

不過在專業領域，斯托得也吃足苦頭。他表示，自己偏好田野研究，不喜歡待在實驗室裡作實驗，使他在學術圈面臨「難以置信的邊緣化」。許多極具影響力、經常被學術界引用的心理學期刊，不會採納沒有實驗根據的研究，這使得他的研究方法無法被視為正途而接受學界檢驗，同時也無法透過傳統管道獲得經費補助。這其中牽扯到關於「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9]的爭議，此為實驗研究的基本原則，但在研究大批群眾時，顯然不切實際，難以執行。「你要如何在擠滿上萬人的球場，研究這一大群人並取得每個人的知情同意？根本毫無意義。」^[10]

你若認為斯托得對公共政策的影響遠大於當今任何社會心理學家，回頭看看他和學術界的對立，就變得很諷刺。剛好，他自己也早就習慣自外於主流。他十六歲時輟學，沒有拿過任何資格證明，因為他自覺被學校體制孤立，於是開始放棄考試，次次不及格。「我當時是個不折不扣的問題少年。」他說。他去登記領取失業救濟金，到了十八歲才意識到想好好把握人生，做點什麼。於是他重新回到校園，

進入專科學校，在一年內拿了兩個優等，並考上當時的普利茅斯理工學院（Plymouth Polytechnic）（今普利茅斯大學），主修心理學。

跟他聊天很有趣，不只因為他口才好，另一方面，他也是我見過最愛飆罵髒話的學者。「我惹過很多人不爽。」他說。他不輕易露出笑容，頂著小平頭，故作正經的風格給人一種可以輕易融入各種團體的印象。他承認，年輕時養成的街頭生存技能對他後來的田野調查很有幫助。意思是說，他可以「跟一群曼聯球迷流氓在國外某個酒吧鬼混，隔天跟倫敦都會警察署的助理署長闖室密談，兩邊都很吃得開。」

歐洲一些牽扯到英格蘭球迷的重大足球暴力事件，如一九九〇年及一九九八年先後在義大利和法國舉行的兩屆世足盃決賽，斯托得從未缺席，口袋裡始終放著一臺錄音機。他深信，大部分的足球暴力事件要從廣泛的群體認同的角度去理解才看得最清楚，而不是著重在少數流氓球迷的影響力。舉例來說，在義大利與法國的錦標賽，絕大多數英格蘭球迷一開始都相當平和，但要是當地警察開始針對任何身穿英格蘭球衣的人找麻煩時，他們就全都變了樣。斯托得在《足球騷亂，對英國流氓球迷的執法與戰爭》（*Football Hooliganism, Policing and the War on the English Disease*）一書裡提到：「就算真的發生集體衝突，那也不像是一場突如其來，沒頭沒腦的暴力事件。²⁸」

依照同一套理論，可以解釋為何蘇格蘭球迷就算喝了酒，也很少惹上麻煩。非暴力已經成了他們價值認同的一部分。蘇格蘭人用「避免衝突」這項特徵來劃清自己跟英格蘭人的界線，甚至懲罰那些莽撞好鬥的自己人。誠如某位蘇格蘭球迷在九八年的法國世足盃期間所言：「要惹火英格蘭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守規矩並且和其他人一起開心大笑。這會讓他們看起來就跟無賴沒兩樣。²⁹」蘇格蘭球迷向來以

理性非暴力著稱，他們與警察的關係和睦，跟英格蘭人簡直天壤之別。不用說，在英國的政治家和媒體身上往往看不到這項細微的特質，他們只會一味地將當年法國世足盃的騷動歸咎於所謂「投機暴徒」、「流氓群眾」以及那些「無法訴諸理智及理性的人」。

二〇〇一年，斯托得和研究夥伴，包括荷蘭籍行為科學家奧托·亞當（Otto Adang），向葡萄牙的保安警察（Public Security Police，簡稱PSP）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希望能應用在預計三年後於葡萄牙舉行的歐洲足球錦標賽。他們建議葡萄牙警方捨棄以往常用的鎮暴部隊戰術，改採低調不張揚、友善而堅定的方式。他們強調，要鎖定的對象就只有煽動鼓譟的滋事分子，並非所有剛好在場的人。此外警方還得與不同球迷團體交流互動，以評估其文化及社會規範會如何影響他們的行為。

幸好，葡萄牙警方接受了斯托得的建議。他們制定一套訓練計畫，確保每位保安警察都瞭解並活用這套理論，研擬出避免正面衝突的維安手法。結果，在二〇〇四年歐錦賽期間，英國隊的比賽沒有發生半場騷亂。那些渴望製造衝突的英格蘭流氓（儘管英國政府下達禁令，還是有些人混進現場）最終被自己的同胞球迷邊緣化，無法得逞。斯托得表示，他研究生涯中最美好的一刻，就是比賽結束後，在阿爾布費拉（Albufeira）街上被警方的高階長官叫住，對方拍了拍他肩膀，告訴他計畫成效很好。那句話聽起來「就像，好樣的，我們真的成功了！」³⁰」

時至今日，群眾行為的社會認同模型已經成為歐洲足總（UEFA）所有比賽維安及警務遵循的架構，雖然俄羅斯和東歐並未表明，依然只在檯面下採用。斯托得目前正致力將這套模型推廣到足球以外的領域。二〇〇九年，倫敦G20峰會場外發生報販伊恩·湯姆林森不幸喪命的意外之後，英國的獨立警察監督機關，皇家警察督察處（Her

Majesty's Inspectorate of Constabulary, 簡稱HMIC) 要求斯托得撰寫一份報告, 說明如何將群眾心理學應用於維持公共秩序及警務上³¹。他提出諸多建議均獲得採納, 發表在《適應抗爭》(*Adapting to Protest*) 這份改革報告中³²。可以預見, 未來英國政府在群眾的管控上將出現全新作法, 用溝通取代圍堵。這也促成倫敦及各地警方設立專門聯絡單位, 派遣身穿特定制服的聯絡官進入抗議群眾以建立聯繫(但並非如某些行動分子所懷疑, 是來監視他們的)。考慮到警方的誠信問題, 這是一項重大的挑戰, 儘管斯托得表示, 這些聯絡官在二〇一二年奧運期間成功達成將近五十場任務, 未來還規劃「倫敦的每一場抗議³³」都會派他們上場。

自從斯托得開始和警方合作之後, 他再度面臨被另一群人排擠的窘境。監督警察行為的公民行動團體, 在他混入抗議群眾時曾經全力支持, 如今將他視為叛徒。甚至有人指控他正在研發一套國家認可的思想控制技術, 以便暗中破壞社會運動, 該人士警告: 「我們已經來到一個利用新穎的群眾心理『科學』手法實施鎮壓的時代。³⁴」另一派人士則試圖將他踢出聯合國人權特別報告員(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human rights)的與會名單。這一次, 他又成了局外人。他表示, 這在在說明, 社會認同的問題與意識形態及權力動態密切相依。「這不僅是科學問題, 更是民主問題。」

當前公共論述對於群眾的看法, 依然停留在於落伍、毫無科學根據的過時思維, 以二〇一一年八月六日到九日(週六至週二)發生在倫敦及其他城鎮的暴動為例, 光從當局者的反應便能窺知一二。該起事件號稱幾十年來英國最嚴重的民眾暴動, 起因是有位二十九歲的年輕人馬克·杜根(Mark Duggan)在倫敦北部的托頓翰被警察開槍射殺, 警方卻未向家屬妥善說明事件的來龍去脈, 因而引發托頓翰和

海克尼當地社區全面性的反警暴動。隔天，倫敦其他地區也爆發了騷動，野火隨後延燒到伯明罕、利物浦、里茲、諾丁漢、布里斯托、索爾福德、曼徹斯特及全國各地。但這次暴動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對抗警方，反而是趁亂滋事，造成許多商店街及購物商場被群眾入內破壞、竊盜。

事後，政府、在野黨與媒體無視三十年來群眾心理學的研究，選擇以經典的勒龐觀點來解釋，也就是過去普萊斯利事件與法國大革命的同一套說辭。時任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³⁵指稱這是「不折不扣的犯罪」；司法大臣克拉克（Kenneth Clarke）³⁶怒稱為「犯罪等級猖狂無恥的行為」；內政大臣梅伊（Theresa May）把大部分的暴動歸咎於「職業罪犯」³⁷所為，代表托頓翰的國會議員拉米（David Lammy）則說，最該譴責的是那些「盲目魯莽，無知至極的群眾」³⁸。

許多評論家認為典型的暴徒可能有前科。接下來的幾個月，政府多次重申這套說法。然而，正如社會心理學家德魯利與歷史學家羅傑·波爾（Roger Ball）證明，這種解釋是有瑕疵的³⁹。儘管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在暴動期間被捕並送上法庭者，其中約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過去曾被警方口頭警告或法院定罪，但這群人不太可能代表所有暴動分子。在政府要求逮人的強大壓力下，警方坦承，他們首先鎖定的對象是那些已經在資料庫建檔、留下照片，並可透過監視器清楚辨識的人。二〇一一年九月⁴⁰，時任倫敦都會警察署代理署長戈德溫（Tim Godwin）在下議院內政委員會上坦言：「很顯然就是那些你知道會先被抓起來的人。」當時有將近四千九百六十人被捕，但警方透露，倫敦暴動期間監視器所拍到的影像中，有二千六百五十多人完全無法辨識，原因是畫質太差，還有人刻意把臉遮住⁴¹。此外還有許多人根本沒被拍到。另一項普遍誤解，就是群眾暴動係幫派分子刻意策

劃，此說法也被英國內政部的報告駁斥。該報告指出，在所有被捕的滋事者之中，只有百分之十三與幫派有關 ^[11]，「有幫派分子參與的場合，他們通常都不是關鍵角色。^{42]}

社會秩序崩壞，是任何政府最不樂見的情況，當局更不會急於承擔責任。把矛頭指向已知的罪犯、幫派或司法大臣克拉克口中「發狂的下流階層」⁴³，並延續當局自古以來的慣例，有效地將整起事件用病態化來解釋，三兩下就能把問題撇得一乾二淨。但這是一種很危險的想法，因為如此一來就無法探究騷亂的起因，以及在背後推波助瀾的社會動力。長達四天的倫敦暴動，引發多起蓄意破壞、縱火、滋事、趁機打劫商家等犯罪，估計損失高達二億英鎊，足見所有社群團體長期以來累積了合情合理的不滿情緒，導致事件一爆發，就吸引許多民眾群起響應。

群眾的不滿很大一部分是針對警方。倫敦政治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與《衛報》（*The Guardian*）⁴⁴合作的「理解暴動」（Reading the Riots）研究計畫以及政府成立的「暴動社區及受害者專家小組」（Riots Communities and Victims Panel）⁴⁵訪談了許多參與者，請他們說明自己在騷亂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訪談者都提到他們對於警方對待自己社區（族群）的方式深感不滿，尤其是屢屢被攔檢盤查；更令人無奈的，是每個市內貧民區的非裔年輕人都無法避免的特殊待遇。對這些人而言，這場暴動無非是一場「反警」行動，也是跟警方算帳的大好機會。

要是沒有這種不滿，暴動可能永遠不會發生。「有抗警暴動，不見得會發生趁火打劫；但有趁火打劫，就一定有抗警暴動。」萊歇爾和斯托得在合著的暴力心理分析《發狂的群眾與英國人》（*Mad Mobs and Englishmen*）⁴⁶書中如此表示。群眾的不滿情緒，無疑會演變成

更甚於反抗權威的嚴重事態。許多參與者承認，他們利用暴動期間法治的崩壞，趁亂偷竊平常買不起的商品。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場階級戰爭：相對其他店家，高檔商店往往成為暴徒下手的目標。群眾騷亂背後的動力和原因似乎相當複雜，但顯然參與者並未失去理智；事實上，他們就像被賦予權力，名正言順。正如萊歇爾所言：「用參與者的反常病態來解釋騷亂，說他們不是瘋子就是惡徒，完全跟我們對於群眾與暴動的理解背道而馳。⁴⁷」

這種充滿民粹、不經思考的本能回應之所以缺乏說服力，甚至不負責任，還有另一個原因。它會促使政治人物和大眾強烈要求涉案人士受到異常嚴厲的教訓，而法官與地方法官也欣然默許。許多案例中，驅使法官做出判決的，似乎是對群眾力量廣泛且根深蒂固的恐懼，而非個人的罪行及作案者的前科。那些人受罰，不僅是因為自己犯下的罪行，同時也因為他們身為全國性的犯罪集團一員。曼徹斯特某位皇家法院 ^[12] 法官認為，就是如此才讓這些事件「完全不符合一般犯罪的成因背景。⁴⁸」判決一般目的在於威嚇，不是伸張正義。因此，在二〇一一年倫敦暴動發生後一年內被定罪的人，平均刑期為十七點一個月，比前一年被判類似罪行者的三點七個月高出四點五倍。被帶上法庭審判的民眾中，有八百四十六人是年僅十歲至十七歲的青少年，其中二百三十三人被判處平均八個月的拘禁⁴⁹。某位年輕地方法官接受「理解暴動」訪談時表示，「法院規則都快被他們翻爛了。⁵⁰」此外，康納斯（Danielle Corns）和傑梅爾（Ricky Gemmell）兩人的案例又要如何解釋？前者僅因偷了兩隻左腳運動鞋（隨即丟棄）而被判入獄十個月；後者則因咆哮辱罵警察而被判四個月。這兩人皆有良好的品行證明，亦無前科。

許多參與倫敦暴動事件審理的法官和地方法官明確表示，懲罰輕重應考量社會大眾對於暴力的憤慨與觀感。二〇一一年八月暴動期

間，發生少年德蘇茲（Darrell Desuze）毆打退休老人鮑爾斯（Richard Mannington Bowes）致死案，當時死者為了撲滅家門外的火勢，被德蘇茲重擊倒地，導致腦部受到重創，三天後不治。翌年四月該案開庭審理，事後，法官桑德斯（John Saunders）對此表示：「過失殺人向來是重罪，但此案更嚴重，因為是在到處肆虐的社會動亂中發生的。」他認為既然法院在暴動後立即做出的判決皆從重量刑（後來亦獲上訴法院核准），後續發生的案件就必須比照同樣標準審理，這一點非常重要，「即使起初大眾對犯罪行為的譴責已經退燒。⁵¹」最後德蘇茲被判八年有期徒刑。

對於社會騷亂的涉案人士施以刑罰是標準的司法慣例，原因之一是為了嚇阻，以防騷亂再度發生；另外也體認到一件事實，那就是集體犯罪行為總是更加駭人、更有破壞力。但司法界對這個案子是否過度反應了呢？英國民眾似乎是這麼認為的。民調顯示，民眾對於非暴力罪犯的懲罰結果普遍感到不安，這並不尋常，因為大家一般都認為刑事法庭的判決過於寬鬆⁵²。但有些政治人物及媒體名嘴不斷散播聳動且毫無科學根據的言論，說暴動分子荒唐瘋狂、天生就有犯罪傾向，若民眾如此激烈的反應，部分是受到這些言論煽動的結果，那麼將其列入判刑的考量是否妥當，似乎有待商榷。

整起事件顯示，群眾心理學這門新興科學跟法律上對於社會行為的理解背道而馳。在法庭上，集體行動幾乎被視為更大的重罪，儘管在某些情況下，其背後的動力——尤其是人天生容易認同並接受周遭人群規範的傾向——或許還情有可原，能作為減輕刑責的理由。另一方面，這也顯示我們有多麼重視維持社會秩序，因為我們深諳它崩毀的速度有多快。正如萊歇爾指出，人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下，會產生殊異的身分認同，這項觀念為法律體制帶來值得深思的議題。「要是一個人在群眾中所認同的主體和他身為被告時不同，你要如何懲罰？」

[13]

在另一種情況下，科學研究同樣領先對普遍對於群眾的理解，那就是緊急事態下的群眾行為。最近針對大規模災害的研究顯示，面臨危急時，英勇救人及互助的行為往往是常態，而非例外。

二〇〇五年七月七日上午交通尖峰時間，一群伊斯蘭自殺恐怖分子在倫敦地鐵、巴士等交通系統引爆四枚炸彈，造成五十二人喪生、七百多人受傷，數百名乘客被困在伸手不見五指、塵土飛揚的地下隧道裡，無從得知是否會得救，更遑論下一秒會不會再爆炸。就在這場殘忍的大屠殺中，發生了一些不像是真的，有關人類合作互助的感人故事。以下是三位現場民眾的真實描述：

我記得我往樓梯走去，樓梯頂端有人從另一頭走來。我記得他比出手勢，禮貌地示意要讓我先走：「妳先請」……我相當驚訝，想說，天啊，在這種危急時刻，竟然還有人這麼有禮貌。雖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永遠忘不了⁵³。

直到現在，想起當時整個場面有多平靜，我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有個優秀的年輕人起身對大家說，我們不知道能否安全脫身，但大家要保持鎮定，繼續交談不要中斷。這個提議帶來相當驚人的效果，眾人幾乎卯足全力跟身邊的人講話，雖然還是能感受到一股低落不安的心情，也看到大家目光飄忽，四處掃視，尋找可以離開的徵象⁵⁴……

我覺得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然後，我的感覺好像，大家可能也都有同感，我不認為任何一個正常人遇到這種狀況還能平靜地坐在那裡，說出「哦，太棒了」這種話……當時情況很緊張，壓力很大，大家都被困在那裡，最好的方法就是互助……是啊，所以我真心覺得周遭的大家就像自己人那樣親密⁵⁵。

和傳統緊急事件的報導方式相比，這些小插曲似乎更令人意外。典型的報導習慣放大非理性的恐慌與可能隨之而來、欠缺思考的個人主義。對於群眾愚蠢深信不疑的評論家，經常引災難情景為例來證明其觀點，例如蜂擁而上的朝聖信徒、足球場邊瘋狂的球迷、失火夜店中為了逃生而盲目推擠的人群等。但有了真人現身說法，對於群眾的刻板印象立刻不攻自破。面臨危機時，群體中的人非但不會驚慌失措、爭相逃難，反而更容易展現互助精神。人性的團結戰勝了自私。薩塞克斯大學的德魯利教授率領的心理研究團隊訪問了倫敦爆炸案的倖存者，他們得到的結論是，當群眾面臨危險時，很少發生慌亂騷動，反而展現出一種團結互助的態度，他們稱之為「集體復原力」（collective resilience）⁵⁶。

這種行為在過去的記錄上有許多實例可以佐證。德魯利團隊訪談了過去四十年來十一起慘案的倖存者，包括一九八九年的希爾斯堡足球場踩踏事件，瘋狂湧入的人潮造成九十六名利物浦隊球迷被困在看臺區的圍欄邊窒息而死，以及一九八三年，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簡稱IRA）在倫敦哈洛德百貨外策劃的爆炸案，造成六人喪生。這些意外中，大部分的受訪者都還記得在危機期間感受到一股強烈的團結感，以及想要幫助陌生人的念頭。德魯利表示，要是沒有這種合作互助，當初的死傷率可能遠不只如此。也因此，他喜歡把群眾稱為「第四緊急救援服務」。這種態度正是大多數的警察、緊急應變規劃機關或群眾安全專家所欠缺的。德魯利認為，一味將群眾事故歸咎於群眾行為是錯的。更多時候，真正的問題在於規劃不周（同一地點聚集太多人），或是場地設計不良。

學理上大抵可以如此解釋：危機——甚至是火車在隧道裡故障這種小事——會使得一群陌生人成為心理上彼此認同的群體。你突然和別人成了命運共同體，因而有了共同身分，他們可能是周遭跟你一樣

倒楣的人，抑或你本來打死也不想理會的乘客。你關注的範圍從個人擴大到群體，就像希爾斯堡球場慘劇的倖存者所說的：

我想每個人都同意，大家早就不再把彼此當成足球迷……此時此刻，說句公道話，他們就只是一群掙扎求生的人類……我不認為任何人在這時候還會分誰是利物浦（隊）、誰是諾丁漢森林（隊）……當時大家已經拋棄球迷這個身分，就只是單純的一般人⁵⁹。

當時《太陽報》（*The Sun*）在希爾斯堡球場意外發生後第五天，肆無忌憚地刊出一篇頭版報導，指責那些喝醉酒的利物浦球迷不但攻擊救援人員，還在死者身上便溺並扒竊受害者的財物，讓人以為這樁慘劇是暴民滋事引起的。這些出自當地議員及不具名的警方高層的指控，後來全都證明是子虛烏有的謠言⁶⁰。直到現在，《太陽報》依然被利物浦人唾棄。

群眾的瘋狂行為往往是人們避之唯恐不及的原因。然而，在緊急情況下，通常就是這種不願輕易陷入恐慌的念頭，使他們的處境更加危險。以前，設計緊急疏散流程的工程師習慣預設群眾在聽見警報、聞到煙味或感覺建築物搖晃時會立即應變，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通常最難的就是讓他們迅速採取行動，及時應變。

當年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被劫持的飛機衝撞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幾項調查當時大樓內人們反應的研究指出⁶¹，大部分的人猶豫不決，並未立即起身前往最近的逃生門；就連那些幸運逃出的生還者，平均也要過了六分鐘後才開始往逃生梯移動。有些人待了半小時，一邊等通知，一邊收拾要帶走的物品，處理各種雜事，例如把文件收進

抽屜、換鞋、上廁所、把信寫完、打電話或將電腦關機。真正動身離開時，他們不急不徐地走下樓梯，遠比大樓安全專家預期的要慢上許多⁶²。

毫無疑問，當時要是大家動作再快一點，就有更多人能順利逃生。同理，許多人不幸在地面失火的飛機上喪生，就是因為在座位上待太久而未能及時逃出。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曼徹斯特機場發生飛機失火事故，造成五十五人死亡。官方調查報告指出：「最令人不解的就是為何乘客沒有立刻下飛機。⁶³」奧斯陸大學研究災難心理學的約翰·里屈（John Leach）教授發現，在火災或渡輪沉沒等重大緊急事故中，大多數人往往「愣在原地，動也不動」，不去思考要如何自救。根據里屈的說法，原因就在於他們腦中一片混亂，無法處理新資訊，進而冷靜思考該採取哪些行動。

遇到緊急狀況而不知所措時，我有個建議就是：「快跑！」除非你身在人群中，但情況可能會有點複雜。一旦集體意識開始作用，你會變得沒那麼想獨自行動，覺得這麼做並不明智。德魯利另一項研究結論，就是在緊急情況下，我行我素的個人行動會引發你爭我奪和破壞行為，減少每個人安全生還的機會。另一方面，從九一一事件、一九九三年世貿中心爆炸案⁶⁴以及多起飛機事故可以明顯看出，大團體往往要比小團體討論更久才能擬定逃生計畫，因為他們得花上更多時間來達成共識。所以，建議你當機立斷，明確告訴周遭的人，你要去找逃生門了，要他們也快跟上。接著，大夥就別再遲疑，馬上行動！



在人群中遇到危急狀況時， 該如何逃生？

你在的地方擠滿了人，這時突然發生狀況。可能是火車在隧道裡故障，或大樓開始煙霧瀰漫，又或者抗議遊行的群眾開始暴動。以下三大步驟源自群眾行為的心理研究，可以助你順利逃生：

1. 要記住，驚愕與困惑是你遇到緊急事態的自然反應，可能會使你愣在原地，無法反應。盡你最大努力來克服這一點，動腦思考、找出生路。
2. 跟周圍的人合作，不要相爭。利他行為在災難中相當常見，能增加你的存活機會。
3. 事先在腦中演練逃生策略。每每來到陌生的地方或身處不熟悉的情勢，都應該這麼做。你要是先在心中演練過這些動作，一旦真的發生狀況，就不會磨蹭太久。

一般的報導很少注意到群眾的團結一致和利他行為（altruism），但這項特徵卻受到愈來愈多心理學家和行為研究者的承認。一九六〇年，保加利亞作家伊利亞斯．卡內提（Elias Canetti）曾說：「只有在人群中，人類才能擺脫被碰觸的恐懼。」他還說：「群體中人人平等，無論差異，亦不分男女。壓在他身上的，跟自己是同一人。⁶⁵」一九八〇年，萊歇爾在研究布里斯托的聖保羅騷亂時，很快就明顯感受到群眾的溫暖。他其中一位受訪者說：「完全不像報紙寫的，是一群徹底喪失理智的暴徒。」「每個人團結一心，隨時互相看顧照應，不分種族黑白、男女老少，感覺非常美好。⁶⁶」

最近，萊歇爾與同仁證明，參與大型集會的正面經驗可以提升人們的幸福感，甚至改善健康，效果長達數週之久⁶⁷。他們以印度北部的年度宗教盛事「佛浴節」（Magh Mela）為例：該慶典吸引四面八方的印度教徒前來朝聖，最為人所知的就是洶湧的人潮、喧鬧嘈雜和糟糕的衛生環境，但這些惡劣條件似乎無損信徒透過緊密社會互動而產生的心理提振效果^[14]。這一點對任何參加過二〇一二年倫敦奧運的人來說，絲毫不足為奇：當時就連最偏激悲觀的英國人，也沉浸在一片友善和諧的狂歡氛圍中。

正面的群眾經驗是值得讚揚的，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會不經意發現自己正與一群陌生人緊密接觸，那些經驗通常都不愉快，令人倒盡胃口，比如為了狂奔趕火車，或是在店門口排隊，塞在動也不動的隊伍中等等。紐約有個搞怪藝術團體「到處即興」（Improv Everywhere），其宗旨就是藉由「在公共場合製造混亂與歡樂」來讓大眾的共同經驗變得更有趣。自二〇〇一年八月以來，他們已經辦了一百多場街頭即興演出，包括在紐約某棟大樓屋頂開一場假的U2樂團演唱會、在中央車站大廳演出「時間凍結」，召集一百五十名演員

暫停身體動作長達五分鐘，以及在每年冬天最冷的時候，挑一天在全球六十個城市發起「地鐵無褲日」運動，號召民眾脫掉褲子，僅穿著內褲。許多目睹這些活動的路人在吃驚之餘，卻也能會意，反應相當熱烈，成功達成策劃者的目的。該團體創始人查理．陶德（Charlie Todd）說，這些活動的用意是「鼓勵大家互動交際，想辦法搞清楚當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⁶⁸」

有時候，群眾的團結可以改寫歷史。以二〇一一年的埃及革命為例，雖然引發這場起義的動因，包括事件導火線、策劃方式、領導人物等依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背景卻是眾所周知的。儘管埃及人民長年遭受壓迫，對於國家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累積了諸多不滿，該國的抗議運動始終無法有效說服民眾響應號召，呼籲政府改革。二〇一〇年六月六日，二十八歲的卡利．薩伊德（Khaled Said）在亞力山卓市被警方毆打致死，這起事件促使民眾在臉書上發起「我們都是薩伊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運動，以及全國各地對於政府暴行的強烈抗議。七個月後，政府公然操縱國會選舉，使其僅存的合法性蕩然無存，造成當時（及現在）的最大反對黨「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在二〇〇五年選舉所贏的八十八個席次中，「失去」八十七席。

儘管如此，若沒有突尼西亞抗議運動的鼓舞，埃及革命可能永遠無法成功（至少在當初的時空背景之下）。二〇一一年，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歷經長達一個月的社會與政治動盪後，獨裁總統班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於一月十四日被罷免下臺。開羅記者哈利勒（Ashraf Khalil）在他的革命紀實《解放廣場》（*Liberation Square*）中寫到：「突尼西亞成為革命典範，發揮相當關鍵的影響。」他又提到：「堅持不懈、和平理性的公共運動能夠

推翻積重難返的獨裁者——就只是單純相信自己辦得到，便足以讓每個人立刻改觀。畢竟，事態會如何演變，根本說不準。⁶⁹」

埃及響應突尼西亞革命，於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發起大規模抗議，當天也是該國傳統的警察節。協助策劃開羅示威活動的青年行動分子法特希（Basem Fathi）說，他們原先預估只會來幾百人，頂多不超過千人。「但我卻看到街上聚集成千上萬的民眾，而且大部分都沒有參與過政治活動。超乎大家意料。」

當時許多國內外分析師（包括英國廣播公司〔BBC〕、《經濟學人》、《時代》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報章雜誌的撰稿人）都認為這種事在埃及不可能發生，法特希用實際行動證明這些專家大錯特錯，對此他相當自豪。外國媒體相信，社群媒體才是這場革命的背後推手，針對這一點他也積極澄清。「你不能說這是臉書革命。那些在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前線與警察搏鬥的人，我不相信任何人有臉書帳號。」

雖然臉書和推特在這場行動中發揮重大功用，特別是激發了埃及年輕中產階級的參與，但它們並未像許多報導所言，無所不在。一項針對一千二百名埃及抗議者的調查顯示，僅百分之五十二的人有臉書帳號，百分之十六使用推特。將近半數受訪者說他們是透過親朋好友當面告知才得知抗議的消息，僅百分之二十八是透過臉書，不到分之一在推特上得知（雖然有百分之五的人透過推特轉發消息）⁷⁰。示威遊行從開羅西邊的藍領社區布拉阿爾答克（Bulaq al-Dakroun）的巷弄出發，於一月二十五日抵達解放廣場。組織這場行動的力量，不是推特或臉書的發文更新，而是街頭巷尾一張張的傳單 ^[15]。

三天後，解放廣場湧入大批人潮，以每小時倍增。政府先切斷網路，接著是行動電話網，不讓抗議者有聯繫協調的機會。此舉反而激

發民眾想出更創新的戰術策略。衛星電視頻道開始透過電臺放送新聞，再由車上的司機將內容轉述給示威者。亞力山卓市的年輕人亨達維（Abdallah Hendawy）說，他支援動員的方式，就是把抗議行動計畫寫在紙鈔上，在商店和公車上流通。這時候，開羅彷彿又變回「透過口述來說故事的超現實社會」，哈利勒如此寫道。「走在街上，看見抗議者自另一個方向走來，你會問他們從哪邊過來、那邊情況怎麼樣？這是一種相當親密，甚至愉快的互動。⁷¹」直到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於二月十一日辭職下臺前，如此緊密的人際互動始終持續著。

社會革命，就像複雜的生命形式，有著多層次的演化歷史，無法一概而論。社會學家鄧肯·華茲將社會革命的動態喻為混亂無章的系統，就連最輕微的波動也能引起難以捉摸的變化。他表示，這種蝴蝶效應的問題在於，「等我們注意到風暴開始形成，那隻蝴蝶的身影早已消失在歷史迷霧中。」但在觀察這些運動逐漸成形的過程中，我們也得以深入瞭解人類行為各種細微的差異，並體認到我們自己的身分認同和心理狀態，與周遭的人關係是如此密切。



圖二、開羅的解放廣場，攝於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一日，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於當日辭職下臺。

撐過埃及革命初期的暴亂與屠殺之後，大多數繼續留在解放廣場的群眾經歷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他們在人群裡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科學記者葉希亞（Mohammed Yahia）告訴我：「這場革命將會是我這輩子最棒的經歷。⁷²」這句話我已經聽了好多次。「那是一片天堂。」法特希說。「沒有人在乎你是基督徒還是穆斯林，也不管你是窮人還是有錢人。」記者琳賽（Ursula Lindsey）如此回憶：

看到那群人，就覺得大勢是屬於我們這一邊的。你覺得非常美妙，這種團結讓人感覺棒極了。大家情緒高昂，因為他們都自認是這個大群體的一分子。這是一種沒有止境的體驗，讓人敞開心胸，又受到肯定。你感覺到恐懼煙消雲散，相當興奮，因為有這麼多人陪著你。過去那十八天激發出人性最美好的價值，每個人都展現出自己最良善的那一面。

主張人在群體中會改變而非拋棄自己身分認同，甚至「展現出自己最美好一面」的觀點，有違普遍認為群眾既瘋狂又危險，被法國犯罪學家塔德喻為「凶暴的蠕蟲」的看法。但這其實是有科學根據的：從災害受難者的利他行為到革命分子的團結一心，能明顯看出群眾擁有壓倒性的理智。雖然在法國大革命中，群眾可以是驅動正面改變的力量，亦能成為社會秩序的威脅，但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他們成功迫使政府廢除不合理的稅制、阻止對珍貴自然環境的破壞、推翻獨裁者，促成整個地區政治與經濟上的變革。萊歇爾說，他們「讓抵抗可能一觸即發，人一旦集結成眾便會做出可怕的事，但這就是沒有力量的人藉此發聲的管道，改變就是這樣發生的。」

然而，人在群體中所認同的身分及行為，持續的時間相當短暫，有如曇花一現。它們就像沙漠之花，只在特定條件下盛開。許多報導顯示，解放廣場在革命期間竟然沒有發生任何性騷擾事件，因為這在

埃及的公共場所履見不鮮。「（革命期間）性別藩籬被暫時放下了，這是件非常暢快的事，女性覺得既舒服又自在。」琳賽說。但就在總統穆巴拉克下臺後，情況改變了。當時不少人第一次加入群眾，但那種齊心齊力的團結感已蕩然無存，大家又回到以前的行為模式。女性安全在人群中再度受到威脅。

愈深入探究個人行為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就愈顛覆我們一般對於人性的預期，令人百思不解。例如，社會心理學研究的關鍵問題之一，就是有些人明明很正常，既非精神病患也無精神障礙，為何就只是順勢而為，也會犯下殘酷的暴行？事實證明，就算來到善惡道德的臨界，群體力量依然扮演關鍵的角色。

[1] 原註：一七七四年，普萊斯利在倫敦創立英國最早的一位論（Unitarian）教會。該教派強調上帝只有一位，否定基督教普遍相信的「三位一體」（即上帝由聖父、聖子、聖靈組成）之說，也否認耶穌為上帝之子。

[2] 譯註：臺灣中文版譯為《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3] 原註：貝洛克是普萊斯利的外曾孫，當然知道他曾被暴徒逼迫過。

[4] 原註：出自傑克．倫敦《深淵居民》第一章。在本章後半段，當他徹底融入東區生活、瞭解當地居民之後，傑克發現自己不再對人群心懷恐懼。他已經成為他們的一分子。「浩瀚與惡臭的海洋湧升，淹沒了我，抑或是我輕輕滑入其中，沒有什麼好怕的。」

[5] 譯註：原文為groupthink，為一種心理現象，指團體成員在決策過程中，為了不破壞整體和諧與共識，傾向從眾、避免提出異議，而令整個團體缺少不同面向的思考角度。

[6] 譯註：即為上文提到的「人頭稅」（poll tax），由當時首相柴契爾夫人推行。英國政府為縮減財政赤字，迫使地方政府減少公共開支，擬捨棄原來以財產為基礎的地方稅，改對每位成年國民（不分貧富）徵收固定稅額，但其實並未照顧到低收入族群，反而加重其經濟負擔。此措施除了引發倫敦街頭抗議，演變成近代歐洲史上最著名

的抗稅暴動，事後更有數百萬人發起拒絕繳稅運動，造成柴契爾夫人支持度急速下跌，因此被迫辭職下臺。

[7] 譯註：這是一場由全國學生聯合會發起的示威運動，抗議英國政府取消大學生活津貼，改採貸款。當時有上千名抗議群眾湧入西敏橋，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

[8] 譯註：指「是個人在社會裡與人互動的行為標準。規範是由社會制定的，互動中的個人通常皆須遵守。規範告訴人們該怎麼做，才能使互動的進行平和並達到個人互動所尋求的目標。」（蔡文輝（2006）。《社會學概要》。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9] 譯註：指「研究者在進行研究前，必須讓研究對象清楚知道研究的主題、方法、經費贊助單位、以及未來研究成果可能將以何種形式發表等，並告知被研究者在研究中的基本權利……讓被研究者在清楚狀況的情形下，得以自由決定是否參與研究。」來源：〈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是甚麼？要怎麼做？〉。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10] 原註：二〇一二年三月，斯托得辭去利物浦大學社會心理學講師的工作（他在那裡教了將近十二年），成立自己的群眾管理諮商公司（www.ccmconsultancy.info）。幾個月後，他以全職犯罪學家的身分重返學界，被任命為里茲大學「安全與司法研究小組」的研究員。

[11] 原註：不同地區的統計略有出入。在倫敦，被逮捕的民眾有百分之十九為幫派分子，倫敦以外地區則不到百分之十。這些被逮的幫派分子中，不確定最後有多少人被起訴或判定有罪。

[12] 譯註：原文為crown court，為英國受理刑事案件初審的法院。

[13] 原註：萊歇爾引用了一個社會認同理論在法庭上奏效的例子。該案被告人被控在一九九〇年人頭稅暴動期間，向警方丟擲石塊，辯稱他的行為是為了自衛。即使被告本身並未受到攻擊，他仍堅稱警方對於整體群眾抱持敵意，所以將警方一切行動視為攻擊，是合情合理的。

[14] 原註：萊歇爾團隊研究的是二〇一一年的佛浴節。二〇一三年，十二年一度的宗教盛事「大壺節」（Kumbh Mela）登場，吸引八千多萬人參加，造成三十六名朝聖者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擁擠的車站踩踏意外中不幸喪生。起因是火車班表在最後一刻臨時變動，造成數百名乘客瘋狂湧入月臺間的狹窄高架天橋，導致人潮嚴重阻塞而發生致命意外。大壺節慶典向來以高效率的組織及縝密規劃的群眾管理為人所知。

[15] 原註：一本開羅當地流通的《如何聰明地進行抗議》（*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手冊提供了實用可行的建議（例如如何對抗鎮暴警察），並特別告誡讀者勿透過社群媒體像是臉書、推特或其他網站散布，因為他們正受到內政部的監控。他們要大家改用電子郵件或影印方式來散播，但依然無法阻止部分西方媒體（如《大西洋》雜誌）將手冊絕大多數的內容曝光在他們的網站上，甚至就在革命最關鍵階段——一月二十八日的「憤怒星期五」（Friday of rage）登場之前。



Chapter 3
惡的平庸

The Power of Others

「譴責為惡者，沒有任何事比這更容易；但要了解他，卻比登天還難。」一九六一年，在耶路撒冷某間改建劇院裡針對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進行的審判上，昔日俄國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觀察仍擲地有聲，猶如真理。艾希曼是納粹的劊子手，犯下許多殘酷暴行：二戰期間，他協助將數十萬猶太人送往東歐和蘇聯的死亡集中營，更是替希特勒執行「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的冷血殺手。審判現場的數百名旁聽者及電視機前上百萬名觀眾，緊張地看著這個微禿、脖子纖細的前納粹官僚站在防彈玻璃包廂裡，臉上所露出的邪惡。「我們每個人都目不轉睛，還不時瞪大雙眼，仔細凝視。大家試圖回答相同的疑問，卻只是白費力氣：『這怎麼可能？……他腦子裡到底裝了什麼？他是誰，究竟是何許人也？』¹」《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記者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如此寫道。

若有人想探尋「惡」的本質，在艾希曼臉上是看不出任何跡象的。他在出庭作證的影片中，神情漠然，大多時候冷靜沉著，應對總是有條有理。他擦拭著厚框眼鏡，細細照料他面前桌上的書和個人財物，像侍者一樣，用手帕拂去灰塵。偶爾，他的舌頭繞著嘴巴內側轉動，並做出看似嚙咬下唇的動作。這個殺人無數的殺人犯毫無半點矯情造作的悔意，就連一般人該有的故作懺悔也沒有。



圖三、阿道夫·艾希曼。

若能一眼看出世上所有像艾希曼這種惡徒泯滅人性、喪盡天良的異常獸性，我們應該會安心許多。審判過程中，檢察長吉迪恩．豪斯納（Gideon Hausner）竭盡所能，將這位納粹中校描繪成變態的虐待狂。「他雖然生而為人，卻活得像隻叢林野獸！」然而在法庭上，艾希曼始終表現得像頭溫馴的大象。敬愛的威廉．洛弗爾．赫爾（William Lovell Hull）牧師在審判期間擔任他的精神輔導員並親眼目睹處決過程，形容他是「一個非常普通的正常人；這才是教人想不透的地方。^{2]}」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務逮捕，接下來的八個月都由警官阿夫納．萊斯（Avner Less）負責偵訊。他表示，艾希曼看起來「再普通不過了。^{3]}」

歷史學家大衛．切薩拉尼（David Cesarani）直言：「儘管我們都希望艾希曼是真的精神有病，所以才異於常人，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列舉艾希曼的成長背景、教育歷程、社會交際等記錄，各方面都相當平凡，與一般人無異。他年輕時沒遇過重大轉折，使他變成冷血殘酷的反猶太分子。切薩拉尼表示，事實上，「艾希曼並非『生來註定』變成暴行的幫凶。想要徹底了解他，關鍵不在於研究他這個人本身，而是要知道背後操控他的是什麼思想、那些思想所流行的社會環境、造就這些思想的政治體制、以及在什麼情況下被廣為接受。^{4]}」

為惡者常被認為心理病態或精神混亂，但實際上往往並非如此。從艾希曼的心理側寫（psychological profile）看不出他有任何虐待、偏執或道德淪喪的徵狀。一群心理學家仔細研究他的「羅夏墨漬測驗」結果（一種檢測人格特質及情感功能的心理測驗，過程中會讓受試者觀看一系列的墨漬，並回答從中看到什麼圖案），發現他是個與社會疏離又自命不凡，認為自己才智高人一等的人，但沒有任何心

理疾病⁵。其他人也認為他根本不像精神混亂，甚至遠比一般人想的還正常⁶。

那麼，這些觀察要如何解釋艾希曼對自己所作所為的評定呢？雖然他未否認大屠殺確有其事，也沒有否認他在其中擔任的角色，但他辯稱自己只是一枚「小齒輪」，一名毫無權力、只能「聽命行事的運送人」。他不過是在履行職責，真要說他做錯了什麼，那就是沒有質疑過長官。不過，從他的證詞也可明顯看出，他非常清楚自己這樣做會導致什麼結果，例如，被他遣送到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四十三萬七千名匈牙利猶太人中，大多數最後會被送進毒氣室。儘管如此，他依然興致勃勃，發揮他足智多謀的才華，狠下心硬幹。

就是這種裡外矛盾的兩難局面，被德國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評為「整起案件最大的道德上甚至是法律上的挑戰」。一個好好的正常人，怎麼會策劃出如此駭人的恐怖行動？對鄂蘭而言，艾希曼的證詞足以證明「惡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她認為，許多人犯下滔天惡罪時，往往欠缺周全的理性思考；即使他們本性不壞，面對當下情勢，卻拋棄了該有的道德判斷，屈服於陳腐老套的言論主張。「這種新型罪犯……在幾乎不可能知道或察覺自己做錯事的情況下，犯下罪行。⁷」

鄂蘭的結論仍然備受爭議。批評者聲稱，她的理論與法庭上聽到的證據並不吻合。證據顯示，艾希曼就如同大多數的納粹殺手，不像機器人般聽令行事，而是懷抱著創意甚至熱情去執行任務，並自豪於種族屠殺的成就。切薩拉尼表示，當初艾希曼奉命執行「最終解決方案」時，他「使出渾身解數，發揮所有管理技能，專心投入這項新任務。他被教導要執行種族屠殺，是他自己決定將想法付諸實現。⁸」

關於鄂蘭觀點的論戰，主要圍繞在大家如何詮釋她的想法，而不是她說了什麼。後來「惡之平庸」這句話被解讀成：我們每個人心中都住著一個艾希曼，一旦條件滿足，我們都將墮入惡的深淵。此觀點依然是部分社會心理學家、歷史學者及哲學家熱衷討論的話題。但鄂蘭本人卻堅稱外界誤解了她的本意，況且「平庸」（banality）在這裡指的並非普通平凡（commonplace）。她表示，不管人人心中有沒有住著艾希曼，這些想法都是不實的⁹。艾希曼接受絞刑處死的兩年後，鄂蘭在一次演講中強調，同為犯罪機器裡一個不思考的齒輪，每個人都應一視同仁，為其所作所為負責。還有，我們應該深思的問題不是為何要服從機器，就像小孩或奴隸那樣，而是為什麼要擁護它¹⁰。

一九六一年八月，就在艾希曼的耶路撒冷審判進入尾聲之際，年輕的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史丹利·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在紐哈芬市的耶魯大學展開了一連串至今仍惡名昭彰的實驗，測試一般人面臨權威人士要求他們在別人身上施加痛苦的時候，他們能聽從命令做到什麼程度。他發現，大部分的人會將指令貫徹到底。米爾格倫選在這個時間點進行研究絕非巧合。他的父母是來自東歐的猶太移民，加上自小在布朗克斯區^[11]長大，他非常清楚那些猶太同胞在希特勒的暴政下過得有多痛苦。他出生那一年適逢希特勒上臺，在他十三歲的成年禮（bar mitzvah）上，他在家人面前講了一段話，希望「猶太人能迎來一個全新的時代……願迫害、苦難和戰爭能夠結束。¹¹」米爾格倫深刻瞭解到艾希曼審判的爭議所在，希望透過實驗，以「科學的方式表達」戰後世代如他對於「權威力量」的擔憂¹²。不只他，學界也以行動響應。人，即使在本意良善的情況下，是如何受到勸誘誤導而犯下道德淪喪的惡行，成為許多猶太學者在經歷二次大戰的殘酷暴行之後首要關注的課題。然而，米爾格倫卻萬萬沒想到，他的實驗將掀起一陣軒然大波。

他實驗的目的 [2] 是想要瞭解一般人在面對明確的道德命令（moral imperative）時，會在什麼時候及用什麼方式服從或反抗權威。然而，報名參加的自願受試者（皆透過當地報紙廣告招募而來），一開始都以為他們的工作就是協助測試懲罰對於提升記憶力與學習成效的效果。儘管在實驗倫理上有所疑慮，這仍不失為一套精心策劃的完美手法。受試者來到實驗室，先由身穿灰色實驗衣、其實是演員假扮的實驗者招呼，接著他會被指派扮演「老師」的角色。實驗者向他介紹另一位同樣由演員假扮的「學生」，對方被綁坐在椅子上，手腕上戴著電極環。接著，實驗者引導「老師」進入另一個房間，坐在一臺外觀令人印象深刻的電擊產生器前，上面有三十個開關，以十五伏特為單位遞增，從最低十五到最高四百五十伏特依序排列。「老師」的任務就是透過對講機，對「學生」朗讀一連串的單字配對，例如「藍色箱子、好天氣、野鴨」，接著要求「學生」複誦這些單字，如果答錯便予以電擊懲罰，從十五伏特開始，每錯一題，電流跟著增強。

這項實驗最著名的版本中，電擊強度達到七十五伏特時，「學生」會開始低聲悶哼，暗示「老師」他覺得痛苦；一百二十伏特時，他會放聲大叫；一百三十五伏特時，開始呻吟；一百五十伏特時，他會哀求老師住手；二百七十伏特時，每次輕按開關，都會傳來痛苦的慘叫；最後來到三百三十伏特時反而悄然無聲，顯然他已經無力回應。但事實上，「學生」從頭到尾皆未受到電擊，那些反應不過是故意設計的技倆，用意是為了測試「老師」是否會服從實驗者的命令堅持到底，完成任務¹³。

實驗結果令米爾格倫大吃一驚。超過百分之六十二點五的受試者 [3] 選擇服從命令，持續處罰到最高的四百五十伏特。他們對受害者的悶哼、呻吟、抱怨、大喊、尖叫等各種反應充耳不聞，也無視自身

明顯的良心掙扎與道德衝突。米爾格倫記得，有個男性受試者以徐緩而堅定的步調，帶著「悲傷沮喪的神情」，完成整個實驗。另一個人則是在加重電擊處罰時，突然放聲笑了出來。他事後解釋，說「這純粹是一種處在完全不可能發生的情況下的自然反應……我完全無能為力，受限於一連串既定的規則條件，無法違抗也不能設法伸出援手。」許多人甚至在「學生」看似失去意識後，依然沒有停手；極少數人在處罰達到三百三十伏特後退出實驗。其中一名受試者回想當時他浮現的念頭：「親愛的主啊，他死了；好吧，乾脆繼續問完吧。」

「我就只是聽命行事，一路做到四百五十伏特……我心想，嗯，就只是實驗，這些情況耶魯大學的人都很清楚，要是他們認為沒問題，那我就繼續配合，沒事的。」¹⁴

米爾格倫「服從」研究的獨創性，不在於上述那些赤裸裸攤在眼前的統計基準（它們初次發表時成為國際新聞頭條），而是他為了梳理出人們各種服從傾向之間的細微差別而進行的四十多種實驗變化。例如，他發現受試者如果聽不見、看不到學生的反應，就愈容易施予高壓電流懲罰；反之，若讓兩人共處一室，或強迫「老師」在按下開關時，把學生的手緊壓在電擊板上，受試者聽命行事的意願會比較低（儘管在這種情形下，還是有高達百分之三十的受試者敢施予最高的四百五十伏特電擊）。

米爾格倫所能想到的各種實驗變化，他都一一試過了。例如他把實驗地點換到耶魯大學實驗室的地下室，看看簡陋的環境是否會助長受試者拒絕服從的機率，但結果並沒有影響。接著，他又找來一批演員分別扮演實驗者和學生，測試受試者是否會因為對象的個性不同而做出不同反應，依然沒有奏效。後來他讓實驗者離開實驗室，要他們透過電話下達指令，這次就有了相當顯著的變化，完全服從的受試者人數減到剩下原先的三分之一。他也曾把受試者全換成女性，發現她

們儘管內心相當掙扎，痛苦不堪，仍同樣選擇默默服從。他改變機構情境，將實驗室搬到鄰近的工業城市橋港（Bridgeport），以消除常春藤聯盟學府可能給人的敬畏感或權威感，這項改變使得完全服從的受試者比例減少了一半左右。他還將看起來像是正式人員的實驗者換成與受試者明顯無異的普通人，叫他代替實驗者行事。大部分受試者很容易就拒絕服從，並早早退出實驗。值得注意的是，每次實驗，大多數拒絕堅持到底的受試者，都是在學生第一次求他們住手的關鍵階段就選擇退出，通常是電擊強度來到一百五十伏特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米爾格倫實驗證明了人的行為有多大程度係取決於環境背景的影響。他關注的是我們在面對權威時會如何反應，但在另外兩個較不為人所知的實驗中，他探討的是同儕壓力的影響力。首先，他安排另外兩名演員加入，與受試者一同扮演「老師」，受試者不認識他們，也不知道他們是實驗者的同伴。實驗者要求三人一起對「學生」進行指導與懲罰，但當電擊強度來到一百五十伏特後，其中一名演員拒絕繼續配合，又過了幾回合，另一人也退出了，剩下受試者單獨進行。在這個實驗中，百分之六十二點五的人選擇和第二名演員同時或比他更早退出，僅有百分之十的人繼續執行到最高的四百五十伏特。這證明，當同儕也跟著反抗權威時，這件事就沒那麼可怕了。遺憾的是，在有人作陪的情況下，米爾格倫發現同儕的影響也會帶來反效果。他進一步實驗，將操作機器的任務交給別人，讓受試者扮演更像官僚的角色，退居二線而不直接執行處罰，藉此影射那些胡亂安排移送文件或替行刑隊裝填彈藥的人。這時反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受試者堅持到最後，兩人合作將電擊推到最高的四百五十伏特¹⁵。結果證明，成為暴力幫凶所受到的良心譴責，明顯比親自扣下扳機來得輕微的多。

有些人試圖否定米爾格倫實驗的結果，認為那是當初時代背景使然，因為以前大家對於權威體制的危害所知有限。不過，儘管現代的倫理規範不允許我們精準重現當年的研究，過去五十年來依然進行了各種類似實驗，大多數的結果亦相去不遠¹⁶，就只有一個提出不同論點。一九七四年某項針對澳洲婦女進行的實驗顯示，百分之八十四的受試者拒絕服從命令。此結果或許會不禁讓人想解讀成澳洲女性的倔強頑固使然，但研究人員認為，這反映了當時大學校園盛行的反獨裁時代精神，以及女性彼此容易產生認同，並聯合起來對抗專制男性實驗者的行為傾向（因為在實驗中，接受懲罰的也是女性）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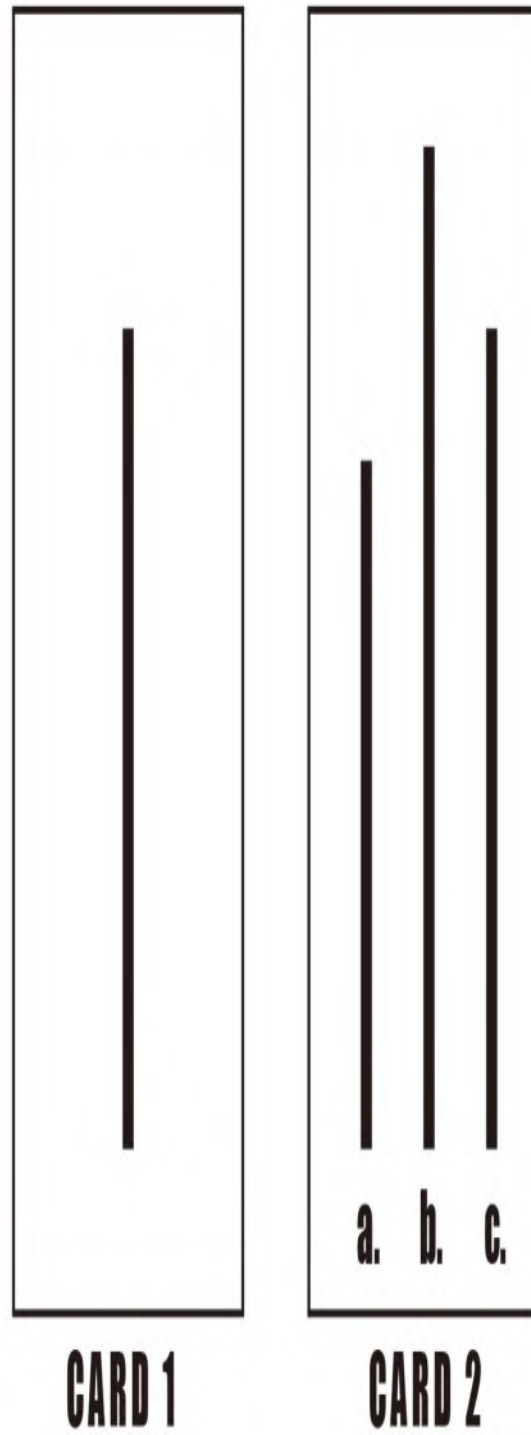
米爾格倫自己認為，這些服從實驗的結果相當「恐怖且令人灰心喪志」。他說，這證明了人類在有如巨獸狂哮的龐大制度面前，往往選擇棄道德責任不顧而屈服在隨心所欲的淫威之下。「我曾經想過，全美各州有沒有任何一個惡毒凶殘的政府，可以找到這麼多道德弱智的傻子，來滿足德國死亡集中營那種國家制度的人員需求。我現在開始覺得，光是在紐哈芬就能全部找齊了。」他憂心忡忡地對同伴說¹⁸。他的想法與漢娜·鄂蘭一致，認為她提出的「惡之平庸」概念「比大家所想的更接近事實。」¹⁹

鄂蘭本人並未參與任何有關米爾格倫研究的討論，因為她怕這些結果會強化「人人心中都有一個艾希曼」的錯誤觀念。她並不相信光憑「服從」就足以解釋納粹德國天理不容的罪惡與其他恐怖運動。不過，米爾格倫倒是證明了一點，那就是一般人也會做出非比尋常的凶殘暴行，以及在某些情況下更有可能放棄道德良知，選擇屈服。

米爾格倫不是戰後第一位強調社會壓力對於個人判斷與行為會產生轉化效應的科學家。他的實驗靈感深受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指導教

授，先驅心理學者所羅門．艾許（Solomon Asch）啟發。艾許在一九五〇年代曾經轟動一時，當時他證明，即使明顯有誤，人們往往還是會採納大多數人的觀點。艾許的實驗設計在當時就跟現在的米爾格倫一樣創新，而對於受試者來說，也同樣令人不安。

在艾許的實驗中，自願受試者來到實驗室，依要求與其他六到八人坐在一起，這些人都是艾許的助手。接著，實驗者把兩大張白色紙卡放在眾人面前，其中一張畫了一條黑色直線；另一張則有三條不同長度的直線，其中一條與最初卡片上的線段等長。受試者依序被要求找出同樣長度的線段。



圖四、艾許的線段實驗。

前幾回合中，答案顯而易見，很好預測，這項任務就像表面看來般平凡無奇。但進行到最後十六回合時，其中有十二次，艾許的助手故意說出錯誤答案，選擇明顯比基準線更長或更短的線段。艾許想知道，受試者在這十二次作答時會如何回應，是持續相信親眼所見的證據，還是遵從（錯誤的）多數意見？雖然任務本身相當簡單，但還是有七成六的人至少會跟著做出一次錯誤的回答，只有二成五的人每次都答對。平均而言，每回合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屈服於大多數人的誘答之下²⁰。

艾許對於這項觀察結果所象徵的社會意涵深感憂慮。「那些聰明理智、本心良善的年輕人竟然會黑白不分、顛倒是非，成了值得關注的重點。這令人疑惑，我們的教育方式與導引個人行為的價值觀是否出了問題。」他如此寫道²¹。

幾年後，加州大學心理學者里德．圖登罕（Read Tuddenham）對學生進行了類似的從眾（conformity）實驗。他列舉各種在美國現實生活中極不可能發生的情況，要求受試者判斷其真實性。結果同樣令人憂心。這些學生在獨自接受測試的情況下所給的答覆都相當合理，但要是圖登罕騙他們說，先前的受試者都是給出某種答案，他們就只會依樣畫葫蘆，如法炮製。

更奇怪的是，即使這些答案明顯不合理，他們依然宣稱一切皆是自己的判斷。例如，他們都認同有六到七成的美國人年紀超過六十五歲；男嬰的預期壽命是二十五歲；男性平均比女性高上二十至二十三公分；大部分的美國人一天吃六餐，每晚只睡四到五小時；舊金山和紐約之間相隔九千六百五十六公里（約六千英哩），以及要是大部分的人從沒受過教育，他們的生活會比現在過得更好²²。

大部分的人相信他們能抗拒來自同儕的壓力，但事實上，在面對多數人時保持獨立思考，遠比你想像的困難許多。通常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來說服自己隨波逐流。特立獨行會引來嘲笑或排擠，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想極力避免的。忍一口氣，嚥下你堅定的信念，總比被當成笑話或遭到冷落來得好。況且，正如我們在第一章看到的，別人的看法可能占有相當分量，因為我們往往會假設他們知道一些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以致於比起自己，我們更信賴別人的見聞或普通知識。這樣看來，我們要是沒有被大多數人牽著鼻子走，某種程度來說才叫奇怪，即使身邊大部分的人都表現得跟白痴一樣。

所幸，凡規則總有例外，而且還挺明顯的。艾許和他的學生米爾格倫一樣，對線段實驗做了些調整，以便更清楚瞭解人類從眾心理背後的社會因素。其中一個版本，他在受試者之中加入一位「誠實的夥伴」，這位新成員對於實驗真正的用意同樣毫不知情，又或者是由研究人員假扮，事先被交待只能回答正確答案。這項設定對結果產生了重大影響，答錯的題數少了四分之三。似乎只要有兩個人唱反調，他們就能結盟。

此外，艾許也發現，即使已經提示這位「誠實的夥伴」須給出一個錯得離譜的回答，但只要他的答案跟大多數人有出入，受試者答錯的機率就變得更低。這代表，任何形式的反對與異見，都能刺激人們更獨立地思考²³。

艾許的直線研究在過去半世紀被多次複製，結果皆出現相當顯著的分歧偏差，以致有些學者認為，群體所帶動的從眾行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文化與歷史背景。一九九六年，薩塞克斯大學的兩位社會科學家針對十七個國家，共計一百三十三項艾許實驗類型的研究進行後設分析²⁴。首先，他們發現在所謂的「集體主義文化」（collectivist culture）社會如日本、中國、巴西等國，對於家庭和社會目標的重

視程度更甚於個人抱負，且同樣強調融入群體的必要；和歐洲與美國盛行的個人主義文化相比，人們往往更容易認同多數，迎合主流。其次，他們得出結論：自一九五〇代之後，人們從眾的程度有所下降，至少在美國是如此。原因可能是今日的大學生（通常是人類心理實驗中的白老鼠）相較於在二戰後室悶侷限的社會氛圍下進行研究的學生，更傾向於質疑現況並且獨立思考²⁵。

在戰後那個年代，有關從眾與服從的研究是行為科學尚未馴化的邊境地帶。實驗者絞盡腦汁，用了許多當時前所未見、如今也絕對無法複製的方法來檢視人性的根本問題並試圖找出答案。史丹佛大學心理學者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是當時延續這股風潮並努力至今的火炬手之一。他是米爾格倫的高中同班同學，兩人就讀的是布朗克斯區的詹姆士門羅高中^[4]。據米爾格倫說，津巴多是他們班上最聰明的人，不過米爾格倫宣稱自己最受歡迎。津巴多說：「過了十年，我們在耶魯大學重逢，史丹利告訴我，他希望自己才是最受歡迎的那一個，而我也向他坦承，當年我希望自己才是班上腦袋最好的。」²⁶

津巴多的人氣毋庸置疑，尤其是對心理學系的學生而言。二〇〇六年五月，在紐約舉行的心理科學學會（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年會上，會場湧入上千人，都是要來聽他講看似善良的好人為何會走上歧途變成惡人，這是他研究了長達四十年的學術使命。演講結束後，半數年輕聽眾衝上舞臺，爭相索取簽名。現場有位聽眾不禁低聲說：「簡直是心理學界的米克·傑格（Mick Jagger）^[5]。」津巴多的魅力從他在美國大學生的教師評鑑網站「教授評分網」（RateMyProfessors.com）上獲得的評論亦可見一斑，學生大讚他「春風化雨」、「了不起」、「大藝術家」。但也有人覺得他「自我感覺過於良好」，甚至還有人說他「看起來跟魔鬼

沒兩樣」，不過津巴多本人保證會很喜歡魔鬼這個說法，因為這就跟他二〇〇八年出版的《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不謀而合，也呼應了他最新著作的內容，即如何弘揚道德英雄主義以消弭惡端，讓人們認識「良善力量的白熾光芒」。

在津巴多的學術生涯中，他對人性之「惡」著墨頗深，投注大量心力研究。讓他聲名大噪的「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為了探究體制化的惡性而進行的模擬實驗，至今仍是心理學史上最惡名昭彰的研究。他的目的是要調查監獄生活的社會動態，以及作為囚犯與獄監兩種身分對於人的心理狀態會有何影響。但他並未在真正的監獄進行，而是在史丹佛大學心理學系大樓的地下室打造一座假監獄。當時是一九七一年的夏天，《紐約時報》剛開始刊登《五角大廈檔案》（*Pentagon Papers*），揭露美國政府涉及越戰的過程。政府威信正受到空前關注。

津巴多研究團隊找來了二十四位男性大學生，每個人皆身心健全。他們對受試者進行人格測驗，然後隨機指派十二人扮演囚犯，另外十二人擔任獄監。他們竭盡所能模擬最真實的監獄情境：獄監身穿全套制服、戴上墨鏡、配備警棍，奉命管制囚犯，使其盡可能感到絕望、毫無抵抗能力。囚犯則穿著不合身的工作服和針織帽，腳上套著沉重的腳鐐，日夜被關在牢房裡，只用代碼稱呼²⁷。

實驗本來預計為期兩週，但津巴多不得不在六天後提前終止。他打造的地下監獄，正如他所描述，成了真正的「地獄」。短短一週內，這種監禁經驗（暫時）使學生中斷了終身學習，人性價值被拋諸腦後，自我概念受到質疑，呈現出人性中最醜陋、最卑鄙、最病態的一面²⁸。面對這種極權專制的環境，學生們以驚人的信念，融入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有三分之一的獄監性格變得殘暴無比，還想出更殘忍的虐待方式來剝奪、侮辱囚犯的人性尊嚴，例如不讓他們睡覺、把他

們抓去關禁閉、上廁所時將所有人用鍊子銬在一起，甚至逼他們彼此模仿肛交。囚犯們只有兩種反應，不是盲目服從，變成「卑微而喪失人性的機器人」²⁹，就是感到愈來愈困惑、歇斯底里、灰心沮喪等，心理狀態日益惡化。其中受創最嚴重的三人甚至在第四天就不得不退出實驗。

事後，所有參與實驗的人對於自己表現出來的行為都感到相當驚訝。「我很難過，自己竟然會用平常絕對無法忍受的方式，做出我完全意想不到的舉動。當下我並未感到絲毫後悔或罪惡感，直到後來開始回想……我才明白那是我自己從沒發現過的，心裡的另一面。³⁰」其中一位獄監在過了兩個月後，如此回憶道。就連津巴多本身也假戲真做，融入了他所扮演的典獄長角色。實驗期間他會到處巡視，雙手在背後交叉，表現出他平常所厭惡的那種性格。後來他為了這項研究對受試者造成的折磨以及未能及早收手而道歉，而這一切卻都要等到研究生克莉絲汀娜·馬斯拉克（Christina Maslach）（當時是他的女友，後來兩人結婚）親眼目睹實驗過程，並且強烈反對後，他才肯承認錯誤 [\[6\]](#)。

津巴多超越了艾許的線段實驗和米爾格倫的電擊控制器，進一步延伸了我們對「從眾」的理解。我們有種本能，能夠將每個落入掌控的人變成他們意想不到的面貌，儘管這種本能係人為塑造且異常殘忍的。監獄實驗的參與者融入他們不認識的角色，判若兩人；從他們的性格來看，根本無法預測其道德感究竟會受到多麼強烈的扭轉而出現偏差。「善良」的人變成施虐狂；「身心均衡」者精神失常，變得孤僻寡言；每個暴虐至極的獄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當我們掉入社會力量的熔爐時，多數人的性格可能會隨之發生重大轉變。」津巴多在《路西法效應》中寫道。「我們一旦掉入社會熔爐的情境，在那之

前以為會有的行為跟反應，可能會跟重新塑造出來的形象與能力相去甚遠。³¹」

三十三年後，史丹佛監獄實驗再次成為新聞焦點。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津巴多在華盛頓特區的飯店房間內隨意瀏覽著電視頻道，轉到其中一臺時，他看到節目秀出一張美國大兵站在由赤身裸體的伊拉克囚犯疊成的人體金字塔前，露齒大笑的照片。他發現這是一系列變態照片的輪播秀，各種畫面不堪入目，包括一名女兵將皮帶綁在裸身的犯人脖子上；囚犯們被迫手淫或模仿口交；一個人被套上頭罩，十指綁著電極環，搖搖欲墜地站在箱子上。原來津巴多偶然看到的，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有關美軍在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Abu Ghraib prison）虐囚事件的即時報導。這些畫面讓津巴多「心頭一驚，好像在哪裡看過。」「就像監獄實驗最慘絕人寰的情境在如此可怕的狀況下持續了好幾個月，卻不是發生在我們那間短暫、相對善良的模擬監獄裡。」³³

這起醜聞導致十一名美國憲兵被控對伊拉克囚犯施以體罰、性虐待、心理虐待等罪名移送軍事法庭審理。津巴多被指派擔任被告伊凡．契普．費德里克（Ivan ‘Chip’ Frederick）中士辯護團的專家證人。費德里克負責值夜班，當時發生不少虐待事件，據說他也熱烈參與。在準備證詞時，津巴多對費德里克進行了幾次長時間的面談與廣泛的心理測驗，並未發現他有任何精神疾病或施虐傾向的跡象。他說：「從許多方面來說，這名士兵就是典型的美國人代表：好丈夫、好父親、好員工，既愛國又有信仰、交友廣闊，長久以來始終過著平凡無奇、恪守道德的小鎮生活。³⁴」津巴多認為在未考量諸多情境影響力作用的情況下就貿然審判的行為是錯誤的。這些情境因素包括：缺乏上級長官適當的監督或介入、極度高壓又可怕的工作環境、

日益嚴重的道德敗壞文化，以及助長剝奪囚犯人性尊嚴歪風的權力結構。

津巴多的評估結果並未讓軍事法官留下深刻印象。雖然費德里克最後認罪，他還是被依共謀、怠忽職守、虐待被拘留者、毆打與猥褻等罪名判處八年徒刑，為本案最長的刑期（他在三年後獲得假釋）。本案提醒了心理學者仍須努力說服法官和其他人相信，社會歷程（social process）在「惡」的產生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從耶魯大學心理學者厄文·詹尼斯（Irving Janis）四十年前的研究來看，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是個令人匪夷所思的特例。一九六三年，詹尼斯證明，一支團結有向心力的部隊，當成員對於上級領導感到不滿或缺乏有效的申訴手段時，他們很容易訴諸集體滋事，犯下暴力搶劫、姦淫或虐待等惡行³⁵。我們無法冀望這種論點能夠成為有效的辯護依據。「我們的社會往往只著重個人的心理狀態。所有體制機構——戰爭、法律、宗教、醫學——都是建立在此概念基礎上。³⁶」津巴多說。

數十年來的實驗行為研究讓我們學到，個人的心理狀態不足以解釋世界上大多數的暴行。二〇〇三年有人針對二萬五千項社會心理學研究，雄心勃勃地進行分析，這些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百年前社會心理學剛開始發展的階段，涉及約八百萬名受試者。結果發現，社會的脈絡背景在形塑人類行為與態度方面，始終起著重要的作用³⁷。這些影響在現實世界中如何發揮作用呢？接下來，就讓我們將焦點轉到體制化的恐怖行為，就其中一種特例來探討背後群體和文化所發揮的影響力。這個特例或許是所有恐怖手段中最致命，當然也是最令人不解的一種，那就是自殺恐怖主義。

位於約旦河西岸（West Bank）的以色列猶太屯墾區「卡爾內夏姆倫」（Karnei Shomron）是世界上最具爭議的定居處之一。該區設於一九七七年，地點選在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上，連同其他以色列聚落，除了以色列當局外，各國政府都認為不具合法性。但大多時候，對當地居民而言，那裡感覺完全不像非法的化外之地。社區內環境優美，街路兩側綠蔭夾道，種著椰棗、尤加利樹，還有整齊美觀的樹籬；潔白的屋舍居高臨下，俯瞰著石灰岩丘陵。家家戶戶比鄰而居，感情相當融洽，許多人幾乎夜不閉戶。但有時，現實處境的危機也會不請自來。

二〇〇二年十月，時值巴勒斯坦發動第二次「起義」^[7]，抗議以色列占領^[8]的第二年，我經由約旦河西岸來到卡爾內夏姆倫與某位女性碰面。這位女性的人生因政治局勢的動盪紛擾而產生巨變，很難想像到底有多悲慘。她名叫吉妮特·泰勒（Ginette Thaler），八個月前，她十六歲的女兒瑞秋在當地露天商場的披薩店被捲入一起巴勒斯坦自殺炸彈客攻擊事件。她在醫院始終未恢復意識，十一天後宣告不治。爆炸當時吉妮特十四歲的兒子里奧也在場，就在瑞秋旁邊，同樣身受重傷：指甲插進喉嚨、炸彈碎片射進腹部與腿部，膽囊受創，耳膜破裂穿孔。他最好的朋友尼西米亞與瑞秋的朋友凱倫，都死於這場意外。那名炸彈客凶手年僅十八歲。

我們約在事發地點的披薩店碰面，這是吉妮特的提議。除了她以外，任何外人看來，這裡不過就是一間擺著塑膠桌，裝潢平凡無奇的普通速食店。吉妮特愉快開朗而健談，天生愛笑。賣場內非常安靜，白天的光線明亮溫煦，孩童坐在高腳椅上舔著色彩繽紛的冰淇淋。這時電視上閃過艾瑞爾（Ariel）屯墾區發生自殺炸彈攻擊事件的新聞，就在卡爾內夏姆倫東南方十公里外。我注意到她急促地倒抽了一口冷氣。

吉妮特提議我們換個地方，到社區另一頭探視瑞秋的朋友漢妮，她也在那場意外中受了傷，對於事件經過還記憶猶新。十分鐘後，我們圍坐在漢妮家中的餐桌前，看著偌大花瓶裡插著五彩繽紛的百合花，若有所思，彷彿是從魔術師的帽子裡變出來似的。就在幾個月前，漢妮還躺在加護病房裡，全身從眼睛以下纏著繃帶，但如今她看不出有任何傷疤，講話輕鬆自如。她描述那名炸彈客的模樣，膚色不深。他走上披薩店的臺階，來到他們桌前，定住不動。他盯著他們，瑞秋笑了起來。「接著他就跑到餐廳中央，我以為他要去廁所。」吉妮特問當時他們坐在哪裡，漢妮隨手拿了紙和鉛筆，畫下餐廳的平面圖和當天桌椅的擺設。她畫線代表炸彈客移動的路線，包括他進來的地方，在他們桌旁所站的位置、最後衝刺的方向等。然後她說了一件吉妮特也不知道的事：「當時瑞秋突然尖叫，但只有一秒，接著就安靜下來了。整間餐廳鴉雀無聲，陷入一種詭異的死寂。」

後來，在她家裡，吉妮特給我看了一張瑞秋出事前拍的照片。照片裡的她剪了一頭男孩子氣的短髮，身穿紅色T恤，正在和朋友說笑。我問吉妮特有關自殺炸彈客的事，對方名叫薩迪克·阿卜迪爾·哈菲斯（Sadek Abdel Hafeth）。我問她對他家裡的事知道多少？是否想過薩迪克的母親是個怎樣的人？她回答：「這個母親的小孩，想辦法闖進了我們小鎮，來到一群孩子身旁，接著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彈。他的母親對他一定有些影響。我也是個母親，但我跟她天差地遠。」我再問她是否看過凶手的照片，她沒有。但她有一捲他自己作證坦承犯案的錄影帶，是幕後主使者，一個名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簡稱PFLP）的恐怖組織所拍的。某家德國電視公司將這捲帶子寄給吉妮特，但她始終沒有看，她的小兒子里奧也沒有。她提議我們三人一起看。影片解說是德文，我們都聽不懂，但畫面相當清楚。薩迪克穿著迷彩戰鬥服，將AK47步槍緊握在胸前，擺出殉道者的經典姿勢。「他

看起來像個小男孩。看他這樣子，我心裡好不舒服。他就是個小孩子。這才是最荒謬的地方。」吉妮特說。

告別吉妮特之後，我開始找尋凶手薩迪克的家人。在當地巴勒斯坦團體的協助下，我跟著他們來到蓋勒吉利耶（Qalqilya），一個位於約旦河西岸西緣、塵土飛揚的低矮小鎮，距離卡爾內夏姆倫僅數英里。那間房子的門口種著橄欖樹，在樹梢上緣、隔壁房子的外牆飾板上，有人掛了幾幅薩迪克的海報，畫面中的他身穿牛仔褲和T恤，呈現蹲姿，AK47步槍就放在右膝上。那把槍他拿起來太大了。

他的父親阿布．馬穆德（Abu Mahmoud）相當友善，但不願多談。薩迪克的死給家裡帶來無止盡的麻煩，他說。如今他每天無時無刻期盼以色列軍隊能夠來把他家炸毀，這是對自殺炸彈攻擊的標準反擊方式。屋內的家具他都清空了，但他還是邀我入內，帶我沿著純白的屋牆繞了一圈。我問他有關薩迪克加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事，他知道多久了。他說：「我從電視上的地方新聞得知他的死訊之後，才知道這件事。」

一般人總是想像自殺恐怖分子無論在心理、生理或其他各方面都異於常人。我們預設這些人都有殺人或自殺傾向；他們都是窮人，沒有受過教育或愚昧無知，對未來絕望，也都是虔誠的（伊斯蘭教）狂熱分子且憤世嫉俗。大多時候，像這樣的誤解往往大錯特錯。過去二十多年來，少數實地田野調查的研究顯示，自殺恐怖分子都是相當普通的正常人，與你我無異。正如諸多暴行的犯罪者，決定這些人行為的關鍵因素主要是群體的影響或操控，而非個人背景或性格。單獨行動的自殺恐怖分子幾乎前所未聞。

以色列臺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退休心理學教授阿里爾·梅拉里（Ariel Merari）是最早承認社會影響力對於激化自殺炸彈客有著舉足輕重作用的學者之一。他研究恐怖主義與政治暴力長達三十年，以縝密而井然有序的方法來分析、觀察人性。他毫不遲疑地承認，從一九八三年開始研究此現象以來，他對自殺恐怖主義的看法出現戲劇化的改變。當年黎巴嫩發生現代首次有系統的自殺式攻擊活動，他當時就推測炸彈客已經有自殺傾向並且自願犧牲，藉此迴避傳統巴勒斯坦禁止自殺的宗教及社會禁忌。

接著，他開始進一步深入研究某些自殺恐怖分子的背景，包括「利他自殺」（altruistic suicide）案件的凶手，例如一九八一年在北愛爾蘭梅茲監獄絕食數週後死亡的十名愛爾蘭共和軍成員。他說：「這件事對我原本所臆測的觀點帶來很大衝擊。說這些成員本來就都有自殺傾向是不太合理的假設，我認為背後還有其他力量推動，如社會承諾，才能解釋此現象。但我無法確定，因為我沒有機會接觸到自殺炸彈客。」

一九九七年，梅拉里的研究出現契機。當時他接到一通來自娜絲拉·哈珊（Nasra Hassan）的電話。她在中東替聯合國工作，被派往加薩，在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簡稱UNRWA）服務四年。到任幾個月後，哈珊得知房東兒子的好友在以色列發動自殺攻擊並因此身亡。她開始對他的動機感到好奇。「我還記得看過那個小伙子四處閒晃。」她回想。「因為工作緣故，我認識不少巴勒斯坦激進組織的成員，開始意識到或許有辦法找出背後的真相。即使到了現在，我還是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選擇走上這條路。」就在這時候，一些以色列朋友居中牽線，協助哈珊與梅拉里取得聯繫，兩人約在臺拉維夫大學的辦公室見面。

梅拉里告訴她，他需要那些巴勒斯坦炸彈客的個人檔案，包括身分、性格描述等。哈珊說她可以協助。她本身是巴基斯坦人，也信奉伊斯蘭教，透過她的工作之便，有相當程度的機會能接觸到恐怖分子的家庭，這是身為以色列猶太人的梅拉里所辦不到的。哈珊所服務的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自一九五〇年以來，持續為加薩和約旦河西岸地區的巴勒斯坦難民提供工作、糧食補給、辦學等。於是兩人聯手設計了一套問卷，由哈珊訪談炸彈客的家人親友時使用，藉此建立死者的個人檔案，即所謂的「心理解剖」（psychological autopsy）。問卷涵蓋許多基本資訊，包括年齡、父母背景、教育程度、職業、興趣嗜好、兒時夢想、受歡迎的程度、交友對象、在家中與誰感情最好、宗教信仰是否比親友更（不）強烈、他們最喜歡《古蘭經》哪個章節、有無任何心理疾病或創傷病史、個性如何？例如積極、順從或是富有同情心？他們本身或親友是否曾遭以色列軍隊逮捕？攻擊動機是否為了報復？他們崇拜的英雄是誰等等。

接下來的一年裡，哈珊利用這份問卷調查了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八年間共計三十六名死於自殺攻擊的巴勒斯坦炸彈客，拼湊出其中三十四人的個人檔案，重現他們的輪廓。她親自造訪這些人的家庭，跟他們的至親好友交好。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壯舉，我問梅拉里她是如何辦到的？「她是個聰明的女士。她懂得如何跟人交談，擅長說服，更能夠與各行各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成一片。她真的很厲害。」他笑著說。

二〇〇三年，我試圖訪問哈珊，想瞭解她在加薩的調查成果。她禮貌性地回絕了我。二〇一二年初，我再度聯繫上她，她提到上次婉拒我的事並向我道歉。她解釋，當時是因為她已經受夠記者濫用她的資料，如今她已辭去聯合國的工作，打算全心投入調查，研究伊

斯蘭文化背景下的自殺式恐怖主義。她同時正在寫作，打算將田野調查的成果寫成兩本書。開始與梅拉里合作以來，她逐步擴充資料庫，目前建立了巴基斯坦、阿富汗、喀什米爾、孟加拉、巴勒斯坦領土和其他各地共計四百多名穆斯林自殺恐怖分子的個人檔案。二〇一二到二〇一三年期間，我多次與哈珊通話，她總是充滿自信，滔滔不絕，有分享不完的故事和觀察，而且就像梅拉里一樣，解讀資料時總是相當謹慎小心。她不知道別人會採用什麼角度來詮釋，對此備感憂心。「每個人都戴著有色濾鏡，用自己的紀律標準來檢視案例。」她說。

雖然少有研究者可以像哈珊那樣，擁有豐富的穆斯林自殺恐怖分子採訪經驗，但她本身不是心理學者或社會科學家。她多次訪談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Hamas）的創始人兼精神領袖艾哈邁德·亞辛（Sheikh Ahmed Yassin）（他後來於二〇〇四年在加薩遭以色列以飛彈擊斃），以及策劃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奧運慘案的巴勒斯坦武裝分子阿布·達烏德（Abu Daoud），該事件造成十一名以色列運動員遭到挾持並不幸喪生。此外，她也訪問過巴基斯坦最令人聞風喪膽的激進分子，負責看管他的獄監還給了她面罩，「以免被對方或其追隨者跟蹤」（但受到她婉拒）。我問她是否曾經害怕過或受到威脅，她說：

從來沒有。我並不是代表中情局、莫薩德（Mossad）^[9]或任何國安機構來審問這些人，關於我的身分與目的，我一律據實以告，他們全都欣然接受，因為我的提問都是從伊斯蘭教的角度出發，並且直接引用他們的字句，他們覺得很放心，不怕會被扭曲造假。

梅拉里和哈珊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研究是首次針對自殺炸彈客，根據熟人提供證據所進行的分析，內容相當有系統且條理分明。研究

發現的統計數據完全公開如下：三十四名炸彈客皆為男性，其中年紀最小十八歲，最大的是三十八歲；有三十一人未婚，已婚者之中有兩人有小孩；教育程度從小學到大學不等，但與一般巴勒斯坦人相比還是高於平均；其中三人家境赤貧，七人來自中下階層，十二人屬於中產階級，三人家境富裕；有二十三個家庭說他們的兒子是相當虔敬的伊斯蘭教徒；三十四人中，有十六人在對抗以色列的過程中失去親友家人，十六人在與以色列士兵的衝突中受傷或被毆打，八人曾被關押在以色列監獄，但所有受訪家庭皆不認為他們兒子的自殺是受到特定個人事件刺激而引發；這些人皆未曾因精神因素而入院治療，也未罹患精神病、情緒障礙或任何心理疾病，或涉及犯罪行為；沒有人告知家人他們的行動³⁸。

我問梅拉里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什麼端倪，他說：「他們看起來相當正常。」哈珊則強調這些樣本組成的多樣性，各種背景應有盡有：

我收集到各式各樣的個人檔案，有很年輕的，也有年紀大的；有非常成熟的，一絲不苟的，也有相當逗趣的；有相當虔誠的，也有完全不信教的；有知名足球員，也有滑稽型和非常搞笑型的；有窮人、富人和中產階級；有學歷傲人的，也有書沒念完或根本沒上過學的。對此我毫不意外，他們就跟社會上各種形形色色的人一樣。

自殺炸彈客這種明顯無異於常人的特點可能令人難以理解，因為大多數評論員的刻板印象，都強調他們喪盡天良，不是堅守基本教義的死硬派就是精神失常，或三者皆備。然而，就連心理學家也普遍同意這項看法³⁹。自從梅拉里和哈珊在加薩展開調查以來，幾項研究已經證實⁴⁰，貧窮、失學、復仇欲望及心理疾病等因素，通常與一個人

是否會為了成就志業而壯烈犧牲沒有絕對關聯；而虔誠的宗教信仰雖然在某些文化背景下至關重要，也仍非必要條件。

梅拉里和哈珊的合作，讓他開始注意到群體壓力對於個人行為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接下來我們將看到這片社會學的多元地景上，存在著許多細微差異。梅拉里最近的研究顯示，某些人格特徵使人更容易成為犯罪者，但他強調自殺恐怖主義是一種有組織性的現象，而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也就是說，要實現理念，必須要有某個組織做出決策並著手執行，無論該組織規模多小或是否被邊緣化。這項決定往往具有策略性：當恐怖集團的武力軍火處於絕對劣勢，或是常規作戰方式對敵人不管用時，通常會選擇採取玉石俱焚的殉道式行動。又或者，根據喬治城大學的恐怖主義及反叛亂行動專家，布魯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教授的說法，他們把殉道攻擊當成一種表明政治立場或與敵對組織競爭的手段⁴¹。

一旦恐怖團體下定決心貫徹自殺恐怖主義，它要如何進行招募？更重要的是，為何有這麼多正常年輕男性自願加入？好比薩迪克，他本來是一間機械維修廠的員工，卻早在首都拉馬拉念大學時加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成為激進分子，而他父親對此卻毫不知情。像他這樣的年輕人，是如何在短短幾週內就從單純的學生變成自殺炸彈客的呢？

我第一次冒險前進加薩時就發現，這個歷程比你想像的要簡單許多。加薩走廊是一片位於地中海東岸的狹長土地，長約四十公里，二〇〇二年時有一百二十萬巴勒斯坦人居住於此，目前已經接近一百八十萬人。當地至少有半數人口住在難民營，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一。我去的時候是三月，就在瑞秋泰勒死於卡爾內夏姆倫的炸彈事件

後不久，也是巴勒斯坦起義行動最腥風血雨的一個月。巴勒斯坦人鎖定耶路撒冷和臺拉維夫，每隔兩天就發動一次自殺炸彈攻擊，地點遍及各大公共場所，包括公車、咖啡館、飯店、超市以及行人群眾中。當年三月，有一百三十多名以色列人死於自殺攻擊，其中超過三分之二是無辜市民。與此同時，以色列也出動戰鬥機轟炸加薩與約旦河西岸地區予以反擊，目標是任何涉嫌參與恐怖行動的激進分子及其據點，儘管巴勒斯坦人堅稱對方的報復行動是不分青紅皂白的無差別屠殺，當月造成二百三十八名巴勒斯坦人喪命，其中至少有八十三人不是戰鬥人員⁴²。

我搭車從以色列邊境往南進入加薩市。我首先注意到的是路上的塗鴉，有些噴繪在牆上，有些則是畫在橫跨馬路兩側的布條上，相當顯眼，令人難以忽略。建築物兩側掛著海報，上面的人物不是倫敦或紐約會看到的流行歌手，而是手裡持槍的年輕人。我問司機這些景象是怎麼回事，「Al-shuhada」，他說。殉道者。我立刻明白，這些烈士都是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戰爭英雄。這些男性，偶爾間雜少數女性，為了他們的同胞而死，做出最壯烈的犧牲，他們的英勇事蹟被公開在大街上、新聞媒體、咖啡館和學校遊樂場，接受大家頌揚。怪不得在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期間，當哈瑪斯和其他團體定期派出自殺攻擊者到以色列境內執行任務時，申請加入的人數遠遠超過實際所需。哈珊指出自殺炸彈攻擊周邊衍生出「龐大產業」：負責策劃殉道任務的團體，同時也會替他安排後事（例如喪禮）；發行紀念手冊以頌揚他的勇氣；替他拍攝最後的遺囑，留下影像紀錄；萬一家中遭到以色列軍隊炸毀，還會替他家人安排棲身之地。



圖五、紀念殉道烈士的壁畫，攝於加薩市。

為了聽聽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如何解釋這些殉道行為，我的巴勒斯坦地陪帶我去見穆罕默德·薩哈爾（Mahmoud Al-Zahar），他是哈瑪斯的創始人之一，也是該組織目前在加薩走廊的最高領導人，在他之上的高層都被暗殺了^[10]。薩哈爾是名外科醫生，他和我約在加薩市的手術室見面。那是一間光線昏暗的小房間，只有一張桌子、一張病床和少量的醫療用品。他穿著一件棕色皮夾克，圍著灰色圍巾，蓄著一小撮鬍子，面容乾淨整潔，表情嚴肅。訪談過程中，他從未露出笑容或發出笑聲，看似相當平靜，只是不停抖著右腳，腳跟激動地敲叩地板。我問他哈瑪斯派自殺炸彈客去殺害以色列公民有什麼正當理由，他張大眼睛盯著我，腳跟的節奏變得更快了。他以呆板生硬的語氣回答，像機器一樣，彷彿在背誦醫學教科書那樣：

那不是自殺。伊斯蘭教不允許自殺。那是最終極的殉道方式。所有以色列人骨子裡都是士兵，都可能會殺害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殺害我們的女人和小孩，他們難道就不是恐怖分子嗎？有句俗話說「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你一定聽過吧⁴³。

美國密西根大學研究員史考特·阿特蘭（Scott Atran）另外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研究宗教和恐怖主義，也多次從恐怖組織領袖口中聽過這種合理化的解釋。他試圖以科學方式來理解恐怖分子的行為，他走訪加薩、印尼、喀什米爾、摩洛哥等地進行田野調查，訪談殺手、伊斯蘭聖戰（jihad）主謀以及有意殉道的烈士。他的研究成果震撼了許多研究者，大多收錄在他於二〇一〇年出版的《與敵人對話》（*Talking to the Enemy*）一書中⁴⁴。他坦言，這項研究使人上癮，欲罷不能。「像這樣的實地調查給人一種搏命般的極度快感。」

他至少遇過兩次生死關頭，差點丟掉性命。一次是在印尼，有「世界聖戰之都」之稱的蘇拉威西島^[11]。他和另一位知名的恐怖主

義學者羅翰．古納拉特納（Rohan Gunaratna）一起在當地進行研究。古納拉特納寫過好幾本關於斯里蘭卡叛亂組織「坦米爾之虎」（Tamil Tiger）的專書，目前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主持一個恐怖主義研究團隊。他們展開調查幾天後，古納拉特納收到一封線民傳來的警示簡訊，說有人要「做掉」阿特蘭——顯然有人發現他是美國人。阿特蘭回憶：「羅翰跟我說，他們要殺掉你。我說，你在開玩笑嗎？他說他是認真的，不過時間應該還夠我們再做二到三個訪談。」後來我向古納拉特納問起這件事。「沒錯，史考特當時有點怕。」他笑著說。「我要他別擔心，想辦法讓他心安。在那種地方，每個人本來就必須非常小心。」

但這一切似乎沒讓阿特蘭打退堂鼓，他說，身為人類學家所面臨的挑戰就是要「分析自身文化所沒有、令人望之生畏的行為」，例如恐怖主義。然而，他的實地調查似乎顯示，恐怖主義在許多方面也沒那麼怪異特殊。他早期的研究認為極端行為可以透過人格和個性來解釋。「對於自小就一直接受個人主義思想薰陶的美國人來說，一般人不會想到要從群體的角度來解釋。」但是，他與恐怖分子及其家人朋友聊得愈多、愈深入研究他們的動態，就愈確信，促使他們走上絕路的主要推手，是來自社會的驅動力。「恐怖分子不會只為了成就偉大的志業而不惜犧牲自己；他們是為了彼此才壯烈成仁。」撇開道德觀點不談，他們其實就跟任何患難兄弟一樣，有著深厚的同胞情誼。阿特蘭表示，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自殺恐怖主義和戰爭英雄主義實乃一體兩面。

加薩街頭妝點著歌頌殉難犧牲的塗鴉、海報和歌曲，為最近慷慨赴義的烈士歡呼，這些景象並非此殉道現象的附屬品，反而是它的核心意義。梅拉里在《衝向死亡》（*Driven to Death*）一書中指出：「當每個人都說自殺炸彈客是國家英雄時……不少年輕人會嚮往加入

他們的行列。但在多數民眾普遍反對恐怖主義，尤其是自殺式攻擊的情況下，受吸引的人就少之又少了。⁴⁵」

九〇年代後期，巴勒斯坦民眾支持自殺式攻擊的平均比例為百分之二十三點九；二〇〇〇年九月第二次起義開始後，數字變成三倍，翌年四月來到百分之七十三點三⁴⁶。阿特蘭自己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到了起義尾聲，加薩和約旦河西岸地區支持自殺式炸彈攻擊的比例為百分之八十。他表示，支持聲浪來自各行各業，不分領域，包括醫生、律師、援救人員、教師、年幼孩子的母親、曾在以色列工作過的人，就連那些積極推動和平的工作者，態度也和激進分子一樣激烈。有位婦女告訴他：「我知道這樣做不對，但是當我在電視上看到烈士犧牲的壯舉，想到我們經歷的種種，不禁感到喜悅。」我記得在巴勒斯坦東耶路撒冷的一間咖啡館，看見新聞快訊報導臺拉維夫發生公車攻擊事件，坐在我前方的巴勒斯坦老人高舉雙手慶祝，彷彿他的地主球隊踢進致勝的一球那樣興奮。

這種激進的社會環境，正好解釋為何激進組織能夠毫不費力地找到願意犧牲的烈士。我聽阿特蘭說，某次他短暫造訪加薩，突然明白年輕人有多麼容易被這個選擇吸引。那是二〇〇四年九月，他當時拜訪的是納比勒·馬蘇德（Nabil Masood）的家人。納比勒年方十八，幾個月前剛被「殉教者旅團」（Al-Aqsa Martyrs Brigade）派往以色列阿什杜德（Ashdod）港執行自殺任務（該次襲擊造成十一名以色列人喪生，二十多人受傷，促使以色列對加薩的哈瑪斯組織發動全面進攻，並暗殺其領導人亞辛）。同樣地，納比勒的父親要等到兒子的死訊傳來才得知這件事。當時他焦慮不已，說納比勒對兩位堂哥的死非常難過，他們都是哈瑪斯的成員。但納比勒愛惜生命，不但是模範生，甚至已經申請到獎學金，準備前往英國念大學。「你覺得他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阿特蘭問。「為了兄弟和朋友。」他父親回答。「他是為了他摯愛的人而犧牲。」

同儕團體的影響力對於說服年輕人加入殉道行列究竟能發揮多大作用？最生動的例子就是「聖戰清真寺」足球隊的故事。該隊球員都是住在約旦河西岸南部希伯倫（Hebron）小鎮阿布塔提拉（Abu Katila）區的年輕人。二〇〇二到二〇〇三年間，至少有六人死於哈瑪斯組織策劃的自殺恐攻行動。這些球員都是朋友或是來自同一個卡瓦什梅（Qawasmeh）氏族的宗親，皆熱愛足球，經常一起練習、比賽。二〇〇三年後，這支球隊停止活動，形同解散；接著在二〇〇八年二月，兩名來自希伯倫的年輕人，穆罕默德·赫伯維（Mohammed Herbawi）與沙迪·茲格耶（Shadi Zghayer）決定追隨前輩的腳步，接受哈瑪斯徵召，為國殉難。他們兩人是摯友，五年前同屬「聖戰清真寺」隊的青少年組，當時隊上的年長球員紛紛自願加入哈瑪斯，成為烈士。他們兩人執行任務的地點是以色列的迪莫納鎮（Dimona），造成一名七十三歲老婦喪生。幾天後，阿特蘭在希伯倫鎮見到赫伯維傷心欲絕的母親，她告訴他：「他（赫伯維）依然熱愛足球，也熱愛著那群隊友，所以他才這麼做。」

希伯倫的足球隊員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透過運動被激化的案例。許多蓋達組織（Al-Qaeda）成員或受其啟發的恐怖分子，彼此也都會踢足球，包括在二〇〇四年三月攻擊西班牙馬德里通勤列車，造成一百九十一人喪生的恐攻團體；二〇〇五年倫敦七七爆炸案的凶手也喜歡玩激流泛舟。這並不是說足球或激流泛舟這些運動本身會讓人變成激進分子，而是意味著群體的動態才是恐怖主義主要的驅動力之一。我們在第四章會看到，團隊運動和休閒活動是增強社會凝聚力最有效的方式⁴⁷。

即使瞭解到就連明智理性的正常人也會被勸服，心甘情願與別人同歸於盡，仍無法充分解釋為何有這麼多人奮不顧身加入。從答應成為炸彈客到實際按下引爆鈕是一段矛盾掙扎的心路歷程。有人可能會被熱血沖昏了頭而一時衝動，但隨著命運的審判之日逼近，最後卻臨時反悔。

恐怖主義組織透過各種手段來確保找來的烈士不會臨陣脫逃。以伊斯蘭組織為例，如哈瑪斯與其他受蓋達組織啟發的團體等，虔誠的宗教信仰是關鍵的激化因素。然而，宗教並非促使群眾變成激進分子的先決條件⁴⁸。如前面提到的，二〇〇二年派薩迪克到卡爾內夏姆倫執行自殺任務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本身是信奉馬列主義（Marxism-Leninism）的組織，目標明顯是為了實現國族主義，而非遵循伊斯蘭教的教義而行動。此外，在二〇〇三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之前，攻擊成效最好的自殺恐怖組織是斯里蘭卡的「坦米爾伊蘭猛虎解放組織」（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簡稱LTTE）。該組織並非宗教組織，而是以爭取少數民族坦米爾（Tamil）在斯里蘭卡東北部獨立建國為目標，所招募的成員有三分之二是女性⁴⁹。這顯示民眾在激進化的過程中，意識形態與性別所扮演的角色，極大程度取決於文化背景。

「猛虎解放組織」的炸彈客隸屬旗下一支名為「黑虎隊」（Black Tiger）的精英部隊。自一九八七年該組織成立以來到二〇〇九年五月被斯里蘭卡軍隊擊潰為止，共計有超過三百三十名黑虎隊員死於對抗政府及國軍的自殺行動，其中三分之一是女性。黑虎隊惡名遠播，人人聞風喪膽。他們犯下許多重大案件，包括先後於一九九一年與一九九三年襲擊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和斯里蘭卡總統普雷瑪德沙（Ranasinghe Premadasa），造成兩人不幸身亡，以及針對軍事基地、機場、港口、通訊中心與其他戰略和民

間據點發動多次毀滅攻擊。內戰結束後，反叛軍解體，斯里蘭卡政府持續對受俘的坦米爾士兵進行心理衡鑑與康復計畫 [\[12\]](#)。因此，我們現在對猛虎解放組織各部隊（包括黑虎隊）的激化與招募過程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其中最顯而易見的發現有兩項：一、整個過程中，宗教從未發揮任何作用；二、該組織的領袖善於利用群體影響的力量，操縱他人。

有位女性對此非常瞭解，名叫阿瑪莉（Amali）（化名），是位斯里蘭卡心理學者。在將猛虎組織成員送回家之前，她負責協助盤問其任務細節。當初與阿特蘭一同在印尼研究的古納拉特納同時也是猛虎組織的專家，告訴我阿瑪莉的任務「異常艱鉅」，說她訪談過的恐怖分子，包括失敗的自殺炸彈客，可能比任何研究者都要來得多。

阿瑪莉說她想了很多問題，例如「如果有個人從來沒想過要做傷天害理的事，每天跟家人同時間起床、出門工作，你要如何把他培訓成自殺炸彈客，奪走數以百計的民眾與孩童無辜的生命卻毫無悔意？」評鑑過將近一萬二千名猛虎組織的幹部之後，她終於明白，該組織領袖採取的手段與加薩及約旦河西岸地區的恐怖分子類似，係透過建立一套殉道文化來操控黑虎隊的思想，使其成為激進分子。志願加入的隊員會受到公開表揚，家人在他們死後也能享有特殊地位。他們以五至六人為單位關在小房間裡接受訓練；每個小房間自成一隊，成員彼此有如家人，各自對隊長效忠。你可能以為，在這種特殊的訓練方式之下，黑虎隊會變成最難重新融入社會的受害者。但其實不然，阿瑪莉說。一旦他們走出迷霧、恢復理智，很快就會發現，事實跟他們被誤導而信以為真的假象大不相同，其偏激失常的世界觀很容易就不攻自破。

會加入黑虎隊的女性，被認為是受到與男性同樣的社會影響力驅使⁵⁰。但本身也盤問過不少坦米爾戰士的古納拉特納，卻注意到他們

有個地方不太一樣。他表示，由於女性通常比較合群，若親朋好友之中有人自願殉道，她們更容易跟著加入烈士行列；一旦戰鬥結束，她們也會更迅速地做出集體決策，一起回歸常軌 [\[13\]](#)。「她們一旦被灌輸觀念，就會堅定相信到底，非常團結。這時候完全拋棄身為女性的特質。但一旦放棄奮鬥目標，她們就會一起回歸正常生活，變回女人。」古納拉特納造訪坦米爾康復中心時，發現最受女性黑虎隊員歡迎的培訓課程，就是美容美體。

阿瑪莉曾說過：「我認為，只要條件合適，幾乎每個人能變成恐怖分子。」這句發人深省的評論意味著對於殉道行為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是社會文化制約的結果。然而，最近一組研究顯示，個人性格特質同樣也扮演著關鍵角色。

二〇〇二年，梅拉里獲准對十五名疑似自殺炸彈客的巴勒斯坦人進行心理側寫。他們還沒來得及執行任務，就被以色列的安全部隊逮捕拘禁。梅拉里想知道這些炸彈客的人格特質是否有別於其他恐怖分子或巴勒斯坦人。他組成了一個大型研究團隊，成員包括數名會講阿拉伯語的臨床心理學家與熟悉巴勒斯坦社會文化的專家。他們訪談的十五名嫌犯中，有四人曾試圖引爆炸彈，卻因設備故障而失敗；其他人則是在抵達目標地點前就被逮捕。梅拉里團隊同時鑑衡了另一組非炸彈客恐怖分子，以及十四名隸屬哈瑪斯與伊斯蘭聖戰組織等團體，負責策劃自殺任務與派遣自殺炸彈客的地區指揮官。

調查結果令梅拉里大吃一驚。這些自殺恐怖分子中，沒有任何人患有精神病，也沒有任何心理疾病病史——他們仍然相當正常。但大多數都具備某些人格特質，梅拉里認為就是這些特質讓他們更容易受到組織影響，自願加入或接受徵召。這些人不是心理學者所謂的「依

賴型畏避人格者」(dependent-avoidant)，就是容易衝動、情緒不穩定。具有前者性格的人容易受到輿論左右，面對權威時傾向默從，逆來順受。大多數嫌犯都覺得自己是社會上的失敗者，害怕被拒絕，因而熱切地取悅別人。他們不像是「典型好萊塢電影裡的殺人怪物」，梅拉里說。你很難去憎恨他們。有三分之二的炸彈客坦承他們在執行任務時，中途的確猶豫了一下。「他們就只是年輕人，毫不傲慢跋扈、咄咄逼人，感覺不到半點惡意。他們只是想提昇自己的重要性，想成為大人物。就因為社會上每個人都說這些攻擊行動是多麼偉大、烈士們有多麼愛國，他們才很難抗拒。」^[14]

但梅拉里對策劃行動的主謀卻毫不同情。從心理上來看，他們非常不一樣：喜歡操控而不依賴別人；比常人更精明老練，更有自信，也更自負。這些人寧願叫別人去送死，也不願自我犧牲。儘管如此，訪談過程中，梅拉里依然保持冷靜，不去多想他們犯下的諸多慘案。

「就像一名不得不替連環殺人犯動手術的醫生，我只想知道他們的動機為何，他們要如何解釋自己的所作所為。我和他們促膝長談了好幾個小時，每個人都自有一套說法與觀點，卻毫無悔意。⁵¹」

我訪問過幾個小孩不幸死於自殺恐怖攻擊的以色列母親，她們對於幕後主使者的憤怒，更甚於自殺炸彈客。艾薇娃·瑞姿爾(Aviva Raziel)在二〇〇一年八月九日那一天，失去了她年僅十六歲的女兒米郝(Michal)，當時一位名叫馬斯里(Izz ad-Din al-Masri)的二十二歲巴勒斯坦青年，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一間餐廳引爆炸彈自殺，造成七名孩童與八名成人喪生、一百三十三人受傷。該起攻擊是巴勒斯坦第二次起義中最慘烈的一次。帶領該名炸彈客從約旦河西岸家鄉來到耶路撒冷的幕後主謀名叫塔米米(Ahlam Tamimi)，是個年僅二十歲，就讀巴勒斯坦比爾宰特大學(Birzeit University)的女大學生。「是個漂亮的女生。」我問艾薇娃對她瞭解多少，她這樣

說。「我對他們兩個都很生氣，但當我在報紙上看到她的照片時，簡直不敢相信這麼漂亮的女孩子竟然如此凶殘狠毒。」

塔米米後來被以色列逮捕並被判處十六項無期徒刑：十五名以色列罹難者加上該名炸彈客，共計十六條人命。但就在二〇一一年十月，她和上千名巴勒斯坦囚犯一起獲釋，藉此交換被哈瑪斯囚禁在加薩長達五年的以色列士兵人質，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返國後，塔米米大言不慚表示她對於所犯的罪行並不後悔：「當然不後悔……今天我就要再幹一筆，用一模一樣的方式。⁵²」

面對這種尖銳的敵意，那些研究偏激行為（如自殺恐怖主義）的人很難不受道德或政治情緒的影響，但若想透過研究來證明什麼，他們就得沉住氣，保持冷靜。這種可惡行為的塑造過程中，要讓人相信文化與社會的影響大於個人的病態心理，是件違背常理的事。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當前的趨勢普遍認為所有自殺攻擊者的主要動機是他們想自殺（臨床上來說就是有自殺傾向），學術界和一般大眾皆然。美國阿拉巴馬大學研究刑事司法的亞當·蘭克福特教授（Adam Lankford）於二〇〇三年出版的《殉道神話》（*The Myth of Martyrdom*）一書中指出，「每一起自殺恐怖主義行動都符合自殺的定義。⁵³」

蘭克福特的論點，一部分來自他從梅拉里最新研究的推斷（如前所述），梅拉里在他訪談的十五名自殺恐怖分子中，發現有六名具備自殺特質；另一部分則是根據他自己檢視針對一百三十名自殺恐怖分子的新聞及電視報導，聲稱每個人皆具備自殺危險因子。由於他將「兄弟被殺」和「罹患肺結核」等假設動機都列入風險因素中⁵⁴，加上梅拉里本人也說蘭克福特的理論「推測成分居多」，並提出建言表示「要評估一個人的自殺傾向和其他心理特質，除了心理測驗與訪談以外，沒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案。⁵⁵」，我們必須對這種說法謹慎以

對。但令人意外的是，《殉道神話》受到講求實證精神的學者支持，例如哈佛大學教授暨作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就讚譽有加，說它破除了「這種令人噁心作嘔的行為⁵⁶」的浪漫面紗。

要是能把自殺恐怖分子和其他作惡者都用心理疾病、人格反常、個性怪異的理由簡單帶過，一切就會好辦許多。但是證據可不會讓我們這麼好過，我們必須認清並接受，他們其實就與一般人沒兩樣。正如艾許、米爾格倫、津巴多及諸多心理學者研究顯示，即使是理性明智的正常人，也很容易踰越道德界線、自甘墮落，被迫做出他們平常所憎惡的事，被群體壓力或他們無法控制的情勢所逼而沉淪腐化。率先將社會心理學應用於調解國際衝突的先驅赫伯特·凱爾曼（Herbert Kelman）發現「不少（甚或大多數）酷刑的施暴者本身並非施虐狂，反而相當正常；他們只是在執行自認理所當然的工作。⁵⁷」大部分令人髮指的惡行，即源自於在特殊情況下遭受刻意扭曲的正常心智。

但，故事到這裡還沒結束。社會上，不是每個人都乖乖聽話，也不是每個人都願意順從，更不是每個人都甘於袖手旁觀。總會有人持不同意見，拒絕像其他人一樣被社會力量吞噬，進而起身反抗。無論是動盪衝突的時代或周遭的日常生活，都有這些人的身影存在，他們是誰？英雄行為是如何產生的？接下來就讓我們一探究竟。

[1] 譯註：Bronx，紐約市的五個行政區之一，為當地有名的貧民區，住民多以非洲和拉丁美洲後裔為主。

[2] 原註：雖然米爾格倫「權威與服從」實驗至今已引發各界諸多討論，仍然值得本書再次介紹，特別是因為它對於我們目前對人類心理狀態的理解，具有舉足輕重的貢獻。

[3] 原註：四十名受試者其中的二十五名。

[4] 原註：該校於一九九四年關閉。

[5] 譯註：英國知名搖滾樂團「滾石合唱團」（The Rolling Stone）主唱，為該樂團的靈魂人物。

[6] 原註：一九七三年七月，美國心理學會發表聲明，確認史丹佛監獄實驗並未違反任何倫理守則。隨後該協會進一步加強規範，確保不會再次發生類似慘劇。

[7] 譯註：原文「intifada」在阿拉伯語中意為「起義」，指巴勒斯坦人為抗議以色列長期軍事占領而發起的暴動。第一次起義發生於一九八七年，地點在加薩走廊。

[8] 原註：根據以色列海茲利亞（Herzliya）的國際反恐怖主義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統計，在二〇〇〇年十月至二〇〇五年二月的第二次起義期間，共有一千零一十名以色列人和三千一百七十九名巴勒斯坦人喪生。網址：www.ict.org.il。

[9] 譯註：以色列情報組織，由以色列政府於一九五一年成立，負責執行各種情報偵查、刺探、反恐與暗殺任務，以維護國家安全。

[10] 原註：二〇〇三年，薩哈爾差點遇刺身亡。該事件造成他的長子及隨扈喪生。

[11] 原註：另一次是在巴基斯坦控制下的喀什米爾，當時他為了躲避可怕的巴基斯坦情報特務，不得不躲在某座廢棄的清真寺裡。

[12] 原註：儘管有此復健計畫，斯里蘭卡政府依然被控於戰爭後期和隨後的和平期間廣泛侵害坦米爾人民的人權。

[13] 原註：我在倫敦訪談某位前猛虎組織成員，聽她講述自己如何跟著六名同學加入組織。她們被斯里蘭卡政府軍攻擊，六名同學在她眼前全數殉難，她自己也吞下氰化物毒藥，企圖自殺以免被活捉，因為組織在訓練期間就是這麼教的（該名受訪者送醫後三個月康復）。

[14] 原註：由於缺少數據顯示這些心理特質者在一般巴勒斯坦民眾中所占比率，無法評估這些特質如何影響個人做出決定，自願執行自殺任務。



Chapter 4
平民英雄

The Power of Others

在古希臘，要被承認是英雄需要付出相當程度的努力。首先，你必須拋棄生命，且最好壯烈犧牲。在這之前，你得證明你的能力與作為遠在凡人之上。以著名大力士海克力斯（Hercules）為例，他因故殺害了自己的家人（不全然是他的錯），為了贖罪而不得不完成十二項艱鉅的偉業，大部分是殺害或捕捉凶猛野獸等任務。後來他又歷經一連串冒險，締造許多英勇事蹟，最後卻不幸中毒，致使全身血肉遭到腐蝕，最終親手以火葬結束自己的生命。

即使現代人對英雄的期待已經略為降低，我們的文化仍然存在著英雄就該異於常人、無所畏懼、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迷思。然而這種想法卻悖離現實。針對英勇及利他行為的研究顯示，那些願意不顧自身安全、甘願失去同儕認同而挺身相助的無名英雄，通常是普通到令人吃驚的一般人；而英雄氣概的表現，也往往比我們想像中更常見。

回顧上一章那些研究順從與人性之惡的經典心理實驗，它們最主要的發現給人一種印象，即無論每個人所崇尚的道德信念（moral conviction）為何，周遭環境的影響終究會使他們誤入歧途。但實際上往往並非如此。在艾許的線段實驗中，有大約四分之一的受試者對眾人做出的錯誤判斷無動於衷；米爾格倫第一次的電擊實驗中，超過三分之一的自願受試者到了某個階段開始拒絕配合指令，總是有少數人在「學生」初次露出痛苦跡象時便毅然決然退出；至於津巴多的監獄實驗，則是有一到二名獄監始終保持公正、恪守職責分際。可見認為人難免會被外力說服而為非作歹的看法，其實未必正確。

針對這些拒絕乖乖合作的反抗分子，科學能夠提供什麼解釋呢？他們究竟是反骨到底的獨行俠，或是純粹視情況而唱反調，不僅難以

預測，也毫無重複規則可循？該說這些人是特殊個案？還是說我們每個人都能起身反抗邪惡，但要能找出其門而入？

歷史上不乏例子證明，各時代都能發現反抗分子的英勇身影。典型代表是二次大戰期間法國勒尚邦村的居民：他們無畏政府命令，為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以及逃離納粹政權的難民提供庇護。當時法國馬歇爾．貝當（Marshal Pétain）元帥及其名義領導下的維希政府（Vichy government），與德納粹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結盟，明令各地將所有難民驅逐到德國的集中營。勒尚邦村民從一開始便堅決抵制這項政策。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就在貝當與德國簽署停戰協定的隔天，村內兩位基督教牧師安德烈．特羅克梅（André Trocmé）與愛德華．泰斯（Edouard Theis）呼籲教區居民勿「被動屈服於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要用聖靈的武器對抗他們企圖用來遮蔽我們良知的暴力」¹。接下來的四年裡，村民面對政府多次威脅恫嚇、試圖逼迫他們服從，總是勇於反抗。他們重挫警察頻繁的突襲，不讓他們找出藏身鄉間的難民所在；還取得偽造的身分證，帶領數百名難民越過邊境，逃到中立的瑞士，甚至特地設置學校，教導難民兒童。

當國內大多地方都乖乖遵從維希政府的命令時，為何唯獨勒尚邦村敢唱反調？他們的行動有幾個特點：首先，每位村民都感受到強烈的共同道德號召（在此為基督教的道德信念），心中引發的共鳴遠甚於貝當呼籲建立「新社會秩序」的訴求。再者，村民對於難民的處境都心有戚戚焉，因為他們自己就是胡格諾 [\[1\]](#) 新教徒的後代。十七世紀時，他們的先人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國被視為少數宗教而受到迫害。此外，村民毫不猶豫，在第一時間便採取行動：特羅克梅與泰斯兩位牧師在停戰隔天大聲疾呼，開啟反抗之先河。最後，這是一項社

會、宗教、歷史等各種層面上的集體行為，正如米爾格倫和艾許的研究顯示，夥同他人合作，反抗權威會變得容易許多。

這很大程度上也跟米爾格倫在電擊實驗中從拒絕配合者身上觀察到的現象不謀而合。例如，那些開始沒多久就拒絕按下開關的人，最後放棄的可能性也更高。他也相信，過去威權主義的經驗足以讓人清楚了解到順服者所感受到的壓力。例如有位三十一歲的德國醫療設備技師葛蕾茜·布蘭特（Gretchen Brandt）在電擊強度來到二百一十伏特之後便拒絕繼續施加，而她就是在納粹德國長大。被問到這項決定是否受到成長背景的影響²，她說：「或許就是因為我們看過太多人受苦了。」

在納粹占領的歐洲各地不乏許多村莊鄰里大規模動員、齊心反抗權威的例子，勒尚邦村只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或許更知名的案例，就是丹麥的抵抗運動。許多丹麥民眾熱心挽袖，在一九四三年的十月，協助八千名猶太人經由海路疏散到瑞典，以免他們被驅逐而關進納粹集中營。這些民眾來自各行各業，無論公務員、計程車司機或學生都紛紛伸援，安排他們的猶太朋友及鄰居，有時還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躲在漁船、渡輪、划艇甚至獨木舟裡，躲過德國巡艇嚴密的監控，航渡厄勒海峽進入瑞典。多虧丹麥民眾這次與其他方面的努力，該國有超過百分之九十八的猶太裔國民平安躲過這場屠殺危機。同樣情形也發生在保加利亞。該國民眾為了不讓猶太同胞被逐出國境而發起運動，強調他們擁有正式的保加利亞公民身分，因此若同意納粹要求，就形同違背國家原則。此舉成功拯救了該國四萬八千名猶太人免於被逐出國門的命運。保加利亞共產黨議員托多爾·波利亞科夫（Todor Polyakov）說：「我們與他們同在，苦其所苦，樂其所樂。」³ 群體認同的力量不僅強大，同時也容易塑造；對於保加利亞的猶太人來說，「是不是自己人」就是決定生死的關鍵⁴。

英勇的反抗或利他行為往往係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而產生。加州洪堡州立大學（Humboldt State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山謬．歐利納（Samuel Oliner）大半學術生涯都在試圖瞭解人為什麼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去幫助別人。一九八二年，他在加州阿克塔創立「利他人格與利群行為研究所」（Altruistic Personal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stitute）⁵，背後隱含著強烈的個人動機。歐利納是猶太人，二次大戰期間幸虧有位非猶太裔的波蘭農婦協助他藏身，才得以躲過當地納粹的搜查，僥倖保住一命。在這之前，他的家人都被關進了集中營，許多鄰居慘死於機關槍掃射，被埋在亂葬崗。一九八〇年，他與同為學者的妻子珍珠訪談了四百多名「援救者」，這些人不畏危險，對納粹歐洲地區的猶太民眾伸出援手。兩人發現，雖然有高達百分之五十六的受訪者不隸屬於任何政黨、宗教團體或反抗組織等正式體系，但幾乎所有人都仰賴這類人際網絡來獲得「實質上及情感上⁶」的支持。

儘管如此，還是有不少孤軍奮戰的英雄。例如保羅．格魯寧格上尉（Paul Grueninger），他是一九三〇年代後期瑞士聖加侖州的警察局長。當時他無視中央命令，放行了約三千多名逃離納粹第三帝國迫害的難民，讓他們越過邊境進入瑞士尋求庇護。後來他因此被革職，同時喪失退休金⁷。另外還有二十四歲的美國陸軍預備中士喬瑟夫．達比（Joseph M. Darby），他在二〇〇四年舉發了美軍在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醜聞，後來他和妻子因為怕遭到同袍報復而被迫躲藏好幾年。也別忘了波蘭護士伊蓮娜．古特（Irene Gut）。二次大戰期間她在某個德國軍官家中的地下室藏匿了十二名猶太人，當時她被迫替他工作，擔任管家。此外還有瑪莉亞．馮．瑪爾贊（Maria von Maltzan），她的父親是德國伯爵，協助數十名猶太人與納粹政敵逃離柏林；塞爾維亞人亞歷山大．耶夫蒂奇（Aleksandar Jevtic）在九〇年代初期的巴爾幹戰爭中，搶救了十幾名被關在拘

留營的克羅埃西亞人，助其免於一死。他瞞騙同袍，讓他們誤以為這些囚犯實際上是塞爾維亞人⁸。最後還有非洲盧安達的飯店經理保羅．盧塞薩巴基納（Paul Rusesabagina），他在一九九四年該國發生大屠殺期間庇護了千名以上的胡圖與圖西族人 [\[2\]](#)。上述這些人似乎都覺得必須跳脫集體衝動的控制，獨自行動，而且往往站在現況的對立面。盧塞薩巴基納在他的自傳《我輩凡人》（*An Ordinary Man*）一書中，描述了人在做出這類英勇事蹟時所抱持的心態：

當你的自主性與群體意志融為一體時，你就會跟著群體的意向隨心所欲行動。任何獨自行動的念頭變得如死亡般可憎，令人深惡痛絕……但要是群體中沒有人能及時清醒，站在局外並由衷勇敢拒絕，他們就會為了維持表面假象而輕易犯下暴行。雖然單打獨鬥的人會受到嘲諷鄙視，但他是唯一能阻止人性沉淪、墮入深淵的人⁹。

一九六〇年代，美國心理學者佩里．倫敦（Perry London）開始研究特立獨行的援救者和乖順的一般大眾有何不同，成為此類研究的濫觴。首先，他訪談了二十七名基督徒，他們過去都曾致力拯救猶太人逃離納粹魔掌，從不間斷。佩里注意到大部分受訪者有三個共通特點：一、具有歷久不衰，將危難視為家常便飯的冒險精神；二、基於某種原因而有種被社會邊緣化的感覺，例如身體有殘疾或本身信仰少數宗教等，這些因素使他們更容易與多數人唱反調；三、強烈認同習慣道德說教的父母¹⁰。遺憾的是，直到他一九九二年逝世之前，佩里始終未能籌到足以讓他完成研究所需的資金。最近，他的夥伴，美國人權活動倡導者同時也是名猶太教拉比 [\[3\]](#)，哈洛德．舒韋斯（Harold M. Schulweis）表示，在他和佩里訪談的救援者中，勇於冒險犯難的特質似乎並不常見。「他發現那些本來非常普通消極的人

身上突然發生某種改變，我不清楚那是什麼。知道誰會來救你嗎？要不要猜猜看？讓你失望，我很抱歉。¹¹」

舒韋斯把這種現象稱為「良善的奧祕」。這是否意味著，正如津巴多所言，良善就如同邪惡一樣平庸？只要條件成立，普通人也能夠做出英雄般的壯舉，就像他們也會輕易犯下殘酷暴行那樣？實則未必。前述歐利納夫妻研究戰爭期間拯救猶太人的民眾時發現，許多人都有著共同的基本道德價值，例如惻隱之心、正義感、個人責任感等等。「你若有能力救人，那就是你的責任。」其中某位受訪者為他們的救援行動提供了合理化的說詞。另一人則堅持「看見有人需要幫忙，就必須伸出援手。¹²」米爾格倫也在順從實驗的反抗者身上發現某些類似的特質。他說，這些反抗者和其他人最大的差別，就在於他們認為自己必須對受害者的痛苦負起絕大部分的責任，而非發號施令的實驗者¹³。此外，歐利納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所抱持的價值觀係傳承自父母，這一點也和佩里的觀察吻合。

另一位心理學家伊娃·弗格曼（Eva Fogelman）在訪談約三百名戰爭期間的救援者後，也得到類似結論。她的研究同樣並非單純出自學術動機。弗格曼的父親是猶太人，也曾受過波蘭農民救援，多虧他們的慷慨與同情才保住一命。因此，儘管她在就讀紐約市立大學時追隨米爾格倫研究社會心理學及人格學，但比起循規蹈矩的順民，她更想研究那些不肯妥協的異議分子。她注意到這些英雄人物有個共通點，即自小便接受人性價值的薰陶，這些觀念如出一轍，令人大吃一驚：

過了一會兒，我開始洗耳聆聽一連串耳熟能詳的內容：（他們）生在一個有教養、充滿關愛的家庭；有處處為人著想的父母或備受愛戴的照顧者，樹立了利他行為的榜樣；能夠包容異己；童年的殘疾或不便，考驗他們的韌性，並受到特別

的照顧；重視獨立、能力、關懷、以解釋說理取代替管教（不採取體罰或愛的剝奪）等教養方式¹⁴。

研究者在調查英雄和為惡者的動機時所面臨最棘手的問題，就是這些動機在某些文化中是否更容易演變成一種惡意。像艾希曼這種喪心病狂的行為或盧安達大屠殺的駭人慘劇，是否更可能見於某些崇尚極權價值的地方？麻薩諸塞大學心理學教授厄文·史塔伯（Ervin Staub）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他也相信利他精神源自個人的價值觀，而且是可以學習的。

史塔伯生於匈牙利，父母是猶太人。他在二次大戰期間的童年經驗啟發了他對人類心理的興趣，引領他走上研究之路，探索惡與利他精神的起源。他特別感謝兩位將他和家人從納粹手中救出的恩人，分別是瑞典外交官羅爾·瓦倫堡（Raoul Gustaf Wallenberg）和家裡的女傭，瑪克絲（Macs）。瓦倫堡簽發了偽造的瑞典護照給成千上萬個像瓦倫堡這樣的猶太家庭，並提供安全的藏身處所，保護了他們的性命；瑪克絲則是基督徒，史塔伯形容她是他的「第二個母親」。

「情況危急時，她本來可以丟下我們離開，最後卻選擇留下。」他說。「她帶著我和妹妹跟著一群基督教家庭躲了一陣子，接著我們去了瓦倫堡的庇護所。她會準備麵團，拿到麵包店烤成麵包給我們吃。她被匈牙利納粹逮捕，雙手高舉壓在牆上，對方揚言要殺掉她。但她還是繼續做這些事情，不只照顧我們，也照顧庇護小屋的每個人。」

¹⁵」史塔伯說，瑪克絲的善舉啟發了他對反抗英雄的好奇，進而想研究這些人的心理。戰後好長一段時間，他都會回匈牙利探望她，感謝她當年的救命之恩。史塔伯說，瑪克絲讓他看見了人性仁慈良善的各種可能。

你可能會以為，研究「惡」這件事會讓人對利他精神失去信心。但史塔伯似乎有著無可救藥的樂觀。即使談到種族屠殺，他依然保持一貫的熱情友善，且心平氣和、坦率真誠地發言。在他安默斯特學院辦公室的書架上擺著他與達賴喇嘛的合照，旁邊則是一張黑白老照片，影中的年輕人有著媲美好萊塢明星的俊帥外貌。「那是我的老朋友，多年前的我。」他笑著說。

如同弗格曼、佩里和歐利納等人，史塔伯深信引發利他行為與道德勇氣（即在敵對的同儕壓力前，亦能堅持自己的價值信仰）的關鍵在於人的教養過程。他所要傳達的訊息是，我們從小就能接受社會化，將同情的觸角延伸至那些非親非故的陌生人身上。在充滿父母慈愛關懷且賦予堅定指引的環境下成長的小孩，長大後對人際關係會有更大的安全感，不容易受到外人威脅，且往往會將外人的福祉視為己任¹⁶。一般說來是如此。但史塔伯的救命恩人瑪克絲，其英勇義舉背後的形塑之路更值得關注。瑪克絲的母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她被繼母虐待，長大後被送到別人家裡當保母。然而，她對於親手照顧的孩子所懷抱的那份愛改變了她。「這是因苦難而生的利他精神。」史塔伯說。「與其對外人置之不理，過往的苦難能讓你敞開心扉。若他人對你伸出援手，你會得到一股力量，讓你明白一切早已今非昔比。」

若我們真的伸出援手，最可能幫助的對象是誰？已故美國哲學家理查·羅蒂（Richard Rorty）相信，大家往往會選擇他們所認同的自己人，而這種認同的凝聚力在「小規模、限定成員（不包含人類全體）的地緣團體」中最為強烈，例如美國同胞、天主教友或一同參與政治運動的戰友¹⁷。

然而，群體凝聚力並非利他行為的必要條件。不少猶太人救援者的動機，似乎都是受到普世道德的號召，而非特殊情感道義的驅使。

他們的「內團體」（in-group）不分種族，包括全人類；他們認為每個人都不應受到迫害。某位接受歐利納訪談的納粹屠殺倖存者說：「他們相信人性，且無法接受就只因為我們是猶太人，就得被殺。¹⁸」另一位荷蘭退役軍官私下組成反抗團體，幫過許多猶太民眾免於迫害。他表示：「你要認清並永遠記得，每個他者基本上就等同自己。要永遠待人如己，無論是邪惡的納粹或身陷困境的猶太朋友，都要一視同仁。¹⁹」英國詩人鄧約翰（John Donne）的名句一語道盡了這種道德觀：「沒有人是孤島，能夠獨自存在……任何人的死，都是我的減少，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²⁰」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人道哲思也揭示了同樣道理：「我們往往容易忽略別人的需求與權利，要避免這種傾向，就得不斷自我提醒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即基本上我們與他人完全無異。²¹」

最近美國西肯塔基大學（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的三位心理學家制定了一套測量標準，來估算一般人受到普世道德感召的可能性（亦即將所有人類都視為自己人的傾向）存在多大程度的個別差異。他們將此工具命名為「全人認同量表」（Identification With All Humanity scale）²²。量表中得分最低者，在觀念上往往傾向專制或個人主義，比如說他們認為自己的群體在道德上優於其他群體，或者習慣從「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好」的角度來看待人際關係；得分高者，在友善隨和、喜歡嘗新等人格特質上的分數亦高，他們往往相當關心全球性的貧窮、饑荒和人權等公共議題。但他們也更加神經質，過度擔心生活裡的瑣碎小事。這項發現令三位研究者感到相當納悶。

這項發現同樣也讓人本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百思不解。他在二十世紀中葉率先將研究重點放在人的正向特質與成長潛力上，而非行為上的問題症狀。馬斯洛發現部

分受試者有個共通的特點，就是對別人展現出有如家人的親密感。在接受實驗之前，這些人都充分發揮人類的潛能，且未出現精神官能症、精神疾病、情緒不穩等病症。他說，這些自我實現者「對一般人有深刻的認同、同情和關愛，有種像家人般的情感連結……（他們）是真心想幫助全人類。²³」遺憾的是，這種人似乎少之又少。馬斯洛認為，雖然理論上每個人都有能力達成這種境界，但真正實現的人卻不到百分之二（其中包括林肯及傑佛遜兩位美國總統與愛因斯坦）。若他所言不假，那麼英雄的確是超乎尋常的例外。

但津巴多可不這麼想。他卯足全力投入惡的研究，讓他快要吃不消，為了讓自己有喘息的機會，近年來他轉換方向，開始研究各行各業英勇人士的行為動機。他說，認為英雄總是異於常人的想法過於浪漫，是古代神話和現代媒體所編造的假象。「我們希望相信這些人生來就有道德思想，成長經歷特殊且擁有獨特的人格特質，或具備比別人更強烈的利他精神。²⁴」但證據顯示並非如此，他說。英雄就和惡人無異，往往都相當平凡。此外他也相信英勇行為同樣無法預測，而英勇行善的人亦值得讚許。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我們每個人心裡都住著一位等待時機到來的英雄。²⁵」透過這種想像，義大利哲學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觀察後做出一針見血的評論。他說：「英雄始終是個誤會，他跟大家一樣，只希望當個誠實的懦夫。²⁶」

這項只有豪傑好漢才能創下英勇事蹟的假設特別適用於戰場上。普遍認為這些沙場英雄天生不凡，與生俱來某些人格特質，讓他們能在眾人紛紛退縮時，反而敢挺身而出。但，現實往往事與願違。那些在戰場上或任何場合展現英雄本色的人，往往都不是以英勇著稱。那可能是他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表現得如此勇敢。套句探險家雷諾

夫．范恩斯（Ranulph Fiennes）的話，在當下那種情況，就連懦夫也可能做出無比尋常的壯舉²⁷。

以自身家人為例，我的外祖父曾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時，率領坦克中隊徒步前往荷蘭清剿全副武裝的德國駐軍，為此他獲頒軍功十字勳章（Military Cross）。他從不主動談起這項豐功偉業，也從未提及當時他心中必然的恐懼，但偶爾會聊到與他交手的那些敵人有多勇猛，特別是「你永遠想不到，人在戰爭中會做出什麼行為。」

他最愛拿同袍伊恩．利德爾（Ian Liddell）當例子，他是冷溪衛隊（Coldstream Guards）^[4] 軍官，但最為人所知的身分，卻是完全不搭軌的爵士樂團團長。外祖父形容他「雖然人非常親切，又受歡迎，但就只是個聰明的普通軍官。」有一次，利德爾的連隊奉命奪取一座位於德國西北部林根市附近埃姆河上的橋樑。這項任務相當棘手，因為該橋明顯埋有地雷，且部署了一百五十名德國步兵及八八毫米高射炮的防守火力。出乎眾人意料的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利德爾竟決定單槍匹馬行動，他冒著敵軍猛烈的砲火，奮不顧身衝到橋上，剪斷炸藥的引線。這項英勇壯舉為他贏得維多利亞十字勳章（Victoria Cross）最高殊榮，但他從未能親自領取，因為不到三週後，他便遭到狙擊手暗殺，不幸身亡。

戰場上有些人看似不可能，最後卻成了英雄，這樣的故事比比皆是。諾爾．戈弗雷．查瓦斯（Noel Godfrey Chavasse）是英國史上唯三兩度榮獲維多利亞十字勳章殊榮的英雄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先後在索姆河（Somme）及帕斯尚爾（Passchendaele）戰役中，無畏敵軍猛烈的砲火，英勇救出受傷士兵。此外他也得過軍功十字勳章，並在戰況報告中受到表揚，你可能會以為他生來就有「英雄人格」。但在戰爭開打之初，他一抵達法國就寫信給父親說：「我根本不打算拿自己性命當賭注，那沒必要；我體內流的不是英雄人物的

血。²⁸」更常見的是那些一時衝動、沒有時間三思就貿然行動的戰場英雄。例如二十歲的皇家愛爾蘭步槍兵比利．麥克法澤恩（Billy McFadzean）。在索姆河一役中，擠滿盟軍的壕溝中突然掉下一箱填滿火藥的手榴彈，他想都沒想就奮不顧身地撲上去，用自己的身體保護其他隊友。麥克法澤恩不幸被炸得粉身碎骨，當然他也早有覺悟，而隊中只有一人受傷。再看看傑克．藍道（Jack Randall），一九四四年，他於陣亡後獲頒維多利亞十字勳章。二次大戰期間他向日軍的機關槍掩體丟擲手榴彈，並犧牲自己身體來堵住槍管。他朋友曾經形容他是「一個毫無條理……幾乎跟廢物差不多的士兵，沒有半點軍人的樣子，你根本想不到他會做出這麼英勇偉大的壯舉。」^[5]

像這樣壯烈犧牲的英雄人物，似乎都是為了保護隊友才衝動行事，而非為貪圖事後的榮耀。「我當時一點都不怕。我根本沒考慮到自身安全，只想著要讓大家從著火的車子上安全逃生。」強森．比哈利（Johnson Beharry）說。他在伊拉克作戰時，兩度操縱裝甲車將同袍自敵軍埋伏中安全拯救出來。為此，他於二〇〇五年榮獲維多利亞十字勳章，是近三十年來首位活著親自領獎的得獎者。「那些人都是平常朝夕相處，一起生活、工作且認識多年的同袍好友，如今他們有難，正是需要我出手相助的時刻。²⁹」

二〇〇七年，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預備士兵馬修．克勞徹（Matthew Croucher）在阿富汗的赫爾曼德省（Helmand Province）進行夜間巡邏時，差點重演麥克法澤恩的英勇事蹟。當時克勞徹的部隊正在調查一座廢棄的塔利班大宅，他感覺到小腿上有東西刷過，隨即意識到自己觸發了絆線手榴彈。他立刻卸下背包，將手榴彈緊緊包住，並且整個人壓在上面，以保護隊友不被炸傷。炸彈過了七到八秒才引爆，他知道自己必死無疑，那等待的短短幾秒對他來說有如世紀般漫長。爆炸發生時，他被拋飛到空中好幾英呎，威力震穿耳膜，造

成鼻血和腦震盪，身上其他部位則安然無恙。他的隊友順利逃生，只被炸彈碎片擊中，受到輕傷 [6]。

克勞徹支離破碎的背包被放在大玻璃箱子裡，在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的艾許克羅夫特勳爵藝廊所舉行的「戰地英豪特展」中，與他所獲頒的喬治十字勳章（George Cross）一同展出 [7]。受到如此崇高的表揚，這只背包彷彿活出了自己的生命，成為一名戰士英勇自我犧牲的隱喻，感覺它也值得一面專屬的獎牌。展覽陳列出紀念各種英勇事蹟的文物，包括飛行員的護目鏡、潛水夫的潛水衣、臥底特務的手槍、印度布倫輕機槍手配戴的聖手環，以及大量獎牌。展廳裡聚集了許多英雄，站在他們面前，自然而然會想找出他們的共同特點，但這些裝備的主人氣概截然不同，無法一概而論。

但這些個別差異並未打消策展人，歷史學者奈傑爾·史提爾（Nigel Steel）的決心，他試圖透過分析這些皇家勳章得主的某些特質來定義所謂的「勇氣」。他從中歸納出七種英雄氣質的屬性，包括：勇敢無畏（行動迅速）、雄心勃勃（「滾燙」的勇氣）、領導素質（激勵他人）、工作技能（善用現有資源並充分發揮）、自我犧牲（奉獻生命，成全他人）、積極主動（挺身而出）、堅毅忍耐（不投降）。儘管如此，史提爾所列的特質依然只是針對行為的描述，並非個人特質。英雄不見得做每件事都勇往直前、全力以赴或受到利他精神的感召，他們可能就只有那麼一次偉大事蹟。所有一千三百五十九名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得主中，另外獲得其他勳章或獎項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史提爾表示，所有英雄都有個共通點，但他並未列入。那就是他們都相當關心別人，總是義無反顧承擔起照顧旁人的責任。蒂蒂·葛拉姆（Didy Grahame）也注意到這項特質。她本身是倫敦維多利亞暨喬治十字勳章協會的祕書，或許是當今認識最多勳章持有者（不分男

女）並跟他們交談過的人。葛拉姆指出，有相當比例的維多利亞及喬治十字勳章得主不是大家庭的長兄就是孤兒寡母，或者早期的生活經歷使其養成關懷他人的習慣。從此看來，戰地英雄的英勇行為就跟那些在納粹占領歐洲期間勇敢拯救猶太人的民眾，以及米爾格倫電擊實驗中拒絕配合的受試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認為英雄在各方面表現都須名符其實的觀念，清楚載明在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的認證條文中，規定持有者日後若犯下叛國、懦弱或其他重罪，將撤除其功勳，以「維護此至高殊榮的純正」。幸運的是，英王喬治五世介入修法，英國政府於一九三一年修訂了這項規定。他認為即使持有者被送上斷頭臺，也應允許他們配戴勳章。但更難改變的是一般大眾根深蒂固的觀念，普遍認為勇氣是與生俱來的特質，而非情急之下才產生的英勇行為。這種迷思本身是有問題的，因為它讓我們對英雄抱持過多期待，尤其是那些保家衛國的軍人。前述的比哈利表示，他注意到自己有些行為，即便是授勳之前就有的習慣，現在已經無法被大家認同，例如上夜店³⁰。人們要求他永遠保持高尚的英雄情操。這種期待根本錯得離譜。美國早期知名諧星威爾·羅傑斯（Will Rogers）說過，英雄是世界上最短命的職業。「只因為我得到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大家就把我當成英雄。但我不過是個無法擺脫戰爭夢魘的普通士兵，每次我一闔眼，就開始冒冷汗，眼前浮現死去同胞好友的身影。³¹」比哈利說。

儘管童年經驗對於利他行為的形塑影響深遠，我們卻很難（或許不可能）預測在任何特定情況下，哪些人會聽話？又有哪些人會抵抗？或許在納粹占領下的歐洲，仍有不少人雖然來自充滿道德感的家庭，卻選擇對猶太鄰居見死不救。這些英勇事蹟背後的心理，對於我們可能做出的行為能帶來什麼啟示呢？

曾於第二章登場、研究群眾心理的萊歇爾和夥伴亞歷山大·哈斯拉姆（Alexander Haslam）認為，與其從個人特質與性格出發來理解這種行為，不如以「社會認同」的角度來解釋更加合理。換言之，就是研究人們如何認同遊戲中其他參與者扮演的各種角色。因此，米爾格倫一系列服從研究要探討的問題就變成：為何大多數人更能認同象徵權威的實驗者，而不是受害者？為何有些人卻不然？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實驗的設計方式以及各種角色關係的建立模式。當受試者和實驗者共處一室且看不到受害者時，他們更容易聽從實驗者的指令；同樣的，由於這項研究係以科學實驗為名，在赫赫有名的牛津大學進行更能突顯其重要性，比起鄰近的橋港市，參與者往往更願意配合³²。

萊歇爾和哈斯拉姆之所以強調群體認同，要從他們的實驗說起。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他們與英國廣播公司合作，依照自己的設計，重現了史丹佛監獄實驗。他們找來十五名志願受試者，在倫敦北部愛爾斯翠製片廠（Elstree Film Studios）搭建的臨時監獄進行實驗（該紀錄片於翌年五月分成四集播出）³³。他們對原本津巴多的設定做了一些改變，例如研究人員本身不扮演任何角色，也不對獄監下指導棋，改讓他們自由發揮。結果大不相同。獄監和囚犯並未盲目根據角色設定而表現出該有的樣子，其行為反而取決於彼此關係的密切程度和「內團體」的凝聚力。例如，獄監們對於該採取何種態度與作法，立刻產生了分歧，因此從未發展出共同的認同感；相較之下，囚犯們並未變得消極順從，反而愈來愈團結，最後甚至發動叛亂，導致監獄體制崩解。哈斯拉姆說，這說明了獨裁政權會崛起，不僅僅是因為民眾乖乖地扮演並融入順從者的角色，而是只有當這些角色允許他們與幫凶組成完整的共犯結構時，才得以發生。

這種凝聚力足以成為基石，促成相當有效的抵抗暴政活動。哈斯拉姆提到三個眾所周知的監獄實際案例。首先是北愛爾蘭問題（the

Troubles) ^[8] 動亂期間，位於貝法近郊的梅茲皇家監獄內發生共和派囚犯絕食抗議及反抗行動。此事件迫使英國政府重新檢討其對北愛爾蘭採取的策略。接著是南非開普敦羅本島（Robben Island）監獄內團結一心的政治犯，其中許多人成了後來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後，組成新政府的重要角（如曼德拉）。最後是一九四三年發生在波蘭索比布爾（Sobibor）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激烈反抗及逃脫事件。帶頭者是一群曾於蘇聯紅軍（Russian Red Army）³⁴服役，感情緊密的猶太囚犯。哈斯拉姆表示這三個案例中，囚犯都是受到強烈使命感的激勵而聯合起來對抗極權，翻轉現狀。

但要是沒有其他志同道合的異議分子該怎麼辦？我們該怎麼做才能在面臨各種處境，比如可疑的牟取暴利、同事的欺負霸凌或監獄囚犯的虐待時，拒絕順從常態、挺身而出呢？這個問題成為近年來津巴多研究的重點。他發起「英雄想像計畫」（Heroic Imagination Project），旨在傳授管理者、員工、在校學童等民眾抵制順從、霸凌以及盲目服從所需的心理技巧³⁵。他提出四點建議：

- 一、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勿只是隨波逐流（「不要猶豫，向大腦皮質發出警訊就對了」）。
- 二、培養個人責任感，隨時為自己的一切作為負責（聽命行事絕對不是合理化的藉口）。
- 三、辨別合理正派的權威人物與假領導者。前者的智慧與專業足以保證其立場的正當性，反觀後者聲稱握有權力，卻毫無本事。
- 四、想像面臨人身安全或社交上的險境時要如何應對，藉此培養「英雄想像」。

前述的厄文．史塔伯從事類似計畫已有數十年之久。他透過實驗測試他所謂「積極的旁觀者行為」，也就是一般人看到別人陷入險境時，是否會主動伸出援手，以及周遭有旁人在是否會影響他們的行動。一九九一年發生洛杉磯警局員警涉嫌毆打黑人羅德尼．金（Rodney King）的暴力事件後，他與加州警方合作，促成員警挺身而出，公開反對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他還發起計畫，教導麻薩諸塞州西部的國小學童如何反對暴力及霸凌。

十多年來，史塔伯和他的妻子，臨床心理學家蘿莉．安妮．波爾曼（Laurie Anne Pearlman）一直在非洲盧安達推動計畫。該國在一九九四年發生大規模的政治屠殺，超過五十萬名圖西族人（Tutsis）遭到占人口大多數的胡圖族（Hutu）殺害，造成國內局勢動盪，目前尚未完全復原。史塔伯夫妻希望找出一套有效的方法，教盧安達民眾學會抵制該國階級社會文化中習慣服從權威、避免異議的強烈衝動——他們認為此舉有助減少種族屠殺悲劇重演的可能性。史塔伯認為，「在時局紛亂不安的時候，人們會更依賴極權的力量。這會使得他們更難抽身，無法看清現況並反抗群體的所作所為。」

該國種族屠殺期間，受歡迎的廣播電臺煽動胡圖族人對其圖西族同胞施暴。這些廣播節目部分隸屬國家控制的電臺，極力鼓吹「胡圖力量」，大肆渲染圖西族是胡圖族人共同的仇敵。史塔伯和波爾曼心想，既然如此，廣播也可以用來散播訊息，成為促進種族和解的利器。訊息內容要強調彼此同樣身為盧安達國民的身分認同，無須分敵我；另外還要鼓勵民眾踴躍參與，對權威人士的悖德行為提出質疑。他們自二〇〇四年起推出教育廣播劇《新黎明》（*Musekeweya*），持續教導民眾瞭解衝突的起源以及如何弭平衝突，吸引超過九成民眾收聽。時間一久，這個方法似乎有了成效：研究團隊注意到聽眾對於

社會上其他族群與各種族裔同胞的態度轉為更加正面，並且展現出高度的和解熱誠，也更願意表達不滿與牢騷³⁶。史塔伯團隊於是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與蒲隆地發起類似計畫。前者在盧安達發生大屠殺之後也經歷了接連不斷的暴動；後者則是在一九九三年至二〇〇五年期間爆發內亂，導致約三十萬人喪生。

史塔伯表示，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因為人們在面對暴力或嚴重事態時的反應，幾乎都是下意識且受到同儕力量的驅使。「如果透過教育能讓民眾變得更有自覺，或許他們就有能力抵抗周遭環境的影響。」



旁觀者效應： 情境下的被動傾向

上班途中，你走在路上，注意到有名男子俯臥躺在人行道上動也不動。現場不只你看到，其他三、四個人也圍攏過來，卻都無動於衷，這時你會怎麼做？

研究者屢次觀察到，發生這類公共緊急事態時，周遭若有人旁觀，大多數人幾乎不會主動伸出援手，不然就是做得相當有限。這是我從學生時代就發現的現象，而且很愛以自身經驗為例。當時我在夜店外被痛毆，同行二十個朋友卻站在一旁，個個看呆了眼卻沒人出手相救，其中不少還是打橄欖球的。

心理學家認為，旁觀者的被動很大程度上係受到情境的影響。他們列出好幾個可能因素，包括害怕顯得能力不足、希望別人能夠擔起責任等等。但毫無意外地，若大家將受害者視為自己社交團體內的一員（但當初救我的不是那些人），他們挺身而出的可能性就變高了³⁷。

儘管經過多年研究，至今仍然沒有人想出化解旁觀者效應的方法。目前最成功的策略，或許是鼓勵旁觀者找出自己和受害者的共通點，正如哲學家理查·羅蒂（Richard Rorty）所說的，發揮我們的想像力「將陌生人當成受害的自己人」³⁸。

正如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所言³⁹，殘忍悖德的行徑似乎往往源自社會環境，眾人經常不知不覺一起陷入高層權威人士所形塑的正當角色裡，發生頻率高得驚人。這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確定，大家都明白人容易在衝動之下成為別人的共謀。我們必須堅決駁斥政治理論學者漢娜鄂蘭所謂的「純粹的無心之舉」（sheer thoughtlessness）⁴⁰，這種念頭使得人們在一時不察之下，拋棄了道德判斷與反省的能力。光靠少數正直公義、擁有強烈道德感的人來帶領整個社會杜絕不良行為是不夠的，因為人的性格脾氣都會受到社會制約的影響。一般觀念裡的「性格」太難以預測，無法作為指引。二〇一一年，大衛．德斯諾（David DeSteno）與皮爾卡洛．瓦德索洛（Piercarlo Valdesolo）合著《隱性人格》（*Out of Character*）這本書，探討道德決策，誠如他們所言，「偽善與道德、愛與欲望、殘酷與同情、誠實與欺騙、謙虛與傲慢、偏執與寬容……在我們身上都是同時並存的。⁴¹」

戰後社會心理研究的先驅學者已經證明，我們若無法更充分瞭解人有多麼容易受到社會力量的影響，要杜絕未來發生種族屠殺或殺人權的可能性，會變得相當困難⁴²。這一點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順從壓力，舉凡董事會議室、委員會議、政府行政部門、社群團體、大學兄弟會等各種場合，皆能得到印證。每次做決定時，心理學家都要我們自問：決定這麼做，是因為自認它是對的？還是周遭的人覺得沒有錯？好好看清楚眼前發生的一切並仔細思考，任何人都可能喚醒沉睡在自我心中的英雄魂。

接下來，我們要將焦點轉到團體心理另一種幾乎與理智思考扯不上關係的特質。本章介紹的許多沙場英雄，都是在危難當前之際，一時情急下而衝動行事。他們的勇氣來自對同袍隊友的堅貞忠誠，這種潛意識的衝動驅使他們勇闖戰場。群體凝聚力讓軍隊更加緊密團結，

只要人類一天不停止戰爭，這項特質就會永遠被領導者所用，作為統御人心的利器。

[1]. 註：胡格諾（Huguenot）為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法國新教徒之統稱。

[2]. 譯註：後來美國好萊塢根據真人實事，拍成電影《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於二〇〇四年上映。

[3]. 譯註：拉比（rabbi）是猶太教的特殊階層，主要由有學問的學者擔任，同時也是智者的象徵，在宗教中扮演重要角色。

[4]. 譯註：隸屬英國御林軍，是英國陸軍歷史最悠久的單位，成立於一六五〇年。

[5]. 原註：二〇〇六年，為紀念維多利亞十字勳章設立一百五十週年，有電視公司拍攝紀錄片《維多利亞英雄點將錄》（*Victoria Cross Heroes*），訪問了傑克的孫子法蘭基·藍道（Frankie Randle）。該片於同年十一月及十二月於英國第五頻道播出。

[6]. 原註：和目前為止論點不同的是，克勞徹就跟一般想像中的軍人原型很像，他在十三歲的時候就立定志向，長大後要加入皇家海軍突擊隊（Royal Marine Commando）。

[7]. 原註：喬治十字勳章（GC）表揚的是戰爭以外最偉大的英勇行為，或在極端危險的情勢下所展現的傑出勇氣，對象多為平民或軍人。

[8]. 譯註：指一九六〇年代末至一九九〇年代末期，主要發生在北愛爾蘭的長期暴力衝突。一直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十日，英國和愛爾蘭政府簽訂北愛和平協議方告一段落。



來到佛蒙特州的綠山（Green Mountains），一路深入山林，沿途很難不發現美國革命戰爭中最惡名昭彰的英雄伊森．艾倫（Ethan Allen）的身影。儘管沒人知道他的確切面目，但舉凡戰爭紀念館、街道路標、旅館、美國國鐵列車、國內最大連鎖家具賣場，處處可見其紀念肖像。只要在酒吧或商店櫃檯一提起他，就能從當地人口中聽到教科書上及代代口耳相傳，關於他的各種荒謬故事。「說起那些艾倫男孩，最愛的當然是聚會狂歡囉！」瑪莉亞斬釘截鐵地說。我投宿在她經營的伊拉．艾倫旅社（Ira Allen House），這棟歷史悠久，有著栗色屋梁、木頭地板起伏不平，樣子相當滑稽的百年老屋，是伊森和他弟弟伊拉於一七七九年親手建造的 [\[1\]](#)。「當時他們關起門來開會的樣子，哇，簡直在就像開派對。」

艾倫在康乃狄克州鄉下長大，之後跟隨親戚北上來到康乃狄克河西岸一處名為「新罕布夏贈地」（New Hampshire Grants）的地方（即今日的佛蒙特州），在那之後成為無人不曉的「煽動者」。他一到當地就被捲入爭議多時的土地糾紛：一方是像他那樣，親自從新罕布夏省長手上購得土地所有權的地主；另一方則是紐約省。該贈地東與新罕布夏省為界，西與紐約省接壤，雙方都聲稱擁有其管轄權。紐約省政府宣稱新罕布夏省買賣土地的行為是詐欺，並威脅墾拓者，若不另外向紐約省購地，就要將他們驅逐出境。此舉激怒了艾倫和他的鄰居友人。一七七〇年夏天，他們齊聚在班寧頓的卡特蒙特酒館（Catamount Tavern，現為佛蒙特州南部的重要歷史景點），在酒精的推波助瀾下（當時喝的是加入蘭姆酒調製的蘋果酒），成立了反抗組織以捍衛他們的權益，拒絕讓「紐約佬」插手干涉。這群人就是後來大家熟知的「綠山男孩」（Green Mountain Boys）。



圖六、綠山男孩的會議情景。

綠山男孩這群「患難兄弟」的實力驚人。他們不僅是美國獨立戰爭打敗英軍的主力，同時也在歷史上曇花一現的佛蒙特共和國時期扮演關鍵角色：該地區從一七七七年到一七九一年間，脫離大英帝國及剛建立的美國而獨立。你可能會以為這群拓荒先鋒個個都是特立獨行、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者，但他們同時亦以積極與忠誠著稱，許多人不是親兄弟就是堂表近親，或感情緊密的鄰里鄉親。這種情誼不僅奠基於血緣，也建立在互相依賴，共生共榮的關係之上，足以構成一股強大戰力。

「山神就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2] 艾倫聽到紐約政府警告他休想和同伴對西部領地的地主¹使出任何骯髒技倆後，發出如此怒吼。過不久，這些紐約佬就明白這句話涵義為何了。艾倫率領的自由鬥士在初次集會後立刻採取行動。他們將臉塗黑並且瀟灑地在帽帶繫上冷杉樹枝，開始強制驅離領地內的紐約移民，從土地測量員到佃租戶，任何人都不准留下。他們不發動戰爭，而是使出各種誇張的威脅手段與懲罰技倆，極盡羞辱之能事。截至一七七五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為止，他們沒殺過任何人。紐約人一旦被發現企圖照政府命令行事，家中的屋頂就會被掀開，或是被拖走並遭受名為「用荒野樹枝來懲罰你」的創意鞭刑。有時候，他們會被迫在大庭廣眾下接受更公開的羞辱，例如山謬·亞當斯（Samuel Adams）這名倒楣的醫生。他坐在搖椅上，連人帶椅被綁在卡特蒙特酒館二十五英尺高的招牌上，忍受客人嘲笑長達好幾個小時²。一七七四年，紐約當局對這種「危險且充滿破壞性的暴亂與放蕩精神，顛覆一切秩序與良善體制的行為」深感悲憤痛絕，並祭出重金懸賞緝捕綠山男孩的首領³。然而，當時有勇氣跨越雷池，踏入新罕布夏奪取領地的紐約地主卻少之又少。

不難想像，綠山男孩在佛蒙特西部山地可謂如魚得水，占盡上風。當地森林環繞，處處可見，一旦走出市鎮或遠離大馬路，就算站在山脊或山頭上，也很難發現旅者的行蹤。某個平靜無風的早晨，我沿著長途步道走了十一、二公里。這條荒野小徑一路穿越綠山山脈，從麻薩諸塞州延伸到加拿大邊境，沿途雖然可見白楊、樺樹、楓樹、橡樹及鐵杉等豐富林相，卻沒看見任何路標。話雖如此，那仍然是一條相當引人入勝的登山林道。樹影下藏著無數令你分心的事物——樺樹皮碎屑形成的殘痕、藏身灌木叢，驚慌竄逃的松雞、如土星環般圍繞著枯木團團展開的真菌——你必須隨時確認方向，知道下一步該往哪裡走。「綠山男孩無所畏懼，他們會埋伏起來，伺機突襲。」艾倫對任何試圖聽從紐約政府命令行事的人提出忠告。「因為他們對山裡的狹路窄道瞭若指掌，且身強體壯、精力充沛，更是射箭高手。⁴」

這幫綠山兄弟的社會肌理（social fabric）最明顯的展現，就是在美國革命初期，眾人集結攻占了英軍駐守的提康德羅加堡（Fort Ticonderoga），此役讓他們名垂青史。一七七五年四月，正當英國與北美殖民地的衝突愈演愈烈，升級為全面開戰之際，綠山男孩與紐約州民化干戈為玉帛，攜手加入戰局，反抗「瘋狂英王喬治三世」（Mad King George）的暴政。雙方幾乎第一時間就達成共識，試圖奪下提康德羅加堡這座巨大星形軍事要塞。該城堡據點絕佳，座落在新罕布夏贈地西部邊境，俯瞰尚普蘭湖（Lake Champlain）。

艾倫號召了一群反抗者組成核心部隊從班寧頓出發，開始長達一百多公里的北征。沿路上，他們向農場、農莊、小酒館招募有志之士，其中不乏許多與艾倫有淵源者或舊識，或知道他就是那個為了捍衛人們土地權益而不惜與紐約政府作對的人。最後，當艾倫一行人進入城堡大砲的射程範圍時，他們已經組成了一支多達二百三十人的「兄弟軍」，其中至少包含三名艾倫的親手足（包括伊拉）以及三名

堂表兄弟，還有一支村莊農家組成的兄弟會，其中一戶還橫跨兩代，共六名成員加入。

最近一位為艾倫撰寫傳記、同時也寫得最為鉅細靡遺的歷史學者韋拉德．史特恩．藍道（Willard Sterne Randall）表示，這是一支雜牌軍。他算了一下，當中有獵人、捕獸人、律師、酒館老闆、鎮務祕書、商店老闆、詩人、剛畢業的耶魯大學畢業生、剛下船的英國（蘇格蘭、英格蘭、愛爾蘭）移民，以及未來的國會議員等。他們來到部隊的集結點，尚普蘭湖畔的漢茲灣（Hand's Cove），「穿著工作服或是由妻子、姊妹或母親縫製的鹿皮狩獵上衣……以棉毛織布、粗斜紋布或絨布製成的褲子，套著羊毛長筒襪，腳穿莫卡辛皮製鞋或粗製靴子，頭戴珍貴的海狸皮帽或熊皮帽，身上套著厚綿或絲質背心。^{5]}

這支雜牌軍成員雖然五花八門，卻相當團結。有美國歷史學者針對這群草莽英雄的社會動力做了全面性的分析，他指出，艾倫在革命前夕成功整合「西佛蒙特地區各個迥然相異的群體並使之融為一體，成為鬥志十足的反抗組織，具備革命政治實體的所有特徵。^{6]} 即使存在差異，他們仍憑著開拓邊疆的進取精神與對彼此的忠誠堅貞而緊密團結在一起。這種出身背景與目標上的一致，似乎是他們攻下提康德羅加堡的致勝關鍵。儘管新罕布夏贈地有數千名民眾依然效忠英國，還有許多人不想參與革命，但戍守該堡的英軍卻遲至一七七五年五月十日的黎明才意識到自己成了反抗軍襲擊的目標。他們醒來時，發現艾倫和他的軍隊早就在閱兵場上列隊準備攻擊。英軍指揮官立刻投降；美國獨立戰爭的首次進攻，就在不費一兵一卒，甚至幾乎不花半發子彈的情況下輕鬆得勝，艾倫的部屬對此「雖然失望但欣然接受。^{7]}

為了表彰他們的功績，綠山男孩被編入美國軍隊，成為獨立軍團。艾倫和表弟塞斯·華納（Seth Warner）擔任指揮官並有權自己選擇幹部，這是美國政府相當了不起的讓步。提康德羅加堡之役後過了五個月，艾倫在一次試圖攻占蒙特婁的草率行動中遭英國人擄獲，被囚禁了兩年半。這段期間便由華納接管整個軍團。他於一七七七年八月的班寧頓戰役（Battle of Bennington）中再次大敗英軍，交戰地點距離綠山男孩們聚會的老地方卡特蒙特酒館僅有幾哩之遙。這是另一場關鍵性的勝利，使英軍損耗近千名兵力。就跟之前的紐約佬一樣，這群紅袍大兵不擅長山林作戰，裝備不足，使得戰力大打折扣。

長久以來，將領和戰略家早就體認到社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on）對於軍事效能的重要性。一四一五年，英王亨利五世於阿金庫特戰役（Battle of Agincourt）中擊潰兵力及食糧補給皆遠遠勝過英國的法軍。在這之前，他似乎就是善用這一點，凝聚英軍士氣。他的激勵演說「吾眾雖寡，而樂，親如兄弟；從我流血者，吾兄弟也。」⁸經過莎士比亞的潤飾詮釋，流芳百世，成為英軍在征戰前夕面臨艱難險阻時，振奮士氣的經典口號。

美國南北戰爭中，聯邦軍（Union）及邦聯軍（Confederate）的士兵由於軍餉微薄、收入不穩，過得相當困苦且面臨極大的生命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團隊忠誠就成了「鞏固軍心的水泥」⁹，彌補了軍隊訓練不足及普遍欠缺紀律的弱點。聯邦軍刻意製造產生團隊忠誠的條件，由志願士兵組成的聯邦連隊，成員皆為同鄉男性且彼此熟識。他們一起入伍、同生共死，很少被外人取代。

從民間召募具備相同背景或特質的團體，藉此建立一支具有高度同質性的軍隊，其成效近來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經濟學者朵拉·

蔻絲塔（Dora Costa）和馬修．坎恩（Matthew Kahn）（兩人恰好是夫妻）的研究中獲得驗證。兩人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美國內戰，出版了《英雄與懦夫》（*Heroes and Cowards*）一書。他們在書中表示，聯邦軍隊中的同鄉士兵並肩作戰，彼此年紀相仿，平時也從事同樣工作（如農民或工人）。這些人幾乎不會輕易逃兵或擅離職守。這些要素不僅有助確立團隊的群體認同，也是決定士兵能否奮戰到底的關鍵條件¹⁰，重要性遠甚於軍隊士氣或基於意識形態的激昂鬥志。

以下是一封內戰老兵信中對同袍兄弟情誼的描繪。作者是紐約一二二步兵團的志願兵，他在一八六四年七月九日寫給妹妹的家書中提到：

你問我是否不怕戰死沙場，我會說我不想死……我自己是個懦弱無比的膽小鬼，但見到戰友夥伴都勇往直前，我不能龜縮，也必須提槍上陣。只有一次，唯一一次，軍團受到砲火攻擊，我躲在後方，無法描述當時的感受，我只是個小兵，無法形容那種感覺……但一聽到火槍手連串擊發，我就知道軍團開始行動了，我踩著蹣跚的步伐，朝大夥走去¹¹。

即使將近一世紀後，到了二次大戰期間，團結和患難情誼依然是激勵士兵勇於踏上戰場的關鍵推力。美國社會學先驅山謬．史塔佛（Samuel Stouffer）於戰爭期間擔任戰爭部教育資訊司的研究處處長，調查了五十多萬名士兵，包括他們對於戰爭抱持的心態、驅使他們作戰的動機、作為士兵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以及美國參戰的目的是否值得他們賭上性命為國奮戰等問題。史塔佛的發現與陸軍高層對衝突心理的認知有諸多矛盾：主宰士兵戰鬥意志最重要的動機因素並非一般認為的理想主義、領導統御、求生欲望或對敵人的仇恨，而是軍隊的團結，以及想要早日結束戰爭、回家與摯愛團聚的渴望¹²。

陸軍相當重視史塔佛的研究成果，不僅將它轉化為政策，還應用在宣導影片裡，例如法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所執導的《我們為何而戰》（*Why We Fight*）系列紀錄片。這是軍事將領在思考如何大幅提昇士兵的作戰意識時，首次開始信任科學分析，而非訴諸傳統智慧。史塔佛甚至建議讓士兵休假時以軍服取代便服，這樣做有效降低了陸軍的逃兵率。這是因為士兵穿著軍服，往往會被家人視為英雄，不僅提昇他們的自尊心，也讓他們回到部隊的意願大增。

戰爭後期，史塔佛旗下的研究員還包括人稱「團體迷思」理論之父的厄文．詹尼斯。詹尼斯二十歲出頭就被徵召入伍，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訪談在歐洲作戰的美軍。他驚訝發現，士兵若得到晉升但須外調的機會，通常會選擇婉拒；傷兵即使患病受傷，仍不願請病假，甚至違背醫院命令，私自出院，就只為了回到同袍身邊。這類案例多不勝數。他回想：「我們一次又一次遇到類似案例，他們的動機不是出於一己之私，而是（害怕）讓其他人失望。¹³」二戰戰爭史學者山繆．馬歇爾（S. L. A. Marshall）觀察到，從潰散的部隊中調派一人至他隊作戰，成效往往差強人意；但若改成兩人，效果通常相當不錯¹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英國皇家砲兵並肩作戰的史東罕中尉（E. W. Stoneham），用一段話簡單說明了患難情感的精神：

男人之間的革命情感實在非常特殊又難以形容。曾經有人問我要不要調派後方，不用出生入死，但條件是得加入旅部。這工作相當誘人，但我不想，因為我和連上弟兄之間有種誰都不想打破的羈絆，要是我走了，就會變成眾人的叛徒，所以我拒絕了，選擇留下繼續與大家並肩作戰¹⁵。

面臨敵人猛烈砲火時，這種對團體的忠貞不渝絕非男性的專利。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期間在西部前線服役的英國「急救護士隊」（First Aid Nursing Yeomanry，簡稱FANY），從義工護士到救護車駕駛皆由女性擔任。在那個軍方百般禁止女性從軍的年代，她們最為人熟知的就是患難情誼與犧牲奉獻的情操。這些戰地護士在戰況最激烈的時候，頂著槍林彈雨，將傷殘的士兵送往醫院治療；她們通常在夜間摸黑行動，不開車燈，忍受刺骨低溫，空氣裡瀰漫著人肉的燒焦味。有志工形容這種經驗宛如「百般煎熬的可怕地獄」¹⁶。《時尚》（Vogue）雜誌曾經刊過一篇FANY營區的簡介報導，說這些護士「浸在血泊中無法脫身，忙著截肢、包紮，不眠不休，無法喘息。」作者認為，這些女性奉獻到如此地步，足以推翻「男性那些惱人且充滿歧視的玩笑話，誰說女人不能團結合作？」¹⁷

為什麼在危急時刻，群體的凝聚力會對動機產生如此劇烈的影響？答案很明顯，因為它是攸關生死存亡的關鍵。士兵要是能與個性或能力都相當熟悉的隊友並肩作戰，在戰爭中全身而退的機會將大上許多。「當你進退兩難或陷入險境時，你希望他們支援，而他們也必須覺得你是值得依賴的。」二戰期間美國第五步兵師的迫擊砲兵勞倫斯·尼克爾（Lawrence Nickell）解釋¹⁸。

二〇〇三年四月，盟軍進攻伊拉克不久，美國陸軍戰爭學院（US Army War College）軍事戰略研究教授雷納德·王（Leonard Wong）率研究團隊前往該國，想瞭解激發士兵戰鬥意志的原因。根據大量訪談的結果，王教授指出，美國步兵對同伴感到前所未見的信任，甚至勝過夫妻或父子。有名士兵對他說：「（隊友）對你而言，比任何人都重要。要是他死了，你也活不了。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守護彼此安全，萬一他不幸喪生，那就是我的錯，

對我來說，比自己丟了性命還嚴重。¹⁹」「寧死不辱」是士兵的格言，亦是軍團最常見的座右銘²⁰。

在探討為何革命情感攸關軍隊戰力時，王教授發現某些失敗案例可以作為很好的參考。這些案例中，團隊忠誠因敵對、猜忌、領導無方等問題而瓦解，導致內部失和，關係破裂。這往往是軍隊作戰失利的敗因。二〇〇三年他在伊拉克研究時，訪談了一批伊拉克戰俘，對方表示該國正規軍內部非常缺乏向心力。他們說，各排班兵依族群或宗教信仰不同而分裂成各種小團體，並有不少人早已逃兵。王教授形容伊拉克軍隊的解體為「很有代表性的個案研究……突顯缺乏社會凝聚力和領導統御時可能發生的實際狀況。²¹」從個人層面來看，一支難以管束的軍隊並非理想單位。面臨生死交鋒的恐懼，卻少了領導者的同情與戰友的陪伴作為心靈後盾、提供安全感，可能會嚴重破壞軍心的穩定，同時也可能急速導致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而造成該症狀的主要風險因素之一，就是缺乏強大的支持網絡。

同樣地，軍隊也可以透過凝聚向心力來彌補兵力或軍備上的不足。越戰期間，北越軍面對美國強大的火力和後勤支援，鬥志始終堅定高昂。儘管以各項傳統指標來看，其軍事實力在各方面都相形遜色，但北越軍具備了參謀長文進勇（Van Tien Dung）所謂的「士氣優越性」（moral superiority），包括高昂的鬥志以及在充滿關愛、井然有序的領導下奮勇作戰、忠貞不二的士兵。在當時實施動員法的越南，這促使平常關係緊密的村莊團結起來，由國家提供武力裝備，組成「自衛隊」。英軍在一九八二年的福克蘭群島戰爭期間對戰阿根廷軍隊也擁有類似優勢。在離家八千英哩（約一萬二千八百多公里）的地方作戰，即使面臨空中武力不足、敵眾我寡等後勤支援上的困難，當下這些劣勢都不是問題，因為阿根廷由徵兵組成的部隊相當

鬆散，不堪一擊。對方投降的條件之一，竟然是允許軍官配帶手槍自保，以避免被自己的士兵攻擊，足以證明他們對於權威的信任早已徹底瓦解，蕩然無存²²。

針對軍人情誼的種種分析，最有啟發性者當屬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者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和莫里斯．詹諾維茲（Morris Janowitz），他們對二戰末期撤退德軍在最後幾個月內所展現的非凡韌性進行了研究。一般人認為德意志國防軍（Wehrmacht）之所以能夠維持高度戰力且很少發生逃兵，就是因為德軍士兵皆堅定服膺國家社會主義思想。但希爾斯和詹諾維茲卻有不一樣的發現。他們宣稱，一般德國士兵能夠奮戰不懈的原因，在於其直屬部隊滿足了他身而為人的基本情感需求：「（它）提供他來自長官和同袍的關愛與敬重，給他一種權力感，充分規範他與權威的關係分際。」最高司令部從一開始就利用這些動力作為操控手段。例如，讓年紀相仿或種族背景相似的年輕人並肩作戰（戰力最強者是以德國人為主的部隊，加上少數奧地利、捷克或波蘭人）。他們將整個師團派上前線再全數撤離，好讓新兵在正式行動前有機會融入部隊²³。二十年後，美國在越南陷入苦戰，無論士氣或戰力皆遭到重挫；包括詹諾維茲在內幾位社會學家認為問題就出在人力運用的策略上，軍官士兵調度過於頻繁，若無法凝聚團結，就算火力再強大也毫無用武之地²⁴。

若無法像德意志國防軍那樣仰賴人們原來的同質性，或效法綠山男孩採取社會聯繫（social ties）手段，要如何讓背景個性都不盡相同的各路人馬團結在一起呢？軍隊利用各種計策，例如密集陣型行進或其他可以加強動作同步的操演等，都是相當常見的訓練方式。儘管與作戰無關，這已是約定俗成的既定作法，有助於打破藩籬、建立

部隊信任與合作²⁵。（齊步前進的方式亦有助改善集團經濟決策，但此概念尚未獲得企業經理人充分利用²⁶。）

世界各地的聯誼會、俱樂部、兄弟會等組織都有入會迎新。這類儀式有著類似的心理功能，儘管往往帶有羞辱及虐待的成分且有安全疑慮，卻幾乎不會受到政府制裁。其目的是希望藉由痛苦的犧牲，讓新人懂得珍視身為群體一員的可貴。各種活動，比如在一群前輩的笑鬧聲中，將蘋果從同輩新人的屁股裡掏出來，或者把軍團徽章刺在身上等，實際上會讓你感到相當開心，因為這代表你已經獲得過來人的認可，成為該特定群體的一分子。

儀式有助提升社會黏著度，使人們團結。這是怎麼辦到的？牛津大學的哈維．懷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教授窮盡大半學術生涯，試圖找出答案。他目前在該校認知與進化人類學研究所執行一個經費高達五百萬美元的研究案，探討儀式在社會行為、兒童發展及政治制度中的作用²⁷。他相信，儀式之所以如此有效，原因就在於它們令人難忘。你若經歷過某些可怕或痛苦的事情，那些遭遇就會成為你的人生故事；若有同伴陪你一起經歷這些遭遇，「你就會將自我意識延伸到對方身上，包括所有意圖和目的，使其成為你個人的一部分。」懷特豪斯說儀式愈痛苦，經驗愈豐富，參與者之間的聯繫就愈緊密。

共同經歷戰火洗禮也會產生類似效果。二〇一一年，懷特豪斯和他的博士生布萊恩．麥昆（Brian McQuinn）前往利比亞的米蘇拉塔（Misrata），研究當地與穆安瑪爾．格達費（Muammar Gaddafi）部隊奮戰的革命團體所展現的群體團結性。據那些交鋒經驗最為慘烈的反叛分子表示，他們跟隊友的感情比跟自己家人還親密。正如懷特豪斯其他研究結果顯示，大家的共同經歷愈可怕，團隊感情就愈好。研究人員觀察到，某些利比亞叛亂組織在作戰時，會透過儀式來振奮

士氣。「即便在最激烈、挨家挨戶的街頭巷戰中，還是會有一名隊員手無寸鐵，負責帶領大家誦經。」懷特豪斯說。「他們一邊戰鬥一邊高喊『真主至大』（*Allahu akbar*）。諸如此類的舉動為他們注入更強大的勇氣，長遠看來，更有助促進團隊更緊密的團結。²⁸」

要讓一支隊伍建立起深厚信任，需要數週甚至數個月的朝夕相處和訓練，但這種革命情誼一旦建立，便很難打破。經常可見退役軍人講起部隊同袍，就像在聊自己家人一樣。「我們吃喝（拉撒）睡——幾乎每件事——都在一起。」某位美國士兵在伊拉克時這樣對王教授說。「我認為本來就該這樣……我真的把這些人當成家人，因為我們一起出生入死，同甘共苦……我們感情甚至好到暱稱班長『老爹』。²⁹」

詹尼斯回顧他在二戰期間對參戰士兵的觀察，試圖從佛洛伊德「分離焦慮」（*separation anxiety*）及「情感轉移」（*transference*）的概念來理解這種渴望。他推論，人在極度恐懼的情況下，會喚醒童年時期的主要焦慮，亦即與母親或父親的分離而導致的焦慮，迫使他們轉而向身邊任何群體尋求慰藉。「因此，連長或外科醫生很有可能變成父親形象的代表，而同袍或病友成了兄弟的替代品。³⁰」一旦失去所珍視的領袖或戰場上的任何「家人」，即使只是與其分離，都可能造成重大的心靈創傷。二戰期間義大利某位不具名的美國士兵，形容被調派到其他單位的感受，就像變成「孤兒……有種失落又孤單的感覺。³¹」軍方精神科醫師普遍認為，同袍在戰場上不幸殉難是士兵最主要的痛苦來源，就像父母失去小孩一樣，因為這種失落經常引發悔恨、內疚和憤怒等負面情感，自責為何沒有更努力地保護他們³²。這種悲憤的情緒在文學及藝術作品中屢見不鮮，但沒有人能夠表現得像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在《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一書中如此壯闊激昂：

在我身後的戰壕裡，這些聲音，這些安靜的話語，這些腳步聲，瞬間將我從內心可怕的孤獨和對死亡的恐懼拉回現實，那些差點就要將我毀掉的心魔。它們對我而言比生命還重要，這些聲音，更甚於母親慈愛的呼喚，超越了恐懼；它們是戰場上最有力、最撫慰人心的支持力量；它們，就是我戰友的聲音³³。

二〇一二年底的某個下雨天，我開車前往英國南部海濱小鎮某條無尾巷內的房子，拜訪一位老兵，他非常瞭解軍方如何利用部隊這種近似家人的親密情誼作為戰鬥動力。現年八十八歲的艾倫·比芬（Alan Biffen）在二戰期間駕駛英國皇家空軍的七人座蘭卡斯特式轟炸機（Lancaster bomber），與隊友一同出生入死，執行危險而親密的任務。空軍隊員們擠在金屬機身裡，防空砲彈就在機外爆炸，大夥同生共死，壯烈犧牲的可能性相當高。轟炸機司令部的十二萬五千名飛行員中，有超過百分之四十四的人不幸殉職，生還率比第一次大戰的步兵軍官還低³⁴。

我在門口遇見陪伴艾倫四年多、友善親人的同伴齊基。牠是一隻十二歲的黃金獵犬，看上去就像一張華麗的地毯。我們聊到一半時，牠會發出一連串的乾嘔聲，並將一些消化不了的東西吐在地毯上。這一幕相當突兀，因為艾倫家裡保持得一塵不染。屋內牆上掛滿飛機畫作，包括他所駕駛的蘭卡斯特轟炸機。他一身整齊乾淨的打扮，穿著棕色燈芯絨褲與酒紅色毛衣，白髮往後梳，散發著健康硬朗的氣息。他看起來像個生還者。事實上，他的確是：娶了兩任妻子，幸運熬了過來。他的家族有著韌性的基因。哥哥湯尼是噴火式戰機（Spitfire）的飛行員，在我來訪前幾週才剛以九十一歲高齡過世；父親在一次大戰的索姆河之役中身受重傷，但仍順利生還。

艾倫在十七歲時加入英國皇家空軍，當時他謊報了年齡。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萬里無雲的天空中完成受訓後，他當了一年的飛行員，指導新手領航員適應英國變幻無常的天氣。接著在一九四四年，他有了自己的小隊。他們很幸運，一起出了十四趟任務，每次都幾乎毫髮無傷的返回。即使知道不無可能，艾倫說他們從來沒有討論過被擊中的可能性：

我們早就下定決心，每趟任務大家都要生死與共。所以，我們要團結，每個人都要清楚我們的行動目標，盡一切努力達成任務、全身而退。我記得有次看見一架轟炸機在空中爆炸，燒成一團火球，每個人都說不出話來，因為大家都覺得是上帝保佑，否則爆炸的可能是我們。這種事你根本沒想過。永遠想不到。我不知道人為什麼不會擔心，或許是知道有同伴在身邊陪你度過難關所產生的心理作用。

訪談過程中，艾倫挪了挪金邊眼鏡，承認有些地方可能記錯了。他說：「我有時回想，不確定當時我們真的有擔心過，或者一切都是從書上看來的印象？」然而他很清楚那是什麼感覺。他聊到隊員時，彷彿昨天大夥兒都還聚在一起，畫面歷歷在目。我問他是怎麼和那六名平均年齡二十二歲的人湊成隊的？過程相當不可思議，他說：

我們被叫進大廳。「好了，各位開始挑隊員吧。」他們說。方法就是這樣。一群人被打散，互相探問、徵詢意願。十分鐘後，你不是再找別人，不然就是說：「太好了，你要當我的領航員嗎？還是無線電操作員、轟炸員或任何職務都行。」每支機組的成員都是這樣找來的。

乍看之下，這似乎是相當奇怪的隨機選員方式，因為你不知道在最艱難的非常時期，這些人能陪你撐多久。但選擇同伴通常最好憑直

覺，太看重個性、過度解析對方性格及特質可能出現哪些千奇百怪的表現，最後只會徒勞無功，毫無意義，而許多招募顧問也默認這一點。培養團隊情誼，並非透過不同性格個體的協調磨合，而是共同經驗所產生的互信互賴。艾倫和其他六名隊員隨即體悟到，駕駛蘭卡斯特轟炸機想安全生還，就只能靠團隊合作。

過不了多久就會明白，只有你一個人是開不了飛機的。機上還有其他人，你不但要為他們的性命負責，同時也得依賴他們。領航員告訴我該往哪裡飛，轟炸員正確排好砲彈位置並設定投彈瞄準器，機槍手持續搜尋敵機等。機上所有人員情如手足，緊密相依，真諦就在於你出自本能知道自己的命隨時掌握在大家手中，那是一種完全的信任感。

在一項針對戰爭期間美國空軍心理困擾（psychological distress）的研究中，軍方精神科專家羅伊．格瑞克（Roy Grinker）和約翰．史匹格（John Spiegel）觀察到，**團隊情感有助士兵避免受到心理創傷**。即使大多數轟炸機小隊都是隨機成軍，成員之間很快就發展出密不可分的患難情誼。「日復一日，經過一次又一次的任務，這種相互依賴換來全體隊員的安全與作戰成效。」他們說。「難怪這些飛行員之間的情感關係如此特殊，同一機組的隊員對於彼此認同之強烈，除了戰場，只有家人親情才能比擬。³⁵」

但即使如此，仍不足以形容這種革命情感的特殊之處。詹尼斯堅信，戰鬥部隊所觀察到的心理過程，就與日常生活中群體行為的形塑過程別無二致³⁶。但真正上過戰場、也體驗過平凡生活的人卻往往不這麼想。艾倫說：「身為蘭卡斯特轟炸機的隊員，那種陪伴、尊重及普遍的情感，我這些年以來始終難以忘懷。那是一種感激之情，我很慶幸自己親身體驗過。我不敢說它讓我成為更好的人，但它確實给了我一些身為普通人從未有過的感動。」

告別艾倫後，回程上，我心中浮現以前和祖父聊起戰爭回憶的感覺。我很感謝他願意跟我分享那些戰地經驗，也意識到只有與他們並肩作戰過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他們的感受。後來，我發現艾倫和祖父兩人之間竟然有過交集。艾倫提到他在諾曼第登陸（D-Day landing）後不久，曾經對法國康城（Caen）進行罕見的日間轟炸襲擊。當時我祖父人就在諾曼第，隸屬位於坦克軍隊前方的冷溪衛隊，親眼目睹那些炸彈。他在日記上寫著：「上千架轟炸機對康城以北的德國人連番轟炸……我們在破曉時分目睹了這幕驚人景象，上千枚炸彈齊發……我以為沒有人能躲得過這次襲擊，但我徹底錯了。」^[3]

戰爭或是戰備訓練，提供了養成強烈群體依附所需的一切條件，但戰場並非這股強大力量唯一的發揮空間。患難兄弟不僅見於戰鬥部隊，在紐約市消防局（Fire Department of the City of New York，簡稱FDNY）也能發現他們的身影，這班打火兄弟向來素有「紐約第一勇者」之稱，更以重視情義的忠誠文化聞名。

紐約市消防局就和軍隊一樣，成員感情相當親密。局內不乏兄弟、父子、叔姪等家人在同一單位服務，且以身為消防隊員為榮，代代相傳；即使毫無血緣關係，彼此也視為家人對待。由於勤務性質特殊，這一點根本不足為奇。這群打火兄弟在單位值班時，不僅一起工作、訓練、檢查裝備，就連日常生活也朝夕相處，一起擠宿舍、同桌共食。每當警鈴響起，局內上下全員出動，一同赴湯蹈火，出生入死。

因此，我們不難想像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該局內發生了什麼狀況。當天上午八時四十六分，大隊長喬·菲佛（Joe Pfeifer）正在曼哈頓市中心街上檢查瓦斯漏氣，當時他聽到上空傳來飛機異常接近的聲音，抬頭一看，隨即目睹飛機撞上世貿中心的北塔。菲佛是該區的最高指揮官，立刻明白這是他的使命，於是他召集

團隊迅速整裝，直奔世貿大樓，在斷垣殘壁的大廳設立緊急指揮站，現場滿目瘡痍，玻璃碎裂，到處都是受傷暈眩的民眾。當時紐約市內幾乎所有消防隊員都緊急出動，奔往市中心。他們抵達現場時，菲佛發號施令，要求他們走樓梯，爬上飛機殘骸所在的九十層樓左右，當時整棟大樓的鋼架已經起火燃燒，陷入一片火海。

菲佛的弟弟凱文也在這群人的行列之中，他在消防局擔任小隊長。事後菲佛回想：「我們只講了幾句話，然後互看了一眼，希望對方此行順利平安。但因為得撤離民眾，加上還有許多人受困，我弟弟也跟著徒步上樓，試圖救出那些人。³⁷」南塔倒塌後，菲佛命令全體隊員撤離北塔，因為他知道北塔早晚也會倒塌。凱文開始下樓往地面移動。走到十樓時，他發現有些隊友正朝著被封鎖的出口走去，於是停下腳步，指引他們正確方向。許多受他幫助的人都平安生還了，但唯獨他自己來不及逃出。凱文成為那天不幸英勇殉職的三百四十三名消防隊員其中之一。

在九一一事件中，失去至親的紐約市消防隊員不只菲佛一個。老約翰·維吉亞諾（John Vigiano Sr.），不僅是位備受尊敬的退休消防車司機，他的父親過去也是消防員。他也在這場意外中失去了兩個兒子：擔任警察的喬和同為消防員的小約翰。接受電臺和電視訪問時，維吉亞諾提到，約翰本來打算成為企業家，但因為嚮往打火兄弟的患難情誼，才自願加入紐約市消防局。「他想成為第二個川普（Donald Trump），立志賺到一百萬來奉養父母。」但維吉亞諾後來生了重病。他說：「一九八四年我得了咽喉癌。他注意到消防局對我們照顧有加，於是改口說：『我要當消防員。』」紐約市消防局授予他當年他祖父所配戴的徽章，編號第三四三六號。喬殉職時剛好是三十四歲，約翰三十六歲；維吉亞諾說，這組數字冥冥中的巧合，撫慰了他的傷痛³⁸。

對感情相當親密的消防隊而言，現場一旦發生任何意外，那種失落感可能會令人難以承受。但菲佛說，紐約市消防局每位弟兄的英勇義行，甚至面對猛烈惡火所展現傳奇般的奮戰精神，都是平時休戚與共、合作無間培養出來的成果。九一一事件當天，雙子星大樓遭到劫持飛機撞毀，當時本來有許多弟兄準備下班，最後卻選擇留下，因為他們不願拋下夥伴不顧，讓他們獨自與畢生最嚴重的大火搏鬥。

這種媲美手足情誼的忠誠文化，通常出現在消防隊之間的較勁場合，最早可追溯至一個半世紀之前。當時紐約市的消防隊係由敵對的幫派組成，每次傳出火警，他們總是比賽誰最先衝到火場，以爭奪打火英雄的榮譽^[4]。肯恩大學（Kean University）的歷史學者泰瑞·高威（Terry Golway）表示，各方競爭相當激烈，「許多消防隊遇到街道擁擠時，索性跨越路肩，開上人行道，駕著消防車疾馳，令民眾為之氣結，有時還被嚇得驚魂未定。³⁹」

團隊間的競爭意識可以激發非比尋常的奉獻精神與利他行為，但並非總是以謀求公共利益為目的。以紐約市消防局與紐約市警察局（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簡稱NYPD）為例，兩者在緊急救災方面長期以來就是死對頭，九一一事件當天，雙方因未能及時分享重要資訊，而錯失拯救寶貴生命的機會。南塔倒塌時，紐約市警察局的緊急應變小組駕駛直昇機從上空觀察災情，發現北塔部分區域因高溫呈現火紅，隨即透過無線電向大樓內所有員警發布疏散命令。幾分鐘後，他們注意到建築物主體開始彎曲並向南傾斜，又發布了一次撤退令。但他們並未將上述任何情報轉達給消防局。消防局的現場指揮官手上沒有空拍資料，無法得知大樓結構已經岌岌可危。等他們終於下令疏散時，對於情況之危急依然渾然不覺，以致於北塔內的員警紛紛沿著樓梯欄杆滑下、連跑帶跳加速逃離時，消防隊員卻還從容不迫地走下樓梯⁴⁰。最後約有一百一十五名消防員不幸喪生。官方調查發

現，該起事件造成大量人員殉職的主因就是缺乏聯繫溝通⁴¹。這並非意味紐約市警察局刻意對消防局隱瞞資訊。反之，這個可悲的例子正好說明，若未制定適當的合作策略，群體內的偏見將導致組織整體的挫敗。

紐約市消防隊的戰鬥力源自面對逆境時所凝聚的兄弟情誼——這種精神就跟綠山男孩、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飛行員及歷史上無數的部隊如出一轍。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言，這群人同甘共苦，歷經生命中某個重大片段，他們的情誼建立在只有彼此知道的共同經歷上。在危急時刻，團隊的向心力最為強大，這一點不言可喻，因為我們把生命託付給同袍，為了自己，自然也會替他們著想，做出利他行為。但這尚不足以解釋這些團體的兄弟情誼為何如此深厚持久，也無法回答下一章所提出的問題：在極端環境中行動的其他團體，例如極地遠征隊和太空人等，為何如此難以預測團隊成員能否和諧共處，以及遇到緊急情況時，他們會如何應對。

美國獨立戰爭結束近一世紀後，綠山男孩原班人馬的後代再度下山，重出江湖——這次他們披上聯邦軍戰袍，投入南北戰爭。跟以前一樣，他們的忠誠毋庸置疑：每次交戰，佛蒙特士兵的殉難人數平均是其他州的兩倍；第一佛蒙特旅的殉難人數是美國陸軍各旅史上最高[5]。

今日，這種犧牲奉獻的精神仍然根深蒂固地留在佛蒙特人的血液裡。雖然開放女性加入已經超過半世紀，該州國民警衛隊依然被稱為「綠山男孩」，其隊旗就是當年美國建國之初，綠山男孩翻山越嶺追逐英軍所攜帶的那面軍旗：左上角藍天綴著十三顆白星，襯著一片理所當然的綠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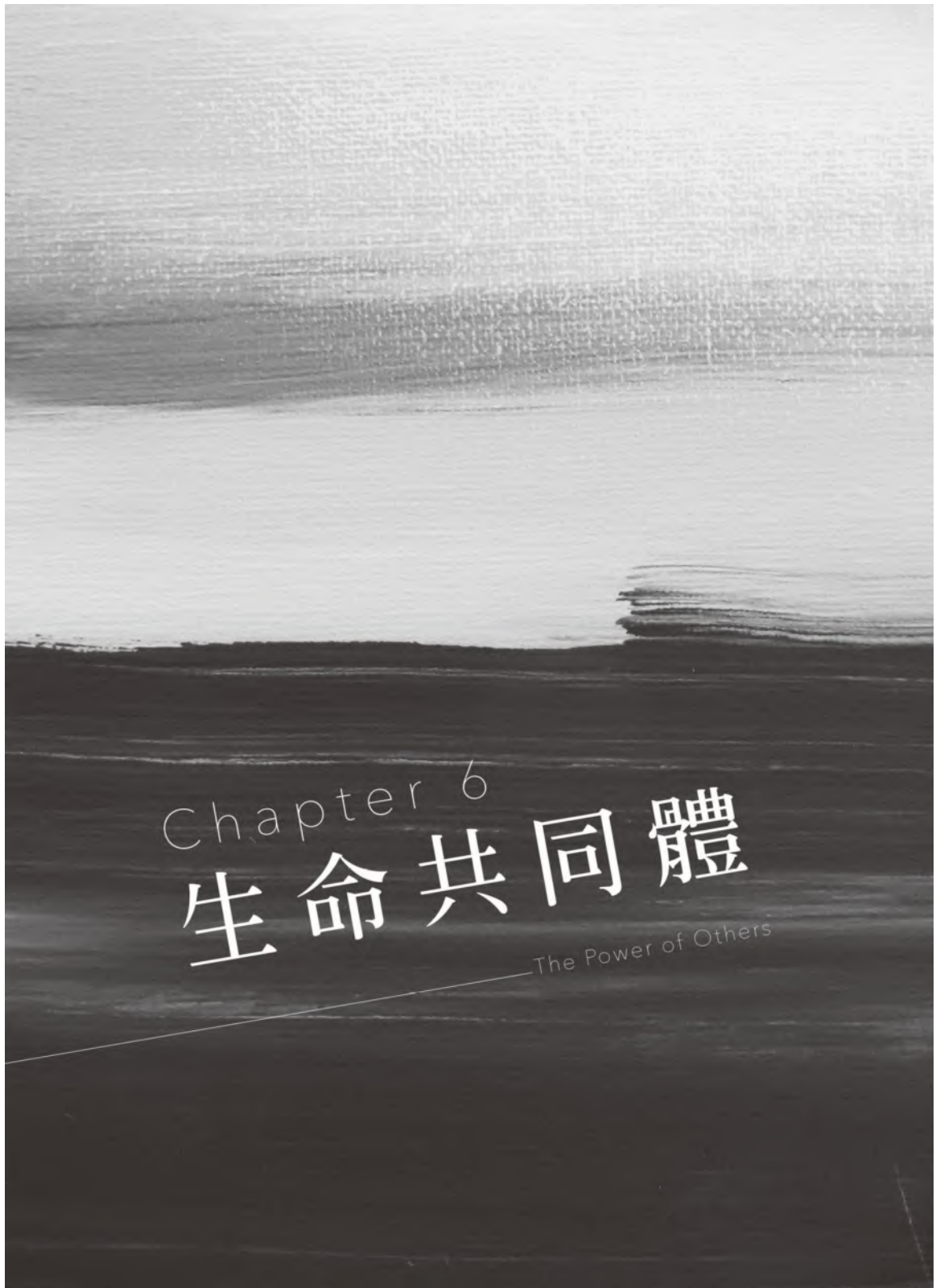
[1] 原註：他和第二任妻子芬妮（Fanny）在這裡住過一陣子。芬妮二十四歲，前夫「剛好」是被艾倫隊友所殺的英國軍官。

[2] 譯註：典故出自《聖經．列王紀上20:28》：「耶和華如此說：『亞蘭人既說我耶和華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將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大意是說亞蘭王率軍出征以色列，欲報一箭之仇，耶和華出手助勢單力薄的以色列打敗亞蘭大軍，在此有「以寡敵眾」並自比為山神的寓意。中文翻譯引自《臺灣聖經網》。

[3] 原註：轟炸時，大多數德軍躲在掩體和坦克中，幸運逃過一劫。我祖父的日記中寫到，他們「接著用穿甲彈幾乎殲滅了整個第七裝甲（師），此後他們再也無法作戰。」一個月後，盟軍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六日全面接管康城。

[4] 原註：十九世紀消防隊之間的競爭有時會演變成大規模的街頭鬥毆，這在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執導的《紐約黑幫》（*Gangs of New York*）中有生動精彩的描繪，儘管其街頭屠殺的血腥場面稍嫌過頭了。

[5] 原註：按規定，聯邦軍各旅係由來自各州的軍團組成，以確保各地傷兵人數平均，不致影響戰力。但唯獨第一佛蒙特旅例外，它完全由佛蒙特州人組成，無怪乎該州傷亡人數如此慘重。光是在一八六四年五月的莽原之役（Battle of the Wilderness）中，就有超過一千二百名民兵喪生。



Chapter 6
生命共同體

The Power of Others

那是在一九九三年的一月初，邁克．斯特勞德（Mike Stroud）和雷諾夫．范恩斯（Ranulph Fiennes）兩人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下，獨自經由南極橫越南極大陸的冒險旅程正走到一半。這是一場艱困無比的極地長征，在這之前從來無人挑戰過。兩個人都是身經百戰的探險老手，對彼此抱持著崇高的敬意。三年前，兩人曾徒步五百英哩（約八〇五公里），穿越北冰洋多變破碎的冰層，在距離北極僅僅一百英哩（約一六一公里）處，為該趟旅程劃下句點。兩人因嚴重營養不良、雪盲及血糖過低而不得不提前止步。後來斯特勞德在他的《荒地黯影》（*Shadows on the Wasteland*）書中寫到：「我們感情非常親密，一路上經歷各種磨難所培養的革命情感，將我們兩人緊緊聯繫在一起，那是一種同甘共苦的成就感，唯一的汙點就是我們的失敗。^{1]}

對於從未踏上極地的我們來說，南極和北極似乎差不多，但對他們而言並非如此。斯特勞德和范恩斯認為，有著廣袤冰原及險惡冰隙的南極大陸是截然不同的挑戰。在面臨未知的情況下，人類的行為會變得反覆無常、難以預測，即使是感情要好的朋友也可能大吃一驚。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第五十四天，斯特勞德出現腹瀉，體力衰弱，不得不停步讓身體休息。范恩斯突然決定拋下他，繼續前進。他對斯特勞德說，他會用無線電呼叫飛機來將他接走，再獨自完成剩下的旅程。那場面就像小學遊戲場上常見的小孩鬧脾氣，斯特勞德的反應是：

我感覺心中升起一股無名火。發自內心，從腳底一路竄升，整個人怒火中燒。過去兩個多月來，我一直走在前面，等這傢伙拖拖拉拉地迎頭趕上。現在他卻一句話就把我踢開，只因為我成了拖油瓶。不過是稍微延誤，他竟敢拿這件事來威脅我？²

斯特勞德後來證實，范恩斯幾乎在第一時間就懊悔不已。他們後來沒有拆夥，繼續完成遠征，友情依然堅定不移。但這次對峙導致兩人關係產生某些變化，至少有段時間是如此。斯特勞德寫到：「我懷疑自己是否能相信他永遠不會重蹈覆轍。³」另一位極地探險家艾瑞克·拉森（Eric Larsen）認為，斯特勞德和范恩斯之所以能長期合作，純粹是因為「和別人相比，他們對彼此的反感沒那麼深」罷了。

發生那件插曲近二十年後，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六日上午，我在南非阿格拉斯號（SA Agulhas）甲板上遇見斯特勞德。這艘經過強化的冰上補給船，是他和范恩斯以及其他隊友為了下一趟看似不可能的任務所購置。這次目標是橫跨長達二千英哩（約三二二〇公里）的南極大陸，在永夜籠罩、低溫可達攝氏零下八十度的極地過冬。這是目前僅存的極地探險賽。當日稍晚，他們將從泰晤士河南岸倫敦塔橋的停泊處出發，踏上范恩斯所誇口的「酷寒遠征」（The Coldest Journey）（這也是該遠征隊的正式隊名）。范恩斯表示，此趟「無疑是史上最偉大、最艱鉅的極地探險。⁴」

當天早晨冷得相當應景，氣溫不到零度卻萬里無雲，在倫敦冬季非常罕見。我和斯特勞德等著記者會開始，屆時遠征隊將會聊起電池發熱衣、金屬在低溫下的作用失靈以及深不可測的冰隙等話題，來引發全球媒體的興趣關注。斯特勞德興致勃勃，戴著方框眼鏡，貌似大學教授，似乎絲毫不受天寒影響。他穿著藍色連帽風衣，看起來足以抵禦遠甚於當下的酷寒低溫。我問他關於一九九三年南極之旅的腹瀉事件，以及之前有一次在北極，他坦承一度非常討厭范恩斯，差點想開槍殺掉他，再把屍體扔進海裡的事⁵。對此，他似乎毫無印象。

「我得回去翻書，重新確認你講的那些內容。我記得的是，雖然我們面臨壓力，而且確實有過幾次非常短暫的情緒失控，但整體而言我們表現得相當出色。」接著他又調皮地說：「我的短期記憶非常差，這

個缺陷正好是讓我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參與這類危險任務的唯一重要心理特質。」

這次的遠征雖然是斯特勞德的想法，但他本人卻未同行。相反地，他同意擔任該隊的醫療及科學顧問。本來他以為會由他和范恩斯獨自滑著雪，沿途仰賴基於策略考量而設置的補給庫的接濟，完成南極大陸的橫斷之旅。現在計畫變更為六人一組，駕駛由兩節獨立金屬守車 [1] 組成，並以特殊改裝、使用飛機燃料（需七千公升）的開拓牌曳引機來牽引的「冰上列車」。就算有這些設備技術，這趟遠征也得花上一年時間才能完成。這對斯特勞德而言太久了，他無法拋下南安普敦大學醫院胃腸科顧問醫師的工作。那麼他對於范恩斯誇大其詞、野心勃勃放話要征服南極的發言有何感想呢？「根本是瘋了。想在那種環境中操作複雜的機器只是自找麻煩。⁶」

范恩斯擁有鋼鐵般的意志力和無比執著的專注，在眾多探險家中享有盛名。這些特質使他成功征服南北極的冰蓋、阿爾卑斯山脈的艾格（Eiger）北峰以及登上聖母峰，儘管往往得克服極端的環境條件，並付出巨大的身體代價（如嚴重凍傷、雪盲和心臟病發作）。酷寒遠征隊的受託人之一，女演員瓊安娜·盧莉（Joanna Lumley）形容他「簡直就是當今世上最可怕的野獸。」斯特勞德稱他「擁有非凡韌性與無比決心。在我見過的人當中，他的行動力無人能及。」

記者會上，范恩斯和遠征隊員坐在臨時搭建的舞臺上，目光如鷹眼般銳利，仔細觀察著臺下觀眾。他身高一百九十三公分，比其他五人整整高出一個頭；六十八歲的他看起來也比他們大上三、四十歲，除了五十四歲的橫渡航海家布萊恩·紐罕（Brian Newham）以外。范恩斯外表帶著貴族氣息，權威專斷，看似有點不耐煩。他大多時候不苟言笑，但臉部表情卻十分豐富：濃密的灰眉毛不斷抽動，彷彿忙著搜尋訊號的天線。他回應提問時面無表情卻不落俗套。談到為什麼要

選在冬天橫越南極，他舉英國與挪威之間存在已久的競爭為例。他說挪威人「認為極區是他們的領地，不容許像英國人那樣的人在那邊鬼混。」我問他屆時隊員必須長時間如此親密地共同生活，有沒有可能融洽相處，他說：「我認為每個人都要把彼此當成自己的老婆對待。你也知道，和老婆相處有兩大守則。第一，讓她認為每次都是她說了算；第二，確定每次都是她說了算。這個答案你滿意嗎？」

我不完全認同他的說法。但後來我又聽到他用有趣的方式巧妙回答了類似問題。有一次他告訴採訪者，他不帶兩種人去南極：一種是戴眼鏡的人，因為他們鏡片起霧時會看不到；另一種是「約克郡人」（Yorkshire people），因為他們個性陰沉而且很愛記仇⁷。

對於研究行為學的人來說，探險家是很值得觀察的類型，特別是因為他們經常得與人性的艱鉅挑戰搏鬥。他們的動機想必十分強烈，一心一意沉迷於個人目標的追求，無論是征服南北極、攀上高峰、打破世界紀錄或寫下個人新猷皆然。他們想成為第一、最快或最厲害的那一個。然而，他們很難靠自己的力量達成，在極端條件的限制下，這就是他們能夠發揮的極限。他們必須同時扮演隊友與獨行俠兩種角色，並且適時切換自如。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玩這種遊戲，雖然在極圈的冰天雪地或高山暴風雪中，一切攸關生死，不可兒戲。遠征途中，關係緊張及意見分歧是司空見慣的事，全隊團結也經常受到鬥爭與內鬨的威脅，絲毫不足為奇。

一九八五年，南極遠征隊「追隨史考特」（In the Footsteps of Scott）發生了一起著名的團隊動力（team dynamics）失敗事件。那年南極冬天，羅伯特．史旺（Robert Swan）團隊（成員包括斯特勞德）在埃文斯角（Cape Evans）紮營，當年羅伯特．法肯．史

考特（Robert Falcon Scott）^[2] 所搭建的小木屋就在前方海灘上。後來，部分隊員沿著史考特的路線抵達極點。這趟遠征的官方日誌記載了每個隊員對於此次經歷的描述，內容卻大相逕庭。以一九八五年四月九日的兩段紀錄為例⁸：

葛瑞．伍德（Gareth Wood）：「我有時候覺得住小木屋很累。感覺我是唯一愛乾淨、會整理內務的人。乾淨的茶巾被當成抹布，什麼都擦，用完就揉成一團堆在架上。難道只有我懂得用毛巾架嗎？」

羅傑．米爾（Roger Mear）：「和我感情最好的大概就是邁可了，他是唯一和我除了遠征以外有共同興趣的人。葛瑞那種樣樣認真的個性最讓我火大，甚至比羅伯特還惹人厭。羅伯特跟我則是互相容忍的關係，因為我們之後勢必還會一同進行任務。」

世界上沒有真正的黃金拍檔。斯特勞德、米爾和伍德三人摸黑冒著零下四十度低溫，徒步跋涉六十英哩（約九十七公里），橫越南極最大的羅斯冰棚（Ross Ice Shelf）來到克羅茲角（Cape Crozier）採集企鵝蛋，內部不合的情況這時卻更加嚴重。他們原先計畫重現當年史考特三人小隊的路線，但希望結果不會像他們那麼可怕：當時史考特的部下回到小屋時，不得不將結凍的外衣剪開，才能順利脫身^[3]。當中有位動物學家艾普斯雷．薛瑞—葛拉德（Apsley Cherry-Garrard）稱之為「世界上最嚴峻的旅程……任何文字都無法形容有多恐怖。」他提到所有人的牙齒都因酷寒而龜裂，皮膚水泡的膿液也隨之凍結。然而，這絲毫未損薛瑞對隊友的欽佩：

他們有如黃金般潔淨，閃耀，純粹。言語不足以形容他們的情誼有多美好。過去那幾天以及接下來的日子，是我認為人

類史上最黑暗嚴峻的考驗，而他們平安生還，卻從未口出輕率或憤怒的惡言⁹。

遺憾的是，同樣的美事沒有發生在斯特勞德三人身上。他們爭執不斷，相互仇視，使得他們迷失方向，差點喪命。這件事讓斯特勞德有預感，接下來的極地行軍將會遭遇「無法挽救的大災難」^[4]。

當情況變得艱難時，遠征隊員完全得依賴彼此的技能與動機才能安全求生。因此，挑選合適的團隊人選可能就是你所做最重要的決定。探險家拉森對此設想很多，甚至與人合著了一篇如何應付極地環境的科學論文¹⁰。二〇一二年十二月，我第一次訪問他，當時他正準備獨自騎單車前往南極。他最擔心的是，一路上就只有單車作伴，該怎麼辦^[5]。但他想起過去好幾次與隊友不合的失敗經驗，彼此欠缺完全契合的目標（例如說，別人真正目的是科學研究，而非征服極點），對方並非發自內心抱持強烈動機（「你必須從心中燃起熊熊烈火，把這股熱情當成動力！」）。又或者，最糟的情況是彼此個性不合。他堅稱：「對我來說，任何條件都比不上個性重要。」在籌組二〇一〇年北極遠征隊時，他甚至對應徵者進行問卷調查，列出五十個問題，希望藉此篩除容易緊張、個性冷漠者，找出真正有自信、友善的人作為隊友。「我的問題包括：他們喜歡吃什麼？是晨型人還是夜型人？覺得什麼事有趣？」那麼結果呢？「不是百分之百準確，但起碼有助我在開始訓練及日後共事時，更瞭解這些人的個性。」

與拉森合撰極端環境論文的是挪威卑爾根大學（University of Bergen）的心理學教授葛若．桑妲（Gro Sandal），過去二十年來一直致力研究在封閉環境或密閉空間工作的探險家與太空人的行為模式。據她表示，她已經歸納出三項維持團體凝聚力（group cohesion）所需的特徵：情緒穩定、強大的交際溝通技巧以及對於共同目標的全心投入¹¹。然而，她也坦言很難從人的個性預測，當他們

一起被困在極圈的冰天雪地，或距離地球兩百英哩（約三二二公里）遠的太空艙裡的時候，會如何自處與合作。桑姐發現，人的行為變化中，有六成無法透過標準的心理計量測驗（psychometric testing）預測得知。這表示雖然拉森的問卷調查或許有助他認識未來隊友的為人，卻無從得知他們成為隊友後會如何相處。

桑姐表示，透過觀察人們在試驗環境中的互動，可以更清楚看出誰能成為合適的團隊成員。例如，在籌備極地行軍的時候，可以讓隊員在寒冷險峻的環境下接受訓練。「人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你必須同時將別人列入考量。」在極端環境中尤其如此。醫療人類學家勞倫斯．帕林卡斯（Lawrence Palinkas）曾在封閉而超乎尋常的地點進行了數十項行為研究，他發現在南極大陸「越冬」（over-winter）的研究人員及科學家，主要會受到身體狀況及社會條件因素的影響，而非人格特質。他認為，心理因應機制（psychological coping mechanism）的運作係「因情境制宜，人在不同社會情境會產生不同的因應機制，不可一概而論。

12」

這種無法預測的環境影響力，更甚於人格個性因素。二〇一二年一月，大西洋奧德賽（Atlantic Odyssey）划船隊的遭遇是少數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極限冒險。這支由英國及愛爾蘭人組成的船隊試圖打破世界紀錄，在三十天內由東向西橫渡大西洋。船長馬修．克勞威爾（Matthew Craughwell）挑選了三位頂尖划船選手及三位經驗豐富的冒險家，每個人都相信這樣的黃金陣容將會充分發揮他們的速度及耐力。他們計畫從頭到尾採取划二小時、休二小時的輪班模式進行，每人每天須消耗一萬二千卡的熱量（幾乎是一般建議標準的五倍）。

這支遠征隊的成員包括二十九歲的蘇格蘭人馬克．博蒙特（Mark Beaumont）。四年前，他打破自行車環遊世界最快的八十一天紀錄。

那趟壯舉中，他一天騎行超過九十英哩（約一四五公里），連續騎了二十八週，毫無間斷。大西洋任務啟航前幾個月，他和另外五人組成划船隊，航越加拿大的北極圈，成功來到一九九六年的地磁北極位置，在這之前都只能徒步抵達。因此他相當瞭解在沒有隊友陪伴、獨自奮戰的情況下該如何保持前進的動力。他說：「你沒有輕言放棄的餘地。」他也受夠了過去組隊遠征的不悅經驗，所以他對於同行隊友的選擇相當挑剔。「出發前填履歷的時候，每個人都能寫出同樣的訓練內容、勾選相同選項，大家資格相當，但這些根本無法說明他們面臨壓力時會如何反應。」

大西洋奧德賽船隊在海上的第二十八天不幸遇上怪浪，造成長達十一公尺的船身翻覆，眾人被拋入海，距離終點巴貝多約五百英哩（約八〇五公里）。他們這時才充分意識到問題有多嚴重。當時他們若沒有及時放下救生艇，大家肯定會滅頂。博蒙特和其他人多次潛入翻覆的船體下方，救回緊急信標、GPS衛星定位追蹤器、衛星電話、淡水和食物。但並非每個人都能即時迅速反應。他事後回想：「有些人被嚇到不知如何反應，還有人連半個字都講不出來，就只是閉上雙眼等死，什麼都不做。當場面陷入混亂、行動失控時，這樣做並非明智之舉。」那個人後來向博蒙特解釋當下情況。「他說：『那種狀況我完全應付不來。我能想到最好的應變方式，就是躲在救生艇上，愈不礙事愈好，閉上眼睛等著一切結束，無論最後是喪命還是幸運得救。』¹³」

斯特勞德深知遠征隊一旦出現內訌，情況會有多危險。然而，身為酷寒遠征隊的醫療顧問，他選擇不採取心理相容性測驗（psychological compatibility test）來篩選成員，因為他認為測驗結果無法代表一切。就在他們一起來到埃文斯角的小屋過冬之前，

他和「追隨史考特」探險計畫的其他四名隊員自願接受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及美國南極計畫（U.S. Antarctic Program）所採用的心理側寫分析。結果「錯得離譜……完全無法看出哪些人不擅長經營人際關係，只有點出潛在問題」，卻也從未發生過。「要預測人的行為，難度相當高，甚至異想天開。」他說。

幾個在南極設有基地的國家會使用一組心理計量測驗作為選才依據，即使這些測驗從未經過科學驗證是否準確。相較之下，英國南極調查局（The British Antarctic Survey，簡稱BAS）卻不採用測驗評估，而選擇以更直觀的方式，透過應徵者的面試表現以及經驗老到的人員判斷來決定合適人選。以團隊和諧為考量來說，儘管面試委員的衡量標準很難以精確的量化數據表示，這項方法似乎相當有效。為此，帕林卡斯和他的研究團隊針對英國南極調查局一七七名合格的候選人，進行了其他南極組織所使用的心理測驗，檢視這些數據是否與面試委員的判斷相符。結果發現兩者關聯性微乎其微。這顯示，英國南極調查局認為，在南極越冬所需具備的相關特質無法以心理計量測驗衡量，或起碼，目前尚未找出合適的測驗方法¹⁴。



圖七、酷寒遠征隊在南極大陸上的作業實況。

斯特勞德也贊成用直覺判斷。他相信與范恩斯同行的五名隊友都是隨和且適應力強的人，此趟遠征理當會相處愉快。我想他們應該也符合范恩斯大致上的要求，「個性平和溫順，毫無惡意；順利成功時不會得意忘形，受挫失敗也不會沮喪失志。¹⁵」當然，隊上沒有半個人戴眼鏡，更沒有約克郡人。儘管如此，斯特勞德還是認為「情況可能會徹底失控，因為那是相當高壓的環境，從過去極地探險的歷史教訓可以得知，一小群人被關在小屋子裡，一定會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爭執。」

從團隊內部的社會動力（social dynamics）^[6] 及與世隔絕的外在環境條件——極度封閉、險峻惡劣、錯亂的日夜循環、毫無救援可能——來看，與其說酷寒遠征隊的壯舉是一場地球朝聖之旅，本質上其實更近似太空探險。但斯特勞德仍未放棄研究的可能，他正在進行一項名為「白色火星」（White Mars project）的長期計畫，研究極端環境條件對於人類生理和心理的影響，美國太空總署及其他太空機構也密切關注。心理健康（mental well-being）與團隊凝聚力被認為是最有可能破壞，甚至終止太空探索任務的頭號風險因素。

為了瞭解某些行為和心理上的未知因素，俄羅斯生物醫學研究所（The Russian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Problems）及歐洲太空總署（European Space Agency）合作，於二〇一〇年六月三日進行了一項模擬火星任務，將六名「太空人」關在莫斯科附近的一艘模擬太空梭內長達五百二十天，觀察他們的適應情形。到了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四日，實驗告一段落，太空艙門重新開啟。研究團隊透過長期觀測蒐集到大量資料，研究出處於長期封閉的環境下，對於睡眠和清醒的週期、壓力程度、情緒穩定性、孤獨感、警覺性、認知表現及動機的影響。

例如，他們注意到隨著任務進行，太空人變得愈來愈不愛動，到最後他們睡眠和休息的時間比起剛開始平均多了一小時。六名成員中，有二人的睡眠模式出現異常失調，以至於任務全程有超過百分之二十的時間，當大家清醒時，他們其中會有一人陷入昏睡，反之亦然。賓州大學教授大衛．丁吉斯（David Dinges）專門研究睡眠不足對於認知及行為的影響，同時也是該計畫的共同研究者。他提出警告，這種作息不和諧可能會破壞團隊在長途太空任務期間的協調合作¹⁶。

更令人憂心的是，太空人的孤獨感似乎對他們的認知能力產生顯著影響。平均而言，這種孤獨感在前六個月呈現上升趨勢（儘管個別差異懸殊），之後才逐漸消退。他們愈感到孤獨，在執行研究團隊指派的各項計數任務時，表現就愈差。研究團隊召集人，義大利羅馬大學（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教授貝娜黛．范．芭珊（Bernadette van Baarsen）認為，認知障礙——例如反應時間變慢——可能會造成太空任務執行上的問題，特別是在面臨緊急狀況，太空人可能只有幾秒鐘能反應的情況下。但她也強調，一切要等真正出任務，測試實際表現後才能確定。「火星五百二十天模擬計畫堪稱逼真，但終究不是真正的任務。隊員們知道他們人還在莫斯科的太空艙裡。」她表示，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他們必須與彼此及地面基地人員保持良好的交際互動，溝通順暢無阻。溝通不良確實會對任務安全造成威脅。^{17]}

儘管團隊成員（包括三名俄國人，法國人、義大利人及中國人各一名）必須處於長期的孤立狀態及嚴密的封閉環境，並面對多元文化背景可能導致的衝突，整個團隊在模擬研究中並未產生激烈的分裂不合，成員間也未出現嚴重對立。然而，真正的火星任務可能會帶來截然不同、實驗模擬不來的心理挑戰。例如，太空團隊必須獨自在外太

空度過三年，期間完全只能自食其力；船上與地球的一切通訊都會慢上半小時，還得眼睜睜看著象徵家鄉的地球離自己愈來愈遠，縮成一個毫不起眼的小點，體驗到何謂完全與世隔絕。斯特勞德質疑火星實驗能否成功克服這些挑戰，因為他說，這些太空人——

基本上就只是被關在停車場的箱子裡。從心理上來說，感覺完全不一樣。萬一有什麼問題，搞不好他們還能去醫院。但在南極不可能。如此嚴峻的環境，任何危及性命的威脅都是來真的。受傷或產生心理壓力的機率更高。在我看來，我的計畫遠比它真實多了¹⁸。

在他的白色火星計畫中，斯特勞德以極地探索取代太空旅行。以酷寒遠征隊來說，結果或許還算準確，但大多極地探險隊則不然。極地徒步探險家必須相當獨立、自立自強，但未必要擅長溝通。他們只有在吃飯、紮營或討論戰略時才會與同伴熟絡交好——不像太空人，他們大多時間都膩在一起。若探險者本身動機強烈、意念執著，意味著往往不太可能成為典型的團隊成員，這對他們而言也未嘗不是好事。這樣一來，這種相處模式就彷彿自動抽選機制：渴望持續得到他人關注或強調秩序的人，不太會來應徵這種必須花上兩個月在冰天雪地長途跋涉的苦差事。任務本身的社交限制及設備故障的高度風險，很快地會讓這種樂群的人格特質成為一種障礙。但從另一方面來看，要是換成和大家關在金屬機艙裡長達一年半，反而會變成優點。

一九九三年，記者芮貝卡·史蒂芬斯（Rebecca Stephens）以三十五歲之齡，成為第一位登上聖母峰的英國女性。她不只了解到，要完成這看似不可能的目標需要哪些條件，同時也體認到身為團隊一員的好處。她深信，光靠一己之力是無法登頂的。下山途中，她感覺到

同伴們一路上始終扮演著她的心靈支柱，支撐她橫越冰瀑與布滿冰隙的崎嶇險地，在缺氧時給她新鮮空氣。

她提到在兩位雪巴嚮導安帕桑（Ang Passang）和卡米．切林（Kami Tchering）陪伴下，最後一鼓作氣，終於成功登頂的情景：

我們三人合作無間，帶來相當實用的優勢。例如，我們可以輪流擔任領隊，為後方的人在積雪中踩出水桶大的深坑，進而減少他們的體力負擔。但最重要也最難忘的是我們對彼此產生的心理影響力。因為這攸關我們三人不是同生就是共死，領隊不能自顧自地前進，後面的人能否跟上，就和自己的行進同樣重要。大家不分你我，彼此關心……他們的身影是激發我前進的動力。每當我落後時，只要瞄一眼前方兩人的背影，就有了堅持下去的力量，因為我不想讓他們失望，也不想讓自己失望。記得當初爬上東南稜（Southeast Ridge）的高點時，我們三人不分你我，融為一體，彷彿被無形的繩索給緊緊栓在一起¹⁹。

在競爭白熱化、陽剛味十足的當代登山界，這種革命情感就像二萬九千英呎（約八八四〇公尺）高山上平靜無風的日子一樣罕見。

時隔二十年，史蒂芬斯回顧這項壯舉，表示自己在聖母峰的經驗以及在山上感受到休戚與共的患難情感，徹底改變了她對人類相互依存的心態與看法。「以前，我會堅決強調自己是獨立的個體，但這一切只是妄想。我的人生和家人、朋友、同事密不可分。少了他們，我可能無法獨自走到今天。」

她這番話讓人想起薛瑞一葛拉德描述他在一九一一年冬天在南極度過「世界上最嚴峻旅程」的經歷。他寫到，當時探險隊面臨到種種

困境，讓成員們建立起親密的革命情感。「這些朋友比穆罕默德口中的樂園裡任何一位妻子更值得依賴。」「給我南極探險的老隊友，友情歷久彌新，壯志理想不減當年，自信可以征服全世界。²⁰」這種延續愛德華時代^[7]風格，與夥伴同甘共苦、樂在其中的團隊精神，在翌年遭遇生死關頭時面臨考驗：當時薛瑞—葛拉德的兩位同伴與羅伯特．史考特，在探險途中不幸於極地冰蓋的營地內殉難^[8]。但他們的情感依然至死不渝。史考特在臨死前幾小時所寫的遺書中，向他的作家兼劇作家好友，詹姆斯．馬修．巴里（James Matthew Barrie）描述眼前的「絕境——雙腳凍結、沒有燃油，糧食短缺。但你能來到我們營帳，聽我們一起唱歌、歡笑暢談，想必你也會感到相當開心。²¹」

這就是探險最單純與最美麗之處，大家齊心協力、生死與共，個人的雄心壯志只是諸多動機之一，但非主要推手，當然也不是最重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登山家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和其他英國登山名人一次又一次試圖征服殘酷無情的聖母峰——他口中那座「彷彿地獄，酷寒又凶險的高山」——感受到肩上背負著整個大英帝國的期待²²。人類學家韋德．戴維斯（Wade Davis）在其著作《走進寂靜》（*Into the Silence*）一書中，詳細介紹了一九二〇年代人類挑戰聖母峰的歷史，描繪了諸多登山家的身影。他認為，這些人的動機，是為了忘卻戰時壕溝的恐怖經歷。「一場不知從何而起的戰爭，徹底毀了一個世代，結束後留下一片孤絕的荒地。每個人只能獨自面對，走出這段悲慘惡夢。²³」唯獨在高山上，他們絕不孤單。

如果歷史上的確存在更多這種崇高志業的黃金年代——顯然馬洛里就和其他狂人一樣，爭相成為登上世界高峰的第一人——不少登山家會相信，如此無私的理想在今日已不復當年。現代大多數的聖母峰

遠征隊係由一群截然不同的人士組成，每個人的背景、動機、能力及體能各異，其中許多人根本素不相識，更別說一起登山了。他們可能會花好幾萬美元聘請一位有經驗的嚮導帶他們上山，協助大家順利攻頂（或至少平安生還）。「但這不意味他們無法建立革命情感。」史蒂芬斯如此說道：

我在山上只遇到雪巴人，我們建立起一股強烈的團結情感，當然，沒有他們，我是絕對不可能成功攻頂的。但可以輕易想見的是，要是對一個人認識不夠深，遇到狀況時可能無法急遽湧出如此強大的情感力量來助你渡過難關；而我也聽過一個說法，爬上八千英尺後，接下來就是自己的事了——順便告訴你，這個觀點我並不同意。

一九九六年五月，聖母峰發生八人在二十四小時內接連喪生的不幸事件，其中包括三名經驗豐富的嚮導，揭露了現代登山隊缺乏團結可能導致的致命後果。事後，這場意外歸咎於兩個原因：突如其來的暴風雪來襲，當時山上還有許多登山客；加上那天還有隸屬好幾個不同探險隊的人企圖登頂，人數高達三十四人，根本不成比例。在那種個人獨立作業的環境中，幾乎沒有團隊合作的餘地，正如倖存者強·克拉庫爾（Jon Krakauer）回顧這場災難時表示：

在這個被上帝遺棄的角落，我有種與周圍的登山者脫節的感覺，無論是感情、精神或生理等各方面皆然，程度之強烈，在我的遠征經驗中前所未見。我這才體認到，我們的團隊只是虛有其表，對此我感到非常難過。雖然再過幾小時我們就要離開營地，整隊出發，但我們只會各爬各的，身上不綁繩子也不建立深厚的團隊忠誠。每個人幾乎都是為了自己而爬。我也不例外，比方說，我雖然衷心希望道格能夠登頂，但如果他中途放棄，我會竭盡所能，繼續往前邁進²⁴。

團結聽起來顯然是種相當可取的特質，是所有群體都應該努力追求的主臬準則。然而，它有時卻會導致相當嚴重的後果，造成扭曲的決策過程，稱之為「**團體迷思**」。因為團結會帶來愉悅的感受——強化個人自尊，感覺充滿力量——使得眾人產生強烈動機，不惜犧牲一切也要維護群體向心力。因此，大家往往不願發表可能危害群體共識的意見或分享相關資訊。他們刻意避免提出異議，但此舉的確是種相當危險的情況。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厄文·詹尼斯在四十多年前首創「團體迷思」一詞，他形容這是一種「心理效力、現實檢驗以及道德判斷的退化」，源自必須遵從群體規範所造成的壓力²⁵。他最早發現這種奇怪現象，是在美國戒癮門診進行研究，接觸重度菸癮病患的時候。他注意到，隨著療程進行，小組成員會互相施壓，增加他們每天的抽菸量。目的顯然是為了凝聚團結以拖延治療期程，不想面對大家各分東西的日子到來。其中一組，有派人馬甚至大言不慚胡扯，宣稱重度菸癮根本無法可治，大幅減少他們每天的菸量只是白費力氣。**團體內**任何人只要提出反對意見都會被排擠。詹尼斯曾試圖解釋，他們誤解了整個治療計畫的重點，不是要限制他們抽菸，而是要協助他們早點減輕菸癮，但眾人卻無視這番說明。對他們而言，群體團結遠比自己的健康重要²⁶。

戒癮治療的動力似乎與探險家所需的極端動機相去甚遠。然而，無論任何方面，群體在追求和諧時，都會面臨團體迷思的風險：因為擔心惹出麻煩，會讓人在看到問題日益嚴重時，往往選擇噤聲。近來，這種心態造成了幾次商界的重挫。例如，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控股公司的前員工在該公司於二〇〇八年宣布破產前聲稱，其執行長理查·傅德（Richard Fuld）所推動的

內部效忠文化幾乎斷絕了員工表達不同意見的可能。在他掌舵的十四年內，傅德將原本分裂不合的公司打造成一派和諧的職場，但這並非好事。領導階層看不見公司運作明顯的失能徵兆，也未能向同事點出這些跡象，因為他們一心只想著迎合別人或上司。這就是Google執行董事長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說過，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極力避免的情況。「我在開會時一直試圖找出那些沒有發言的人，他們往往抱持不同意見卻不敢說出口。我讓他們說出心裡真正的想法，這樣一來才能激發討論，做出正確決定。²⁷」

團體迷思在辦公室會議、市政廳委員會、教區議會及學校董事會等場合亦發揮同樣作用，就連在一向採取嚴謹分明的決策流程、力求判決公正的陪審團，這股影響力也明顯可見，連法官也難以倖免。針對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的三人司法合議庭的種種研究顯示，三位法官中若有兩人是共和黨員，由民主黨總統任命的法官在投票時可能會更保守²⁸。這種從眾傾向與心理學者艾許在一九五〇年代的線段實驗所注意到的現象相似，成因包括缺乏公開討論，以及社會敏感度（social sensitivity）的影響：批評某種觀念思想意味著批評它所代表的個體，對於重視自己在群體中如何立足的人來說，這是一種高風險的策略。

團體迷思所引發的災難中，最受關注的就是美國哥倫比亞號太空梭的失事。二〇〇三年二月一日，該太空梭在返回地面途中，於德州上空爆炸，造成機上七名太空人全數罹難。造成這起意外的直接原因是在太空梭升空時，從外部燃料箱脫落的一片隔熱泡棉片，毀損了機體的遮熱板。美國太空總署本來可以趁太空梭還在軌道上運行時及時修正問題，但在這十六天中，飛行管理小組的會議紀錄顯示當局極度抗拒考量可能發生的最壞情形。當時該局還瀰漫著當代流行的成功主義文化，考慮技術風險時，必須衡量政治及經濟方面的後果，沒有

人願意當唱反調的烏鴉，提出隔熱泡棉可能就是造成機翼損毀的原因來質疑現狀。一份報告指出，該小組「幾乎不」允許不同意見有被討論的空間²⁹。例如，管理人員知道泡棉擊中了機翼，卻拒絕安排拍攝衛星影像進一步調查，甚至拒絕外界專家查看衛星照片的要求。

[1]. 譯註：載貨火車最後一節車廂，為車務員專用。

[2]. 譯註：二十世紀初的知名英國探險家，於一九一一年率領遠征隊前往探索南極大陸並進行科研任務，目的之一是尋找化石及科學證據。

[3]. 原註：一九一一年探險隊採集到的三顆國王企鵝蛋目前保存在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列為館藏。

[4]. 原註：見米爾與史旺合著的《追隨史考特》（*In the Footsteps of Scott*）南極日誌紀實。儘管史旺、米爾及伍德等人彼此滿腹牢騷，他們最終還是於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成功抵達南極極點，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下，成為當時路程最遠的極地長征。

[5]. 原註：後來他遭遇極地強風和雪堆阻撓，行進速度延宕，不得不折返，否則在抵達極點前，勢必會彈盡糧絕。見網站：www.ericlarsenexplore.com。

[6]. 譯註：指團體內由個體成員之間互動所產生的群體行為。

[7]. 譯註：指一九〇一至一九一〇年，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在位時期。

[8]. 原註：兩人分別是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Wilson）和亨利．鮑爾斯（Henry Bowers），另外兩名隊員艾德格．埃文斯（Edgar Evans）及勞倫斯．奧茨（Lawrence Oates）在這之前早已喪生。



如何避免組織 產生團體迷思

首創「團體迷思」一詞的心理學家厄文·詹尼斯列出八大徵狀，每一項都顯示該群體可能面臨盲目遵從內部規範，進而破壞決策過程的風險。組織若出現以下任何一種狀況，代表可能要重新檢討運作方式：

1. 大多數或所有成員都幻想自己無懈可擊，造成過度樂觀，鼓勵承擔極端風險。
2. 對於群體本身的道德規範堅信不移。
3. 有志一同地忽略警訊或者任何可能使成員不得不重新檢視其臆測的資訊。
4. 對於敵方領導者抱持刻板印象，認為對方不懷好意，無法擔保具備協商談判的誠意。
5. 一旦對於顯而易見的群體共識產生懷疑，成員之間傾向自我審查。
6. 由於實施自我審查或將沉默錯誤解讀成同意，普遍抱持全體意見一致的錯覺，而無視符合多數人觀點的判斷。
7. 成員只要對群體任何信念發表強烈的反對意見，就會被直接施壓。
8. 有成員自詡為「思想警衛」，將保護群體、杜絕不利的負面資訊視為己任。

來源：改編自厄文·詹尼斯《團體迷思：政策決定及失敗的心理學研究》（*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Houghton Mifflin, 1982），pp. 174-5.

另一種群體效應就和團體迷思同樣危險且無所不在，那就是人們在追求團結時，他們的想法往往會變得比一開始更極端。一群本來溫和批評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稅收前景的共和黨員，經過半小時和善的討論後，最後會堅信茶黨的政策是瘋狂而荒唐的；某個垂死掙扎的足球俱樂部，死忠球迷只要窩在酒吧的小角落裡，就能讓彼此相信球隊一定會在賽季最後稱王；有種族歧視的人遇到同類，聊過之後，他們的偏見會更根深蒂固。企業高層開會時，只會考慮他們喜歡的行銷策略並進一步提高預算，卻無視外界眼裡顯而易見的風險。

造成極端分化的原因有二：第一、當你處在同溫層之中，身邊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你只會聽到支持自己觀點的言論，而這些言論將會強化你的想法。第二、我們總是會拿自己與別人相比，而為了避免失禮，往往會轉換立場。同樣的思維亦見於所謂的「風險轉移」（risky shift）現象。以容易做出風險行為的青少年為例，他們與同儕相處時，更容易不顧風險而魯莽行事。青少年特別容易受到這種思維影響，因為他們相當重視社會酬賞（例如朋友對他們的尊敬），而且對於負面後果往往視而不見。隨著他們與同齡朋友相處愈來愈久，會養成對社會判斷（social judgement）的強烈敏銳度。費城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心理學者勞倫斯．史坦伯格（Laurence Steinberg）所主持的實驗完美說明了這一點³⁰。他透過功能性磁共振造影觀察成人與青少年在玩模擬賽車遊戲時，大腦的活動情形。結果顯示，青少年開車的習慣比成人來得更魯莽，例如他們在號誌即將轉換時會猛踩油門加速，這時他們如果以為朋

友就在隔壁房間觀看自己表現，大腦內的「報償系統」活動量也會隨之增加³¹。

哈佛大學法律專家凱斯．桑思坦（Cass Sunstein），同時也是暢銷書《推出你的影響力》（*Nudge*）作者之一，比任何人更積極，想讓政府注意到群體分化的危險性。身為歐巴馬總統的顧問，他更是當仁不讓。桑思坦於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二年擔任白宮資訊與法規事務辦公室主任期間，試著將行為經濟學的觀念引入企業、社會及環境等相關法規內。他在《極端的人群》（*Going to Extremes*）一書中提出警告，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對極端分化的思維有所警覺，因為它正在我們周遭發生。

「舉凡我們的經濟決策、對鄰居的評價，甚至有關食衣住行等種種選擇的決定，它都無所不在。³³」分化思維就像團體迷思，主要是種依情況制宜的現象，與個人特質無關。無論總裁或辦公室職員都同樣容易陷入窠臼。最嚴重的情況，可能導致無政府狀態與恐怖事件，許多激進的基本教義派團體，最初就是由一群偏離主流社會路線或心理思維的同路人發展而成。

桑思坦最喜歡舉聰明人為例，即使是最精明睿智的思想家，也難逃群體分化的影響，例如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的法官充滿意識型態偏見的決策結果。我們已經確定（這同樣得歸功於桑思坦），當司法合議庭中，持不同政治主張的人數多過另一方時，這些法官很容易產生團體迷思。事實也證明，當他們遇到政治主張相同的法官，會表現出更明顯的偏見。全由共和黨員組成的合議庭會表達明顯保守的意見。同理，全是民主黨員的合議庭則顯然自由開放。以同志人權案件來說，桑思坦發

現，整體而言，共和黨任命的法官在審理過程中有百分之十六的機率會投下同情票，民主黨則是百分之五十七。但在意識形態單純一致的合議庭中，共和黨贊成票的比率只有百分之十四，民主黨則是百分之百³⁴。

極端分化的意識形態已經成為美國政治生態中令人擔憂的特徵（其他由少數政黨把持的西方式民主國家中，這種現象也日益明顯）。這就像一臺社會離心機，相互競爭的利益團體會被甩離中間地帶，使得團結的希望更顯渺茫。自從一九九二年蓋洛普民意調查（Gallup Poll）開始調查美國的意識形態以來，自稱「溫和派」的人口比例呈現穩定下降趨勢，從百分之四十三減少至百分之三十五，光譜兩端偏向極端保守或自由的比例愈來愈高³⁵。在人口的地理分布上也呈現相同趨勢：在總統大選中，當選人得票率超過六成的「選票懸殊」（landslide）地區人口從一九七六年的百分之二十六點八一路攀升，二〇〇八年成長至百分之四十七點六，二〇一二年則高達百分之五十二點二³⁶。同時，在英國和歐洲，民眾亦愈發體認到，三十年來政治上對於多元文化的支持——即不同文化與種族能夠以自己選擇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聲音——並未帶來人們所期待的社會凝聚力，反而導致破碎不全的多樣性，造成各自孤立的團體以質疑的眼光彼此看待。

為什麼這種趨勢會走向極端呢？儘管各種社會變遷（如交通基礎建設改善、通訊技術進步及購屋置產機會增加）大大促進了人們的移動性，使他們更容易擇地而居，與擁有共同道德及政治價值的人為鄰，這依然很難解釋。而在虛擬世界中，情

況更是如此。網路長久以來被稱為實現社會平權的場域，網路世界中，人人平等。但事實上，透過網路，我們得以與同溫層的人交好，其觀點與偏見照映出自己的傾向。正如桑思坦所言，網路讓我們聽見自己的觀點有「更多、更響亮」的聲音³⁷，進而將我們深深禁錮在意識形態的城堡中³⁸。有線電視亦同，提供閱聽者愈來愈多偏頗的新聞頻道³⁹。以上種種現象都不利促進社會和諧。追求中道必須有所互動，健全的民主需要的是一種可以包容異己的寬容文化 [\[9\]](#)。

我們不應害怕控制與生俱來的群性，任何時候面臨團體迷思和極端分化造成阻礙發展卻又無可避免的影響時，也要勇於起身對抗，無論在委員會、學校董事會、工作小組、運動團隊、政府委員會、法庭、教會、兄弟會、政黨、監管機關或公司董事會等場合皆然。在當今充斥各種社會飛地（social enclave）[\[10\]](#) 的時代，我們面對共識應謹慎小心，三緘其口，並且鼓勵打破成規，勇於反抗。我相當贊同美國政治活躍人士，自稱「神話終結者」的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的建議：「即使愛國主義常常被流氓當成尋求庇護的藉口，反對、叛亂、到處惹事生非才是愛國分子真正的義務。⁴⁰」

團結的危害在任何為了達成共同目標而奮鬥的群體中可見一斑，無論極地探險家還是華爾街高層皆然。然而，團隊合作的好處往往遠勝過它的風險，這在體育運動中特別顯著，原因在於比賽規則、每個隊員的角色能力以及團隊目標都相當明確，促成了隊員間的高度合作。美國新罕布夏大學管理專家安

東尼·佩斯科索利多（Anthony Pescosolido）表示：「在一個編制得宜的團隊中，團結能夠促進隊友之間的信任、溝通、關心及互助行為，這些都有助於提昇整體表現。⁴²」將時間拉長來看，效果最為顯著，他補充說道。「團隊成員合作時間愈長，就愈能夠發展出明確、既定且運作順暢的常規和專業角色分工。這就像電影中乏善可陳的橋段套路，運動隊伍中幾名隊員在某個福至心靈的時刻突然開竅，大夥熱血相擁後走出更衣室，演出一場大逆轉，跌破眾人眼鏡。這一切都只是電影的陳腔濫調。」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全明星球隊在單場比賽中的表現往往不如預期，以及為什麼剛簽下許多新球員的球隊，在足球賽季一開始時會讓球迷看得如此痛苦。即使球員個個天賦異稟、身懷絕技，卻還是無法彌補缺乏團結的硬傷。

[9] 原註：你可能會認為，只要強迫對立的團體打破藩籬、交流懇談，就能減少極端分化的發生，促使人們接納彼此的觀點。但若雙方堅持己見，立場強硬，這種狀況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矯枉過正只會深化對峙。這時候就須要改變策略。在耶魯大學法學院主持文化認知研究計畫的學者丹·戈恩（Dan Kahan）等人發現，如果人們能夠設身處地站在對立者的角度思考，例如有共同的價值觀、忠誠觀或文化世界觀，他們很少會否定對方提出的矛盾資訊（見網站：www.culturalcognition.net）。這時，傳遞訊息的人比訊息本身更重要：對方若非我方社群團體的自己人，就算論點再怎麼精確合理，都不會被接納。

[10] 譯註：「飛地」（enclave）概念源自人文地理，意指在某個地理區境內有一塊隸屬於他地的區域，現在也被廣泛用於社會科學，描述明顯不同於周遭地區、國家、政治、社會文化的特徵。在此指不同立場的社會群體。



創意工廠： 腦力激盪

美國廣告大師亞歷克斯·奧斯本（Alex Osborn）於一九八四年首創「腦力激盪」（brainstorm）一詞來描述他解決創意靈感短缺的團隊方法。從那之後，心理學家便不斷爭論這套方法是否真的有效。然而，這並未影響它在廣告、媒體及其他創意產業中受歡迎的程度。「腦力激盪」至今仍被視為激發創意時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那麼，成效究竟如何呢？傳統腦力激盪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團體討論過程中某些常見的順從效應，例如不敢跳脫多數人觀點的思考。團隊成員被召集起來，鼓勵他們主動提出所有想得到的點子，並自由聯想，不用擔心會受到任何評價、批評或負面反饋。就想法的數量和品質而言，眾人集思廣益的效果比正式或分層小組討論來得高。問題是，它的成效又不如大家各自獨立發想，最後再將成果匯集起來的作法來得好。

這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大家依序提出想法，在等待發言機會的過程中，很容易失去靈感，忘記自己要講什麼；第二、即使知道自己不會被公開批評，許多人依然不敢拋開束縛，自由參與小組討論——他們還是無法擺脫社會焦慮的影響。第三、聽到別人的想法會對該內容產生某種固化的認知，打斷自身的創意思緒。

另一種解決方法是將腦力激盪的討論分為兩個階段：首先，一開始介紹基本規則，強調人人皆可自由聯想且不受（自我）批評，接著再讓團隊成員自行發想。最後整合眾人想法，公開討論——必要時可匿名——再進一步分組集思廣益，每隔幾分鐘稍事休息，以免參與者對於討論內容產生根深蒂固的印象。或許還可以再增加第三階段，打破基本規則，鼓勵大家進行批判與辯論——這是激發創意思考相當重要的手段。這項作法聽起來也許相當耗力，但在無從瞭解個別成員在群體中會如何表現的情況下，應該有助發揮大家所長。

此外還可以選擇電子腦力激盪法（electronic brainstorming），亦即透過電腦連線或社群媒體平臺，每個人以匿名方式構思及分享創意。這樣一來就能參考別人想法，從中獲得靈感而不必顧慮面對面的尷尬，導致有所顧忌。幾項研究證明這種作法相當有效：透過螢幕各自分享想法，比大家圍坐在桌邊討論要容易得多，也更能引起興趣。⁴¹

即便是休閒娛樂，例如騎自行車或登山等以追求個人卓越為主要動力的活動，團結亦能為團隊創造優勢。公路自行車競賽仰賴出色的個人表現及努力，但要贏得像環法自行車賽這樣的大型賽事，則必須靠團隊合作，因為得有隊友在前方開路，為後方的人提供遮蔽，才能創造巨大的物理優勢。力量與速度呈現的是一種立方關係，意即自行車手若想让速度加倍，就得使出八倍的力氣。速度愈快，要提升車速就愈耗力。但若跟著前方車手，利用牽引氣流效應，則能節省約百分之四十的踩踏動能而保持車速不變。像布萊德利．威金斯（Bradley Wiggins）這樣的頂尖車手在比賽時，由隊友騎在他前後及兩側，以他為車隊中心前進，這時他身上的風阻最小，省力功效可達到百分之六十，如此一來就能貯備充分體力，伺機衝刺。隊員彼此配合得天衣無縫，懂得利用物理力學原理，才能造就最成功的車隊。

這種戰術需要隊友做出相當大的犧牲，他們必須騎在前面開路，為最強的隊員擋風，減少風阻；這樣做很耗費體力，同時也葬送自己獲勝的機會。例如克里斯．弗魯姆（Chris Froome）在二〇一二年的環法自行車賽中，全力支援威金斯，但許多自行車迷認為他更有實力，本來可以親自穿上象徵冠軍榮譽的黃衫（翌年換他奪冠）。運動生理學家理查．戴維森（Richard Davison）以前也是自行車手，他花了二十年研究有哪些因素會影響選手表現，目前正協助培訓英國新一代的自行車教練。戴維森表示，明白自己傾盡全力幫助隊友，推對方一把，讓他遙遙領先，可以彰顯自我犧牲的價值，使之變得更有

意義。「你在車隊前方奮戰，遠遠超出自己能負荷的極限，但這都是為了讓團隊好。身為隊員只有兩種選擇，不是扯大家後腿，就是幫領先者創造優勢，讓他們展現實力、贏得比賽。這樣才算克盡你的職責角色。」

但社會動力對於自行車選手表現的影響層面不只如此。心理學家諾曼・崔比特（Norman Triplett）於一八九八年在《美國心理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發表專文⁴³，被譽為社會心理學研究之濫觴。該研究顯示，美國自行車手在有競爭對手及配速車隊在旁兩種情況下的表現，每英哩平均車速比獨自騎行者分別快了百分之二十三及二十六。光是他人的存在似乎就能發揮顯著的激勵作用 [\[11\]](#)。

酷寒遠征隊於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日抵達南極洲，很快地，他們應驗了斯特勞德最不願面對的預測。一個月後，范恩斯脫下手套修補雪板固定器，左手指因此凍傷。他為了動手術，搭乘入冬前最後一班飛機離開南極。另外五人則繼續旅程，到了六月中旬，他們好不容易撐過惡劣的天候，破天荒開著重達二十五噸的冰上列車駛過危險重重的廣大冰隙地形，最後卻決定放棄遠征極點，選擇在冰上紮營度過接下來的四個月，等春天來臨，天色夠亮時再安全撤退。就心理層面上而言，這項遠征計畫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還更接近太空旅行。「處於長期黑暗和幽閉恐懼的狀態下，壓力會變得非常明顯。」斯特勞德如此預測⁴⁴。

由於白色火星計畫的資料尚未公布，外界無法確切得知遠征隊後續的發展，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內部的團結在那四個月內差點分崩離析。個性上的衝突和意料外的行為問題導致團隊內部出現嚴重分歧。一行人於十一月下旬返回英國，幾週後接受電話採訪，隨隊醫師羅伯．蘭伯特（Rob Lambert）認為該遠征隊的前景堪憂。「我根本不會把我們這些人稱為團隊。」他說：

我們這群人，每個人去南極的動機都大不相同，對於未來遭遇的想像也大相逕庭。這趟旅程讓我大開眼界，見識到人在離開正常環境時會做出什麼舉動反應。若非親眼目睹，我大概不會相信。原因之一是我們身處的環境，另外就是來自同儕的壓力。翻閱我的日記，會發現我用了非常多次「遊樂場」（playground）這個詞來形容這次遠征，因為根本就是如此，年紀大的小孩對年紀小的百般刁難，不斷找碴。你根本想不到在二、三十歲的成年人身上也會發生這種情況，實在相當令人厭惡。

南極專家通常把南極稱為「心理放大鏡」，因為只要在那裡待上一段時間，就會突顯出人們性格的某些層面。內向的人更內斂，外向的人更外放。蘭伯特認為這就是酷寒遠征隊遭遇的問題之一。他和接替范恩斯擔任隊長的紐罕都認為隊員遴選過程不夠嚴謹，甚至在出發前，遠征隊內部就出現了矛盾。

「有些傢伙和其他人處不來，」紐罕透露，「但我們有共同目標（橫越南極大陸），相較之下這問題就顯得沒那麼重要，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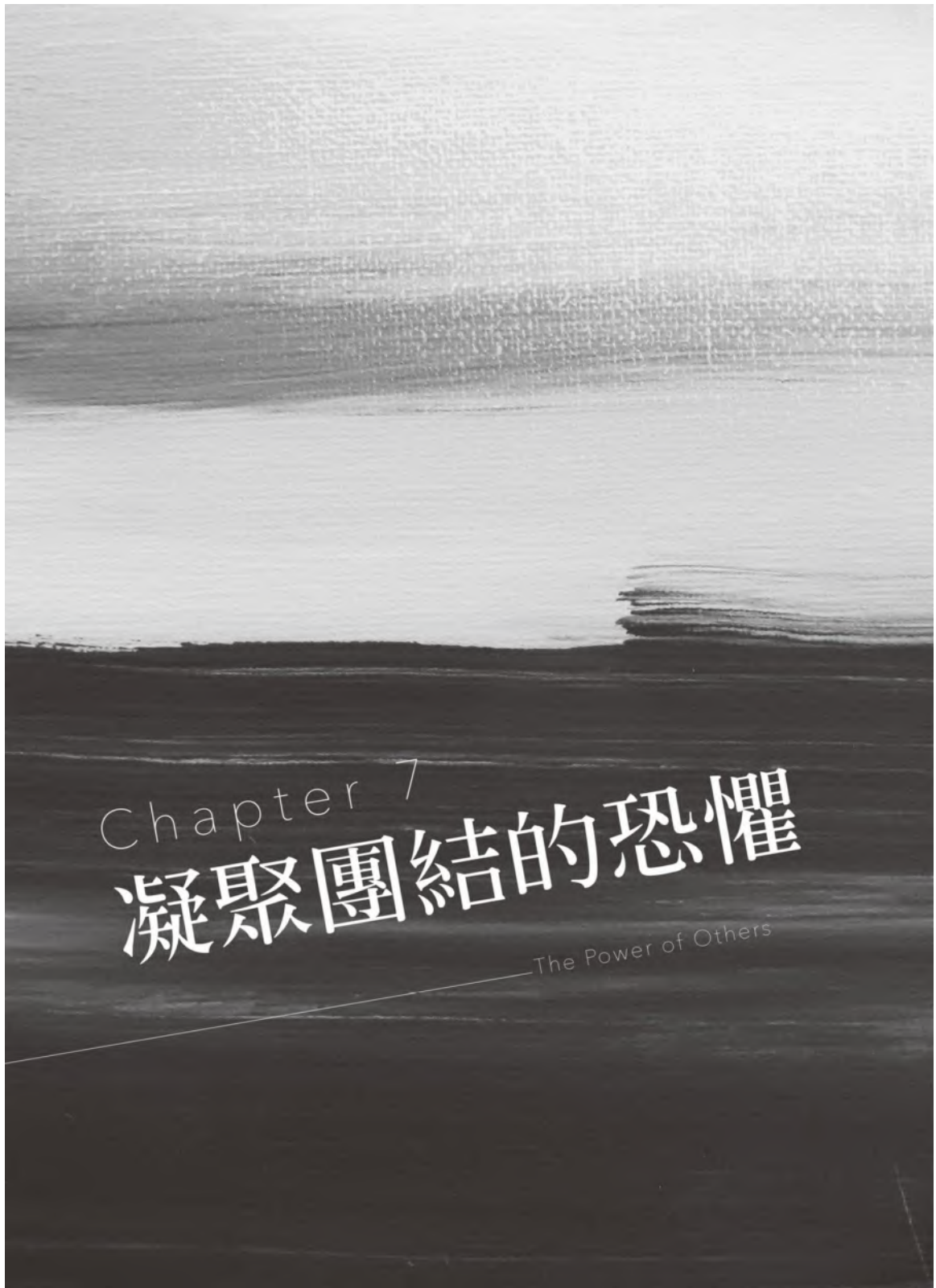
為我們一心一意，專注而堅定地竭盡所能，試圖達陣。一旦失去目標，社會動力也就隨之潰散。我們不再有共同的目的，對團隊來說，成功變得難上加難。」

說酷寒遠征隊的任務失敗似乎有失公允。除了白色火星計畫針對人類生理及心理上的發現外，其科學實驗應當能為雪的物理及化學研究、極端環境微生物的生命科學及南極沿海冰層的移動，帶來相當寶貴的洞見啟發。這項行動還為「看得見的希望」（Seeing is Believing）公益計畫募集到超過二百萬美金的善款（儘管最初目標是一千萬），該計畫是一項全球慈善倡議，旨在減少可預防性失明的發生。然而，在南極探險的歷史上，酷寒遠征隊將成為另一個經典顯例，說明成員個性上的衝突對立如何使團隊陷入困境、幾乎無從預測人們在陌生環境中會有何反應，以及正如斯特勞德所預警，「一小群人被關在小屋子裡，可能會發生難以置信的爭執不合。」

以上這些故事提供了許多教訓，尤其是對於「火星一號」（Mars One）的支持者而言。該公司係來自荷蘭的非營利組織，號稱目標在二〇二四年送出四名太空人前往火星執行單程任務，建立人類的永久居住地。但除非心理學家在未來十年內能突破過去一世紀以來的瓶頸，對於小團體內的人際相容性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不然這項火星任務所潛藏的風險和酷寒遠征隊相比，只會讓後者相形之下淪為有如露營渡假的一場兒戲。

[11] 原註：有時候，別人在場反而會帶來反效果，降低行為動機，心理學家將這種現象稱為「社會懈怠」（Social Loafing）。社會懈怠往往發生在團體活動（如拔河或合唱），個人付出被集體努力掩蓋，導致責任心降低，參與者更

容易讓自己隱藏在人群中，或是覺得自己沒有太大貢獻。這種現象最早是在一九一三年，由法國農業工程學教授馬克斯．林格曼（Max Ringelmann）所注意到。



Chapter 7
凝聚團結的恐懼

The Power of Others

團體動力（group dynamics）足以改變大家的生活，它不只激發人們的雄心壯志，也可能造成人心道德低落。此刻正須從大局思考：我們的從眾傾向如何影響自己圈子以外的人和整個社會？當我們跟著參與行動時，展現忠誠、團結和凝聚力固然是好事，但相較於其他因素，大家對於群體內部規範的過度狂熱反而是最可能破壞社會和諧的不穩定因子。在威脅當頭時，這一點特別危險：代表我們自己人的內團體就像父母的臂彎，安撫人心，提供慰藉；而任何不屬於小圈圈的外團體（out-group）就成了大家宣洩心中不安的代罪羔羊，以下實例便能證實。

二戰結束五十年後，德國與荷蘭攜手合作，共創軍事史上新猷：雙方各自撥出一支部隊合併成單一跨國組織「第一德—荷兵團」（1German/Netherlands Corps）。這支全新的聯軍勁旅在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日舉行了隆重的成軍儀式，兩國總理皆應邀出席，體現了該組織的象徵意義。第一德—荷兵團以「我們因團結而強大」（Communitate Valemus）作為隊訓，總部設於德國明斯特。一六八四年的《西發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於該地簽訂，象徵歐洲「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1]的結束，從此確立了歐洲國家主權的原則。兵團各種軍階職別皆有兩國代表參與，總司令每二至三年輪換一次。該組織運作相當良好，雖然雙方因文化差異而有些不愉快（如荷蘭人偶爾會因稍嫌隨意、不拘小節而遭受批評，德國人則給人一種老是在發號施令的印象¹），但幾乎每個人都同意這是一次相當創新的軍事合作演習。只是他們沒想到竟會發生一個始料未及，近乎災難的例外。

二〇〇三年二月，該部隊被派往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駐軍六個月，加入聯合國的國際維安部隊，負責保護當地不受塔利班和其他反對哈米德（Hamid Karzai）過渡政府團體的襲擊。喀布爾情勢相當不

穩，外國駐軍不斷遭受火箭、手榴彈和爆炸物的攻擊威脅。六月七日，一名自殺炸彈客乘坐計程車衝撞他們搭乘的公車，造成四名德國信號兵死亡，二十九人受傷 [2]。出乎意料的是，在這場突如其來的混亂中，德國和荷蘭士兵的合作無間竟徹底瓦解。當時由於德軍指揮官人數較多，又負責戰略的運籌帷幄，部隊實際上是由他們主導。但執行維和任務經驗比對方豐富的荷蘭士兵，卻因不滿必須聽從這些德國長官的指揮而頗有微詞。他們斤斤計較，小從別人喝了多少啤酒，大至彈藥供應都抱怨連連；而德國軍官則指責荷蘭同袍對他們有失尊重。回到兵團總部後，將領們都不解，為什麼在明斯特相安無事的文化摩擦，到了喀布爾不久竟會成為引發外交危機的導火線。

為了瞭解更多實情，我前往荷蘭南部的某個小村莊，拜訪荷蘭皇家空軍一位退役上校，他是當年隨軍派駐喀布爾的一員，經歷過那影響重大的六個月。安·切普科馬（Anne Tjepkema）是該任務的戰地日誌記錄官，恪守這項據說是德國軍方的優良傳統（儘管他是荷蘭人）。我抵達他家時，正好趕上喝晨間咖啡的時間，不過端出來的卻是牛奶。儘管他的軍旅生涯成就斐然，但眼前唯一明顯散發軍人風範的特徵就是那排令人印象深刻，看似衣物鬚毛刷的小鬍子，修整得跟花園裡的樹籬一樣整齊。

切普科馬說話語氣和緩，用字精簡。我問到當時喀布爾的情勢有多危險，他說：「大多時候，我們總部都是降半旗的。」他又舉外出吃飯的例子來說明他們不得不採取的預防措施：「我們在當地只會去一家餐館吃飯，是伊朗人開的。我去過幾次。我們習慣開兩輛吉普車，其中一輛載隨扈人員。我每次都會帶著手槍防身並且上膛。我固定挑餐廳後方的位子，以便一眼就能看到入口且從後門逃生。這就是你走進一間餐廳時最先要考量的事。」他表示，在這種環境下，以前

從不覺得是問題的思維和文化上的差異一下子跳到眼前。「慢慢地，你會發現一些過去永遠沒想過的事。」

部分心理學家相當清楚他所形容的這種突兀矛盾，他們研究人在感受到威脅時，會做出什麼舉動。沒有任何一種方法，比起踏入一個會讓人心生恐懼、擔憂性命安危的環境更能激發我們的群性本能。我們會立刻轉向自己最熟悉、信奉共同價值觀及道德準則的人求助。我們頓時自成一群，對抗整個世界。因此，我們發現要與異己合作變得更加困難；過去雙方種種不對稱的差異，本來只是無謂的問題，如今卻讓我們深感挫折。我們強烈希望能夠胸有成竹，杜絕任何不確定因素，於是只堅信我們所知道的，並將異己視為仇敵或惡魔。

社會心理學家史塔伯表示，這種內在轉向的傾向，是在陷入困境時，尤其是社會紛亂或戰爭期間的正常反應。「（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拋棄了自己的個人身分，對群體產生相當強烈的需求。」然而，這能解釋荷蘭及德國軍隊在喀布爾發生的失和嗎？根據荷蘭某研究小組針對數百名於二〇〇三年分別在明斯特和阿富汗服役的荷蘭人所作的調查結果，答案幾乎是肯定的。他們發現，士兵對於死亡的擔憂愈強烈，與德軍合作的意願就愈低²。他們光是身處喀布爾這座世界上最危險的城市之一，反應就都大相逕庭。

恐懼對於人類心理會造成扭曲性的影響，此論點最有名的支持者，是美國知名文化人類學家歐內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他博學多聞，先後跨足精神病學及社會學領域。他的朋友，同時也是學者的隆納．里佛（Ronald Leifer）表示，貝克爾將理解「他自己、人的處境以及生命的意義³」視為使命。他的中心思想發展於一九六〇年代晚期至七〇年代初，脫胎自他對精神病患者的觀察。他認為，舉凡人生觀、個性、文化世界觀、信仰體系、道德理解、自我意識與歸屬感、欲望、希望和夢想等種種定義我們生而為

人的特質，主要是透過我們試圖否定死亡那令人畏懼的必然性所塑造而成。他相信人在本質上是悖離常理的。我們一方面利用智力和想像力來創造身分，找到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的意義並賦予我們無限的價值；另一方面，「人本身就是蠕蟲，同時也是蠕蟲的食物」：

人實際上是二元分裂的矛盾存在：他們貴為萬物之靈，在自然界中享有崇高的威嚴，意識到自己獨樹一格的光環，卻又讓自己躲回數呎深的地底，摸著黑，默默任其腐爛，永遠消失。深陷這般進退兩難的境地，不得不接受，實在令人悚然⁴。

貝克爾認為這種存在的矛盾是許多精神官能症狀背後真正的原因，這些病症可視為人因為過度熱衷或受到誤導，企圖超脫或限制我們的「受造性」（creatureliness）而產生的行為（例如隨時保持雙手乾淨）。他同時將這種矛盾心態視為惡的根源：人們有時會不惜一切代價，不顧別人犧牲，只為了打造自己永恆不朽的存在感。

就在貝克爾將人性境況的哲思問題作為知識探求核心的同時，適逢美國一派經驗主義論者崛起，這群重量級學者主導了當時國內的社會科學及精神病學界，認為信仰、倫理和價值觀與知識的追求是毫無關聯的兩碼事。由於貝克爾觀點偏激，加上他與著有《精神疾病的神話》（*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的精神科醫師湯瑪士·薩斯（Thomas Szasz）過從甚密，且對當時的精神醫學提出強烈批評，導致他被美國三所大學開除，並辭去了另一所大學的教職。一九七四年，貝克爾因結腸癌辭世，享年四十九歲。就在他死後兩個月，遺作《否定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⁵才榮獲普立茲獎肯定。如今，世人想起貝克爾，就如里佛所描述，都認為他是個「神祕、陰沉的邪教人物。⁶」但他的概念也啟發了許多門生及追隨者，特別是其中三人，在過去三十年內將他的思想發揚光大，發展出自成一格的理

論。他們的見解為我們提供一個了說服力十足的解釋，說明為什麼大多數人會自然而然地對群體產生認同——無論是足球俱樂部、政黨或是組織化的宗教皆然，以及為什麼當我們感到恐懼害怕時，大家會更緊密地依附自己的小團體（並蔑視敵對者）。

你若認為花上三十年鑽研死亡這項人類無可避免的課題，只會讓人生觀變得更消極悲觀，顯然你還不認識傑夫·格林伯格（Jeff Greenberg）、湯姆·匹茨辛斯基（Tom Pyszczynski）和薛爾頓·所羅門（Sheldon Solomon）這三位社會心理學家。他們三人是研究所的好夥伴，合力挑戰過許多懷疑論者，終於將貝克爾的概念成功轉化為可受檢驗的科學命題。他們也是當代社會心理學界特色最鮮明多彩、活力十足的研究者。他們相當引人注目，第一眼你會先注意到他們的髮型：格林伯格將頭髮往後梳成馬尾；匹茨辛斯基雖然中間禿頭，兩側卻留了一襲及肩的花白長髮；所羅門則是前短後長的狼尾頭，相當時髦。

他們的研究和髮型，隨著由演員蓋布瑞·拜恩（Gabriel Byrne）擔任旁白的紀錄片《飛躍生死線：追求永生》（*Flight from Death: The Quest for Immortality*）^[3]於二〇〇三年上映，吸引了學術圈以外的觀眾注意。影片中，所羅門身穿色彩繽紛、迷幻藍、綠、橙、紫、黃漸次紛呈的紮染T恤，身後以舊金山金門大橋為背景，對著鏡頭露出微笑，總結點出人類存在的困境核心：「你明確意識到，自己不過是一塊會呼吸、會排便的活肉，終將難逃一死；直到最後，重要性甚至連蜥蜴或馬鈴薯都不如，這種感覺實在讓人開心不起來。」

我猜所羅門是個講話很有趣的人，於是去了一趟斯基德莫爾學院（Skidmore College），該校位於紐約州薩拉托加泉（Saratoga Springs），素以人文領域著稱，他就在那裡任教。我從紐約搭火車

出發，沿路所見時時提醒著我死亡的存在。那天是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三日，兩天前美國位於利比亞班加西（Benghazi）的領事館才剛遭受恐怖攻擊，造成美國駐當地大使不幸身亡，所有機關皆降半旗以示哀悼。

我在靜謐的斯基德莫爾校園內找到所羅門的小研究室。辦公室門扉半掩，他坐在裡面，身穿招牌豔彩T恤及藍色短褲、工地靴，看起來一派輕鬆。他和那些愛戴貝克爾的同學一樣，在古板保守的學術界裡是特異獨行的孤鳥。他隨心所欲，自在跨越知識的分野，架上藏書涵蓋生物、哲學、心理等領域，你可能會聽到他精彩的旁徵博引，從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到吳爾芙（Virginia Woolf），再到佛洛伊德或達爾文。他表示，早期他們三人剛開始接觸這些「鉅型理論」（grand theory）時，受到英國學界和實驗心理學者多所批評。他們花了好幾年才說服期刊編輯，讓他們的論文得以發表；但在學校，要讓學生來聽他上課卻比喝水還簡單。他在該校人氣數一數二，是最受歡迎的老師，在美國大學的「教授評分網」上，修過課的學生對他盛讚有加，說他「為人謙遜卻有點瘋狂，是個有著邪惡幽默感的天才」、「學校裡最酷最搶手的教授」，甚至還有人語帶讚許之意，說他「穿得跟遊民一樣」。

所羅門在逐步建構人類行為理論的過程中，歷經許多自省與反思。他在將近三十歲時第一次讀到貝克爾的《否定死亡》，讀完後，覺得人生頓失所依，茫然不知方向，於是辭去斯基德莫爾學院的教職，在國內四處遊蕩，從事建築工作。「我當時心想，哇，要是他（貝克爾）的道理是對的，那我到底還在幹什麼？一時之間，我突然從學術大夢中醒了過來。」於是他興起了當廚師的念頭^[4]，這突如其來的轉折讓他變成一個相處起來非常有趣的人。他很健談，隨時有聊不完的話題，也永遠靜不下來，一下子猛搖頭，一下子聳肩，不然

就是腳跟一直跺地，整個人坐在椅子上打轉。他口無遮攔，想罵就罵。這種戲劇化的行徑或許稍嫌誇張，但傳遞的卻是認真而嚴肅的訊息。

他想傳達的內容是，我們拒絕領悟人終將難逃一死的事實，於是接受現實中的文化規範和觀念，藉此賦予生命意義，得到象徵性的永生不朽。我們認同各種意識形態、加入機構組織、誓死效忠運動團隊、接受信仰及道德準則、從事藝術創作或全心投入家庭及工作，做出承諾。在這些常見的努力過程中，我們實現了一種永遠無法獨力達成的自我價值。當危機來臨，強烈感受到死亡威脅近在眼前時，我們會固守自己的世界觀——無論宗教、科學、文化或哲學等各方面皆然，同時緊緊依附有著共同信念的人，彷彿將生命託付給他們一樣。但這樣做會給我們帶來麻煩：在強化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和群體忠誠的同時，我們往往會貶抑或蔑視那些抱持不同觀點的人。或者正如所羅門所言，人們會聲稱：「我們的神比你們厲害，不信的話，給你們一點顏色瞧瞧就知道了。」

格林伯格、匹茨辛斯基、所羅門等人至今進行了將近五百次實驗來檢驗這項涉及團體衝突的觀點，他們稱之為「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⁷。在一九八九年首度發表的研究中，他們要求二十二名亞歷桑納州土桑市的法院法官，針對某位被控賣淫的被告判定其保釋金額。所有法官都認為那是傷風敗俗的罪狀。其中半數受試者被要求填寫問卷，回答他們對於自己總有一天終將死去的看法。從受試者的反應就能看出結果會如何發展，那些被要求思索死亡的法官所判定的保釋金，平均是另外那些開開心心、毫無所知的同僚的九倍（四百五十五元對上五十元美金）。加深法官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gst）^[5] 似乎能讓他們更堅持自己根深蒂固的價值觀，而更急於懲罰犯法者⁸。

所羅門等人不斷推陳出新，設計各種創意方法來檢測這種心理作用，同樣的結果幾乎屢試不爽。其中我個人最喜歡的一項是，他們找來七十四名主修心理學的學生，請他們分配定量的超辣辣醬給那些政治立場與自己大相逕庭的人，並事先知情對方不喜歡辛辣食物，卻不得不吃下辣醬。正如他們猜測，部分被要求「試想自己死後的情況，並盡可能具體地寫下來」的受試者，舀起墨西哥辣椒莎莎醬更加毫不手軟⁹。

意識到人的有限性所產生的心理作用不同於一般的焦慮，使得我們對於異己採取更加強勢的態度，此說法對現實世界帶來重大影響。這解釋了為何在國家局勢不安時——例如遭到恐怖攻擊後或內亂及經濟動盪期間——人們往往會對自己所屬的「族群」（國家、鄰里或介於兩者之間的任何群體）成員產生非比尋常的團結與向心力，並對外人懷有敵意¹⁰。格林伯格、匹茨辛斯基、所羅門等人與研究夥伴觀察了各國案例多達數十種情境，皆顯示出這種共通的趨勢。例如，當德國人被迫認真思索死亡時，他們會不知不覺往德國同胞身邊坐攏，並且離土耳其人遠遠的；荷蘭的足球迷在國家隊對上德國時，會做出不切實際的贏球預測；義大利人總是誇大強調他們和其他外國人的不同；日本人對於批評他們國家的人，則是回以更深的歧視與輕蔑；以色列人不太願意接納俄國籍的猶太新移民；伊朗人贊成對美國發動自殺炸彈攻擊，而不願與西方國家維持和平（在未受威脅的情況下則相安無事）；政治立場保守的美國人支持對某些中東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攻擊，包括核武或化學武器等手段。

這就是人稱「霍布斯陷阱」（Hobbesian trap）理論背後的心理思維，該理論認為，當兩個群體的對峙日益緊張之際，恐懼會使其中一方先發制人，導致衝突極可能一觸即發。正如電影《星際大戰首部曲：威脅潛伏》中，尤達大師對年輕的安納金·天行者的殷切告誡：

「恐懼是通往黑暗的道路。恐懼帶來憤怒，憤怒帶來仇恨，仇恨帶來苦難。」衝突過程中，我們與敵人有共同的心理空間（psychological space），使我們不想給對方留下活路的衝動傾向，同樣也讓對方想置我們於死地。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日上午，一個溫暖卻不安的星期一，所羅門搭火車從紐澤西州紐瓦克的住所出發，前往紐約到他任教的布魯克林學院。途中，他抽空繞到世貿中心一樓，去他最愛的麵包店買了平時常喝的咖啡和玉米瑪芬，過去兩年來，這是他每兩週一次的習慣。正如他事後感慨：「就只隔了那麼一天，一切卻恍如隔世。」翌日上午，美東地區幾乎萬里無雲，因為必須早到，他直接開車上班，「注意到冉冉升起的朝陽映照著下曼哈頓，灑滿璀璨晨光，尤其是世貿雙塔。¹¹」但就在所羅門抵達教室不到兩小時的光景，雙子星大樓轉眼成了斷垣殘壁，他滿腔怒火，「恨不得親眼目睹（當然是透過CNN頻道）那些凶手粉身碎骨。¹²」

對大多數美國人和全世界的人來說，九一一事件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本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安心無虞的世界，突然變得像海市蜃樓般虛幻縹緲。如果死亡可以在某個晴朗無雲的秋日毫無預警地從天而降，究竟生命的價值是什麼？還能想像有什麼能夠比這件事更刻骨銘心地提醒我們生命的有限和無常？匹茨辛斯基稱九一一事件是「對美國人沉著冷靜的心理素質一次重大的打擊。¹³」一般民眾常見的反應，包括高漲的愛國情緒、堅定的民族團結、對他國文化懷抱敵意、大聲疾呼採取報復行動、上教會的人數回升等，正是他、所羅門和格林伯格意料之中的結果 [\[6\]](#)。

九一一事件在政治上的影響同樣令人跌破眼鏡。事件發生過後一個月，時任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獲得九成以上的支持率，超越歷屆總統，創下美國有史以來最高紀錄。這現象維持了好幾個月，影響不只政治，還擴及其他層面。絕大多數美國人也支持（當時）他對阿富汗及伊拉克採取的軍事行動。貝克爾若有知，應該也毫不意外。小布希的作為強化了美國傳統的文化價值觀，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憤怒與悲傷中，我們找到了自己的使命與行動的時刻……人類自由進步的展現，現在操之在我們手中。¹⁴」他代表民主與共和兩黨高舉正義之劍，在這場象徵性的戰役中，對所有威脅美國的勢力發出戰帖。誠如貝克爾所言，小布希正在幫助這些黨人「否定世界上的恐懼」¹⁵。在美國人面臨危機之際，需要有人來讓大家恢復信心，重拾內心深處對人生充滿希望的理想以及幸福感，而自信、主戰的小布希就是不二人選¹⁶。

乍看之下，美國政界不分黨派、團結一心的反應看似自相矛盾。極度強調進步及開放思想的自由派人士，在感受到恐怖主義威脅時，態度上不是應該變得更加寬容嗎？這種反應¹⁷通常發生在人被迫正視死亡的時候：自由主義者變得更加自由開放，保守派人士則更趨向保守 [7]。但九一一事件不同，接連恐怖攻擊對美國人的生活造成根本上的重大威脅，引發政治上不分黨派，各界一致的反彈撻伐。所羅門表示：「所有美國人都將希望寄託在某個充滿魅力，聲稱是被上帝選來為全世界剷除邪惡的領袖身上，尋求心理庇護。」因此，一時之間他自己也加入了譴責伊斯蘭教的行列，認為「我們應該派幾架戰機飛去他們那裡，賞他們幾顆炸彈——但目標在『哪裡』以及『他們』是誰，老實說我並不知道。」

二〇〇四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小布希輕鬆贏得連任。所羅門三人在選前半年進行的實驗顯示，恐怖主義論述的確會對選民造成影

響。他們在紐約布魯克林學院的自助餐廳找來一百五十七名學生，要求其中半數回答某些耐人尋味的問題，例如：「簡單說明當你自己面臨死亡的時候，心中會湧起哪些情緒？」剩下的人作為控制組，則是被要求想像自己陷入痛苦時，會有何反應。接著，他們檢視這些學生的政治傾向（整體而言偏向溫和的自由派），問他們在小布希和民主黨的約翰．凱瑞（John Kerry）兩人之中，會投票給誰。調查結果令他們大吃一驚。控制組的學生大多支持凱瑞，雙方人數比達四比一；死亡組則擁護代表保守勢力的小布希，兩邊比例達三比一。但這些人的選擇似乎與他們本身的政治意識形態無關：對於被激起存在危機感的保守派與自由派人士來說，小布希是更適合的人選。原因無他，其積極捍衛美國國族認同的態度，正好為大家心中深處共同的恐懼提供了出口¹⁸。

「讓我們吃驚的是，一方面，我們對於死亡的提示非常隱晦，但這對心理狀況造成的微妙變化卻令人難以置信。」所羅門說。基於這項發現，心理學家卓．威斯頓（Drew Westen）直言：「大腦在思考政治時，本來就是情緒化的。」意指我們的投票意向，往往是被直覺情感牽著走，而非以理性論證決定¹⁹。例如，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丹．卡翰（Dan Kahan）發現，人們遲早會找出方法來駁斥並消弭「全球暖化是排放二氧化碳所致」的證據，或者槍枝管制若與公眾的核心文化價值觀或社群觀點相悖，該措施對暴力犯罪防治就起不了作用²⁰。尤其遇到選舉，恐懼和情感共鳴的效果往往更勝理性邏輯。二〇〇四年五月，民主黨某位選戰操盤手觀察：「無論小布希在面對（伊拉克）戰爭和九一一事件的表現有多糟，只要選民的情緒被激起，我們就只有死路一條。²¹」

共和黨充分利用了九一一事件的意象及引發恐懼的煽動言辭來鞏固他們在選民心中的地位。「雙子星大樓」、「恐怖威脅」、「蓋達

組織」、「國家安全」等相關關鍵字，都成了該黨的競選語彙。更重要的是，就國際層面來看，這項策略幫助他們贏得來自世界各國普遍的支持，使其能夠名正言順地對伊拉克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宣戰，即使缺乏可靠證據顯示他與蓋達組織對紐約及華府的攻擊有任何關聯也無妨。二〇〇三年，小布希在發動進攻的兩個月前宣讀的國情咨文中表示：

根據各方情資、祕密通訊及羈押人犯的供稱內容顯示，海珊確有協助並庇護包括蓋達組織成員在內恐怖分子之行動。他可以不著痕跡地暗中提供私藏軍火給這些恐怖分子，或協助他們開發自有武器……只要有人挾帶一個小玻璃瓶、鐵罐或箱子潛入國內，就能引發前所未有的恐懼。我們將竭盡所能，確保那一天永遠不會到來²²。

這是一招相當高明的心理戰術，用意在閃避對風險的理性討論。前英國首相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也採取了類似手法，他將國際社會對伊拉克曖昧模糊、支吾搪塞的立場，與一九三九年納粹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後未能抑制希特勒的野心作類比²³。歷代以來的領袖就是採取這些策略，藉由操控大眾心理根本上的恐懼、提醒他們自身的脆弱，以激發人民對於戰爭的支持。這雖然是最古老的謀略，卻總能成功誘使我們落入圈套，鑄下大錯 [8]。

九一一事件是個出乎意料且前所未見的特例。但在美國歷史上，因重大事故而造成全國上下族群隔閡加劇的情況，並非首見。其實不只濫殺事件會引發這樣的影響，國家的經濟假如太不穩定，同樣也會造成社會動盪不安，形同具體的致命威脅。

一九七九這一年，你要是住在美國，可能會想起麥可·傑克森當時發行了《牆外》（*Off The Wall*）這張象徵他演藝生涯突破的百萬暢銷專輯，或是麥當勞首度推出小孩滿意、大人開心的快樂兒童餐，以及時任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家鄉喬治亞州池塘釣魚時，用船槳驅趕游到他船邊的兔子而引發的「兔子事件」。但這些事大家的印象應該不深，或許你會想起其他更重大的新聞，例如賓州三哩島核電廠爐心熔毀的核災事故、伊朗狂熱分子衝進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的「伊朗人質事件」、蘇聯入侵阿富汗等。可能更印象猶新的是，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二年間，美國失業率從百分之五點八暴漲至九點七²⁴；民生必需品價格飛升，以消費者物價指數來看，飆漲速度更甚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任何同期時間點²⁵，全國因此籠罩在經濟不安的陰影中。就在這一年，卡特總統對全國人民發表電視演說並提出警告，美國民主正面臨根本性的威脅，以及全國性的「信心危機」：

這場危機重創了我們國家意志的核心、精神與靈魂。隨著我們對於自我生命意義的懷疑日漸加深、喪失團結一致的國家意志，危機就潛藏其中……美國精神遭逢危機，種種跡象舉目可見。這是我國史上第一次，絕大多數人民認為未來五年會比過去五年更難過²⁶。

面對這種普遍的不確定感，美國社會的反應與當時九一一事件類似。社會上出現一種心理現象，理查·多堤（Richard Doty）、比爾·彼得森（Bill Peterson）、大衛·溫特（David Winter）等幾位密西根大學的心理學者稱之為「威權專制症候群」（authoritarian syndrome）。他們研究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二年間的社會趨勢，指出當時的美國人與其後五年經濟復甦、危機感減弱的社會民情相比，似乎更加嚴厲保守，且無法忍受悖離常理的價值觀與論述觀點。例如，他們注意到高中生的種族偏見加劇、三K黨（Klu

Klux Klan) 的活動更為頻繁、反猶太人事件激增（例如蓄意破壞猶太會堂）；觀眾愛看以權勢顯赫或專制獨裁的主角為號召的電視節目，以及養狗人士偏愛「攻擊型」的猛犬（如德國牧羊犬），甚於吉娃娃這類可愛的寵物狗²⁷。於是，無可避免地，種種社會亂象正中右翼政客下懷，成為政治操作的籌碼：主張嚴懲犯罪並且對蘇聯態度強硬積極的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在一九八〇年的總統大選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

這顯示，當經濟問題或社會亂象對大眾的生活方式構成威脅時，可能會促使他們急於投靠自己的內團體以尋求慰藉擁抱，這股驅動力不亞於恐怖分子的威脅。七〇年代末，如同九一一事件過後，美國人自覺不堪一擊，最後是大家一起努力，堅持美國文化的核心信念，重振美國精神、凝聚團結，才走出陰霾。貝克爾認為，這才是社會的真諦：一個人們可以透過參與，從中發現意義、創造生命價值的體系。當這個體系受到威脅，就必須加強其象徵，這一點非常重要。

歷史上，對於外人的迫害通常與經濟及社會的動盪不安密切相關。由此看來，外部因素似乎真的會激發人們向小圈子靠攏的群聚傾向。耶魯大學的卡爾·霍夫蘭（Carl Hovland）及羅伯特·希爾斯（Robert Sears）在一項經典的早期社會心理學研究中發現，一八八二年至一九〇三年間，美國深南地區（Deep South）民眾對黑人施暴的程度高低，與棉花價格及當地農民的收入起伏成正比（當時該地區以農業為主）²⁸。同樣地，在不平等問題較嚴重、民眾缺乏安全感（例如凶殺案件發生率高）的地區，對於死刑的支持率較高。至少在民風保守的州內，死刑犯和被處決的人數在國家面臨威脅時都明顯增加²⁹。

這種現象在世界各國都有可能發生。從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初，德國大規模的失業和嚴重通膨助長了納粹主義興起，因為它強烈

的民族意識型態讓失業者和社會中下階層——尤其是那些將自身邊緣化歸咎於大型猶太企業的小貿易商——從中得到反動的力量³⁰。六十年後，東德的失業問題（這次是因為與西德統一引起）再次成為爆發仇外情緒的背景，導致該國針對難民、尋求庇護者和其他外國人的攻擊事件激增（一九九一年一月發生四十起；到了翌年九月至十二月，每月將近千起）³¹。

在英國，國家社會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的民意調查顯示，二〇一二及二〇一三年民眾對於新移民的態度與十年前相比，明顯變得更加反感³²。這或許反映了英國人民對於外來人口移入的焦慮不安，加上遭遇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程度更是有增無減。這種狀況讓大家注意到政治分析家大衛·古德特（David Goodhart）所謂多元文化社會「尷尬的真相」：「人類是群居性的靈長類動物，有屬於自己的小團體；當他們對外人展現信任時，總是小心翼翼，萬分謹慎。」³³」

二〇〇一年，哈佛大學政治學者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一項針對全美三萬人的調查中發現，種族結構愈多元的社區，投入公民事務的程度明顯偏低，參與投票、志工、慈善捐款的人數也不如其他地區，因為他們對於彼此的信任不高³⁴。普特南稱之為「龜縮」現象（turtling），意指縮回熟悉的環境。當資源和機會有限時，例如經濟蕭條時期，我們往往會更加退縮，社區極端分化的現象變得更明顯，猜忌演變成敵意。這時候，要讓陷入混亂的大環境得到控制，與其從大局著手，不如找幾個代罪羔羊（新移民？猶太人？穆斯林？救濟索賠者？銀行家？）來頂替更簡單。因此古德特延伸出一項論點，認為在代議制的民主國家中，僅僅為了達到和諧共存而針對不同族群課稅、實施福利制度的作法是不夠的，為此他受到許多抨擊。合作必須仰賴某種程度的團結，若不同群體彼此無法整合，可以

肯定的是，當社會體系的巨輪脫落崩壞時，各族群的分歧將被各界利用，成為操作的籌碼。

這就衍生了一個關鍵問題：究竟需要多大程度的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才能讓多元混雜的社區免於衝突呢？美國政治學者阿舒托什·凡斯尼（Ashutosh Varshney）提出了一項見解。他目前任教於羅德島的布朗大學，想知道為什麼在印度某些地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間的暴力衝突比其他地方更普遍。他挑了六座城市進行實地研究，其中三處治安良好，雙方和平共處，包括：科澤科德（Calicut）、勒克瑙（Lucknow）及蘇拉特（Surat）；另外三處則水火不容，爭端激烈，包括阿里格爾（Aligarh）、海德拉巴（Hyderabad）及阿默達巴德（Ahmedabad）。他的結論是，促進種族和諧的關鍵在於跨社區的深度參與，僅僅讓相鄰的社區居民彼此認識或者讓孩子們上同一所學校是不夠的，他們應該一起加入工商協會、運動俱樂部、工會、政黨、社區組織、學生會或讀書會等社交活動。凡斯尼解釋，如此深度的整合限制了政治菁英操作極端分化策略的空間，鼓勵社區維持良好關係，避免擦槍走火而演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這就是和平得以維持的關鍵：在穩定的多元融合社會，共同參與已經成為公民體制的一部分³⁵。

這正好是英國北部的布拉福市（Bradford）所欠缺的。二〇〇一年七月，該市的白人和南亞人的種族緊張關係擴大惡化，演變成大規模的騷亂。事件平息後，政府成立了一個獨立審查小組，旨在調查社區內部的凝聚力。該小組回報，布拉福市和其他受到種族暴力波及的北部城鎮「極端分化程度之嚴重，令他們大吃一驚」。報告指出，各種場域都出現種族分化現象，包括學校、志工團體、禮拜場所、社會文化體系、工作職場等。「許多社區過著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平常沒有任何交集，遑論共同進行或推動任何有意義的交流。」³⁶」布拉

福目前仍然是英國隔離分化最嚴重的地區之一，當地中小學的學生超過三分之一是喀什米爾人，百分之四十三的居民在家講的不是英語³⁷。

要將文化差異甚鉅的社區整合凝聚起來相當困難，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Belfast）就是一個好例子。儘管在民調中，絕大多數居民表示他們比較想住在宗教混雜的社區中，但當地大約九成的住宅區仍然以天主教或新教為主³⁸。即使民眾有意願，要將各個毫無歷史淵源的社群安頓在同個地方也是一大挑戰。

二〇〇〇年，我花了一整年的時間四處造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土，在研究兩國人民的衝突心理時，大多數的人近年來都未曾交談，更不用說深入瞭解對方了。直到今天，他們還是僅透過圍籬、電視或在檢查哨才能看見對方，但從不互動或提問。他們無法到對方領土境內旅行，甚至疏遠得連吵架的機會都沒有。我在加薩的一所小學裡，女孩和男孩們指著彈痕累累的教室窗外一處以色列住宅區（已拆除），與他們年紀相當的猶太孩童正騎著單車，穿梭在紅磚屋舍間。但不管在巴勒斯坦或以色列，孩子們在素描本中彼此描繪的形象幾乎如出一轍：不是動物，就是來自某個可怕世界的怪物。他們很少把對方畫成人樣，因為他們沒有機會認識、相互了解，心中只剩下恐懼。

為了謀求社會和諧，不同群體的成員必須認識並熟悉彼此，這是美國心理學家高登．奧伯特（Gordon Allport）一九五四年提出的「接觸假說」（contact hypothesis）的中心思想。該假說旨在減少偏見、負面刻板印象及敵意³⁹。這背後的基本道理不難理解：適當的互動和溝通可以讓人更懂得接納並欣賞別人的觀點，體認到雙方的相似處，進而增進彼此的信任。但實際執行可能要比聽起來困難得多。

奧伯特的結論是，為了促進有效的接觸，必須制定各種基本條件。例如，雙方應享有平等的地位、擁有共同目標及來自社區的支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環境背景不符合這些標準，使得雙方若是有人願意不惜反抗團體的敵對心態，主動與對方溝通並打成一片，就會變得更加引人注目。他們有不少人目睹兒女、兄弟、姊妹或父母在暴動中喪生，這絕非巧合。如此重大的失落使他們不知所措，於是轉而尋求另一種和諧共存的方式。伊扎克·法蘭肯塔（Yitzhak Frankenthal）是個信奉東正教的猶太人，他的兒子阿里克（Arik）於一九九四年被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Hamas）綁架殺害。一路以來，法蘭肯塔始終是主要的推動者，他創立「父母心聲家庭論壇」（Parents Circle）⁴⁰，服務同樣失去至親的以色列人及巴勒斯坦人；最近又創設「阿里克和解、包容及和平研究所」（Arik Institute for Reconciliation, Tolerance and Peace）⁴¹，並協助設立熱線服務，讓素未謀面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夠敞開心胸交談，至今已經撥出百萬通以上的電話。「我覺得自己是個失敗的父親，無法救回兒子的性命。我必須竭盡所能，保護我剩下四個孩子平安活下來。」二〇〇二年，他在位於耶路撒冷，雜亂無章有如洞穴般的辦公室如此對我說。



圖八、在約旦河西岸地區大部分城鎮裡，巴勒斯坦居民唯一接觸到的以色列人就是士兵。

法蘭肯塔的巴勒斯坦籍夥伴似乎也所見略同。法蘭肯塔要我去以色列占領的東耶路撒冷找阿德爾·米斯克（Adel Misk），他目前是「父母心聲家庭論壇」的副會長，本身是巴勒斯坦人。「大部分人都問我和伊扎克，你們是怎麼辦到的？」米克斯說。「但我們都是受害者，了解鮮血的意義。我們若能夠敞開心胸交談、比鄰而坐，就是在傳遞一種訊息。我相信，除此之外別無他法。」許多人對這一點深信無疑——要像英雄般勇敢破除群體界線，小說家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更是如此。他認為自己所寫的每一篇真誠坦率的散文都秉持這項原則：「要試著去理解別人，若彼此能相互理解，就能以善相待。對一個人的認識夠深，就永遠不會招致仇恨，幾乎只有關愛。⁴²」

「尋求共通點」（Search for Common Ground，簡稱SFCG）是世界規模最大，致力於解決對立衝突的非政府組織，同時堪稱最成功的一個。自一九八二年成立以來，該組織已經協助非洲、歐洲、東亞及北美各地共二十七國分散戰火、減少種族仇恨，其理念宗旨正如其名：衝突源自差異，而締造和平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著眼於彼此的相似之處。

SFCG的創辦人約翰·馬克斯（John Marks）曾在美國國務院擔任分析師，後來對政府的越南政策感到相當失望。他這套將重點放在尋求「共通性」的作法，主要是以實地與民眾接觸的基層經驗和良好的判斷力為途徑。最近，科學研究的成果也迎頭趕上。二〇〇九年，匹茨辛斯基展開一系列心理實驗，檢測是否能藉由提醒人們自己與他人的共通點，來軟化他們本能中對於外團體的偏見。他首先發現（同時也是研究成果中成功機率最高者），當美國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信徒開始認真思索死亡後，在讀到《聖經》中強調耶穌慈悲教誨的篇章時，就不那麼熱衷於以強大的軍事武力來捍衛美國在海外的利益。他

在伊朗什葉派穆斯林身上也看到類似效果：閱讀《古蘭經》闡述慈悲價值觀的經文，有助降低伊朗人對美國與歐洲訴諸暴力手段的渴求⁴³。他還發現，光是讓人們觀看不同文化的家庭生活照片（例如父母和小孩同桌共進晚餐或一起玩耍的景象）或讓他們閱讀別人書寫最珍愛的童年回憶⁴⁴，就能徹底扭轉其對所謂危險團體與生俱來的偏見（以美國大學生對於阿拉伯人的態度為例）。

以上結果反映出SFCG的創立理據：讓人們發現自己和別人的共通點，就能產生強大的影響力。所羅門認為，要增進人際包容，就得「放下我們的部落心態（tribal mentality），要提醒大家，所有人類的共同點遠遠多過彼此的差異。」這想法聽起來或許一廂情願，但是當大家共同投入某項活動、打破團體藩籬時，自然而然會產生包容心。最值得參考的操縱實驗，是本書序言提到的心理學家謝里夫的「羅伯斯山洞」實驗。他將兩組敵對的青少年湊在一起，要他們想辦法解決營地的飲水問題。這項任務需要雙方緊急應變合作，因為每個人都快渴死了。結果過去一週以來的爭吵謾罵，在合作過程中逐漸變成善良友好的互動，彼此打成一片。（顯然僅僅製造機會讓雙方接觸，例如讓他們在同一棟屋子裡吃飯或一起看電影，並不足以打破藩籬；只有在迫使他們融為一體以謀求實現共同目標的情況下，才可能減輕敵意。⁴⁵）

像這類深度關聯發揮作用的例子相當多。根據我個人的經驗，近年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持續在當地進行合作的少數領域之一，就是醫學研究。醫學研究首重雙方的合作及知識共享，特別是傳染病的跨境監測。另一個領域則讓人聯想到謝里夫的實驗，那就是雙邊人民賴以維生的約旦河西岸水資源保育。這樣的合作關係雖然一開始往往會籠罩在互相猜忌的疑雲之下，但終究會隨著彼此瞭解日增，尤其是好

感日益加深而永續維持。若兩邊交情友好，即便在衝突的敏感時刻，維持單純的學術交流關係也會容易許多⁴⁶。

以上這些啟示，我們應該如何善用呢？要遏制偏見和群體之間的敵意，需要對相關人士背後的心理動力（psychological dynamics）有所瞭解，特別是媒體、政治家、宗教和社群領袖、所謂的安全專家和其他對公眾輿論有特殊影響的人物。這項要求並不為過。我們長期活在恐怖主義風險的起伏擺盪中，明白當政府提高威脅等級（例如英國將中度改為重大，或美國舊制下由橘轉紅）^[9]或是警察局長出面警告「絕對不可自滿輕忽」⁴⁷時，大家都會感到些許不安，但其實這些徵兆對我們的行為幾乎不會造成任何影響。（我們又能怎麼辦？少搭飛機，還是離公共垃圾桶遠一點？）我們也知道，造成人心不安這件事本身就會引發某些效應，例如煽動偏見及認同更強大的國家權力。最後造成警方最仰賴的情資社群（假如威脅來自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人士，資訊來源就是穆斯林）更加疏遠，因為當局與社會大眾對待這些外團體的方式將使得他們不願站出來，其心態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數領袖都會忍不住趁機深化人民心中對敵人的恐懼，作為政治上的利基^[10]，但此舉根本無益於提昇國民的安全。^[11]

媒體的角色至關重要。大部分記者都知道影像報導會加深社會分化，但這似乎並未嚇阻媒體業者和編輯有所節制。九一一事件過後幾個月以及此後每年的紀念日，新聞頻道總是反覆播放當時血淋淋的傷亡影像及現場滿目瘡痍的畫面，使大多數美國人和歐洲人始終活在恐怖主義的恐懼陰影中，與實際可能遭遇的風險完全不成正比。這種心理的影響層面遠遠不只我們對於房屋保險或交通方式的選擇。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心理學者在實驗研究中發現，接觸九一一事件的影像會加深種族成見⁴⁸，這個結果格林伯格、匹茨辛斯基及所羅門可能早就預測到了。在現實生活中，也的確發生類似現象：持續追蹤調查顯

示，自二〇〇一年以來，英美兩國境內對於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和歧視比以前更加頻繁⁴⁹。

恐懼能刺激報紙銷量，同時也扭曲人們的見解。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倫敦東南部的伍利奇區（Woolwich）發生一起慘絕人寰的街頭喋血事件，英國軍人李·里格比（Lee Rigby）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當街殺害。這起震驚各界的凶案更教人心驚膽戰的原因，是其中一名凶手揮舞沾滿鮮血的雙手，大聲咆哮說英國將永無寧日的畫面，竟然在社群網站上迅速瘋傳，並且被主流媒體拿來大肆報導（雖然社會大眾相當反對），毫無自律可言。媒體這種「有血就有收視率」的嗜血心態對社會造成立即性的危害，幾乎難以導正。

生動傳神的影像會觸發內心的真實反應，推翻任何理性的風險評估⁵⁰。要是告訴看過伍利奇凶殺案影像的人，說他們被閃電打中的機率是被手持開山刀的伊斯蘭極端分子砍死的五倍，可能會讓他們晚上睡得更安穩。但這樣做並不會改變他們本能上將穆斯林視為外人、認為他們都「不怕死」的偏見。（該凶殺案發生後一個月內，英格蘭和威爾斯地區通報的反伊斯蘭事件頻率升至以前的四倍，始終居高不下。⁵¹）

既然恐懼能如此大幅扭曲我們對世界的看法，鮮明突顯出內團體和外團體之間的差異，且輕易激發人對生死存亡的不安，我們該如何與之共處呢？除了關掉電視、取消新聞訂閱或遠離塵囂、自給自足之外，最好的對策或許是儘量保持我們對群體認同的敏銳度，留心各種可能受到操控的手法。換言之，看到聳動的新聞標題和散布恐怖謠言的政客，要認清他們真正的意圖就是刻意扭曲現實。另一方面，也可借鑒許多太空人從宇宙回望地球時所產生的心理反應：看見這個「淡

藍色的小圓點」，想到它的脆弱和地球上所有生命相互依存的連結，油然而生一股深刻的敬畏之意。你會發現，退幾步從遠處看，群體差異就顯得微不足道。

羅蘭·艾默瑞奇（Roland Emmerich）執導的《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是部災難電影，描述人類現代文明被突如其來的新冰河期襲擊，一夕之間化為烏有，但它受肯定的原因並非背後精確的科學論據，誠如加拿大的氣候模擬權威安德魯·韋弗（Andrew Weaver）所言，該片「用相當創意的手法顛覆了所有已知的熱力學定律⁵²」。但談到人類在危急時刻所展現的行為舉止，導演艾默瑞奇或許就自有一番道理了。

電影中，拳頭大小的冰雹持續襲擊東京、酷寒的氣旋渦流癱瘓整個蘇格蘭、印度德里開始下雪、超級海嘯席捲紐約，當下讓人覺得每個人都成了生命共同體，在這場全球性的災難中無人能置身事外。於是世界各國暫時放下爭端，美國將所有拉丁美洲的債務一筆勾銷，開發中國家也開放邊境，收容數百萬流離失所的歐美難民。

雖然大多數分析家預測，氣候變遷的影響——乾旱、饑荒和沿海人口稠密地區的洪災——恐因人類搶奪日益減少的資源而導致世界各地衝突頻仍，但最近匹茨辛斯基一項耐人尋味的實驗顯示，這結果並非必然。他找來一些人，事先要他們想像自己萬一不幸死去的假設情境（通常令人焦慮不安），再請他們設想全球暖化可能帶來的災難或影響，例如冰蓋融化、海平面上升、被迫遷徙、劇烈風災與長期乾旱等，這些人對於建構和平與國家外交會展現出更大程度的熱忱，遠勝於其他只被要求想像發生地震等局部性災害的人。他還發現，中西部某所大學的美國籍學生應要求想像氣候變遷造成的這類破壞後，他們就徹底打消了支持出兵伊拉克的念頭 [\[12\]](#)。

最好的情況是：萬一氣候變遷真的發生，屆時我們每個人顯然都將成為命運共同體，許多人會選擇合作而非爭鬥，因為大家都是同一艘船上的自己人^[13]。即使是向來對人類文明前景不怎麼樂觀的佛洛伊德，也看到了全世界的人類在災難中團結一心的可能性。他在《一個幻覺的未來》（*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指出：「人類少數令人欣慰且值得讚揚的印象，就是在面對狂暴猛烈的災難時，會暫時拋下文明中的種種不和與一切內部問題及仇恨，想起每個人共同的偉大任務，就是在大自然至高無上的力量面前自保自全。⁵³」至於最糟的情況，則隨時謹記美國作家戈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的小說《長路》（*The Road*）的啟示，故事描述人類遭逢前所未見的末日浩劫，倖存者在一片焦灼的世界中自相殘殺，以獲得僅剩的營養來源：人肉⁵⁴。當大家都沒東西吃的時候，再怎麼利用群眾心理也救不了你自己。到了那時候，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1] 譯註：此役發生於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係由當時神聖羅馬帝國新舊宗教內戰演變而成的大規模跨國戰爭，以波希米亞人（今捷克）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為導火線，引發代表天主教舊勢力的哈布斯堡王朝集團（奧地利、西班牙與德意志的天主教諸侯國）與支持新教的反對集團（法國、丹麥、瑞典、荷蘭及德意志新教諸侯國）之間全面交戰。最後由反對集團獲勝，雙方於一六四八年簽訂《西發利亞和約》，終結了歐洲宗教改革時代的最後一次宗教戰爭，也開啟現代民族國家的濫觴，歐洲的專制國家互相承認而確立主權，被視為現代國際關係發展的起點。

[2] 原註：除了德軍，該事故亦造成一名阿富汗路人死亡，十人受傷。

[3] 原註：派翠克·沈（Patrick Shen）導演，葛瑞格·班尼克（Greg Bennick）及Transcendental Media公司共同監製。

[4] 原註：至今他依然留有一身好廚藝，與人在薩拉托加泉合夥開了一間融合多種民族飲食特色的「世界語」速食餐廳（Esperanto），其中最有名的招牌菜是他所獨創，名為「麵糰小子」（doughboy）的起司雞肉捲，備受各界好評，就連《紐約時報》也稱讚不已。

[5] 譯註：體認到生命到頭來可能毫無意義，因而產生某種焦慮，對人生感到悲觀絕望。

[6] 原註：並非所有恐怖攻擊都會刺激民眾對於國家領導的支持度上升。二〇〇四年，西班牙發生馬德里火車爆炸案，事件發生三天後的全國大選，民眾用選票表達他們的不滿，造成當時的政府下臺。原因可能包括人們認為政府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導致該國成為恐怖分子攻擊的目標；另一方面，政府惡意將該起爆炸案歸咎為巴斯克（Basque）分離主義組織所為，也是造成民眾不滿的原因。

[7] 原註：此通則不只適用於政治價值觀，在恐懼威脅的時刻，任何可支持人們面對各種變數的事物亦同樣適合。虔誠的宗教信徒可能會更堅定其信仰；家庭觀念重的人可能會與親人更加緊密；正如牛津大學二〇〇三年的實驗顯示，強調以科學角度理解世界的人可能會變得更加理性。這代表對於不相信宗教的世俗主義者來說，面對存在焦慮時，其對科學的信仰似乎能發揮一種近似信徒對於宗教信仰的心理作用。

[8] 原註：對於恐怖主義毫無道理的恐懼嚴重影響了民眾日常生活，例子之一就是保險公司在倫敦住宅區針對恐怖行動收取高額不成比例的保費——但該地從未發生恐攻事件——許多房東都堅持保險，然後轉嫁給承租人和房客。

[9] 原註：二〇一一年四月，美國終止了二〇〇二年推出、備受批評的國土安全顏色預警系統（綠—藍—黃—橙—紅），以更簡潔的全國恐怖主義警報系統取代之，僅包含三種威脅等級（無—升高—緊迫）。

[10] 原註：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挪威政府。面對極右派激進分子安德斯·布萊維克（Anders Breivik）於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犯下七十七人的大屠殺事件，該政府採取的對策是確保國家的核心價值不受任何影響及破壞。時任總理延斯·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呼籲社會要以「更多的民主、開放與更積極的政治參與」來回應暴力，他因此獲得廣大的政治支持。挪威政府並未修法，警方也未被賦予額外的權力。時至今日，挪威國內像布萊維克這樣的極端意識形態已經被徹底邊緣化，是史上前所未見。

[11] 原註：政治人物為了提高支持度，往往會利用大眾的恐懼以及群體界限的不穩定性，常用的手法之一就是將國家內部的動盪不安怪罪到外人身上。例如前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府，在二〇一一年埃及革命初期曾試圖將騷亂歸咎於「外國特務」和「埃及叛徒」；二〇一三年七月埃及前總統穆爾西（Mohamed Mursi）被罷免後，埃及軍方領導人與「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發生衝突期間也用過同樣手法；無獨有偶，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二〇一三年六月試圖轉移外界對政府祕密監視計畫的批評，也聲稱該計畫只針對外國人。

[12] 原註：他還發現，在二〇〇九年一月以色列軍隊入侵加薩期間受到審問的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在氣候變遷的假設情境下，會更傾向與以色列籍的猶太人和平共處——儘管只有深刻體認到自己與全人類的命運休戚與共的阿拉伯人才有這種想法。見Tom Pyszczynski, Matt Motyl, Kenneth E. Vail III, Gilad Hirschberger, Jamie Arndt and Pelin Kesebir, ‘Drawing attention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decreases support for war’,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18, 4 (2012), 354 - 68. 研究人員以務實的態度看待這些狀況實際上會如何發生，他們承認氣候變遷是個充滿政治意味的議題，一旦出現災難性的變化，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就會升高。他們認為，團結的最佳良機就在於氣候變遷尚未來襲之前以及威脅迫在眉睫之際。

[13] 原註：類似氣候變遷這類全球層級的重大威脅可能造成另一項心理影響，就是對於社會上可能威脅集體秩序的人（例如罪犯、激進分子、傷風敗俗者），會助長更多專制權威態度的出現。參閱Immo Fritzsche, J. Christopher Cohrs, Thomas Kessler and Judith Bauer, ‘Global warming is breeding social conflict: the subtl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threat on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2, 1 (2011), 1 - 10.



Chapter 8
看不見的陪伴

The Power of Others

仔細檢視人類團體行為的種種特性，很難不注意到別人在我們潛意識裡造成的影響。但要探討這個課題並非只有研究團體行為一途。我們也可以觀察一個人在沒有人陪伴、被迫自力更生的情況下的反應，來認識他人對自己的影響力。社會孤立往往使人心灰意冷，但並非總是如此。有些人應對得比別人好，瞭解背後原因有助我們對人的處境有更深入的了解。以下介紹的英國年輕探險家隻身在北極熬過酷寒嚴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外在的孤獨並不同於心境上的孤獨；當一個人面臨困境時，決定他能否堅持到最後一刻或頹廢不振的關鍵，很大程度取決於他所抱持的信念。

一九三〇年七月，奧古斯特·科陶德（August Courtauld）跟隨英國北極航空路線遠征隊（British Arctic Air Route Expedition）出發前往格陵蘭，與其他十三名年紀相仿、背景相似的隊友，帶著無限熱忱去探索未知的世界盡頭；當時他年僅二十五歲，剛從劍橋大學畢業不久。探險隊由他的好友吉諾·沃金斯（Gino Watkins）領軍，他們的目標是在大陸冰蓋上蓋一座氣象站，並蒐集籌設歐洲—北美空中走廊所需的資料。他們將基地營設在格陵蘭東南海岸，並在西北方一百三十英哩（約二〇九公里）、海拔八千五百英呎（約二五九〇公尺）處擇地作為氣象站的場址，他們有把握能在那裡蒐集到北極變幻莫測的氣候情報。難以想像世界上還有什麼地方能比那裡更遙遠，舉目所見盡是一望無際的白雪，延伸至地平線的遠端，一座渺無生機的極地沙漠。

沃金斯事先規劃以兩人一組，每四到六週輪替一次的方式在氣象站駐點。十二月初，輪到科陶德駐守時，狂風暴雪嚴重影響遠征隊的物資供給，剩下的食物和燃料不足以支撐兩個人安然過冬。但科陶德不放棄，他自願留下，獨自駐守氣象站。這樣一來，剩下的食糧便足夠讓一個人吃上五個月；他也不想回去基地營，因為這時氣溫已經降

至零下四十四度，他的腳趾已經凍傷。同伴們縱使百般不願也只能同意。他們辦了一頓耶誕歡送晚宴，雖然距離真正過節還有三週，但以當時情況來說已經相當奢華，菜色包括：野味湯、橄欖油炸沙丁魚、油烤雷鳥、葡萄乾布丁佐蘭姆酒醬、主菜「乘坐雪橇的天使」^[1]、椰棗葡萄乾甜點、百果甜餡醬、果醬以及摻水的熱烈酒，和著茶一飲而盡¹。兩天後，科陶德目送隊友步履蹣跚地穿越冰層，往海岸走去，身影漸去漸遠，最後凝縮成東南地平面上的微小黑點。「現在就真的只剩我一個人了，身邊沒有狗，甚至連半隻蚊子都沒有。」他如此寫道²。

但科陶德在日誌裡並未透露他孤單的心情。他預計隊友們再過幾週就會回來，在此期間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他每四個小時要查看一次氣象數據，並儘可能剷除氣象站外牆的積雪；他悉心維護工具裝備、檢查物資用品，用煤油爐煮食，照料凍傷的腳趾頭。閒暇之餘，他就讀前人留下的書——《浮華世界》、《簡愛》、《馬丁·翟述偉》（*Martin Chuzzlewit*）、《釣客清話》（*The Compleat Angler*）。有時候，他也自己下棋，唱著英國劇作家吉伯特（William S. Gilbert）與作曲家蘇利文（Arthur Sullivan）的歌劇（科陶德自述是「可怕的魔音但沒有人聽過」）³，或是設計他夢想中的帆船，並規劃和未婚妻來一趟蘇格蘭西岸航行之旅。但情況變得愈來愈嚴峻，正如他在日記中寫道：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左右，出去外頭鏟雪，睽違兩週第一次見到久違的太陽，有時半掩。今晚的極光美極了，彷彿紫色的煙霧花環不停搖擺舞動著，掛滿整片夜空。晚上十點，萬籟俱寂，外面靜得嚇人，聽不見半點雜音，就只有自己的心跳聲和血液在血管內滴答作響⁴。

二月二十六日：狂風終於停了，天氣變得晴朗寒冷，雖然依舊吹著西北風……剩下最後四加侖的煤油，再過三到四星期，要是再沒人來，我就要被凍僵，陷入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我若有幸回到基地，說什麼都不可能再回到這片冰原。他們到底何時才會來呢？天才曉得⁵。

三月一日：我很滿意現況，除了每隔三小時就得鑽過隧道爬到外頭去很煩人之外。救援小隊應該趁著上週的好天氣出發了，運氣好的話，他們在月底前就會抵達。雖然僅靠罐頭口糧還能撐到現在的確不可思議，但可以的話我還是想吃點新鮮的東西⁶。

此刻雪勢愈來愈猛烈，不斷打在外牆上，使得他連挖洞都有困難。到了三月中，氣象站入口被徹底封死，他在旁邊的雪屋屋頂上挖了一個洞，但不到幾小時也被封住了。霎時間，他被埋入永無天日的黑暗中，只剩下一根細通風管成為他與外界唯一的聯繫。他的食糧和物資愈來愈少，肌肉開始萎縮。

四月五日，復活節：獨自駐守已過了四個月，沒有半個人來救援。只剩一杯煤油和一兩根蠟燭。幾乎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巧克力吃光了，菸草也快抽完了（只剩半袋）。去年的復活節我在法爾茅斯（Falmouth）度過，前年在阿伯茨伯里（Abbotsbury），今年卻淪落至此，多麼戲劇化的人生際遇！只要能重溫當年的生活或是回到妳身邊，心愛的，無論付出任何代價我都願意⁷。每當我躺在黑暗中無法入眠，只能藉著想妳度日，不然實在太難熬了⁸。

四月二十日：只剩一根蠟燭，煤油幾乎用完了。整天躺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滿腦子只想著如何打造心目中的帆船，幻想著豐盛的美食。左腳腫脹，希望不是壞血病⁹。

科陶德不知道同伴何時才會來救他，或是說他們還活著嗎？

研究社會孤立與感覺剝奪（sensory deprivation）影響的心理實驗顯示，獨自被困在冰冷且不見天日的洞穴中長達數週，不管對誰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但時至今日，這種研究因為有道德疑慮而難以進行。早在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就有傳言指出中國透過隔離監禁（solitary confinement）的手法來「洗腦」在韓戰期間俘虜的美國戰囚，而美國和加拿大政府也躍躍欲試，試圖驗證其可行性。

美加兩國的國防部聯手出資，請美國哈佛大學及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醫學中心展開一系列研究計畫，花錢找來志願受試者——以大學生為主——蒙上他們的雙眼並關在隔音的小房間，阻絕任何有意義的人際接觸。用意是為了觀察他們在這樣的狀況下過了數天或數週後，會產生何種反應。但大部分實驗都被迫腰斬，因為這些學生變得非常痛苦，無法繼續配合。少數人撐了超過兩天，但許多人不到二十四小時便宣告放棄。

據報他們出現一系列驚人的症狀，包括：長期焦慮、定向力障礙（搞不清楚人時地）、情緒失調、恐慌發作（panic attack）、思考受損或非理性思維、專注力無法集中、極度不安，以及扭曲的視覺和聽覺感知。他們產生鮮明生動的幻覺，例如背著麻袋的松鼠大搖大擺地走過田野；史前動物在森林中行走；一排眼鏡沿著大街列隊行進[2]。有些學生甚至一下子就出現妄想、緊張性的木僵狀態（catatonic stupor）或精神病發等狀況¹⁰。麥基爾大學的研究主持人心理學家唐諾·赫布（Donald Hebb）寫道，研究結果「令我們非常不安……聽說中國人正在世界的另一頭洗腦他們的囚犯；另一端，就在我們自己的實驗室，我們發現只不過剝奪一個健康大學生平常的視覺、聲音和肢體接觸，才短短幾天就足以徹底動搖他的心志。¹¹」

要知道，意義大多是透過與他人接觸，進而從我們的情感狀態中產生，難怪人一旦被孤立，就會變得如此頹廢不振（影響更勝其他遭遇）。生物學家認為，人類之所以演化出各種情感，是因為它們能讓過著群體生活並從中獲益的人類祖先進一步相互合作。這些情感主要的功能是社交，要是沒人可排解我們的恐懼、憤怒、焦慮和悲傷等種種感受，幫我們確立其正當性，很快地，這些情感就會使我們產生一種扭曲的自我意識、知覺分裂或極度不理性。獨處太久，缺乏人際互動，調控我們社交生活的那一套系統就可能壓垮我們的理智。

那麼科陶德最後怎麼了呢？他的隊友歷經幾次失敗後，終於在五月五日回到氣象站，距離他們當初丟下他一人離開已過了將近五個月，此時從他受困雪中算起，也過了四十五天。他們慢慢走近氣象站，他好像已經死了。該區徹底被大雪淹沒，不見最近有人生活過的痕跡，只剩一面破爛的英國國旗、鐵鏟握把，以及各種從雪中露出頭來的氣象儀器。

遠征隊中的鳥類學家弗雷迪·史賓塞查普曼（Freddie Spencer Chapman）回憶：「整個地方瀰漫著一種詭異不尋常的荒涼氛圍。¹²」接著，瓦金斯發現了那一截露出的通風管。他渾身發抖，跪臥在管子旁朝地面大喊。這時傳來一聲微弱顫抖的回應，瓦金斯立刻挖開積雪、扯開帆布屋頂，找到了科陶德。他緊握科陶德的手不停甩動，說天候變幻莫測，使得他們遲遲無法動身。接著，他給他套上護目鏡，將他拉出地面，重見天日。

科陶德如此描述他獲救的過程：

突然間，外頭傳來駭人的聲響，彷彿一輛公車駛過，緊接著是一陣混亂的吼叫聲。我嚇死了，是房子終於塌下來了嗎？下一秒我立即意識到，外頭有人，那是活生生的真人朝著通

風管大喊傳來的聲音。當下實在太美妙了，我說不出半句話也不知道該如何反應。我大喊回應，結結巴巴講了一些在當時顯得相當沒用的廢話¹³。

他現身時整個人看起來就像《舊約聖經》中被派來預言天啟的隱士，或者如查普曼形容：「他簡直就像從上阿瑪高（Ober-Ammergau）走出來一樣。」他指的是一座位於德國巴伐利亞的小鎮，過去在一六三〇年代曾經為了預防鼠疫而封城。「他蓬頭亂髮，滿臉鬍子，臉上沾滿菸渣和污垢。¹⁴」但科陶德只抱怨「因為缺乏運動，感覺有些虛弱」，除此之外其他各方面都宣稱「狀況非常好」¹⁵。這或許是那個年代特有的時代精神：堅苦卓絕，面對逆境仍處之泰然。照片中，科陶德看起來骨瘦如柴，有些憔悴，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神智相當清楚。他在日記中對於自己在獲救前後的心理狀態著墨甚少，但無論是瓦金斯、查普曼或其他同伴的文字紀錄，都未曾表示他飽受折磨。好不容易歷劫歸來後不到一週，他又和朋友史考特（J. M. Scott）跑到格陵蘭東岸山上獵雷鳥去了。



圖九、奧古斯特·科陶德在冰天雪地中過了五個月與世隔絕的生活後，終於重見天日。

此後，科陶德過著精彩豐富的人生。他與未婚妻莫莉（Mollie）——日記中那位「我最親愛的」——結婚，生了六名小孩。他自己組成探險隊遠征格陵蘭，也在二戰期間為海軍情資部門工作，後來還被任命為艾塞克斯郡郡長、擔任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榮譽祕書。他開著最愛的帆船「二重奏號」在海上度過許多快樂時光，最後於一九五九年罹患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逝世，享年五十四歲。

二〇〇九年，科陶德的姪孫女克蘿伊（Chloe Courtauld）追隨他的足跡，首開先例重現了他的北極之旅¹⁶。她花了很多時間思考為什麼科陶德被困在冰雪底下這麼久，好不容易脫身，身心卻幾乎毫髮無傷，這確實相當不簡單。她認為這和他自己設定的日常慣例、定期蒐集氣象資料和律己甚嚴的內務整理等工作有很大關係。很可能他的性格本來就特別剛毅，使得他心智異於常人。也許他天生超然的心態也是原因之一，又或是他眾所皆知的古怪行徑使然，誠如莫莉形容：他「幾乎不把普通行為的正統性當作一回事」。¹⁷

還有另一種假設：他之所以能保持心智健全，是因為他感受到與同伴緊密的團結，使他得以超脫現實中的監禁桎梏，在精神上與他們同在，並且相信他們早晚會找到他。

「我知道，就算吉諾得等到天氣好轉才能動身，他從來不會讓我失望。」他在自傳裡寫道¹⁸。他在遠征隊的官方紀錄中提及，他有信心，再過幾週，救援隊就會出現，「身邊有某一種來自外部的力量正支持著我，命中注定我不會死在格陵蘭冰原上」。¹⁹從他的文字敘述就能明顯看出來，他經常想著那些要來救他的人，誠如為他撰寫傳記的尼可拉斯·沃拉斯頓（Nicholas Wollaston）所言，這種意念「猶如一條細如絹絲的連結，像血管般沿著半英哩長的旗繩，從冰原氣象站一路接回海岸邊」²⁰。

這就是一群人跨越千里的力量，在看不見的遠方，起著某種令人毛骨悚然的作用。科陶德的好友史考特認為，在人類各種感情連結中，「沒有任何一種比北極探險的革命情感更牢固。²¹」這番話讓人不禁想起艾普斯雷·薛瑞—葛拉德對一九一一年南極遠征隊夥伴的看法（見第六章）。套用神學家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的說法，「孤單」（loneliness）與「獨處」（solitude）的差異在於：前者表達的是孤獨的痛苦，後者彰顯的則是榮耀²²。孤單是一條射往內心的拋物線，通往深沉的痛楚，形成抑鬱苦悶的弧拱；獨處則是朝外射向全觀的宇宙覺知（cosmic awareness），通往更大的自我意識。科陶德心中不斷想著他的同伴，形成「獨處」的狀態。米爾頓（John Milton）在《失樂園》（Paradise Lost）寫道：「心自成一片天地，俯仰其間／天堂可化為地獄，地獄亦能變成天堂。」²³，對此他深信不疑。

科陶德和許多冒險家一樣，超越自我，將目光投注在遠方的夥伴、上帝，甚至周遭的風景之上，得以度過獨處的時光。三年後，美國海軍軍官兼飛行員理查·伯德（Richard Byrd）也在南極洲完成了幾乎一模一樣的壯舉。他自告奮勇獨自留守位於羅斯冰棚中央、距離探險隊海岸基地一百二十三英哩（約一百九十八公里）遠的氣象站，在零下八十二度的低溫下度過暗無天日的酷寒嚴冬。他的生活空間——一棟粗陋的木屋——和科陶德的雪屋相比，顯得相當豪華。他透過簡單無線電與基地營的夥伴保持聯繫，這些人仍正式受他指揮。此外他也使用過留聲機。

儘管如此，他還是免不了面對隔離監禁狀態下「令人頭痛欲裂的孤單」，每每醒來，總是發現自己「身處星際的寒冷地帶盲目摸索，既茫然又困惑……這是哪裡？我在這裡做什麼？」²⁴」同時他還得忍受

爐子和發電機故障產生致命的一氧化碳，害他變得虛弱無比、神智不清，只能裹在睡袋裡認真思忖著，要是把這些明知正一步步置他於死地的機器關掉，毫無疑問的他也會跟著凍死。但他卻拒絕透過無線電求救，因為他不想讓夥伴冒著生命危險在南極嚴冬中長途跋涉，這項艱難的壯舉過去只發生一次^[3]。同時，他篤定認為，萬一自己真的倒下，失去意識，「那股集結百人信念、為了某個偉大目標而努力的短暫張力，也會跟著煙消雲散。²⁵」身為領隊，他堅持負起責任，在如此惡劣的狀態下咬牙撐了四個半月，直到有人發現他在無線電通話中神智愈來愈迷離而開始起疑，才不顧一切趕來救援。最後他們發現時，他幾乎不成人形，宛如一具「有如稻草人枯瘦，蓬頭亂髮、目光如炬的幽靈²⁶」——但心理狀態卻相當穩定。

要是夥伴無法像變戲法般及時現身馳援，也可以發揮想像力召喚他們。登山家喬·辛普森（Joe Simpson）最知名的事蹟，是他在祕魯攀登安地斯山時發生意外，不得不讓同伴賽門·耶茨（Simon Yates）割斷繩索，留他在山上自生自滅。最後他卻拖著斷腿成功自行下山，順利生還。他在絕望之際，腦中產生幻覺，以為耶茨和另一名夥伴與他同行，就在看不見的某處亦步亦趨地跟著：

我笑了，想到有人陪著我，隨時可以伸出援手，覺得相當開心。只要喊一聲，他們就會現身，但我不打算這麼做。他們始終走在後面，不見蹤影，但我心裡明白，他們就在不遠處²⁷。

義大利登山家萊茵霍爾德·梅斯納（Reinhold Messner）於一九八〇年成功獨自登上聖母峰北側，過程中始終堅信身邊有個無形的夥伴陪著他，他甚至將食物分成兩份，還擔心兩人要如何擠進他的小營帳。這並非他第一次在爬山時感覺到某種幽靈般的存在，他將這種經驗合理化成一種求生機制：「身體正在設法創造陪伴。²⁸」挪威心

理學家桑姐訪談過不少探險家，想知道他們如何應對極端環境。她也同意，透過想像來超脫個人的現實處境，是一種常見的因應行為（coping behavior），人們得以安然度過危機。「這讓他們更有安全感，感覺不那麼孤單。」

類似的心理機制也能解釋，為什麼遭遇船難而流落遙遠荒島的水手會將無生命的物體人格化，有時候還會憑空幻想出一群夥伴組成虛擬的密謀集團，共度獨處時光；以及為什麼單人出海的帆船手會和他們的船建立情感關係。這聽起來雖然相當瘋狂，卻更彰顯此心理機制的影響。二〇〇五年，艾倫．麥克阿瑟（Ellen MacArthur）駕駛她暱稱為「莫比」（Mobi）的三體帆船 [4] 打破單人帆船環球世界紀錄。航行過程中，她在寫給後援團隊的電子郵件裡總是署名「愛你們的艾和莫比」；而她在書中描述成功抵達法國西北部的終點線後，她默默感謝莫比過去七十一天以來陪她經歷各種千辛萬苦，從頭到尾都以「我們」而非「我」自稱：

我們之間毋需隻字片語，僅透過她獨特的語言彼此交心，在我睡覺的時候，她輕輕搖醒我，讓我知道她需要我幫忙……她總是看顧著我，正如我一直守望著她。要是船有靈性，絕對非她莫屬²⁹。

曾於英國陸軍傘兵團及空軍特勤隊服役的湯姆．麥克林（Tom McClean），在一九六九年成為首位獨自划船橫渡北大西洋的人。毫無疑問，他寧可跳船也不想陷入那種難以自拔的多情善感中。這位剛毅隨和的男子住在蘇格蘭高地的海灣邊，那一帶我相當熟悉。我曾多次划船經過他的住所，窺探那一整排停泊在灣岸邊各式各樣的船隻，怎麼看他都不可能駕著那些船成功航越大洋（其中包括世界最小的帆船 [5] 以及一艘外觀像瓶子的船）。他的策略就是下定決心，訂立明確目標並堅持到底，絕不輕言放棄。據他表示，這項特質是他從小

在孤兒院長大所培養出來的。「我通常會堅持不懈並放手去做。」他說。「我出海時，整個人就像走在隧道裡，眼界變得非常狹隘，整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划船。這三件事，只要有一項做不好就無法前進半步。」然而就連他也承認，自己和船隻與船上所有東西之間隱含著某種關係。「你的每樣東西都是獨一無二，專屬於你，包括食物、衣服、設備。某種程度上，你們就像一個團隊，就只有你和裝備。它們就是你在這世界上僅有的一切。」

對於許多沒有隊友陪伴的探險家來說，自然景觀本身可以取而代之，助他們抽離孤單的內心世界，融入周遭環境的瑰麗壯闊之美。科陶德在冰天雪地蟄伏長達三個月後感嘆：「在這種絕境下，世俗的煩憂顯得多麼微不足道。」「這裡的一切，包括那些令人恐懼的物事，以及讓宇宙萬物繞行太空的力量，是如此宏偉而可畏。³⁰」在南極，伯德深刻體會到何謂天人合一，為此震懾不已：「宇宙深奧莫測的種種過程與力量如此和諧卻悄然無聲……那一瞬間，我真切感受到人與宇宙本為一體，毫不懷疑。³¹」對太空人而言，從機艙舷窗望出去，驚奇凝視著地球——就像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形容的「那顆小巧可愛的藍色豌豆粒」——也有異曲同工之妙³²。這種可以全神專注於心像（mental imagery）的能力，也許是單人探險家更受用的人格特質，為旅人帶來冥想體驗或改變其意識模式，紓解長途跋涉的單調與勞頓³³。

獨處可以是一種幸福的狀態，適應良好的探險者在獨處時可能會比有同伴支持的情況下過得更好。專門研究隔離監禁影響的法醫精神病學者史都華·葛雷森（Stuart Grassian）認為，在所有監禁方式中，兩個人一組致病的可能性最高，雙方容易逐漸產生猜忌、多疑及強烈敵意³⁴。當初在南極，伯德不贊成同時留下兩個人，因為他推論他們勢必會「互揭瘡疤，看彼此不順眼……哪怕只是因為簡單的日

常例行公事做完了沒事幹，就只好彼此打量，互探斤兩。³⁵」但對於獨自行動卻無法戰勝孤獨——或至少從中找出某種意義——的人來說，他們就只能走上分道揚鑣一途。孤單成了他們心頭上不可承受之重。

沒有任何例子比得上柏納德．摩特歇（Bernard Moitessier）和唐納德．克洛赫斯特（Donald Crowhurst）的故事，更能錐心刺骨展現出孤獨能載舟亦可覆舟的力量。他們兩人是一九六八年「週日泰晤士報金球盃環球帆船賽」（Sunday Times Golden Globe Race）的競爭對手，該競賽的獎盃將頒給最快完成單人不間斷繞行世界一周的帆船選手，結果由羅賓．諾克斯．約翰斯頓（Robin Knox-Johnston）贏得，他花了三百一十三天，是九名參賽者中唯一成功完成這項壯舉的人。他似乎相當享受與自己的船在海上的獨處時光，但還是比不上摩特歇這位來自法國的苦行者，他會在甲板上做瑜伽，用起司餵食尾隨的海鷗。摩特歇對這種體驗十分愉悅滿足，但一想到要回歸文明世界就滿心厭惡。即便他勝算極大，最後仍然決定棄賽，不斷繼續航行，直到再次繞行地球超過一圈半後才終於在大溪地上岸。「我不停地持續前進，是因為我在海上過得很開心，或許也是因為我想拯救我的靈魂。³⁶」他說。另一方面，克洛赫斯特一開始就出師不利。他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離開英國，同時對於回報的預計行程造假，本來打算航行南方海域，但事實上他從未離開大西洋。他漫無目的地沿著南美洲海岸漂流了幾個月，整個人變得愈來愈抑鬱孤單。最後他回到船艙內，將他的幻想寫成一篇凌亂無章、長達二萬五千字的哲學文章，隨後跳海自盡。他的遺體始終未能尋獲。

二〇〇四年十月的某個深夜，當時我人在耶路撒冷，正要穿越城市東區走回飯店，途中巧遇了某位多數色列人眼中的頭號叛徒，但

在國外卻是足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肯定的告密英雄。一九八六年，莫迪凱．瓦努努（Mordechai Vanunu）因為向《週日泰晤士報》記者彼得．侯南（Peter Hounam）爆料，洩漏以色列暗中進行核武計畫的機密情資而聲名大噪。當時他確信以色列發展核武的野心是為了破壞中東局勢的穩定。但在該篇報導見報的前幾天，瓦努努被以色列情報人員挾持，隨後入獄被關了十八年。我遇見他時，他才剛出獄半年，獲釋的條件相當嚴苛，限制重重。我一眼就認出他來，因為我對他的故事很感興趣，他還在服刑時就曾寫信給他。當時他回覆說自己被「徹底對外隔離」，沒什麼機會接觸媒體，還希望將來能離開以色列，走得愈遠愈好（但他還是走不了）。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他看起來比想像中還瘦小，走路時縮著身子，像在躲避黑夜似的。我對他的一雙濃眉和頸間的金色十字架（兩年前他放棄了猶太教，改信基督教）印象深刻，但重點是，他當時看起來非常緊張。

聽完他的故事，就不難理解他為何有這種反應。翌日我和他坐在聖喬治大教堂的花園裡，一處與世隔絕的僻靜之地，那是他在東耶路撒冷隱居的住所。他娓娓道來被監禁的那段日子，當中有十一年半被隔離監禁。他在沒有窗戶的小牢房之間來來去去，頭被套上麻袋，不知身在何處，對於周遭環境一無所知，也看不見外面的風景。審訊人員不准他與律師及家人聯絡，連一通電話也不能打。一年後，他們給了他一臺電視，卻切斷他最喜歡的節目的訊號；他們試圖擾亂他的睡眠，日夜永不熄燈，逼他過了兩年沒有黑夜的生活。他們還放了一臺攝影機，二十四小時不間斷拍攝。他們勸他自我了斷，還扣留他的信件，不斷製造噪音，剝奪他的一切自主感（sense of autonomy）。無論醒著或是睡著，他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掌控之中。「你看過《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嗎？」^[6]他喊道。「我在裡面過的就是這種生活。」

出獄當天，瓦努努在全世界媒體面前，宣告以色列國安單位曾試圖奪走他的理智但未得逞。他的前任律師阿維格多．費爾德曼（Avigdor Feldman）稱他「是我見過最頑強、有原則且最堅強的人。」面對被隔離的孤獨，他應付得似乎比許多人好。然而，就在我們談話過程中，顯然這段經歷也對他造成深刻的影響。他疑神疑鬼，認為國安單位仍分秒不停地監視他，擔心他們干擾他的電視訊號，還擔心我的錄音機可能正在暗中傳送我們的對話內容。他提出奇怪的陰謀論，認為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係死於法國和其他擁核政府之手，原因就在於他曾試圖阻止以色列取得核武；另外，英國工黨領袖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真正死因是謀殺，而非心臟病，目的是為了讓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接任，帶領工黨迎戰下屆大選。瓦努努相信世上存在著一個祕密的世界政府，操控人們的一舉一動和思想。

從瓦努努在獄中寫給侯南的信，可明顯看出他的妄想症狀，我在侯南的同意下看了幾封。一九九七年，經過十年多的隔離監禁，瓦努努說服自己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英國密謀發動的，目的是為了「說服美國製造並使用核武」，這樣一來英國就能暗中進行人體實驗，測試自己的核武技術。他也堅信英國間諜就是造成一九二九年華爾街股市崩盤、三〇年代德國納粹主義發展、俄羅斯革命及毛澤東崛起的幕後黑手。

此外，英國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和其他航空業者都收了英國政府的錢，奉命載運間諜往來世界各地，這就是他們得以維持償付能力，免於破產的唯一原因³⁷。瓦努努深陷於自己憑空捏造的幻想中，唯一的束縛就是想像力侷限的框架，然而在孤立的情況下，他的幻想根本無邊無際，沒人控制得了。

不同於科陶德、伯德等人，瓦努努的情況就是一般非自願遭受監禁者的寫照，他們毫無心理準備，又缺乏有組織的支持網絡扮演心理支柱來緩解其孤立狀態。關押在美國超高度安全管理監獄（super maximum security prison）的二萬五千名囚犯證明了這一點。幾十年來針對該監獄受刑人心理的研究顯示，大多數人每天被關在牢房裡長達二十三小時，導致嚴重的心理創傷，症狀包括恐慌發作、焦慮、失控、非理性的發怒、偏執、幻覺、過度反芻思考（rumination）、抑鬱、失眠、對外部刺激過度敏感、強迫性思維、認知功能障礙、自殘及各種可能使他們難以在一般社會中正常活動的社會病態³⁸。百分之二十二到四十五的人罹患重度精神疾病或腦部損傷³⁹。獄中自殺人數亦多到不成比例：光在二〇〇五年，加州發生的自殺案件，將近百分之七十是隔離監禁⁴⁰。囚犯監禁時間愈長，傷害愈大，復原所需時間就愈久——如果有可能的話。

以下是精神科醫師葛雷森親眼見證超高度安全管理監獄受刑人常見的病症：

（他們）變得很容易陷入沉思，相當在意某些察覺到的輕視或刺激、從隔壁牢房傳來的聲音或氣味，或者——也許是最常見的一——身體的某些感覺。（他們）飽受折磨，一直想著這些事，無法自拔。在隔離監禁的狀態下，一般的刺激變得非常惱人，就連煩人的瑣事也足以令人發狂……我研究過無數隔離監禁者，有些過度執著於某些細微到幾乎無法察覺的體感，時間一久這種疙瘩就演變成擔憂，最後變成一種耗盡心神、危及性命的疾病⁴¹。

心理學家認為，這種因長期監禁而造成的恐懼，主因之一就是缺少社會互動。受刑人很難維持對自己的認同與情感的適當性，並保持他們與廣泛外界社會間的連結。「（他們）無法驗證幻想的真實性，

容易演變成偏執多疑，也無法控制隨著每次察覺受辱而加劇的憤怒情緒。⁴²」法醫精神病學者泰瑞．庫柏斯（Terry Kupers）如此解釋。過去三十年來，他在美國、歐洲、非洲各地訪談過數千名超高度安全管理監獄囚犯，評估其心理狀態。他說，用日常生活的例子來比喻，就像：

我走進房間，一進門，有兩個人本來正在交談，隨即降低音量。我一度以為他們正在講我，所以我踏進房間時他們才要把聲音壓低。我迎上前去，兩人親切問候，消除了我多心猜疑而誤判的幻想。這種真實性的檢測在你我日常生活中天天上演，但隔離監禁的受刑人卻沒有機會與願意傾聽的朋友一同查證那些或許只是偏執的揣想。

美國研究囚犯心理健康的權威專家克雷格．黑尼（Craig Haney）發現，部分受刑人會故意與獄方人員發生激烈衝突，就只是為了重新確認他們自身的存在，提醒自己是人而不要忘記自己是誰⁴³。許多囚犯忍受多年的隔離監禁，但不良後果在入獄幾天後就明顯可見。曾在阿富汗及古巴的關塔那摩灣監獄被美軍拘禁兩年多的英國人沙菲克．拉蘇爾（Shafiq Rasul）表示，他被隔離監禁才一個星期，就覺得自己快瘋了。過了五、六週之後，他終於承認美軍審訊人員的（不實）指控，供稱曾見過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因為他「實在太想快點解脫，最後決定放棄掙扎。⁴⁴」（這足以說明為何隔離監禁在很多情況下形同酷刑，是相當不可靠的問訊手段⁴⁵）美國人莎拉．舒爾德（Sarah Shourd）二〇〇九年在伊朗與伊拉克庫德斯坦（Kurdistan）邊境登山時遭伊朗軍隊逮捕，被拘禁在德黑蘭的伊文監獄（Evin prison）一間僅約四坪大小的牢房裡長達十三個半月，也遭遇類似的痛苦：

經過兩個月幾乎與世人隔絕的日子，我開始神智不清。有幾天，我聽見走廊上傳來幽靈般的腳步聲，我幾乎整天蹲趴在地上，透過門上的小縫專心聽著外頭的動靜。透過眼角餘光，我開始看見閃爍的光影，但環顧四周卻什麼都沒發現。不只一次，我用力拍打牆壁，打到指關節流血、哭到精疲力盡。有一次，我聽見有人在尖叫，直到感覺有某個友善的獄卒雙手捧住我的臉，試圖讓我清醒過來，才發現那尖叫聲是我自己的⁴⁶。

像舒爾德這樣的普通人是最脆弱的受害者，因為他們是突然被抓去監禁。他們的世界一下子天翻地覆，但這些遭遇卻無法讓他們從中獲得任何意義——像是有苦難言的犧牲或是為了更大的利益而咬牙苦撐。他們必須獨力建構一個疏離淡漠的視角，對於獨處的人而言，是相當艱鉅的任務。

侯賽因·沙赫雷斯塔尼（Hussain al-Shahristani）卻做到了。他是前伊拉克總統海珊的首席核能顧問，後來因為基於道德考量拒絕與政府合作研發核武而遭受酷刑。他在長達十年的隔離監禁中，沉浸在抽象的世界裡，努力解決自己想出的數學問題而得以保持心智清醒⁴⁷。目前他擔任伊拉克的能源部副部長一職。醫療學者伊迪絲·博恩（Edith Bone）同時也是位譯者，她在二戰後被匈牙利共產黨政府監禁長達七年，亦採取了類似策略：她用餓掉的麵包做成算盤，計算她運用自如的六種語言所累積的字彙總量^[7]。艾哈邁德·伊拉希迪（Ahmed Errachidi）被無辜關押在關塔那摩灣監獄的五年半期間，躲在自己的想像世界裡，「飛越假想的地平線，仰望太陽，看見耀眼光芒……在我腦海裡，想去哪就去哪。⁴⁸」



圖十、關塔那摩灣拘留營的牢房。

泰瑞．魏特（Terry Waite）也是一例。他曾被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挾持長達五年，其中有四年被隔離監禁。但他在一九八七年一月被挾持時，是以英國國教會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特使的身分與黎巴嫩交涉釋放其他人質，因此他相當瞭解這些風險，也早已做好最壞的打算。他會這麼做同時也是基於信仰，決心「抱持大愛」自我犧牲。魏特是個慈悲的好人，他在自傳中對監獄守衛的關心絲毫不比自己少⁴⁹。與魏特同一時間被監禁的美國人法蘭克．里德（Frank Reed）下場就沒那麼好了。曾與他短暫同室的獄友布萊恩．基南（Brian Keenan）和泰瑞．安德森（Terry Anderson）指出，隔離加上虐待，導致他變得極度孤僻，精神幾近陷入緊張狀態⁵⁰。他拒絕運動，會用毛巾蓋頭或蒙上眼罩，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他迷失在另一個現實中。雖然他獲釋後出現酗酒問題並住進精神病院，但後來似乎恢復了。

對軍方人員來說，縱使在戰時敵人會試圖藉此從其口中套出情報，這種遭遇可能也不至於那麼難以承受。精神科顧問科隆．弗萊徹（Keron Fletcher）曾協助詢問並治療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初期被拘禁在黎巴嫩的西方國家人質，他表示自己在英國皇家空軍服役期間參與的拘留訊問模擬演練，有助軍人對被敵人俘虜的衝擊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他們教你基本的應對技巧，同時你也知道隊上兄弟們正努力設法將你毫髮無傷的救回來。我認為軍人不太可能陷入無助或絕望的境界。無助和絕望是相當可怕難忍的感受，會一點一滴磨耗掉你的士氣與應變能力。」

美國參議員約翰．麥侃（John McCain）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充分展現軍人思維如何賦予戰俘心理優勢。他在越南當了五年半的戰俘，在此期間他抵死不從，拒絕向審訊者屈服，甚至以激怒他們為樂，就算被嚴刑拷打也無所謂。實際上，這些遭遇將他鍛鍊得更加強

韌。但值得注意的是，提到被隔離監禁的那兩年，他不得不說：「單獨監禁非常可怕，會徹底擊潰你的精神，使人無力抵抗，比任何一種形式的虐待更有效……絕望一觸即發，那才是最難對付的敵人。⁵¹」

對團隊的效忠固然能夠支持被俘虜的士兵熬過審訊及監禁之苦，但敵人也會利用這一點來對付他們。情報官員明白，雖然對團隊的忠誠能夠激發頑強的抵抗，但這股凝聚力一旦瓦解，當囚犯知道戰友背叛了他們共同努力的目標，即使意志最堅定的人也會灰心喪志，無法堅持到底。若每個人都抵死不從，審訊者會使計讓他們誤以為有其他人不敵而屈服。《美國陸軍戰場手冊》（*The US Army Field Manual*）針對情資蒐集，建議利用被拘禁者愛護隊友的心意⁵²作為手段，例如說服他只要提供情報就能保全同伴性命，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條^[8]。更狡猾的作法是利用他對家人的牽掛，伊拉克前總統海珊將這一招發揮得淋漓盡致。前面提到的沙赫雷斯塔尼在被隔離監禁之前，曾受到長達三週的審訊與精神折磨，他說：「在那些拷問室裡，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聽到兒童被凌虐而尖叫哭喊，逼得他們的父親不得不認罪。⁵³」

某天下午，我從耶路撒冷開車前往古老的海港城市阿什克隆（Ashkelon）一處幽靜的街區，去見一位深諳如何讓囚犯開口講話的人，他毀譽參半，仇視與仰慕他的人數不相上下。麥可·庫比（Michael Koubi）效命於以色列國家安全局（Shin Bet）長達二十一年，其中有六年擔任首席審訊官。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三年間，他訊問了上百名巴勒斯坦人，包括許多恐怖分子。他的名聲響遍全局，就連受過他毒手的受害者也莫不聞風喪膽。

我故意用「受害者」這個字，因為就算不施予身體上的壓力——他宣稱從來沒必要這麼做——審訊人員常用的恫嚇、脅迫和精神霸凌等手段也會在對方心中造成難以磨滅的傷痕。後來我約見了幾名巴勒斯坦囚犯，他們曾接受庫比手下的審訊，即使過了十年，留下的心理創傷依舊深刻難解。

庫比約一百八十三公分高，瘦骨嶙峋，臉型稜角分明，十分削瘦，即使笑起來依然不見幾分柔和，樣子看起來就像昆汀·塔倫提諾（Quentin Tarantino）電影中常見的偵訊長官。他彷彿是從漫畫中走出來的人物。他坐下來，示意要我坐近一點，近到我幾乎能看見他經常骨折的鼻子上微細的血管。他穿著一件紅襯衫，說話時眼神專注，炯炯有神。我永遠記得他注視我的樣子，我想許多巴勒斯坦人也和我一樣，對他的眼神永生難忘。

我最想問他的問題，同時也和本章息息相關，就是他如何「打破」艾哈邁德·亞辛的心防。亞辛是巴勒斯坦「哈瑪斯」組織的精神領袖（見本書第三章），於二〇〇四年被以色列暗殺。他針對以色列軍民策劃了數十起致命的恐怖攻擊，庫比表示，他是「我所見過最凶殘無情、邪惡無良的人。」他曾於一九八九年對亞辛進行長時間的審訊，據他表示，起初亞辛拒絕合作，完全保持緘默。因此，他決定與他討論《古蘭經》來引誘他開口說話。亞辛對《古蘭經》這個話題相當有自信：

我對他說：「我們來比賽。我來問你一個有關《古蘭經》的問題，要是我贏了，我就可以問第二個問題，不限主題，而你必須照實回答。」他對自己很有把握，確信會贏過我，但當我開始提出複雜的問題時，他卻不得其解。人在獄中，記憶會變差，會開始忘記一些事情。例如，我要他告訴我《古蘭經》一百一十四章中，唯一一個不包含「mim」這個字母

的章名。他不知道。我接著問他《古蘭經》最長的〈黃牛章〉（Baqarah）中有多少節，他也忘了。於是我贏了，開始問其他問題⁵⁴。

但亞辛還是拒絕合作，於是庫比使出殺手鐮。他將態度已經軟化，開始配合的亞辛副手沙利赫．席德（Saleh Shade）帶進牢房。席德被罩上頭套，並不知道亞辛在場，開始毫無顧忌地大談哈瑪斯的軍事組織。

「當下亞辛就被說服了。」庫比說。「這是非常戲劇化的轉折。然後，我花了幾百小時與他共處，聽他說明哈瑪斯的意識形態。他甚至還要其他人與我配合。他要是有能力，應該會殺了我，但他尊重我。」

我無從證實庫比的說法是否屬實，儘管他對亞辛設下的圈套長期以來一直頗受審訊人員青睞，如法炮製應用在情感緊密的團體成員身上。在像偵訊室這種緊張高壓的環境中，幾乎沒有人不會受到同伴的影響。

就連亞辛這位全心奉獻於志業，備受崇敬的領袖也不例外。娜絲拉．哈珊（Nasra Hassan）致力研究伊斯蘭世界的自殺恐怖主義，與亞辛在他加薩家中有過多次訪談，曾經問及他被以色列囚禁的那段日子以及在獄中如何自處。他回答，他並不想念自由，而且那段經歷並未對他造成傷害或令他不安，原因之一是他有更多時間可以祈禱，再者他身邊也有許多巴勒斯坦同胞，其中不少人是哈瑪斯的成員。（在她與亞辛的面談過程中，哈珊發現他「非常開放、輕鬆、反應機敏又極富幽默感，且相當敏銳，十分聰明。」回想庫比對他的評價，說他是所見過最凶殘無情、邪惡無良的人，兩造乍聽之下似乎相互矛盾，

但實則不然——雖然按照我們的理解，人性很少會出現如此令人不安的複雜性。）

正如人身隔離未必會導致絕望的孤獨感，反過來說，就算有社交互動，也無法保證不會孤單。「處在人群中，我從未感到如此孤獨，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我處在一種完全的孤立狀態。」神學家田立克在沉思「孤單」與「獨處」時，如此有感而發⁵⁵。日常生活中，每個人偶爾會體驗到被社會排斥（social rejection）的痛苦⁵⁶。乍看之下，這是一種健康的反應，一種促使我們與他人互動藉此建立生存所需的社會連結（social connection）的進化狀態。然而，孤獨太久會產生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

社會孤立能激發免疫反應——壓力賀爾蒙激增及突然出現發炎症狀——對健康影響甚鉅。長期孤單寂寞的人血壓較高，同時更容易受到感染與生病。他們睡眠品質差，容易濫用藥物或染上酒癮。他們很難保持專注，邏輯和語言理解能力變差，罹患阿茲海默症及失智症的機率亦高。雖然研究人員懷疑這些生理變化與最近發現基因表現蛋白質的方式會隨著社會環境條件而異，但背後確切的生理機制至今尚未明朗。但即使如此，結果依然相當明確⁵⁷。

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是研究社會行為如何影響大腦的重量級專家，他認為寂寞是造成健康欠佳的危險因子之一，嚴重性不亞於抽菸、缺乏運動、高血壓和肥胖等因素。但他說，真正關鍵就在於個人的主觀經驗——你覺得自己有多寂寞：

無論是在家陪伴家人、在辦公室與一大群聰明開朗、魅力十足的年輕人共事、去迪士尼樂園玩或是獨自坐在貧民區某間

簡陋骯髒的小旅館內，種種長期的孤立感會引發一連串的生理反應，這些反應實際上加速了你的老化過程……時間一久，這些生理變化會加劇，可能讓數百萬人未老先衰，英年早逝⁵⁸。

這樣一來，重點就不在於你認識多少人，而是友誼的品質。你在臉書上可能有五百名好友，但仍感到悵然若失。作為群居動物，對於深度互動的需求是深植在人類DNA裡的生命密碼。少了它，我們會變得萎靡不振，整個人的心神消失一半。九〇年代初期，從羅馬尼亞孤兒院被救出的院童，自出生以來幾乎未曾有過與人單獨一對一的社會接觸，長大後存在著嚴重的行為偏差和依戀問題，即使已經融入了充滿慈愛的寄養家庭，情況依然未見改善⁵⁹ [9]。成年時期的孤單，其影響通常是可以逆轉復原的，但這需要靠我們主動跨出去，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此即田立克所謂的「自我超越」（self transcendence）。卡喬波說，這與克服伴隨孤單而來的威脅感——孤立者對於世界的恐懼——有很大關係。他建議一開始先慢慢來，心中想著「嘗試從正面積極的社會互動中，獲得少量正向的感受」。他套用匿名戒酒會（Alcoholics Anonymous）的座右銘表示，通往健全社會連結的道路沒有盡頭，「我們不斷在進步中。」⁶⁰

社會疏離（social alienation）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雖然程度或許不及那些「解甲歸田」，退伍返鄉的士兵、水手和飛行員。還記得之前提到，在軍中，部隊其實更像家人，同袍間的深厚情誼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更是罕見。他們的相互依賴是毋庸置疑的。失去這種兄弟情誼，回到陌生的平民世界重新展開新生活確實很寂寞。這種體會對於越戰的退伍軍人而言尤其強烈，他們返國時不像二戰時期的同胞，受到全民熱烈歡迎，反之面臨的卻是反戰遊行、充滿敵意的媒體以及冷漠無情的群眾。這些退伍軍人非但沒有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

反而受到譴責。軍事心理學家戴夫．葛斯曼（Dave Grossman）表示，這種遭遇加深了他們在戰場上受到的心靈創傷，演變成「驚人程度的恐懼」⁶¹。現在已知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包括安慰他們在戰場上的所作所為皆有其必要性——對於維持退伍軍人的心理健康至關重要，有鑑於此，也難怪越戰堪稱美國戰爭史上精神傷亡最慘重的一役 [\[10\]](#)。

最近有研究調查伊拉克及阿富汗返國士兵的心理健康。結果再度突顯出在缺乏適當社會安全網的情況下退役的危險性。二〇一三年，倫敦國王學院研究團隊針對英國武裝部隊的現役及退役成員進行的研究顯示，回歸平民生活的退役軍人更容易同時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和常見精神疾患（如抑鬱症和焦慮症）。研究者歸結主因，就在於「失去社會鑲嵌（social embeddedness）[\[11\]](#) 和團體凝聚力」，換句話說，就是斷絕了緊密的情感聯繫，這通常令他們難以承受⁶²。

國王學院的法醫精神病學家蒂爾德．麥克馬納斯（Deirdre MacManus）另外發現，退役軍人犯下暴力罪行的機率，比起服役中的同袍還要高出百分之五十⁶³。她表示，離開軍隊回歸平民生活，這項轉變可能會形成巨大壓力。「假設這些人十六歲就入伍，大部分的朋友都在軍中；突然間與夥伴疏遠，他們還能找誰作為支持網絡呢？這些人可能會陷入嚴重的社會孤立中。」

數十年來，軍方精神科專家已注意到重返社會的危險。羅伊．葛林克（Roy Grinker）和約翰．史比格（John Spiegel）在一九四五年針對美國空軍進行了一項經典研究，調查他們在二戰期間如何適應作戰生活。在兩人合著的《受壓之人》（*Men Under Stress*）書中，他們指出，退伍軍人在服役期間，往往會將自己徹底融入部隊中，全心投入，以致於重返平民社會時，他們就得重新創造新的自我以建立個體性。此過程相當痛苦，可能導致精神疾病。問題是，剛入伍時，

士兵為了盡快進入狀況、展現效率，必須逼迫自己完全屈服於不民主的軍中環境，之後再慢慢適應。這時候問題就變成：

……美國士兵一旦習慣了這種立場倒退且淪為附庸的制約，能否靠著外界的援助，恢復獨立自主及健康？還是他必然無法適應新生活，履試履敗，身心失調？抑或他永遠在尋求一個強而有力的群體作為寄託，幻想過去軍中賦予他的那股力量？⁶⁴

會產生這些動態的不只是軍人。二〇一〇年，智利發生礦坑坍塌意外，有三十三名礦工受困地下長達六十九天，最後幸運獲救。但許多人在回歸正常生活後出現嚴重適應不良。這無疑是由好幾個因素造成，包括媒體馬戲團的新聞炒作，使他們全球知名，最後造成人心的貪婪腐敗。但也可能是因為這些人在充滿壓力的環境下共處這麼長一段時間——遠甚於其他礦災事件的受困者——不僅改變了他們之間的關係，連帶也改變了自身與妻子兒女及朋友的關係。電影製片安格斯．麥昆（Angus Macqueen）在翌年為了替BBC拍攝紀錄片，採訪了幾名當事人，他說：「他們在地下礦坑建立的革命情感和向心力，比家人之間的親情羈絆還要牢固。」⁶⁵

孤單、孤立、排擠等因素都可能導致身心疾病。在某些人身上，這種影響甚至更加極端。他們無法與周遭的人建立關係，於是將內心的疏離轉化成自我膨脹的暴力行為。冷僻的孤狼恐怖分子（lone wolf terrorist）就是這種心態。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安德斯．布萊維克（Anders Breivik）在挪威某個青年領袖訓練營上開槍射殺了六十九名青少

年，又在奧斯陸發動汽車炸彈攻擊，奪走八條人命。許多人都認為他瘋了，否則怎麼可能做出如此反常的行為？但一年後，法院判定他心智正常——只是過度自戀與狂妄，而非思覺失調或精神異常。他被判殺人罪定讞，處以挪威的最高徒刑。

然而，布萊維克確實與其他「孤狼」殺手有著共同的心理特徵，這些人包括泰德．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又被稱為「大學炸彈客」（Unabomber）。他於一九七八年開始進行了一場長達十七年的炸彈恐嚇行動，目的是推翻現代「工業科技體系」，因為他認為科技發展與人類自由牴觸，必須加以阻止⁶⁶；艾瑞克．魯道夫（Eric Rudolph）由於不滿美國政府支持墮胎政策而發動殺人威脅行動[\[12\]](#)。另外還有一九九五年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的主謀提摩西．麥克維（Timothy McVeigh）以及部分校園屠殺的凶手等。在與眾人息息相關的事務上，這些人似乎都很難與其他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他們被社會孤立，甚至被同樣有著極端意識形態的偏激團體拒於門外。卡辛斯基在蒙大拿州荒郊野外一棟沒有水電的小屋獨居了二十五年，哀嘆自己是「社會上的廢人」；麥克維和槍枝俱樂部的許多熟人都鬧翻了；布萊維克遭到右翼團體「保衛挪威聯盟」（Norwegian Defence League）刻意疏遠，因為該組織認為其觀點過於激進。據報導，二〇一三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凶手查納耶夫的哥哥塔姆蘭（Tamerlan Tsarnaev）也抱怨感覺被排擠，身邊沒有半個美國朋友。

臨床心理學家凱薩琳．派克特（Kathleen Puckett）相當瞭解這類人物的心態。她擔任FBI（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務長達二十三年，大部分時間專門研究國內單獨恐怖分子的行為。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八年間，她於大學炸彈客的調查行動中擔任首席罪犯行為分析師，直

至一九九六年四月卡辛斯基在蒙大拿小屋落網之前，她始終是隊上少數認定他就是幕後主謀的人。

二〇〇一年，FBI要求派克特深入調查誘發卡辛斯基和麥克維這類恐怖分子犯案的動機。她花了好幾個月時間翻閱他們的個人檔案，分析其文字內容，詳細描繪出這些人社交生活的樣貌。她指出，關鍵因素就在於疏離感。這不僅是這種人共同的特徵，同時也是其行為背後的驅動力。她表示：「單獨行動的恐怖分子並不好當。他們很孤單。這些人都迫切渴望並需要社會連結。他們無法與其他人順利建立連結，只好轉而尋求某種更超然且不會拒絕他們的對象，例如意識形態。事實上，這就賦予了他們動力，使其最後被社會認定為單獨恐怖分子。^{67]}

孤狼恐怖分子的特徵——與周遭格格不入、被所屬的社會群體排斥、懷抱充滿仇恨的意識形態——在許多所謂「校園殺手」身上亦相當常見。一九九九年的美國科倫拜高中校園喋血事件，凶手艾瑞克·哈理斯（Eric Harris）和狄倫·克萊伯德（Dylan Klebold）在校時經常遭到排擠，據兩人日記^[13]顯示，這似乎就是引發他們殘殺十二名同學和一名教師的原因之一。二〇〇七年在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中射殺三十二人的凶手趙承熙（Seung-Hui Cho），據認識的人表示，他很少與人往來，相當孤僻，在人群中顯得很突兀。二〇一二年，亞當·藍沙（Adam Lanza）在康乃狄克州山迪胡克小學開槍濫殺了二十名孩童及六名教職員工（在這之前他在家殺害了自己母親）。他患有相當嚴重的社會焦慮。這些案例明確顯示出此類犯罪者的行為模式。社會心理學家克拉克·麥考利（Clark McCauley）調查一九七四至二〇〇〇年間發生的美國校園攻擊事件，共計四十一名凶手的個人生平。他得到的結論是，除了一名例外，其他人都顯示遭到孤立或與社會脫節的跡象⁶⁸。另一項研究則調查一九九五年至二

○○一年間的十五起校園槍擊案，發現其中十三起的凶手皆曾遭受同儕的排擠、霸凌或拒絕⁶⁹。

顯然，單憑孤立本身並無法解釋所有非集體暴力行為。大多數感到被社會疏離或拋棄的人，並不會透過槍彈或炸彈來表達他們的沮喪。但我們可以這樣說：排擠（ostracism）具有強大的煽動力，我們每個人對於這種感受都非常敏感，會出自本能地想抵制它 [14]。沒有人自願選擇孤獨。被排除在外會讓人意志消沉，沮喪絕望。堪稱科學心理學家先驅的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早在一又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於探討社會自我（social self）的論述中就承認了這一點：

如果這種事情可能成真，再也沒有任何懲罰比起在社會中被放逐、任其自生自滅而被所有人徹底忽視來得更殘忍。要是我們走進屋子時沒有任何人轉身，說話時沒有人回應或關心我們做了什麼，遇到的每個人都對我們「視而不見」，把我們當成不存在的東西一樣，這時心頭會旋即湧上一股憤怒又無能為力的絕望，只能透過最殘酷的肉體折磨發洩解脫；因為惟有這樣做，我們才會覺得，不管處境變得多艱難，我們還沒有淪落到完全不值一顧的地步⁷⁰。

至此我們已經看到人們在面對社會孤立時，有各式各樣且往往不可預測的因應之道。我們思索，像科陶德這類大難不死的生還者，如何藉由不時想著遠方的夥伴，來幫助自己在冰雪之下安然度過五個月；也省思那些不幸受害者的際遇，比如美國人質里德，毫無預警就被關入黎巴嫩有如地獄般的監牢裡。我們還看到其他人——例如用麵包充當算盤的博恩——利用天生的強韌心理素質，戰勝了困境。

從這些堅毅而絕望的故事中，我們能夠獲得什麼啟發呢？顯而易見的一點是，當我們與他人脫節，斷絕與外界的聯繫，我們通常會變得相當耗弱；但換個角度評估，更樂觀的看法也同樣成立：即使是孤身一人，還是有可能建立連結，在自我之外找到慰藉。我們不應低估那些人賴以推倒監獄高牆或鑿穿冰穴的強大力量。這可能需要一點想像力，但重點是，我們要盡可能建立各種社會連結，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需要這股力量來扶自己一把。

[1] 譯註：原文「angels on sledges」，出自遠征隊紀實報導。內文見以下網址：

https://archive.org/stream/in.ernet.dli.2015.208588/2015.208588.Nothern-Lights_djvu.txt

[2] 原註：令陸空交通乘客擔心的是，長途航班的機師和卡車司機也傳出同樣症狀：他們看見巨大的紅色蜘蛛爬過擋風玻璃，還有許多想像中的動物橫越馬路等。

[3] 原註：這就是薛瑞—葛拉德口中「世界上最嚴峻的旅程」，他於一九一一年從南極埃文斯角跋涉到克羅茲角。見本書第五章。

[4] 原註：她花了七十一天又十四小時十八分鐘三十三秒，航行了二萬七千三百五十四英哩（約四萬四千零二十二公里）。

[5] 原註：這艘帆船名為吉爾茲帕號（Giltspur），在一九八二年載著麥克林橫渡大西洋。當時它的船身僅有九點九英呎（約三公尺），在成功橫渡大西洋的船隻紀錄中是體積最小的一艘。三週後，另一名美國人駕駛著比它短八英吋的帆船再度創下壯舉。麥克林不甘示弱，於是用鋸子將吉爾茲帕號鋸短二英呎，並於翌年奪回世界紀錄。

[6] 原註：這部電影於一九九八年上映，由美國影星金凱瑞（Jim Carrey）主演，描述一個男人活在人工搭建的世界裡，其日常生活被節目不間斷的監控下，成了一場真實的實境秀。

[7] 原註：她在《七年孤獨》（*Seven Years Solitary*, Hamish Hamilton, 1957）書中描述了這段經歷，以及她為了求生所進行的心智活動。

[8] 原註：自從二戰結束以來，審訊人員使用以及培訓時教授的方法，幾乎都一成不變；有關其成效的科學研究也付之闕如，根據法醫精神病學者羅伯特．費恩（Robert Fein），同時也是二〇〇六年美國政府針對審訊方法的檢討計畫主持人表示，這意味著審訊人員往往「隨便捏造」（參閱 www.fas.org/irp/dni/educing.pdf）。二〇〇九年，歐巴馬政府上任後改變作法，成立「高價值囚犯偵訊小組」（High-Value Detainee Interrogation Group）作為情報蒐集單位，利用行為科學來改善訪談技巧，並篩除成效不彰的方法（其中許多是虐待）。

[9] 原註：社會剝奪（social deprivation）不僅僅是人類的痛苦。最能說明這種殘酷影響的例子之一，就是一九六〇年代，心理學家哈利．哈洛（Harry Harlow）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麥迪遜分校進行的恆河猴實驗。他將一群只有幾個月大或幾歲大的幼猴隔離，剝奪其社會聯繫。他觀察到，就算只過了三十天，這些猴子就已經變得「極度不安」；一年後，他們的社會性已經被「徹底毀滅」，無法進行任何互動。牠們被釋放後，有些拒絕進食，研究人員認定這是「情緒性厭食症」（emotional anorexia）；其他猴子則陷入驚嚇狀態，瑟縮在籠子角落，身體不停抖動搖晃。年紀較大的成猴經過隔離被釋放後，看似恢復了社交性，但變得更具攻擊性。參閱 H. F. Harlow, R. O. Dodsworth and M. K. Harlow, 'Total social isolation in monkeys', *PNAS* 54, 1 (1965), 90 - 7.

[10] 原註：許多分析家都表達了這項觀點，包括加拿大皇家軍事學院知名教授，同時也是軍事精神病學史專家理查．加百列（Richard Gabriel）。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越戰退伍軍人的確切數量始終備受爭議。根據美國政府的「越戰退伍軍人再適應調查」（National Vietnam Veterans Readjustment Study）估算，越戰結束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後，有百分之十五點二（超過四十萬人）的退伍軍人仍顯示出全面性的創傷後壓力症狀；百分之三十五點八的人曾經歷「高壓戰地情境」（high levels of war zone exposure）。許多精神病學家認為這些數字仍屬保守估計。

[11] 譯註：「嵌入性」（Embeddedness）是經濟社會學的一種概念，最早由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提出，意謂所有經濟活動都是嵌入在社會關係和制度之中，例如人際關係、社會價值、法律規範、文化習俗等。後來由美國經濟社會學者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進一步闡釋，提出「社會鑲嵌」，認為「經濟行為都是深受持續進行的社會關係之影響，因而經濟行為（指有企圖的行為）是鑲嵌在具體的、持續性的社會關係之上。」（周新富，二〇一八）

[12] 譯註：此即一九九六年亞特蘭大夏季奧運炸彈事件，後來被好萊塢當作題材於二〇一九年拍成電影《李察朱威爾事件》（*Richard Jewell*）。

[13] 原註：有些精神病學家聲稱哈理斯患有精神病，判斷依據幾乎完全來自他們對其日記的解讀。

[14] 原註：從演化角度解釋，對人類的老祖先而言，被排斥在群體之外意味著短壽。

結語

反思我們的社會行為能夠發人深省，因為形塑這些行為的力量相當強大，且往往超出我們可控制的範圍。然而，就是這種社會性才突顯出人類的特殊之處，使我們有別其他物種，自成一格。孤立會使人喪失能力，這並非偶然。誠如神經科學家馬修．利伯曼（Matthew D.Lieberman）在《社交天性》（*Social*）一書中提到：「此即我們大腦中天生內建的功能：主動接觸他人並與之互動。這是人類本質的特性，而非缺陷。這些社會適應（social adaptation）的能力就是使我們成為萬物之靈的關鍵。¹」

人類從眾合群的行為傾向不僅帶來愉悅滿足，也可能引發不少衝突紛爭。儘管如此，它們還是容易受到理性的制約。因此，即使會有難忍不堪的狀況，認清這些傾向，對我們其實有益無害。試想以下三種情況：

一、許多為惡的人本身並無精神疾病，就只是盲目遵從其群體規範或一味服從權威卻從不質疑。那些為惡者若知道人類生來就有順從的天性，相當容易因此誤入歧途，他們的行為是否會隨之改變？或許不無可能。

二、社會心理學家數十年來的研究顯示，恐懼會促使我們更容易往自己的小圈圈（內團體）靠攏，並激起對外團體的偏見。要是政治領袖、公眾人物、權威人士、名嘴、媒體等都能瞭解這一點，避免利用恐懼來刺激選民和炒作新聞買賣，世界是否會因此而更安全？答案毋庸置疑是肯定的。

三、我們往往喜歡和氣味相投的人——那些和自己有共同政治及文化價值觀的人——交往，這種傾向會擴大迥異群體之間的隔閡（多元文化本身就是分化對立的，除非不同文化能夠交流互動）。要是各種群體間的相互參與能夠更頻繁，社會會變得更和諧嗎？雖然很難實現，但還是很有可能。

其中有些研究成果立刻就能派上用場。無論在哪裡，只要遇見與我們不同的人，都可以開始與之交談：打破藩籬，從你我做起，讓隔閡始於基層，終於基層。其他方面的進步，則需要體制性的改革。例如，可以增修仇恨言論相關法規，將直接或間接煽動對特定族群偏見的語言或圖像列入管制範圍；或請媒體自律並達成共識，遵照比例適度報導恐怖暴力事件，類似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WHO）建議的自殺新聞報導原則^[1]，以杜絕有心人士蓄意模仿²。

以上情況是事態最嚴重時的考量，但它們絕非人類群體性唯一且最重大的影響。凝聚力（cohesion）是一種能夠使群體團結起來的心理黏著劑，能激發極致的忠誠、耐力和勇氣，還能顯著提昇上班族的工作效率和運動隊伍的表現。但俗話說過猶不及，過度強調團結精神可能會帶來反效果：無論在商界或是委員會，任何人都要小心團體迷思的危險。這種情況下，你

的同事會為了達成共識而執著於相互遷就，無法做出完整的決策。

意識到我們的社會性就能改變我們在人群中的經驗，在投資和面臨抉擇的時候，淡化我們天生的群聚本能，甚至在公共緊急事態時救自己一命。我們的日常生活也因此而豐富多彩。在團體接觸的過程中，觀察協調的肢體語言和富有感染力的動作習慣是相當有趣的事情，尤其是只有你察覺到這些現象的時候。一旦知道自己在熱情的朋友身邊就能沾染對方的開朗樂觀，遇到喪志消沉的朋友也會跟著難過悲傷，你就會感到很安心。若能體認利他行為可以學習，以及只要保持頭腦清醒並靈活應變，人人都能成為英雄，就足以振奮人心。

或許人類群性最深奧的一面，是它有助我們確立自我意識。身分認同不只建立在記憶之上，同時也建立在他人與我們的互動方式上，此即神經科學家達馬吉歐（Antonio Damasio）稱為「社會我」（the social me）的觀念³。你之所以是母親、兄弟、社工、金融家、美國人、朋友、內向的人、運動員、藝術家，都源自於別人看待你的方式。因此，自我（selfhood）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文化。在東亞的集體主義社會中，個人敘事著重在事件的背景和社會意義，歐美國文化更關注的則是個人成就。當幼兒來到人生中「恐怖的兩歲期」（terrible twos），會開始鬧獨立，但在某些非西方文化中，他們的表現不會那麼誇張，有時甚至完全不存在。

人要先有群體認同才能建構自我認同，得先團體合作才能自主。我們隨波逐流，受到許多外力牽引，但也正是與我們並

肩同行的這群人，形塑了我們的模樣。

[1] 譯註：即「六不六要原則」，包括「六不」：不要將自殺新聞放在頭版或明顯位置，且勿過度、重複報導；不要使用聳動化、合理化的描述用語，或將自殺呈現為一個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法；不要詳述自殺方式的細節；不要詳述自殺事件發生的地點；不要使用聳動化的標題；不要刊登照片、影片或社群媒體的連結。「六要」：提供正確的求助資訊；教導民眾自殺防治的事實及做法，且不散布迷思；報導如何因應生活壓力、自殺意念及尋求協助的正面新聞；謹慎報導名人的自殺事件；謹慎訪問自殺遺族或友人；留意媒體專業人士也會受到自殺新聞報導影響。（摘錄自衛福部《媒體從業人員自殺防治手冊》）

致謝

除了感謝本書提及的許多人物熱情撥冗參與，我還要感謝下列各位的協助與鼓勵：克蘿伊．科陶德、貝薩姆．法特希、娜絲拉．哈珊、露絲．梅耶（Ruth Mayer）、湯姆．匹茨辛斯基、史蒂芬．萊歇爾、卡利姆．里茲克（Karim Rizk）、薛爾頓．所羅門、克里夫．斯托得、麥克．斯特勞德（Mike Stroud）、吉妮特．泰勒、《新科學人》的傑瑞米．韋伯（Jeremy Webb）、理查．沃曼（Richard Wolman）、寰宇一家（Oneworld）出版社的各位編輯：邁克．哈普利（Mike Harpley）、凱薩琳．麥卡莉（Kathleen McCully）、羅賓．丹尼斯（Robin Dennis），最後要特別感謝我在A. M. Heath經紀公司的經紀人比爾．漢彌頓（Bill Hamilton）。

圖片來源

圖一、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冒雨聚集在美國銀行外的民眾。圖片提供：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圖二、開羅的解放廣場，攝於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一日，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於當日辭職下臺。圖片提供：半島電視臺英語頻道（Al Jazeera English）。

圖三、阿道夫．艾希曼。圖片攝影：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

圖四、所羅門．艾許的線段實驗。

圖五、紀念殉道烈士的壁畫，攝於加薩市。作者提供。

圖六、綠山男孩的會議情景。圖片提供：美國國會圖書館。

圖七、酷寒遠征隊在南極大陸上的作業實況。圖片提供：布萊恩．紐罕（Brian Newham）。

圖八、約旦河西岸地區大部分城鎮裡，巴勒斯坦居民唯一接觸到的以色列人就是士兵。作者提供。

圖九、奧古斯特．科陶德在冰天雪地中度過五個月與世隔絕的生活後，終於重見天日。圖片提供：劍橋大學史考特極地研究中心（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圖十、關塔那摩灣拘留營的牢房。圖片提供：美國陸軍莎拉．伍德（Sara Wood）。

參考資料

本書引用內容主要取自作者親身訪談，其他則另說明如下。

序言

1. 見David Cannadine, *The Undivided Past: History Beyond Our Differences* (Allen Lane, 2013), p. 5

Chapter 1

1. 引自《觀察家報》「全民的王妃——還是曇花一現的童話？」
(*People's princess - or just a fast-fading fairytale?*) 一文。二〇〇二年八月十一日。
<http://observer.theguardian.com/focus/story/0,6903,772521,00.html>.

2. James Thomas, 'From people power to mass hysteria: media and popular reactions to the death of Princess Dia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1 (2008), 362 - 76, p. 371.

3. 報導內容引自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一、十二日發行之《紐約時報》。

4. 詳見下列著作: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acobson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aul Trecott, 'The failure of the Bank of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4 (1992), 384-99; Niall Ferguson,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Allen Lane, 2008).
5. R.C.J. Hermans, A. Lichtwarck-Aschoff, K. E. Bevelander, C.P. Herman, J.K. Larsen, et al., 'Mimicry of food intake: the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eating companions', *PLoS ONE* 7, 2 (2012), e31027. doi:10.1371/journal.pone.0031027.
6. K.A. Patel and D.G. Schlundt, 'Impact of moods and social context on eating behavior', *Appetite* 36 (2001), 111-18.
7. H. Larsen, R.C. Engels, P.M. Souren, I. Granic and G. Overbeek, 'Peer influence in a micro-perspective: imitation of alcoholic and non-alcoholic beverages', *Addictive Behaviors* 35 (2010), 49-52.
8. R. Koordeman, E. Kuntsche, D.J. Anschutz, R. van Baaren and R.C.M.E. Engels, 'Do we act upon what we see? Direct effects of alcohol cues in movies on young adults' alcohol drinking', *Alcohol and Alcoholism* 46 (2011), 393-8.
9. Joanne Lumsden, Lynden K. Miles, Michael J. Richardson, Carlene A. Smith and C. Neil Macrae, 'Who syncs? Social motives and interpersonal coordin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2012), 746-51.
10. W.S. Condon and W.D. Ogston, 'Sound film analysis of normal and pathological behavior pattern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43 (1966), 338-47.
11. P. Totterdell, 'Catching moods and hitting runs: mood linkage and subjective performance in professional sport team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5 (2000), 848 - 59.

12. J.H. Fowler and N.A. Christakis, 'The dynamic spread of happiness in a large social network: longitudinal analysis over 20 years in the Framingham Heart Stud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37 (2008), a2338.

13. 引自《新科學人》(*New Scientist*)，二〇〇九年一月三日出刊，頁二五。克里斯塔吉斯研究團隊主張，還有許多行為與特質也是透過類似的社會網絡模式讓人們感到快樂——主要藉由社會規範(social norms)而非情緒傳染，這類行為包括肥胖、飲酒習慣、決定戒菸、對於網路隱私及獨處的偏好等。然而，這些主張雖然皆通過同儕審查並發表在知名期刊上，其統計分析始終備受爭議。有些學者認為，不可能單就資料推斷出受試者群聚的原因。譬如說，可能是物以類聚，因為彼此特質相近才湊在一塊。見R. Lyons, 'The spread of evidence-poor medicine via flawed social-network analysis', *Statistics, Politics, and Policy* 2 (2011), doi:10.2202/2151-7509.1024.

14. H.S. Friedman and R.E. Riggio, 'Effect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nonverbal expressiveness on transmission of emotion',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6 (1981), 96 - 104.

15. T.E. Joiner, 'Contagious depression: existence, specificity to depressed symptoms, and the role of reassurance see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1994), 287 - 96; Gerald J. Haefel and Jennifer L. Hames,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can be contagious',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2, 1 (2013), 75 - 85.

16. S.D. Pugh, 'Service with a smile: emotional contagion in the service encount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4 (2001), 1018 - 27; E. Kim and D.J. Yoon, 'Why does service with a smile make employees happy? A social interaction mode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7 (2012), 1250 - 67.

17. 許多研究來自Christakis和Fowler, 見二人合著的*Connected* (Little, Brown, 2009).
18. S. Côté and I. Hideg, 'The ability to influence others via emotion displays: a new dimension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 (2011), 53 - 71.
19. Antonio Damasio,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Body and 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99).
20. P. Ekman and W. Friesen, *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 A Techniqu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Facial Movement*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1978).
21. Paul Ekman, *Emotions Revealed: Understanding Faces and Feelings* (Times Books, 2003), p. 36.
22. Kirk Douglas, *The Ragman's Son: An Autobiography* (Simon & Schuster, 1988), p. 266.
23. 情緒傳染研究概況請見E. Hatfield, R.L. Rapson and Y. L. Le, 'Primitive emotional contagion: recent research', in J. Decety and W. Ickes (eds), *The Social Neuroscience of Empathy* (MIT Press, 2009). 深入分析請見 Elaine Hatfield, John Cacioppo and Richard Rapson, *Emotional Contagion: Studies in Emo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4. David A. Havas, Arthur M. Glenberg, Karol A. Gutowski, Mark J. Lucarelli and Richard J. Davidson, 'Cosmetic use of botulinum toxin-A affects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languag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2010), 895 - 900.
25. A. Hennenlotter, C. Dresel, F. Castrop, A. Ceballos Baumann, A. Wohlschlager and B. Haslinger, 'The link between facial feedback and neural activity within central circuitries of

emotion - new insights from botulinum toxin-induced denervation of frown muscles' , *Cerebral Cortex* 19 (2008), 537 - 42.

26. *Technology Review*, March/April 2008.

27. 'To signal is human' , *American Scientist* 98 (2010), 204 - 11, p. 207.

28. 這似乎支持了經常被提出，但最近才獲得可信數據證實的理論：社會連結最多元化的社區，經濟發展往往是最好的。見N. Eagle, M. Macy and R. Claxton, 'Network divers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Science* 328, 5981 (2010), 1029 - 31.

29. 'The new science of building great teams'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90 (April 2012), p. 65.

30. Nadav Aharony, Wei Pan, Cory Ip, Inas Khayal and Alex Pentland, 'Social fMRI: investigating and shaping social mechanisms in the real world' , *Pervasive and Mobile Computing* 7 (2011), 643 - 59.

31. Stanley Milgram, Leonard Bickman and Lawrence Berkowitz, 'Note on the drawing power of crowds of different size'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3 (1969), 79 - 82.

32. 節錄自Hatfield et al., *Emotional Contagion*, p. 190.

33. Frank J. Bernieri, J. Steven Reznick and Robert Rosenthal, 'Synchrony, pseudosynchrony, and dissynchrony: measuring the entrainment process in mother - infant interactions'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1988), 243 - 53.

34. R.B. Zajonc, P.K. Adelman, S.T. Murphy and P.M. Niedenthal, 'Convergence in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of spouses' ,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1 (1987), 335 - 46.

35. Jack Kerouac, *On the Road* (Penguin, 1991), p. 10.
36. 詳見Daniel M. Rempala, 'Cognitive strategies for controlling emotional contagio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3 (2013), 1528 - 37.
37. 範例見 F. Bernieri, J. Davis, R. Rosenthal and C. Knee, 'Interactional synchrony and rapport: measuring synchrony in displays devoid of sound and facial affec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 (1994), 303 - 11.
38. 更多關於貫序投票 (sequential voting) 的動態模式, 見S. Nageeb Ali and Navin Kartik, 'A theory of momentum in sequential voting' (2006), 下載網址:
www.kellogg.northwestern.edu/research/math/seminars/200607/kartik032807.pdf.
39. 此數據為針對消費者物價通膨所作的修正。節錄自From Robert J. Shiller, *The Subprime Solution: How Today's Financial Crisis Happened,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40. 引用多處資料, 來源包括: Patrick Bajari, Chenchuan Sean Chu and Minjung Park, 'An empirical model of subprime mortgage default from 2000 to 200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4625 (2008)。下載網址: www.nber.org/papers/w14625.
41. In Robert J. Shiller, *The Subprime Solution*, p. 45.
42. For more on the spread of vivid or easily available ideas see Timur Kuran and Cass R. Sunstein, 'Availability cascades and risk regulation', *Stanford Law Review* 51 (1999), 683 - 768.
43. Gerd Gigerenzer, 'Out of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ire: behavioral reactions to terrorist attacks', *Risk Analysis* 26 (2006), 347 - 51.

44. C.S. Enright, '9/11 anniversary media coverage: anxiety and expectations of future terrorist attack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18th Annual Convention, New York, May 2006.

45. First in 'Learning to expect the unexpected', *Edge: The Third Culture* (www. edge.org), 19 April 2004.

Chapter 2

1. Robert Schofield, *The Enlightened Joseph Priestley: A Study of His Life and Work from 1773 to 1804*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xii.

2. Joseph Priestley, *An Appeal to the Public on the Subject of the Riots in Birmingham* (J. Thomson, 1791), p. 28.

3. 出處同上，頁三〇。

4.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J. Dodsley, 1790), p. 117.

5. 出處同上，頁一〇六。

6. 出自 Hippolyte Taine,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la Revolution*, vol. I (Librairie Hachette, 1896), pp. 40, 51.

7. Gabriel Tarde, 'Les crimes des foules', *Archives de l' anthropologie criminelle* 7 (1892), 353 - 86; 英譯見 Susanna Barrows, *Distorting Mirrors: Visions of the Crowd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44.

8. Scipio Sighele, *La foule criminelle: essai de psychologie collective* (Felix Alcan, 1901), pp. 62 - 3.

9. Gustave Le Bon, *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Felix Alcan, 1895), 英譯版書名為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Macmillan, 1896), p. 19.

10. Will Self, 'When it comes to riots, it's all relative', *New Statesman*, 22 August 2011.

11. Le Bon, *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12. Gustave Le Bon, *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 (Felix Alcan, 1894); Gustave Le Bon, 'La psychologie des femmes et les effets de leur éducation actuelle', *Revue Scientifique* 46, 15 (1890), 449 - 60; Gustave Le Bon, 'Recherches anatomiques et mathématiques sur les lois des variations du volume du cerveau et sur leurs relations avec l'intelligence', *Revue d'Anthropologie*, 2nd series, 2 (1879), 27 - 104, quotations pp. 60 - 1.

13. Sigmund Freud, *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 (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1921).

14. Hilaire Belloc, 'A force in Gaul', *On Something* (Methuen, 1910), p. 160.

15. Le Bon, *The Crowd*, p. 68.

16. 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 book 2, ch. 21.

17. Émile Zola, *Germinal*, book 4, ch.7. 英譯見 Barrows, *Distorting Mirrors*, p. 101.

18. 收錄於 *The Long Valley* 短篇故事集 (William Heinemann, 1939), p. 137.

19. P.G. Zimbardo, 'The human choice: individuation, reason, and order vs. deindividuation, impulse, and chaos', in W. J. Arnold and D. Levine (eds),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9), pp. 237 - 307.

20. Ann Coulter, *Demonic: How the Liberal Mob Is Endangering America* (Random House, 2011).

21. 出自The Daily Caller部落格，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http://dailycaller.com/2012/08/15/why-liberals-behave-the-way-they-do/>.

22. 「無領袖群眾」(leaderless crowd)的現代觀念最早由保加利亞作家卡內提(Elias Canetti)提出。他在一九六〇出版的《群眾與權力》(*Crowds and Power*) (英文版於一九六二年由Victor Gollancz發行)一書中提到，領導者不能用傳統理論派的作法來指揮群眾，而群眾更有可能回過頭來利用領導者。這項論點後來演變成有關領導本質的精彩辯論，昆士蘭大學的哈斯拉姆(Alex Haslam)等社會心理學家認為，最成功的領導者憑藉的不是普世公認的人格特質，而是能否充分反映並迎合其追隨者的社會認同。他們本身就是群體特色的具體展現。前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往往被認為是個失敗的領導者，但發生九一一事件後，人氣卻扶搖直上，這是因為他對於當時美國人民心中最深刻的恐懼不安公開表達認同。更多論述見哈斯拉姆《領導的新心理學》(*The New Psychology of Leadership*, Psychology Press, 2010)。

23. 見S.D. Reicher, 'The St Pauls' riot: an explanation of the limits of crowd action in terms of a social identity model',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 (1984), 1 - 21, p. 17. 本研究係依據事件當時及結束後，針對參與者進行的大規模訪談和其他資料，來源包括警方、法律文件及報告、媒體傳播、新聞報導及照片等。

24. 本理論名為「精細化的群眾行為社會認同模型」(Elaborated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rowd behaviour)，更多資訊見 Stephen Reicher, 'The psychology of crowd dynamics', in Michael A. Hogg and R. Scott Tindale (eds), *Blackwell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Group Processes* (Blackwell, 2001), ch. 8.

25. 關於坎納爾委員會報告摘要，見下列網址：

www.eisenhowerfoundation.org/docs/kerner.pdf.

26. 自從一九九九年美國西雅圖召開的WTO部長會議場外發生暴動抗議事件（又稱「西雅圖之戰」）後，尤其在特別注重維安的後九一一年代，美國政府機關幾乎已經放棄以談判為主的維安策略，改採遏制、監控及先發制人逮捕的作法，稱為「策略性的遏止削弱」。見Patrick F. Gillham, 'Securitizing America: strategic incapacitation and the policing of protest since the 11 September 2001 terrorist attacks', *Sociology Compass* 5, 7 (2011), 636 - 52.

27. Clifford Stott and Geoff Pearson, *Football Hooliganism: Policing and the War on the English Disease* (Pennant Books, 2007), p. 218.

28. Stott and Pearson, *Football Hooliganism*, p. 78.

29. 出處同上，頁一二七。關於更多當時場邊蘇格蘭球迷與英格蘭球迷行為的差異，見Clifford Stott, Paul Hutchison and John Drury, '“Hooligans” abroad? Inter-group dynamics, social 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disorder” at the 1998 World Cup Final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0, 3 (2001), 359 - 84.

30. 關於二〇〇四年歐錦賽期間，警方戰術、群眾事件及社會動態等詳細分析，見Clifford Stott, Otto Adang, Andrew Livingstone and Martina Schreiber, 'Tackling football hooliganism: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public order, policing and crowd psychology',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14, 2 (2008), 115 - 41; also Clifford Stott, Otto Adang, Andrew Livingstone and Martina Schreiber, 'Variability in the collective behaviour of England fans at Euro2004: “hooliganism”, public order policing and soci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7, 1 (2007), 75 - 100.

31. Clifford Stott, 'Crowd psychology & public order policing: an overview of scientific theory and evidence'.呈交 HMIC

公眾抗議維安檢討小組，2009。

32. 出自www.hmic.gov.uk/publication/adapting-to-protest/.

33. 更多關於警方聯絡官的角色職責及初期績效分析的詳細說明，見 Clifford Stott, Martin Scothern and Hugo Gorringer, 'Advances in liaison based public order policing in England: human rights and negotiating the management of protest', *Policing* 7, 2 (2013), 212 - 26.

34. 'Sussex police unleash their new weapon: "crowd psychology"', Indymedia. co.uk, 8 June 2012.

35. Speech to Parliament, 11 August 2011.

36. 'Punish the feral rioters, but address our social deficit too', *Guardian*, 5 September 2011,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sep/05/punishment-rioters-help>.

37. 'Theresa May: the lessons I learned from the report on the summer riots', *Daily Mail*, 18 December 2011,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075540/Theresa-May-lessons-SHE-learnt-weeks-LSE-report-summer-riots.html>.

38. BBC TV news, 7 August 2011.

39. Roger Ball and John Drury, 'Representing the riots: the (mis)use of figures to sustain ideological explanation', *Radical Statistics* 106 (2012), 4 - 21.

40. House of Commons Home Affairs Committee, *Policing Large Scale Disorder: Lessons from the Disturbances of August 2011*. Sixteenth Report of Session 2010 - 12, vol. II (Oral and written evidence), Q93.

41. 出自倫敦都警察署的電子郵件。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42. Home Office, 'An overview of recorded crimes and arrests resulting from disorder events in August 2011' (2011), p. 5.

43. 'Punish the feral rioters', Guardian, 5 September 2011.

44. 該研究後來出版，書名為*Reading the Riots: Investigating England's Summer of Discontent* (Guardian Shorts e-book, 2011)。見 www.guardian.co.uk/uk/series/reading-the-riots.

45. 最終報告於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公布，可從下列網址下載：
<http://riotspanel.independent.gov.uk/wp-content/uploads/2012/03/Riots-Panel-Final-Report1.pdf>.

46. Stephen Reicher and Clifford Stott, *Mad Mobs and Englishmen: Myths and Realities of the 2011 Riots* (e-book, Constable & Robinson, 2011).

47. 'Reading the riot actors', *New Scientist*, 17 September 2011, p. 30.

48. 引自《衛報》報導 'Facebook riot calls earn men four-year jail terms amid sentencing outcry', *Guardian*, 16 August 2011, <http://www.theguardian.com/uk/2011/aug/16/facebook-riot-calls-men-jailed>.

49. 數據引自英國司法部「統計資料專區」：二〇一一年八月六日至九日公眾騷亂。二〇一二年九月更新。

50. *Reading the Riots: Investigating England's summer of discontent* (Guardian Shorts, 2011), <http://www.theguardian.com/uk/2012/jul/03/courtroom-profiles-reading-the-riots>.

51. 引自內倫敦地方法院（Inner London Crown Court）桑德斯法官針對德蘇茲案的判決意見。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52. Julian V. Roberts and Mike Hough, ‘Sentencing riot-related offending: where do the public stand?’ ,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3, 2 (2012), 234 - 56.

53. John Drury, Chris Cocking and Steve Reicher, ‘The nature of collective resilience: survivor reactions to the 2005 London bombing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27, 1 (2009), 66 - 95, p. 79.

54. 訪談出自《經濟學人》部落格 ‘Seven years since 7/7’ , Economist blog, 6 July 2012,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blighty/2012/07/london-bombings>.

55. *Drury et al.*, ‘Nature of collective resilience’ , p. 82.

56. 出處同上。

57. John Drury, Chris Cocking and Stephen Reicher, ‘Everyone for themselv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rowd solidarity among emergency survivors’ ,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8, 3 (2009), 487 - 506.

58. John Drury, David Novelli and Clifford Stott, ‘Psychological disaster myths in the perception and management of mass emergencies’ ,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3, 11 (2013), pp. 2259 - 70.

59. *Drury et al.*, ‘Everyone for themselves?’ , p. 10.

60. 由希爾斯堡事件獨立調查小組於二〇一二年九月確認。見 *Hillsborough: The Report of the Hillsborough Independent Panel* (House of Commons, September 2012)。下載網址：

http://hillsborough.independent.gov.uk/repository/report/HIP_report.pdf.

61. 九一一事件民眾應變行為的相關資料來源如下：1. *Federal Building and Fire Safety Investigation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Disaster: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Safety Team on the Collapses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Towers* (NIST NCSTAR 1, 2005); 2. E.R. Galea, L. Hulse, R. Day, A. Siddiqui, G. Sharp, K. Boyce, L. Summerfield, D. Canter, M. Marselle and P.V. Greenall, 'The UK WTC 9/11 Evacuation Study: an overview of the methodologies employed and some preliminary analysis', in W.W.F. Kligsch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4th Pedestrian and Evacuation Dynamics* 2008 (Springer Verlag, 2010), pp. 3 - 24.

62. 部分詳細內容首見於 'What would you do?',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4, 7 (20 April 2009).

63. *AIR 8/88. Report on the Accident to Boeing 737-236, G-BGJL at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22 August 1985* (United Kingdom Air Accidents Investigation Branch, 1988), p. 135.

64. B.E. Aguirre, D. Wenger and G. Vigo, 'A test of the emergent norm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ological Forum* 13, 2 (1988), 301 - 20.

65.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Claassen Verlag, 1960; in English, Victor Gollancz, 1962), ch. 1.

66. Reicher, 'St Pauls' riot', p.16.

67. Shruti Tewari, Sammyh Khan, Nick Hopkins, Narayanan Srinivasan and Stephen Reicher, 'Participation in mass gatherings can benefit well-being: longitudinal and control data from a North Indian Hindu pilgrimage event', *PLoS One* 7, 10 (2012), e47291. doi: 10.1371/journal.pone.0047291.

68. <http://improveeverywhere.com/missions>.

69. Ashraf Khalil, *Liberation Square: Inside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birth of a Nation* (St Martin's Press, 2011), p. 123.

70. Zeynep Tufekci and Christopher Wilson, 'Social media and the decisio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protest: observations from Tahrir Squa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 2 (2012), 363 - 79.

71. Khalil, *Liberation Square*, p. 164.

72. Duncan Watts, 'Can the flap of a butterfly's wings on Facebook stir a rev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本文於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發表於網站：www.everythingisobvious.com.

Chapter 3

1. 'Eichmann and the private conscience' by Martha Gellhorn, *The Atlantic Monthly*, February 1962, <http://www.theatlantic.com/past/docs/issues/62feb/eichmann.htm>.

2. William L. Hull, *The Struggle for a Soul* (Doubleday, 1963), p. 40.

3. 出自萊斯為 *Eichmann Interrogated: Transcrip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Israeli Police* 所寫引言（第xix頁）。該書由Bodley Head出版社於一九八三年出版，作者為Jochen von Lang和Claus Sibyll。值得注意的是，萊斯也表示他發現艾希曼是個狡猾的騙子，且毫無悔意。

4. David Cesarani, *Eichmann: His Life and Crimes* (William Heinemann, 2004), pp. 16, 367.

5. Barry Ritzler, in Eric Zillmer, Molly Harrower, Barry Ritzler and Robert Archer, *The Quest for the Nazi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Nazi War Criminals* (Lawrence Erlbaum, 1995), pp. 8 - 9.
6. 出處同上。
7.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Faber and Faber, 1963), p. 253.
8. Cesarani, *Eichmann*, p. 16.
9. From 'On Hannah Arendt' , in Melvyn A. Hill (ed.), *Hannah Arendt: The Recovery of the Public World* (St Martin' s Press, 1979).
10.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Dictatorship' . Lecture 1964. The Hannah Arendt Papers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Series: Speeches and Writings File, 1923 - 75.
11. 節錄自米爾格倫妻子亞莉珊卓收藏的手稿，被引用在湯瑪士．布拉斯 (Thomas Blass) 的書中。見Thomas Blass, *The Man Who Shocked the World* (Basic Books, 2004), p. 8.
12. Stanley Milgram, *The Individual in a Social World: Essays and Experiments* (Addison-Wesley, 1977), p. 126.
13. 更多詳細內容見 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Tavistock, 1974).
14.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pp. 49, 54, 87 - 8.
15. 關於一系列完整的服從實驗，詳細內容及刊載結果的原始期刊論文資料可參考前註。

16. Jerry M. Burger, 'Replicating Milgram: would people still obey today?' , *American Psychologist* 64, 1 (2004), 1 - 11. Also see Blass, *Man Who Shocked the World*, appendix C.

17. W. Kilham and L. Mann, 'Level of destructive obedience as a function of transmitter and executant roles in the Milgram obedience paradigm'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9, 5 (1974), 692 - 702.

18. Letter to Henry Riecken, head of social science at the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21 September 1961, quoted in Blass, *Man Who Shocked the World*, p. 100.

19.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p. 6.

20. S.E. Asch (1951), 'Effects of group pressure upon the modification and distortion of judgment' , in H. Guetzkow (ed.), *Groups, Leadership and Men* (Carnegie Press, 1951).更完整的解釋，見艾許《社會心理學》 (*Social Psychology*) (Prentice-Hall, 1951).

21. S.E. Asch, '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 , *Scientific American* 193 (1955), 31 - 5, p. 35, 可參考網址 www.panarchy.org/asch/social.pressure.1955.html.

22. Read D. Tuddenham, 'The influence of a distorted group norm upon individual judgment' ,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terdisciplinary and Applied* 46 (1958), 227 - 41. See also Read D. Tuddenham and Philip D. McBride, 'The yielding experiment from the subject' s point of view'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7, 2 (1959), 259 - 71.

23. Asch, '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 .

24. Rod Bond and Peter B. Smith, 'Culture and conformity: a meta-analysis of studies using Asch' s (1952b, 1956) line judgment task'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9, 1 (1996), 111 - 37.

25. 這些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文化傾向非常難改變。史丹佛大學的心理學家在二〇一三年發表的研究顯示，歐洲裔美國人對於呼籲大家團結合作以促成變革的公眾訴求興趣缺缺，但對於鼓勵他們要負起責任的訴求，例如二〇〇八年歐巴馬總統引用甘地名言的競選口號「成為你想看見的改變」(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反應卻更熱烈。但相較之下，亞裔人士似乎對於共同利益更有興趣。MarYam G. Hamedani, Hazel Rose Markus and Alyssa S. Fu, 'In the Land of the Free, interdependent action undermines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2013), 189 - 96.

26. 出自Philip Zimbardo's introduction to the 2009 paperback edition of Stanley Milgram's *Obedience to Authority*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改編自哈佛法學院法律與心智科學學程 (The Project on Law and Mind Sciences at Harvard Law School) 網站，網址如下 <http://thesituationist.wordpress.com/2009/04/16/zimbardo-on-milgram-and-obedience-part-ii/>.

27. 關於史丹佛監獄實驗研究更多細節，見P.G. Zimbardo, *The Psychological Power and Pathology of Imprisonment*. A statement prepared for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No. 3, Hearings on Prison Reform,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25 October 1971; Philip Zimbardo, *The Lucifer Effect* (Random House, 2007); and www.prisonexp.org.

28. Zimbardo, *Psychological Power*, p. 154.

29. 出處同上，頁一五四。

30. 出自實驗後所拍攝的影片，網址：www.prisonexp.org.

31. Zimbardo, *Psychological Power*, p. 211.

32. 完整報告可見下列網址：
www.cbsnews.com/stories/2004/04/27/60ii/main614063.shtml.

33. Zimbardo, *Psychological Power*, p. 328.

34. 此引用內容最早見於〈They made me do it〉, *New Scientist*, 14 April 2007, p. 42.

35. Irving L. Janis, 'Group identific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external danger',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36 (1963), 227 - 38.

36. 此引用內容最早見於〈They made me do it〉, *New Scientist*, 14 April 2007, p. 42.

37. F.D. Richard, C.F. Bond and J.J. Stokes-Zoota,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 psychology quantitatively described',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7 (2003), 331 - 63.

38. Details in Ariel Merari, *Driven to Death: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Suicide Terror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9. 更多例子可見Claude Berrebi, 'Evidence about the link between education, poverty and terrorism among Palestinians', *Peace Economics, Pea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13, 1 (2007), doi: 10.2202/1554-8597.1101; Alan Krueger, *What Makes a Terrorist: Economics and the Roots of Terror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40. 克勞德．白萊比 (Claude Berrebi) 與其他人指出，雖然貧窮不是誘使一般人成為自殺恐怖分子的主因，但集體貧窮與經濟剝奪更可能使得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自願犧牲。見 Ephraim Benmelech, Claude Berrebi and Esteban F. Klor,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suicide terrorism',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320, August 2010.

41. See Bruce Hoffmann, *Inside Terror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42. 傷亡人數統計來自以色列外交部及以色列人權團體卜采萊姆 (B'Tselem) (英譯: the Israeli Informatio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43. Some of this detail first appeared in ‘This is how we live’, *New Scientist*, 11 May 2002, p. 40.

44. Scott Atran, *Talking to the Enemy: Faith, Brotherhood, and the (Un)making of Terrorists* (Ecco, 2010), p. 7.

45. Merari, *Driven to Death*, pp. 174 – 5.

46. 引自下列機構的研究成果：巴勒斯坦研究中心（Center for Palestine Research and Studies），網址：www.pcpsr.org；耶路撒冷媒體與傳播中心（Jerusalem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網址：www.jmcc.org。

47. 更多有關恐怖主義的團體歷程，見Marc Sageman, *Leaderless Jiha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and Ariel Merari, ‘Social, organiz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suicide terrorism’, in Tore Bjorgo (ed.), *Root Causes of Terrorism* (Routledge, 2005), pp. 70 – 86.

48. 雖然自殺炸彈客的動機不見得都出自於宗教因素，但宗教的確有助取得大家對以族群而號召的利他行為（包括自殺炸彈攻擊）的支持。然而二〇〇九年一項針對巴勒斯坦穆斯林、以色列猶太人和其他宗教團體的心態研究顯示，這種支持並非取決於信仰的虔誠度（如禱告頻率），而是透過集體的宗教儀式（如上清真寺或猶太教堂做禮拜的頻率）凝結而成。換句話說，關鍵不在於信仰本身，而是透過共同信仰衍生而來的群體意識。見Jeremy Ginges, Ian Hansen and Ara Norenzayan, ‘Religion and support for suicide attack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 2 (2009), 224 – 30.

49. Peng Wang, ‘Women in the LTTE: birds of freedom or cogs in the wheel?’,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Law* 4, 1 (2011), 100 – 8.

50. Some analysts, such as Peng Wang, claim the women were also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overturn conventional Tamil gender

role。有些分析家，如王鵬（音譯），認為女性加入的動機也包括想要翻轉坦米爾社會傳統的性別角色。見Wang, ‘Women in the LTTE’.

51. 本研究更多細節可見 Merari, *Driven to Death*; Ariel Merari *et al.*,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suicide bombers and organizers of suicide attack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2, 1 (2009), 87 - 101; ‘A psychologist inside the mind of suicide bombers’, *New Scientist*, 17 July 2010, p. 45.

52. 取自位於美國華盛頓的中東媒體研究所（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翻譯的影片訪談文字稿，內容見以下網址：
www.memritv.org/clip_transcript/en/3157.htm.

53. Adam Lankford, *The Myth of Martyrdom*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10.

54. 出處同上，見附件A。

55. 出自本書作者電子信件，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56. 見下列網址
http://adamlankford.com/mythofmartyrdom_reviews.htm.

57. Herbert C. Kelman, ‘The social context of torture: policy process and authority structure’, in Ronald D. Crelinsten and Alex P. Schmid (eds), *The Politics of Pain: Torturers and Their Masters*. Series on State Violence, *State 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s* (Westview Press, 1995), pp. 21 - 38, quotation p. 23.

Chapter 4

1. 引用自法蘭索瓦．羅沙（Francois Rochat）及安得魯．莫迪里亞尼（Andre Modigliani）合撰 ‘The ordinary quality of resistance: from

Milgram's laboratory to the milage of Le Chambon' ,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1, 3 (1995), 195 - 210, p. 199.

2.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p. 85.

3. 引用自茨維坦．托多洛夫 (Tzvetan Todorov) 著作,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1), p. 66.

4. 更多有關二戰期間保加利亞社會認同的深入探討, 見 S. Reicher, C. Cassidy, I. Wolpert, N. Hopkins and M. Levine, 'Saving Bulgaria's Jews: an analysis of social identity and the mobilisation of social solidarity' ,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2006), 49 - 72.

5. 該機構網站: www.humboldt.edu/altruism/index.html.

6. Samuel P. Oliner and Pearl M. Oliner, *The Altruistic Personality: Rescuers of Jews in Nazi Europe* (Free Press, 1988), p. 96.

7. 更多格魯寧格的故事收錄於Francois Rochat and Andre Modigliani in Thomas Blass (ed.), *Obedience to Authority: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Milgram Paradigm* (Psychology Press, 1999), p. 91.

8. 關於耶夫蒂奇的故事, 詳情見Eyal Press, *Beautiful Soul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9. Paul Rusesabagina, *An Ordinary Man* (Bloomsbury, 2009), p. 248.

10. Perry London, 'The rescuers: motivational hypotheses about Christians who saved Jews from the Nazis' , in J. Macaulay and L. Berkowitz (eds), *Altruism and Helping Behavior* (Academic Press, 1970), pp. 241 - 50.

11. 引用自舒韋斯在一場種族屠殺及宗教研討會上的致詞內容。該研討會由美國加州佩柏戴恩大學 (Pepperdine University) 法學院主辦，於二〇〇七年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期間舉行。

12. Oliner and Oliner, *Altruistic Personality*, p. 169.

13.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ppendix II.

14. Eva Fogelman, *Conscience and Courage: Rescuers of Jews during the Holocaust* (Cassell, 1995), p. 254.

15. 史塔伯撰寫專文，深入探討自身童年經驗與研究工作的關聯，見 Samuel Totten and Steven Leonard Jacobs (eds), *Pioneers of Genocide Studies* (Transaction, 2002), pp. 479 – 504.

16. 有關童年社會化的探討，可參閱下列著作：Ervin Staub, *The Roots of Goodness: Inclusive Caring, Moral Courage, 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 and Active Bystand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及 *Overcoming Evil: Genocide, Violent Conflict, and Terror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 22.

17. 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91.

18. Oliner and Oliner, *Altruistic Personality*, p. 167.

19. 出自於一九八九年與政治學者克里斯汀．夢露 (Kristen Renwick Monroe) 的訪談內容，並收錄在其著作中： *The Heart of Altruism: Perceptions of a Common Human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05.

20. John Donne, *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 Meditation XVII, 1624.

21. Tenzin Gyatson, the Dalai Lama, *Ancient Wisdom, Modern World: Ethic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Little, Brown, 1999), p. 170.

22. Sam McFarland, Matthew Webb and Derek Brown, 'All humanity is my ingroup: a measure and studies of identification with all human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3, 5 (2012), 830 - 53. 「全人認同量表」見下列網址：
www.ravansanji.ir/?Escale7003IWAHS.

23. 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Harper and Row, 1954), p. 138.

24. 出自津巴多與芝諾·法蘭柯 (Zeno Franco) 合著的 *The Banality of Heroism: Taxonomy, Types and Theory* 未出版的原稿，由作者親自提供。這段話後來被引用在其他著作中，如 *Greater Good*, Fall/Winter 2006 - 7, pp. 30 - 5.

25. 出處同上。

26. Umberto Eco, 'Why are they laughing in those cages?', in *Travels in Hyperreality: Essays*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p. 122.

27. 出自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內，艾許克羅夫特勳爵藝廊「戰地英豪特展」上放映的影片。

28. 出自查瓦斯的通信紀錄，收藏於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

29. 出自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內，艾許克羅夫特勳爵藝廊「戰地英豪特展」陳列的證詞手稿。

30. 見紀錄片《維多利亞英雄點將錄》 (*Victoria Cross Heroes*)。

31. 出自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內，艾許克羅夫特勳爵藝廊「戰地英豪特展」的致詞內容。

32. 更多探討可參閱以下著作：1. Stephen D. Reicher and S. Alexander Haslam, 'After shock? Towards a social identity

explanation of the Milgram “obedience” stud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0 (2011), 163 – 9; 2. Stephen D. Reicher, S. Alexander Haslam and Joanne R. Smith, ‘Working toward the experimenter: reconceptualizing obedience within the Milgram paradigm as identification-based followership’,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7, 4 (2012), 315 – 24; 3. S.A. Haslam and S.D. Reicher, ‘Contesting the “nature” of conformity: what Milgram and Zimbardo’s studies really show’, *PLoS Biol* 10, 11 (2012), e1001426, doi:10.1371/journal.pbio.1001426.

33. Stephen Reicher and S. Alexander Haslam, ‘Rethinking the psychology of tyranny: the BBC prison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5 (2006), 1 – 40.

34. 見哈斯拉姆與萊歇爾合撰的專文 ‘When prisoners take over the prison: a social psychology of resista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 2 (2012), 154 – 79.

35. 計畫網址: <http://heroicimagination.org>.

36. 更多內容詳見史塔伯著作《征服邪惡》（*Overcoming Evil*, 書名暫譯），頁三六九到三八六。

37. 在某些情況下，旁觀者效應沒那麼顯著，例如：1. 當旁觀者與受害者都是女性時；2. 若旁觀者是陣中唯一的男性時；3. 旁觀者彼此認識。關於這些條件差異的測試研究，參閱S. Levine and S. Crowther, ‘The responsive bystander: how social group membership and group size can encourage as well as inhibit bystander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 6 (2008), 1429 – 39。近年相關文獻回顧，參閱P. Fischer, J.I. Krueger, T. Greitemeyer, C. Vogrincic, A. Kastenmüller, D. Frey, M. Heene, M. Wicher and M. Kainbacher, ‘The bystander-effec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n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dangerous and non-dangerous emergenc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 4 (2011), 517 – 37.

38.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p. xvi.

39.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Polity Press, 1989), pp. 166 – 8.

40.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Faber and Faber, 1963), p. 288.

41. David DeSteno and Piercarlo Valdesolo, *Out of Character* (Crown, 2011), p. 9.

42. 有人針對戰時波蘭納粹黨工的角色與內心衝突，進行了詳盡而極富啟發性的研究，參閱Mary Fulbrook, *A Small Town Near Auschwitz: Ordinary Nazis and the Holocau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apter 5

1. Ira Allen, *The Na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Vermont, On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W. Myers, 1798).

2. 出自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前佛蒙特州報編輯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的講稿。出處：佛蒙特州立檔案館（位於佛蒙特州的米德薩克斯）。

3. The papers of Henry Stevens, 1739 – 1775 collection, Vermont State Archives: *Narrative of Proceedings of the Government of New York on New Hampshire Grants*, September 1774.

4. J. Kevin Graffagnino, Samuel B. Hand and Gene Sessions (eds), *Vermont Voices, 1609 through the 1990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Green Mountain State* (Vermont Historical Society, 1999), p. 40.

5. Willard Sterne Randall, *Ethan Allen: His Life and Times* (Norton, 2011), p. 38.

6. Donald A. Smith, 'Green Mountain Insurgency: transformation of New York's forty-year land war', *Proceedings of the Vermont Historical Society* 64 (1996), 197 - 235, p. 223.

7. 出自伊森·艾倫 (Ethan Allen) 於一八七五年五月十一日寫給麻薩諸塞州議會的信件中。收錄於亨利·史提芬斯文件集，一七七〇至一七八六年，佛蒙特州立檔案館。

8. 《亨利五世》 (*Henry V*) 第四幕第三景。

9. Gerald F. Linderman, *Embattled Courage: The Experience of Combat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Free Press, 1987), p. 34.

10. Dora L. Costa and Matthew E. Kahn, *Heroes and Cowards: The Social Face of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also this 2003 paper by the same authors: 'Cowards and heroes: group loyalty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2 (2003), 519 - 48.

11. 出自Saxton Collection,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lifornia. 引用自James M. McPherson, *For Cause and Comrades: Why Men Fought in the Civil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7.

12. Samuel A. Stouffer, Edward A. Suchman, Leland C. DeVinney, Shirley A. Star and Robin M. Williams, Jr.,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World War II: The American Soldi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13. Irving L. Janis, 'Group identific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external danger',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36 (1963), 227 - 38, p. 227.

14. S.L.A. Marshall, *Men Against Fire: The Problem of Battle Command* (William Morrow, 1947).

15. 節錄自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有聲檔案所保存的訪談錄音，謄錄於Max Arthur, *Forgotten Voices of the Great War*,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Ebury Press, 2002), p. 200.

16. Grace McDougall, *A Nurse at the War: Nursing Adventures in Belgium and France* (Robert McBride, 1917), p. 55. 引用於Janet Lee, 'Sisterhood at the front: friendship, comradeship, and the feminine appropriation of military heroism among World War I First Aid Nursing Yeomanry (FANY)',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1 (2008), 16 - 29.

17. F.T. Jesse, 'The first Aid Nursing Yeomanry: a personal impression of the FANY camps in France - girls who are doing yeoman service', *Vogue*, May 1916, pp. 54-5. Quoted in Lee, 'Sisterhood at the front'.

18. 出自美國諾克斯維爾市（Knoxville）田納西大學「二戰退伍軍人研究計畫」（World War II Veterans Project, Special Collections）特集未發表的備忘錄。引用於 John C. McManus, *The Deadly Brotherhood: The American Combat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Presidio Press, 1998), p. 324.

19. Leonard Wong, Thomas A. Kolditz, Raymond A. Millen and Terrence M. Potter, *Why They Fight: Combat Motivation in the Iraq War*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3), p. 10.

20. 群體凝聚力是否為決定作戰成效的關鍵條件，各界始終爭論不休。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羅伯特．麥克康恩（Robert MacCoun）等人表示：「所有證據在在顯示，軍隊的表現取決於作戰人員是否齊心一致，全力投入共同目標，而非他們是否彼此欣賞。」參閱Robert J. MacCoun, Elizabeth Kier and Aaron Belkin, 'Does social cohesion determine motivation in combat? An old question with an old answer', *Armed Forces & Society* 32, 4 (2006), 646 - 54.

21. Wong et al., *Why They Fight*, p. 9.

22. 達瑞爾·韓德森 (Darryl Henderson) 針對現代軍隊內部凝聚力的動能有相當精彩的探討，參閱Darryl Henderson, *Cohesion: The Human Element in Combat. Leadership and Societal Influence in the Armies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North Vietnam, and Israel*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3. Edward A. Shils and Morris Janowitz, '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e Wehrmacht in World War II',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2, 2 (1948), 280 - 315, p. 281.

24. 社會學家羅伯特·史密斯 (Robert B. Smith) 認為，影響向心力、領導統御及「戰鬥精神」三者關係的關鍵變因，就是士兵所遵從的軍方權威是否具有正當性。在越戰後期，美國陸軍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因為它在美國國內缺乏政界及民眾的支持，且作戰行動已經呈現疲態。見R. Smith (1983) 'Why soldiers fight', *Quality and Quantity* 18 (1983), 1 - 58. 美國陸軍目前仍以晉升作為衡量成功的首要標準，針對此組織結構的評論認為，部隊的凝聚力會因此犧牲，因為軍官的替換速度太快了，就像越戰那樣。批評者之一是史考特·哈爾特 (Scott Halter) 中校，他服役十七年，目前在國防部擔任戰略規劃師。他表示，幾年前他的旅被派往阿富汗，即使該旅十二名負責執行與作戰的營級主管中，有八人尚未與其單位完成訓練，他們還是毅然接下任務。接下來的十四個月，在部署該旅戰力時，有百分之四十六的軍官被調離。哈爾特表示，這種情形「削弱了部隊的凝聚力、持久力和戰鬥力。」參閱Scott M. Halter, 'What is an Army but the soldiers?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Army's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system', *Military Review* (Jan - Feb 2012), 16 - 23. 更多有關人事安排如何影響美國陸軍部隊凝聚力的分析，見Donald Vandergriff, *Raising the Bar: Creating and Nurturing Adaptability to Deal with the Changing Face of War*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2006).

25. 更多有關行軍、舞蹈及其他同步儀式的心理效益之探討，參閱William H. McNeill, *Keeping Together in Time: Dance and Drill in Human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also Barbara Ehrenreich, *Dancing in the Streets: A History of Collective Joy* (Metropolitan, 2006).

26. 參閱S.S. Wiltermuth and C. Heath, 'Synchrony and cooper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 (2009), 1 - 5.

27. 詳細內容可參閱網站: www.icea.ox.ac.uk/research/ritual.

28. 丹麥學者迪米特里·西加拉塔 (Dimitris Xygalatas) 發現, 在完全不同的環境背景下, 儀式的強度和群體認同 (本例視為利社會性 (prosociality)) 之間存在相關性。在非洲模里西斯每年舉辦印度教節日上, 參與者會進行一項相當殘忍痛苦的儀式, 用大量的針、鉤、叉子來穿刺身體。這些人對於當地寺廟活動投入的程度, 顯然比單純來唱歌祈禱的民眾高出許多。參閱D. Xygalatas, P. Mitkidis, R. Fischer, P. Reddish, J. Skewes, A.W. Geertz, A. Roepstorff and J. Bulbulia, 'Extreme rituals promote prosocial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8 (2013), 1602 - 5.

29. Wong *et al.*, *Why They Fight*, p. 13.

30. Janis, 'Group identification', p. 229.

31. 引用於Alfred O. Ludwig, 'Neuroses occurring in soldiers after prolonged combat exposure', *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linic* 11, 1 (1947), 15 - 23, p. 18, taken here from Joanna Bourke, *An Intimate History of Killing* (Granta, 1999), pp. 145 - 6.

32. 精神科醫生稱之為「道德傷害」 (moral injury), 被定義為心理創傷, 因為做了與根深柢固的道德信仰相衝突的事而導致, 例如殺人或未能完成自認該做的事, 如拯救戰友使其免於一死。道德傷害可能引發一連串的病態行為, 包括酗酒、吸毒、嚴重的輕率行為、自殺傾向、逃避成功或正面情緒、困惑、絕望和自我厭惡等。患者可能也會開始覺得自己道德敗壞、無可救藥, 或者認為自己生活在道德淪喪的世界中。參閱 Brett T. Litz, Nathan Stein, Eileen Delaney, Leslie Lebowitz, William P. Nash, Caroline Silva and Shira Maguen, 'Moral injury and moral repair in war veterans: a preliminary model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9, 8 (2009), 695 - 706.

33. Erich M. Remarque,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Putnam, 1929), p. 232.

34. 感謝英國皇家空軍慈善基金會 (Royal Air Force Benevolent Fund) 協助筆者與艾倫取得聯繫。
35. Roy R. Grinker and John P. Spiegel, *Men Under Stress* (Blackiston, 1945), pp. 23 - 4.
36. Janis, 'Group identification'.
37. 出自菲佛為凱文的葬禮所寫的悼文，該儀式於二〇〇年二月九日星期六，在紐約市舉行。
38. 出自「人生故事庫口述歷史計畫」 (StoryCorps oral history project) 的訪談錄音 (地點在紐約州鮑德溫，完整內容見網站：<http://storycorps.org/listen/stories/john-vigiano-and-his-wife-jan>) 以及CBS電視公司紀錄片 *9/11: The Fireman's Story*。
39. Terry Golway, *So Others Might Live: A History of New York's Bravest - The FDNY from 1700 to the Present* (Basic Books, 2002), p. 70.
40. Joseph W. Pfeifer, 'Understanding how organizational bias influenced first responders at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Bruce Bongar et al. (eds),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07 - 15.
41. *Federal Building and Fire Safety Investigation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Disaster: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Safety Team on the Collapses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Towers*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2005).

Chapter 6

1. Mike Stroud, *Shadows on the Wasteland* (Jonathan Cape, 1993), p. 24.

2. 出處同上，頁一〇六至一〇七。
3. 出處同上，頁一〇七。
4. 引用自「酷寒遠征隊」媒體公關小組提供的新聞資料。
5. Stroud, *Shadows on the Wasteland*, pp. 102 - 3.
6. 部分引用出自斯特勞德接受筆者訪談之內容，刊登於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新科學人》頁三十五。
7. 出自英國廣播公司第四臺（BBC Four）紀錄片節目《時光荏苒》（Timeshift）專題：〈Antarctica: Of Ice and Men〉，於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播出。
8. Roger Mear and Robert Swan, *In the Footsteps of Scott* (Jonathan Cape, 1987), p. 78.
9. Apsley Cherry-Garrard, *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Constable, 1922), ch. 7, p. 246.
10. Gloria R. Leon, Gro Mjeldheim Sandal and Eric Larsen, 'Human performance in polar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1, 4 (2011), 353 - 60.
11. 見她針對另一趟北極遠征的研究：美國人約翰．哈斯敦（John Huston）與泰勒．費許（Tyler Fish）自加拿大進入北極，路程長達四百七十五英哩（約七百六十四公里），歷時五十五天。參閱G. Leon, G. Sandal, B. Fink and P. Ciofani, 'Positive experiences and personal growth in a two-man North Pole expedition team',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3, 5 (2011), 710 - 31。有關本領域相關研究的概述，參閱G.M. Sandal, G.R. Leon and L. Palinkas, 'Human challenges in polar and space environments', *Review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5 (2006), 281 - 96。

12. 引用於L.A. Palinkas, 'On the ICE: individual and group adaptation in Antarctica' (2003)。下載網址：
www.sscnet.ucla.edu/anthro/bec/papers/Palinkas_On_The_Ice.pdf；可參閱L.A. Palinkas and D. Browner, 'Effects of prolonged isolation in extreme environments on stress, coping,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5 (1995), 557 - 76.

13. 更多有關馬克的冒險事蹟可參閱網站：www.markbeaumontonline.com.

14. 南極選員 (The Selection of Antarctic Personnel, SOAP) 測驗檢視各式各樣的心理因素項目，包括：情緒反應、焦慮程度、憂鬱易感性、人際技巧及人格類型等。參閱 I. Grant, H.R. Eriksen, P. Marquis, I.J. Orre, L.A. Palinkas, P. Suedfeld, E. Svensen and H. Ursin, 'Psychological selection of Antarctic personnel: the "SOAP" instrument', *Aviation,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78 (2007), 793 - 800.

15. 出自英國廣播公司第四臺 (BBC Four) 紀錄片節目《時光荏苒》(Timeshift) 專題：〈Antarctica: Of Ice and Men〉，於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播出。

16. 更多詳細內容可參閱see M. Basner, D.F. Dinges, et al., 'Mars 520-d mission simulation reveals protracted crew hypokinesia and alterations of sleep duration and timing', *PNAS* 110 (2013), 2635 - 40.

17. 更多資訊可參閱B. Van Baarsen, F. Ferlazzo, D. Ferravante, J.H. Smit, J. Van der Pligt and M.A.J. Van Duijn,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adaptation during 520 days of isolation: results from the LODGEAD Mars500 study', 發表於二〇一二年十月三日至七日在義大利拿坡里舉行的第六十三屆國際宇航大會 (the 63th International Astronautical Congress)。

18. 本段引用首次見於麥可．龐德 (Michael Bond) 專文："*Insane Antarctic winter crossing like space flight*", 參閱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新科學人》雜誌，頁三十五。

19. Robert Heller and Rebecca Stephens, *The Seven Summits of Success* (Capstone, 2005), pp. 72 - 3.

20. Cherry-Garrard,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Preface, p. vii.

21. 引自巴里 (J.M. Barrie) 於一九二二年五月三日對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生發表的校長談話，收錄於《勇氣》 (*Courage*) (Hodder and Stoughton, 1922)，頁三十二。

22. 引自Wade Davis, *Into the Silence: The Great War, Mallory, and the Conquest of Everest* (Bodley Head, 2011), p. 441.

23. 出處同上，頁三八一。

24. Jon Krakauer, *Into Thin Air* (Macmillan, 1997), p. 163.

25. Irving Janis, *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s* (Houghton Mifflin, 1982), p. 9.

26. 出處同上，頁八。

27. 引自詹姆士．曼宜伽 (James Manyika) 訪談內容。參閱 ‘Google’ s view on the future of business: an interview with CEO Eric Schmidt’ , *McKinsey Quarterly*, November 2008.

28. Cass R. Sunstein, David Schkade and Lisa Michelle Ellman, ‘Ideological Voting on Federal Courts of Appeal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 Economics, Olin working paper no. 198 (2003); University of Chicago, Public Law working paper no. 50; AEI-Brookings Joint Center working paper no. 03-9 (2003)。可於社會科學研究網 (SSRN) 下載：
<http://ssrn.com/abstract=442480> 或
<http://dx.doi.org/10.2139/ssrn.442480>.

29. C. Ferraris and R. Carveth, 'NASA and the Columbia disaster: decision-making by groupthink?', *Proceedings of the 2003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Communication Annual Convention*, p. 10.

30. J. Chein, D. Albert, L. O' Brien, K. Uckert and L. Steinberg, 'Peers increase adolescent risk taking by enhancing activity in the brain's reward circuitry', *Developmental Science* 14 (2011), F1 - F10。另參閱Margo Gardner and Laurence Steinberg, 'Peer influence on risk taking, risk preference, and risky decision making in adolescence and adulthood: an experimental stud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1, 4 (2005), 625 - 35.

31. 儘管近來研究顯示，基因與成長背景的交互影響，是決定為何有些年輕人更容易受影響而加入幫派的關鍵因素，但社會酬賞的吸引力亦提供了有力解釋。例如，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學者凱文．貝維（Kevin Beaver）等人發現，帶有多巴胺轉運體蛋白基因（dopamine transporter gene, DAT1）變體的青少年與反社會或不良同儕來往的可能性更高，但前提是他們從小就在缺乏母愛的「高風險」家庭環境長大。這正好說明一個人的性格特色或經驗與外在的群體環境如何導致行為的產生。參閱 Kevin M. Beaver, John Paul Wright and Matt DeLisi, 'Delinquent peer group formation: evidence of a gene X environment correlation',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69 (2008), 227 - 44.

32. Richard Thaler and Cass Sunstei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3. Cass R. Sunstein, *Going to Extrem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5.

34. 但在死刑、墮胎和國家安全等三大領域似乎不會產生極端分化的偏見。顯然，法官對這些議題有強烈堅定的個人觀感，不致被旁人說服。更多個案研究，參閱Cass Sunstein, David Schkade, Lisa Ellman and Andres Sawicki, *Are Judges Political?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Federal Judiciar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6).

35. ‘Conservatives remain the largest ideological group in US’ , published on Gallup.com, 12 January 2012.

36. 數據引自Bill Bishop and Robert Cushing, *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 (Marina Books, 2009).

37. Sunstein, *Going to Extremes*, p. 80.

38. 關於聖戰組織如何透過網路加深其激進思想，深入的實地分析可參閱 Mark Sageman, *Leaderless Jihad: Terror Network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39. 政治學者馬可仕．普萊爾（Markus Prior）在《後廣播民主》（*Post-Broadcast Democrac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一書中詳述了美國選民如何隨著媒體選擇愈來愈多而出現極端分化的趨勢。

40. 引自 Barbara Ehrenreich, ‘Family values’ , in *The Worst Years of Our Lives: Irreverent Notes from a Decade of Greed* (Lime Tree, 1991), p. 11.

41. 更多有關腦力激盪的研究，可參閱下列著作：N. Kohn and S. Smith, ‘Collaborative fixation: effects of others’ ideas on brainstorming’ ,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5, 3 (2011), 359 - 71; ‘Separating creativity from evaluation’ , in C. McCauley, ‘Group dynamics in Janis’ s theory of groupthink: backward and forward’ ,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73 (1998), 142 - 62, p. 153; Alan R. Dennis, Randall K. Minas and Akshay Bhagwatwar, ‘Sparkling creativity: improving electronic brainstorming with individual cognitive priming’ , *System Science (HICSS)*, 2012 45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IEEE, 2012); Nicolas Michinov, ‘Is electronic brainstorming or brainwriting the best way to improve creative performance in groups? An overlooked comparison of two idea-generation techniques’ ,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2, S1 (2012), E222 - 43.

42. 參閱Anthony T. Pescosolido and Richard Saavedra, 'Cohesion and sports teams: a review', *Small Group Research* 43, 6 (2012), 744 - 58.

43. N. Triplett, 'The dynamogenic factors in pacemaking and compet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9 (1898), 507 - 33.

44. 引用自下列網站: www.thecoldestjourney.org blog,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Chapter 7

1. 摘自Joseph Soeters and René Moelker, 'German - Dutch co-operation in the heat of Kabul', in Gerhard Kümmel and Sabine Colmar (eds), *Soldat - Militär - Politik - Gesellschaft* (Nomos, 2003), pp. 63 - 75.

2. Mark Dechesne, Coen van den Berg and Joseph Soeter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under threat: a field study in Kabul',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4 (2007), 25 - 36.

3. Ron Leifer, 'The legacy of Ernest Becker', *Psychnews International* 2, 4 (July - September 1997)。參閱網址 http://userpage.fu-berlin.de/expert/psychnews/2_4/pn24d.htm.

4. Ernest Becker, *The Denial of Death* (Simon & Schuster, 1973), p. 26.

5. Becker, *Denial of Death*.

6. Leifer, 'Legacy of Ernest Becker'.

7. 其他心理學者另外提出不同假設，試圖解釋人類何以傾向接受複雜的世界觀。例如荷蘭提堡大學 (Tilburg University) 崔維斯．普露 (Travis

Proulx) 及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史蒂芬·海涅 (Stephen Heine) 的意義維持論 (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 認為, 我們的主要動機之一是在生活中找出意義並瞭解世界, 對於死亡的恐懼只是諸多認知失調 (cognitive dissonance) 的來源之一; 正因為這些來源, 我們被迫找出各種方式來重申自我觀點 (意外結束一段關係或離開待了很久的工作可能也有同樣效果)。另外德國萊比錫大學的伊默·弗里榭 (Immo Fritzsche) 等人主張, 人在感受到威脅時, 對於自己所屬的群體會變得更加忠誠、對外人的偏見則更深, 是為了維持對於不確定局勢的個人控制感 (personal control)。關於各派不同論點的概述以及格林伯格、匹茨辛斯基、所羅門三人對此的看法, 可參閱 Tom Pyszczynski, Jeff Greenberg, Sheldon Solomon and Molly Maxfield, 'On the unique psychological import of the human awareness of mortality: theme and variations', *Psychological Inquiry* 17, 4 (2006), 328 - 56.

8. A. Rosenblatt, J. Greenberg, S. Solomon, T. Pyszczynski and D. Lyon, 'Evidence for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I.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reactions to those who violate or uphold cultural valu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 4 (1989), 681 - 90.

9. H. McGregor, J.D. Lieberman, S. Solomon, J. Greenberg, J. Arndt, L. Simon and T. Pyszczynski, 'Terror management and aggression: evidence that mortality salience motivates aggression against worldview threatening o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3 (1998), 590 - 605.

10. 暴力威脅實際上可以讓我們在自己的內團體裡更討人喜歡。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安德魯·懷特 (Andrew White) 等人發現, 在五十四個國家中, 愈注重軍隊兵力的國家, 這項人格特質的平均分數就愈高 (研究者將軍隊強弱視為該國所受到的威脅程度)。參閱 A. White, D. Kenrick, Y. Li, C. Mortensen, S. Neuberg and A. Cohen, 'When nasty breeds nice: threats of violence amplify agreeableness at national, individual, and situational leve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3, 4 (2012), 622 - 34.

11. Tom Pyszczynski, Sheldon Solomon and Jeff Greenberg, *In the Wake of 9/11: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3), p. 5.

12. 出處同上。

13. Tom Pyszczynski, 'What are we so afraid of? A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perspective on the politics of fear', *Social Research* 71, 4 (2004), 827 - 48, p. 839.

14. George Bush's speech to Congress, 20 September 2001, 出自小布希總統於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日於國會發表之演說，全文網址如下：
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64731

15. Becker, *Denial of Death*, p. 149.

16. 這些影響在所羅門等人在二〇〇三到二〇〇四年間的實驗研究中也相當明顯。這顯示讓人們想起九一一事件（即便只是下意識地喚起他們的印象），相當於提醒他們面對自己的死亡，這兩種手法都有助於刺激民眾提高對小布希的支持。參閱Mark J. Landau *et al.*, 'Deliver us from evil: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and reminders of 9/11 on support for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 9 (2004), 1136 - 50.

17. 參閱M. Farias, A.-K. Newheiser, G. Kahane and Z. de Toledo, 'Scientific faith: belief in science increases in the face of stress and existential anxie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 6 (2013), 1210 - 13.

18. Landau *et al.*, 'Deliver us from evil', study 4. 此結果在大選前六週又再次重現。參閱Florette Cohen, Daniel M. Ogilvie, Sheldon Solomon, Jeff Greenberg and Tom Pyszczynski, 'American roulette: the effect of reminders of death on support for George W. Bush in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alyses of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 5 (2005), 177 - 87.

19. Drew Westen, *The Political Brain: The Role of Emotion in Deciding the Fate of the Nation* (Public Affairs, 2007), p. xv.

20. 參閱 Dan M. Kahan, 'Ideology, motivated reasoning, and cognitive reflect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8 (2013), 407 - 24.

21. 《時代》雜誌，二〇〇四年五月三日，頁三十二。

22. 發表於二〇〇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舉行的電視轉播美國國會聯席會議。全文見以下網址：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9645

23. 二〇〇三年三月十八日於英國下議院就伊拉克問題進行辯論的開幕致詞。

24. 資料出自美國人口普查局 (US Census Bureau) 發表之《美國統計摘要》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5. 資料出自美國勞工部勞動統計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Labor)

26. 於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播出，全文網址：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32596

27. Richard M. Doty, Bill E. Peterson and David G. Winter, 'Threat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8 - 1987',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 4 (1991), 629 - 40.

28. Carl Iver Hovland and Robert R. Sears, 'Minor studies of aggression: VI. Correlation of lynchings with economic indic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terdisciplinary and Applied* 9, 2 (1940), 301 - 10. 將近半世紀後，喬瑟夫．赫普沃斯 (Joseph Hepworth) 和史蒂芬．威斯特 (Stephen West) 重新分析了霍夫蘭及希爾斯的資料集，證實了兩者之間的關聯性，雖然並不明顯。參閱 Joseph T. Hepworth and Stephen G. West, 'Lynchings and the economy: a time-series reanalysis of Hovland

and Sears (1940)',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 2 (1988), 239 - 47.

29. 對於死刑的強烈擁護常見於保守州，卻不見自由開放的州表態支持，這項事實恰好反映了恐懼管理理論的預測：人們在受到威脅時，會回復他們原來的主流文化價值觀——主張包容的自由派往往不太贊成死刑。事實上，研究結果也顯示美國自由派當道的州在威脅期間，對於死刑的支持度確實是下降的。（參閱Stewart J.H. McCann, 'Societal threat, authoritarianism, conservatism, and US state death penalty sentencing (1977 - 2004)',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4, 5 (2008), 913 - 23）

30. 有關一九三〇年代德國的社會經濟環境與群眾心理如何交互作用的經典分析，參閱德國社會心理學家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第六章（Rinehart, 1941）。

31. Thomas Ohlemacher, 'Public opin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foreigners in the reunified Germany',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23, 3 (1994), 222 - 36.

32.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29 (2012), National 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全文網址: www.bsa-29.natcen.ac.uk/

33. David Goodhart, *The British Dream: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Post-War Immigration* (Atlantic, 2013), p. xxi.

34. R.D. Putnam, 'E pluribus unum: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30 (2007), 137 - 74.

35. 見Ashutosh Varshney,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c Life: Hindus and Muslims in Ind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近來凡斯尼在斯里蘭卡、印尼、馬來西亞國內城市進行了類似研究，結果各不相同。初期分析顯示印度模式同樣適用於斯里蘭卡（例如尼甘布（Negombo）族群整合的程度相當高，向來平和穩定），但馬來西亞則不然（如吉隆坡的馬來人和華人雖然界線分明，幾乎沒有交流，但當地自一九六九年後，社會始終相當平靜）——儘管他並未發現任何例子顯示族群高度整合的社區會演變成暴力社會。因此，族群整合

似乎是實現和平的充分條件，甚至是必要條件。(‘Civil society, Islam and ethnocommunal conflict’ , in Alfred Stepan (ed.), *Democracies in Dange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36. T. Cantele, *Community Cohesion: A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Review Team* (Home Office, London, 2001), p. 9.

37. 摘自Goodhart, *British Dream*, p. 78.

38. Paul Nolan, *The Northern Ireland Peace Monitoring Report* (Community Relations Council, Belfast, 2012).

39. 參閱 G.W. Allport,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Perseus Books, 1954).

40. 網址www.theparentscircle.com.

41. 網址www.arikpeace.org.

42. 摘自一九三八年日記，引用於蘇珊．希琳洛 (Susan Shillinglaw) 對史坦貝克的介紹，見企鵝出版社 (Penguin Books) 於一九九四年發行之《人鼠之間》 (*Of Mice and Men*) 第 vii 頁。

43. Zachary K. Rothschild, Abdolhossein Abdollahi and Tom Pyszczynski, ‘Does peace have a prayer? The effect of mortality salience, compassionate values, and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on hostility toward out-groups’ ,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 4 (2009), 816 – 27.

44. Matt Motyl, Joshua Hart, Tom Pyszczynski, David Weise, Molly Maxfield and Angelika Siedel, ‘Subtle priming of shared human experiences eliminates threat-induced negativity toward Arabs, immigrants, and peace-making’ ,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 6 (2011), 1179 – 84.

45. 關於謝里夫實驗的完整說明，可參閱網站
<http://psychclassics.yorku.ca/Sherif>.

46. 更多有關以巴兩國合作實例，可參閱Daniel Gavron, *Holy Land Mosaic: Stories of Cooperation and Coexistence between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8).

47. 前倫敦都會警察署署長保羅．史蒂芬生 (Paul Stephenson) 爵士於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倫敦皇家聯合三軍研究所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發表之演說。全文見下列網址：
www.met.police.uk/pressbureau/burspeeches/page03.htm.

48. R. Gillespie and D.C. Jessop, 'Do reminders of terrorist events influence acceptance of racial pride? A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perspective' (2007) (未發表)。

49. 眾多資料來源包括：蓋洛普穆斯林研究中心 (Gallup Center for Muslim Studies) (www.gallup.com)、美國皮優公民與新聞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 (www.people-press.org/)、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歐洲穆斯林研究中心 (European Muslim Research Centre at the University of Essex) (<http://centres.exeter.ac.uk/emrc/>)

50. 在健康方面也有影響。幾項研究發現，像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戰爭這類令人悲痛的人禍，反覆接觸相關媒體報導與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及其他壓力相關疾病發病率的增加有所關聯。參閱R.C. Silver, E.A. Holman, J.P. Andersen, M. Poulin, D.N. McIntosh and V. Gil-Rivas,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effects of acute exposure to media images of the 9/11 attacks and the Iraq War',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2013), 1623 - 34.

51. 出自*Anti-Muslim Hate Crime and the Far Right*, by the Centre for Fascist, Anti-Fascist and Post-Fascist Studies at Teesside University, June 2013。資料來源：宗教慈善機構「Faith Matters」之「Tell Mama」計畫。 (www.tellmamauk.org).

52. 出自Andrew Weaver, *Keeping Our Cool: Canada in a Warming World* (Penguin, 2008).

53. Sigmund Freud,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1927), p. 16, 引用於 Pyszczyński等, 〈Drawing attention〉。

54. Cormac McCarthy, *The Road* (Alfred A. Knopf, 2006).

Chapter 8

1. 見 F. Spencer Chapman, *Northern Lights: The Offici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Arctic Air-Route Expedition 1930 - 1931* (Chatto & Windus, 1932), p. 117.

2. Diary of A. Courtauld, vol. 1, 6 July 1930 to 6 August 1931. 原稿查閱自劍橋大學史考特極地研究中心 (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 MS 123/125/126; BJ.)

3. Augustine Courtauld, *Man the Ropes* (Hodder and Stoughton, 1957), p. 65.

4. 出自科陶德日記 (Diary of A. Courtauld)

5. 出處同上。

6. 出處同上。

7. 出自他寫給未婚妻莫莉 (Mollie Montgomerie) 的信。

8. 出自科陶德日記。

9. 出處同上。

10. 本實驗更多詳細內容，參閱Woodburn Heron, 'The pathology of boredom', *Scientific American* 196 (1957), 52-6以及 Philip Solomon *et al.* (eds), *Sensory Deprivation: A Symposium Held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1. D.O. Hebb, 'The motivating effects of exteroceptive stimul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3, 3 (1958), 109-13, p. 111.

12. Chapman, *Northern Lights*, p 175.

13. 出自科陶德日記

14. Chapman, *Northern Lights*, p. 176.

15. Chapman, *Northern Lights*, p. 187.

16. 完整的遠征之旅可見下列網址：www.icecapstation.com。影片見www.gregatkins.tv/productions/ice/index.html。

17. Mollie Butler, *August and Rab: A Memoir*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7), p. 9.

18. Courtauld, *Man the Ropes*, p. 64.

19. Chapman, *Northern Lights*, p. 186.

20. Nicholas Wollaston, *The Man on the Ice Cap: The Life of August Courtauld* (Constable, 1980), p. 144.

21. J.M. Scott, *Portrait of an Ice Cap* (Chatto & Windus, 1953), p. v.

22. 完整內容為：「我們的語言明智地感知到，人類的『孤獨』有兩種面向，而創造了『孤單』來表達孤獨的痛苦，又另外創造『獨處』來彰顯孤獨的榮耀。」引自Paul Tillich, *The Eternal Now* (SCM Press, 1963), p. 11。

23. 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book 1, lines 254-5.

24. Richard E. Byrd, *Alone* (Putnam, 1938), pp. 94 - 6.

25. Byrd, *Alone*, p. 226.

26. 見Edwin P. Hoyt, *The Last Explorer: The Adventures of Admiral Byrd* (John Day Company, 1968), pp. 327 - 8.

27. Joe Simpson, *Touching the Void* (Jonathan Cape, 1988), p. 152.

28. 引自約翰．蓋格 (John Geiger) 《要不要相信第三者：尋找會救活你的影子天使》 (*The Third Man Factor*) (Canongate, 2009) 書中與梅斯納的訪談內容 (頁一五七)。另可參閱下列網站：www.thirdmanfactor.com

29. Ellen MacArthur, *Full Circle* (Michael Joseph, 2010), p.

200. 麥克阿瑟也肯定陸上團隊在心理層面上的重要性。「團隊是最棒的。每件事我們都一起完成，包括造船、上船訓練等，那種氣氛實在太美好了。我們就像一家人，力量非常強大。」 (摘自二〇一三年七月號《Engineering & Technology》雜誌訪談)。

30. 出自科陶德日記。

31. Byrd, *Alone*, p. 85.

32. 見〈The greening of the astronauts〉, *Time magazine*, 11 December 1972, p. 43.

33. 某些離群索居者聲稱他們透過閱讀來保持理智。法國旅遊作家西爾文．泰森 (Sylvain Tesson) 帶了八十本書，幾乎是一間圖書館的量，在西伯利亞貝加爾湖畔的小木屋隱居了六個月。他寫道：「書本是最好的陪伴。」 (‘Russia: solitude in Siberia’, *Guardian*, 31 May 2013, www.theguardian.com/travel/2013/may/31/siberia-cabin-lake-baikal-russia). 但他還帶了兩隻狗同行，應該也能達到類似功效。見Sylvain Tesson, *Consolations of the Forest: Alone in a Cabin in the Middle Taiga* (Alan Lane, 2013).

34. 參閱Stuart Grassian, ‘Psychiatric effects of solitary confinement’,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22 (2006), p. 357. 至於夫妻是否就不會發生上述部分問題呢？此相關研究很少。有研究調查三組被北極冰雪困在船上長達九個月的夫妻，結果顯示，若有其他情感的支持，對小團體而言是有利因素。參閱 Gloria R. Leon and Gro M. Sandal, ‘Women and couples in isolated extreme environments: applications for long-duration missions’, *Acta Astronautica* 53 (2004), 259 - 67.

35. Byrd, *Alone*, p. 16.

36. 這些訊息被他用彈弓射到一艘航經南非開普敦的船上，後來被記者丹尼斯·賀伯斯坦 (Denis Herbstein) 轉載在〈Flying Frenchman sails off to Pacific to “save my soul”〉一文中，於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刊登在《週日泰晤士報》頁三。

37. 出自瓦努努和侯南於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七日的私人通信。

38. 更多詳細說明，參閱Craig Haney, ‘Mental health issues in long-term solitary and “supermax” confinement’, *Crime and Delinquency* 49, 1 (2003), 124 - 56; *Reforming Punishment: Psychological Limits to the Pains of Imprisonment*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Books, 2006); Peter Scharff Smith, ‘The effects of solitary confinement on prison inmates: a brief history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rime and Justice* 34, 1 (2006), 441 - 528; Stuart Grassian, ‘Psychiatric effects of solitary confinement’,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22 (2006), 325 - 83.

39. 此數據範圍係根據許多研究估算而來。參閱 David Lovell, ‘Patterns of disturbed behavior in a supermax population’,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35, 8 (2013), 985 - 1004。值得注意的是，在入獄前就患有精神疾病或腦部損傷的囚犯比例為何，始終沒有確切的統計數據。

40. 數據來自加州矯正局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Rehabilitation)

41. Grassian, 'Psychiatric effects of solitary confinement', pp. 331 - 2.

42. 部分內容出自 'Does solitary confinement breach the Eighth Amendment?', *New Scientist* online, 29 June 2012。參閱網址: 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dn21992-does-solitary-confinement-breach-the-eighth-amendment.html.

43. Craig Haney, 'Taming the dynamics of cruelty in supermax prison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35 (2008), 956 - 84.

44. 出自〈Detention in Afghanistan and Guantanamo Bay: Statement of Shafiq Rasul, Asif Iqbal and Ruhel Ahmed〉第一九九段，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刊出。.

45. 若構成「嚴重的精神痛苦或折磨」，使用隔離監禁就違反了《日內瓦公約》和國際人道法。二〇一一年十月，聯合國刑求特派調查員呼籲全世界禁止一般監獄實施隔離監禁，稱之為一種「與監獄系統的目標——矯治（rehabilitation）背道而馳的嚴厲手段」。參閱 'Solitary confinement should be banned in most cases, UN expert says', UN News Centre, 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40097。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傾向採個案審查，決定隔離監禁是否構成虐待，然亦宣布「原則上不可取，應該避免。」參閱ICRC Israel/Occupied Territories E-Newsletter, August 2012.

46. Sarah Shourd, 'Tortured by solitude', *New York Times*, 5 November 2011.

47. 見 'Saying no to Saddam', *New Scientist*, 26 June 2004, p. 44.

48. Ahmed Errachidi, *The General: The Ordinary Man who Challenged Guantanamo* (Chatto & Windus, 2013), p. 132.

49. Terry Waite, *Taken on Trust* (Hodder & Stoughton, 1993), p. 241.

50. Brian Keenan, *An Evil Cradling* (Hutchinson, 1992); Terry Anderson, *Den of Lions: Memoirs of Seven Years in Captivity* (Hodder & Stoughton, 1993).

51. John McCain, *Faith of My Fathers: A Family Memoir* (Random House, 2008), p. 201.

52. Field Manual 2-22.3: Human Intelligence Collector Operations.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006.

53. 'Saying no to Saddam', *New Scientist*, 26 June 2004, p. 44.

54. 本段部分出自《新科學人》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刊登之 *The enforcer* 一文。

55. Tillich, *Eternal Now*, p. 12.

56. 社會排斥的確會造成「疼痛」。這與其他情緒反應不同，遭到拒絕會激發大腦詮釋身體痛覺的區塊，例如背側前扣帶迴皮質（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和前島（anterior insula）。參閱 Ethan Kross, Marc G. Bermana, Walter Mischel, Edward E. Smith and Tor D. Wager, 'Social rejection shares somatosensory representations with physical pain', *PNAS* 108, 15 (2011), 6270 - 5. 針對此發現的一種解釋是，對於人類的祖先而言，被群體或部落隔絕在外，足以威脅生存，就和身體受傷是一樣的。

57. 更多資料請參閱：S.W. Cole, 'Social regulation of human gene express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 3 (2009), 132 - 7; John T. Cacioppo and Louise C. Hawkley, 'Perceived social isolation and cogni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3, 10 (2009), 447 - 54; John T. Cacioppo, Louise C. Hawkley, Greg J. Norman and Gary G. Berntson, 'Social isolatio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231 (Social Neuroscience: Gene, Environment, Brain, Body) (2011), 17 - 22; and

Lisa M. Jaremka, ‘Loneliness promotes inflammation during acute stress’ ,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7 (2013), 1089 – 97.

58. John T. Cacioppo and William Patrick, *Loneliness: Human Nature and the Need for Social Connection* (W.W. Norton, 2008), p. 5.

59. 關於制度化環境對大腦及行為發展影響的研究，參閱美國杜蘭大學、馬里蘭大學和波士頓兒童醫院共同進行的「布加勒斯特早期療癒計畫」(Bucharest Early Intervention Project) :
www.bucharestearlyinterventionproject.org.

60. 關於卡喬波針對孤單問題進行的研究型行動計畫，詳細內容參閱 Cacioppo and Patrick, *Loneliness*, ch. 13.

61. Dave Grossman, *On Killing: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 (Little, Brown, 1995), p. 290.

62. Stephani L. Hatch, Samuel B. Harvey, Christopher Dandeker, Howard Burdett, Neil Greenberg, Nicola T. Fear and Simon Wessely, ‘Life in and after the Armed Forces: social networks and mental health in the UK military’ ,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35, 7 (2013), 1045 – 64, p. 1048.

63. Deirdre MacManus, Kimberlie Dean, Margaret Jones, Roberto J. Rona, Neil Greenberg, Lisa Hull, Tom Fahy, Simon Wessely and Nicola T. Fear, ‘Violent offending by UK military personnel deployed to Iraq and Afghanistan: a data linkage cohort study’ , *The Lancet* 381, 9870 (2013), 907 – 17.

64. Roy R. Grinker and John P. Spiegel, *Men Under Stress* (Blackiston, 1945), p. 454.

65. Angus Macqueen, ‘Los 33: Chilean miners face up to a strange new world’ , *Observer*, 17 July 2011。紀錄片 *Chilean Miners*:

17 Days Buried Alive於二〇一一年八月在英國廣播公司第二臺（BBC 2）上映。

66. Theodore Kaczynski, 'The Unabomber manifesto: industrial society and its future', 全文見下列網址 <http://editions-hache.com/essais/pdf/kaczynski2.pdf>.

67. 派克特目前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精神病學及法律學程的顧問。更多有關她針對單獨恐怖分子的研究，參閱Terry Turchie and Kathleen Puckett, *Hunting the American Terrorist: The FBI's War on Homegrown Terror* (History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68. C. McCauley, S. Moskalenko and B. Van Son, 'Characteristics of lone-wolf violent offenders: a comparison of assassins and school attackers',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7, 1 (2013), 4 - 24.

69. Mark R. Leary, Robin M. Kowalski, Laura Smith and Stephen Phillips, 'Teasing, rejection, and violence: case studies of the school shootings', *Aggressive Behavior* 29 (2003), 202 - 14.

70. William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Henry Holt, 1890), vol. 1, ch.10, p. 293.

結語

1. Matthew D. Lieberman, *Social: Why Our Brains Are Wired to Conne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9.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uicide Prevention, *Preventing Suicide: A Resource for Media Professionals* (2008).

3. 見Antonio Damasio, *Self Comes to Mind: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 (Pantheon, 2010), p. 23.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失控的群體思維：從同儕壓力到同溫層效應，人的一舉一動
都逃不出「群性」 / 麥可·龐德 (Michael Bond) 著；林士葵
譯.-- 初版.-- 臺北市：方言文化，2020.08

面：公分

譯自：The Power of Others

ISBN 978-957-9094-67-2 (平裝)

1. 社會心理學 2. 社會關係

541.7

109005390

失控的群體思維

從同儕壓力到同溫層效應，人的一舉一動都逃不出「群性」

The Power of Others

作 者 麥可·龐德 (Michael Bond)

譯 者 林士葵

總 編 輯 鄭明禮

責任編輯 邱昌昊、廖桓偉

版 權 部 莊惠淳

業 務 部 康朝順、葉兆軒、林子文、林姿穎

企 劃 部 林芳如、王文伶、李偲嫻

管 理 部 蘇心怡、張淑菁

封面設計 兒日設計

內頁設計 李偉涵

出版發行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 50041064

電 話 (02) 2370-2798

傳 真 (02) 2370-2766

定 價 新臺幣 450 元，港幣 150 元

初版一刷 2020 年 8 月 5 日

I S B N 978-957-9094-67-2

方言文化

版權所有，未經同意不得重製、轉載、翻印

Printed in Taiwan

The Power of Others

Copyright © 2014, Michael Shaw Bon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M. Heath & Co.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Babel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Table of Contents

[序言](#)

[Chapter 1 情緒變色龍](#)

[Chapter 2 群眾心理學](#)

[Chapter 3 惡的平庸](#)

[Chapter 4 平民英雄](#)

[Chapter 5 患難兄弟情](#)

[Chapter 6 生命共同體](#)

[Chapter 7 凝聚團結的恐懼](#)

[Chapter 8 看不見的陪伴](#)

[結語](#)

[致謝](#)

[圖片來源](#)

[參考資料](#)